

# 俄国 1820 年代关于普希金的论争

## ——《现代人》的“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溯源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19世纪50年代中期俄国文学的一场大争论“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其源头要追溯到20年代关于普希金的论争。当时重要的批评力量都参与到了普希金评论中:格拉戈列夫、沃耶伊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别斯图热夫、雷列耶夫、波列沃伊、韦涅维季诺夫、布尔加林、杰利韦格、纳杰日金、基里耶夫斯基、舍维廖夫、波戈金、米·德米特里耶夫、普列特尼约夫等。这是真正的众声喧哗,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萌芽的现实主义甚至政治用意的争论中,普希金处于批评的漩涡中。如果从刊物角度看,参与到批评中的有《欧洲导报》《祖国之子》《北方蜜蜂》《莫斯科电讯》《文学报》《莫斯科导报》等,虽然不构成一对一的论争,但在对待普希金创作的态度上,大致前三者的否定多于肯定,后三者的肯定多于否定。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大致看出后来发展为特定术语的“普希金倾向”的内涵。

**关键词:**1820年代;普希金;论争;“普希金倾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01-06

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俄国文学有一场大争论,即“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这场争论到60年代余波渐息,70—80年代又复燃。而在1850年代自由派与民主派之间的争论就常常表现为其参与者是文学中的“普希金倾向”的捍卫者,还是“果戈理倾向”的捍卫者。

当梳理这场争论时,我们发现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其源头来讨论。因而笔者往前回溯到了19世纪40年代、30年代直至20年代关于普希金、果戈理的争论。弄清这场争论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同时,弄清普希金生前死后关于他的争论以及关于果戈理的争论的详细过程,对于理解50年代的争论并非毫无裨益。

别林斯基40年代(1843—1846年间)撰写过11篇关于普希金的系列文章,在第一篇中他提到:“赞美与谴责的喊声,无论在诗人生前还是死后,一刻也

没有停歇过,他的每一部新作品,不论对公众或是对享有特权的文学法官们,都曾经是引起纷争的苹果。”<sup>[1]6</sup>这里别林斯基讲的时段“诗人生前还是死后”即是普希金创作的20—30年代。别林斯基的论断有着充分的文学事件支撑。对普希金推崇赞美者有之,否定反对者有之;钦慕转而反对者有之,谩骂、攻击者有之……其间主要有三次重大争论:20年代两次——围绕《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南方长诗的争论和围绕《奥涅金》的争论;30年代一次——即围绕《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争论。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先讨论20年代的两次争论。

### 一、围绕《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南方长诗的论争

从20年代的批评来看,似乎普希金的每一部作品都带给俄罗斯文学此前没有的某种新东西,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诗歌领域,留给批评家最普遍的

**收稿日期:**2022-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化研究与翻译30余年。

感觉就是普希金的革新作用,无论这种革新是被赞成还是反对。关于诗人的革新作用在20年代中期已经明显地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正是在关于《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争论中成熟的。

1820年代基于作家批评家对文学生活中新兴思潮的不同态度,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圈子,分别获得了“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称呼。围绕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争论,一方面是著名的正统古典主义与新兴浪漫主义之争的继续,一方面也是浪漫主义内部“斯拉夫者—浪漫主义者”与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卡拉姆辛派—浪漫主义者”之争的发展——这一争论因卡捷宁与茹科夫斯基的叙事诗而起。但是普希金长诗自身的一些因素,如“轻浮地”、戏谑地处理英雄情节,尤其是具有“平民”因素的风格,不仅与古典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悖,也与既拒绝斯拉夫主义也拒绝俗语的平民的表达及上流社会的口语化倾向的卡拉姆辛派的诗歌实践相悖;这就不难解释属于卡拉姆辛派的伊·伊·德米特里耶夫以及卡拉姆辛本人对长诗的激烈反应。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首先受到来自古典主义的指责。1820年第11期《欧洲导报》发表安·加·格拉戈列夫<sup>①</sup>的文章《给编辑部的信》,他把普希金的长诗作为与茹科夫斯基的叙事诗一类的当代文学新流派看待,文章作者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普希金诗歌与民间口语诗歌的联系,激烈反对在他看来是“对基尔沙·丹尼洛夫<sup>②</sup>的戏仿”因素进入崇高的诗歌领域;把崇高的诗歌建立在民歌基础上,在他看来是愚蠢的玩笑。

另外,对长诗发难的是亚·费·沃耶伊科夫<sup>③</sup>在《祖国之子》上发表的评论文章《〈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评析》。他同样以“高雅品味”为标准,遵循布瓦洛的诗歌原理,严格区分体裁和风格,坚持语义的单义性,批评普希金长诗体裁的不确定性,内容和风格的神奇和俗语因素。这些因素是被普希金严肃地带进诗歌的。沃耶伊科夫的核心关切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语言和风格,不接受诗人对作为诗歌材料的词语的新态度——这种新态度使得在塑造情感形象时词语众所周知的含义被减弱了或取消了;他还攻击长诗的轻浮和“优雅的情色”,指责长诗的一些画面和形象的“性冲动”,这里同时暗含了指责长诗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倾向。实际上绝不含有政治性的长诗,却让他联想起“在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末”法国大量出现的一类作品,它们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文学的衰落,也意味着道德的败坏”<sup>[2]73</sup>;他似

乎在《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捕捉到了某种自由思想的气息和批评态度,从而把它作为“为革命作了准备”的一类诗歌之列。其实这是将文学浪漫主义作为政治中的自由主义理解的结果。这些论说决定了古典主义者对普希金的基本态度。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及随后的长诗《高加索囚徒》《巴赫奇萨拉的喷泉》《茨冈人》,则被浪漫主义者认为给俄国文学带来了革新,其中两种因素尤为突出:“异域景物描写”与“当代人物性格”。但是,在肯定“异域景物描写”的同时,维亚泽姆斯基在文章《论〈高加索囚徒〉》和《出版者与古典主义者的谈话》(给《茨冈人》的前言)中,提出了主人公的“当代性”问题,否定其中的主人公性格的塑造,认为把主人公塑造为那种被迫的“无所作为”的性格,其中缺失了“英雄主义”和“崇高性”。要求主人公应该具有英雄主义和崇高性,不仅是古典主义的美学,也是取而代之的浪漫主义(包括所谓的消极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积极浪漫主义——英雄浪漫主义)的美学要求——应当揭示普通状态下的人的英雄主义和心灵的崇高性,尤其是十二月党人的美学要求——他们期待以英雄浪漫主义的艺术教育社会。这样,普希金不仅被古典主义责难,也被应该说是自己圈子的人责难。他的长诗被作为与古典主义的“高雅”、与自己的浪漫主义阵营的“英雄主义”相悖而受到指责。

## 二、围绕《奥涅金》的争论

对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否定观点不仅由维亚泽姆斯基在上述两文中鲜明地表达出来,几乎与《茨冈人》同时发表的《奥涅金》(第1章)在别斯图热夫、雷列耶夫与普希金之间也引起一场友好争论,两位友人同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甚至将《奥涅金》(第1章)评价得比《喷泉》和《囚徒》还要低,以至于不是《奥涅金》而是《茨冈人》才代表了此时普希金才华的高度。这场争论使普希金受到极大震动,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奥涅金》所迈出的具有革新性的一步,让他进一步思考诗歌的对象,为自己的转向——转向对“低级的天性”,平常的、中等的、非英雄人物的关切——找到合理的论证。普希金在《奥涅金》中选取新的现实现象,也是对艺术使命的某种新理解。但此时不仅不被外界接受,甚至被理解都是不可能的。

《奥涅金》(第1章)的发表还引发了另一场争论:在《莫斯科电讯》出版人及批评家尼·波列沃伊与“爱智慧派”的韦涅维季诺夫(文章主要发表在

《祖国之子》)之间的激烈互动。这依然属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争论。

尼·波列沃伊初始评论普希金时,即是在关于浪漫主义的争论中。他属于浪漫主义批评的社会、哲学、历史批评方法中历史批评的代表,在这一方面,他是别林斯基及其系列普希金批评的直接先驱。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其都有评述,后者的《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第一章整个就是关于波列沃伊的。波列沃伊关于普希金的评述主要有五篇专论:《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5)<sup>[3]</sup>、《论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1829)、《论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sup>[4]</sup>(1833)、《普希金》(1837)。其中第一篇首次发表于自己的杂志《莫斯科电讯》1825年第5期。在创办该杂志之初,波列沃伊就期望吸引普希金为固定撰稿人,他在杂志第一期批评栏目的首篇文章《1824年俄国文学观察》(1825年第1期)中,就已经强调了普希金“无可置疑的伟大的天才”和“其诗歌对当代人的强烈影响”<sup>[4]242</sup>;而在第一篇专论《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继续沿用这一评价。在论《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文章中,他将普希金解读为俄国文学浪漫主义阶段的最高体现:“如果杰尔查文是自己时代俄国精神的完整代表,普希金就是至今我们这个时代俄国精神的完整代表。”<sup>[5]234</sup>对于诗人的所有作品,他均采用浪漫主义美学范畴看待,因此在他那里,普希金20年代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以及《波尔塔瓦》《莫扎特和萨利里》(将其看作富于激情的浪漫主义戏剧)都获得了他的高度评价。随着《奥涅金》的不断发表,波列沃伊进行追踪评述(1827、1828年分别评论《奥涅金》第2、4、5、6章,1829、1830、1832年再评再版的第1、7、8章,1833年又评《奥涅金》单行本),他高度赞美诗人的自由精神和反成规——反古典主义的陈规。不过,波列沃伊在分析《鲍里斯·戈都诺夫》具体文本时,则因作品偏离了他所认为的浪漫主义戏剧规范而开始指摘、否定诗人。关于此,笔者将另辟文论述。

《奥涅金》(第1章)发表后,韦涅维季诺夫发表在《祖国之子》上的《评1825年〈莫斯科电讯〉第5期上发表的关于〈奥涅金〉的文章》<sup>[5]</sup>即是对上述波列沃伊第一篇专论的回应。他强调,批评家(这里指波列沃伊)可以拒绝古典主义的美学要求,但没有权力藐视艺术的一般规律。他认为过分吹捧有害诗人,提醒批评家和读者需要更审慎地对待诗人,静观诗人的未来,而不要急于下判断。<sup>[6]</sup>紧接着,波列沃伊发文《关于〈奥涅金〉的纷争》<sup>[6]</sup>再回应韦涅维

季诺夫,反驳他对自己文章的误解。韦涅维季诺夫继续撰文《答波列沃伊》<sup>[7]</sup>。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波列沃伊所论述的普希金与拜伦的关系,诗人究竟是不是模仿拜伦,有没有独创性。这是关于诗人的模仿性与独创性的第一次争论。波列沃伊站在浪漫主义立场上维护普希金的独创性,韦涅维季诺夫则站在古典主义美学原则上认为诗人是对“典范”的模仿。他们激烈争论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比其他许多人都更为了解当代浪漫主义风潮的普列特尼约夫早在1822年的文章《普希金的中篇〈高加索囚徒〉》中就已提及,他开篇这样写道:“中篇〈高加索囚徒〉是以最新的英国诗歌类型写的,它们尤其在拜伦那里最常见。”<sup>[7]116</sup>对于普列特尼约夫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诗歌类型的开端,普希金的诗歌应当被看作此类,应当按照这种“新类型”来分析普希金的诗歌。也就是说,他认为普希金同样是在创作一种新类型的诗歌,像拜伦一样;也许并非模仿,而是与拜伦同步进行着整个诗歌类型的革新。不过,普列特尼约夫在性情上是相当谨慎且传统的批评家,他也仅在文章开篇如是起笔,接下来,浪漫主义规范就被他忘记了,他并没有按照新的、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看待普希金,而是依旧按照古典主义的规范评价他,得出拜伦与普希金创作的“形象雷同”的结论,这样就没有揭示出普希金的独创性。到此时《奥涅金》(第1章)发表,独创性问题在波列沃伊与韦涅维季诺夫的争论中成了焦点。此后伴随着《奥涅金》每章的发表,众多人物参与到这一争论中。也正是从这一场争论起,对普希金天才的创造力开始质疑。一般来说,这种否定的最强音通常以布尔加林的说法——普希金的天才“完全衰落”了——为代表。

如果撇开布尔加林在“十二月党人事件”中的不光彩行为及在新闻出版业中的低劣做法而与普希金关系恶化,单论他对普希金创作的评价,我们看到他对诗人早期的才华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在评论《巴赫奇萨拉尔的喷泉》(1824年)<sup>[8]</sup>、《奥涅金》(第2章)(1826年)<sup>[9]</sup>以及《波尔塔瓦》(1829年)<sup>[10]</sup>时,他都高度赞美普希金,但到《奥涅金》第7章发表(1830年)时,则称其天才“完全没落”了:“我们首先认为这是一部恶作剧,简直就是笑品或滑稽作品。如果书商不给确认,简直不敢相信这第7章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作者的作品。两个小印张的第7章完全被那些诗句和噱头(玩笑)破坏了,甚至将《叶甫盖尼·韦利斯基》<sup>[11]</sup>与它们对比一下,两者还真有点像呢。在这个空洞无物的第7章,没有任何思想、任何情感、任何画面、任何值得称道的见解。

完全没落了! 完全失败了(法语: chute complete)! 因此我们的希望落空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作者渴望到高加索,被崇高的诗意滋养一下,丰富一下新的印象,在甜美的歌声中向年轻一代转达俄国当代英雄们的伟大功绩。我们原认为,东方的伟大事件<sup>⑧</sup>,令世界惊奇不已,获得了俄罗斯所有有教养人的尊重,必定会唤醒我们诗人们的天赋——但我们错了!”<sup>[8]232</sup>“整个导言和插笔,所有外部不相干事物的那些描写毫无意义,以至于我们不愿相信这些蝇头小作还可以发表! 自然,像在先前几章那样,在本章中作者也常常诉说自己的苦闷、厌倦和自己心灵的死亡,似乎一切都陷入黑暗云云。”<sup>[8]233</sup>“整个第7章除了第36、37诗节,没有任何闪光的诗句。”<sup>[8]235</sup>我们知道,第36、37诗节是对莫斯科的描写,却又被布尔加林指为是对《智慧的痛苦》的模仿。所以这唯一闪光的诗句又是模仿,就更是无讽刺与贬损的意味。

针对布尔加林对《奥涅金》第7章的否定性评论,立即有反驳的声音。布尔加林的文章登于1830年3月的《北方蜜蜂》,杰利韦格于4月立即在《文学报》做出反击:“《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以自己的优美比一切捍卫者都更好地捍卫了自己。除了《北方蜜蜂》外,没有人在对莫斯科的描写中找出对《智慧的痛苦》的模仿。”<sup>[9]236</sup>杰利韦格还揭示出普列特尼约夫关于《奥涅金》的评论中所没有明示的普希金的独特性:奥涅金已经不是拜伦的主人公,而是俄国人的忧郁。

与波列沃伊、布尔加林各自出于自己的立场(或美学或政治或其他原因),肯定普希金早期而否定其后创作相反,有另一种声音,就是纳杰日金的评述。1828—1829年开始发表自己第一批文章的纳杰日金,批评当代文学死气沉沉,其原因是浪漫主义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对普希金截至此时的创作的否定。

纳杰日金是19世纪仅次于波列沃伊的新闻界活动家,也是俄国思想史上描述虚无主义现象的第一人,著有《虚无主义的一群》(1829)。2002年普罗佐洛夫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中,称纳杰日金为“普希金时代的新闻业中最复杂与矛盾的人物之一”,“愚蠢而不知深浅地攻击普希金的南方诗歌和《奥涅金》”<sup>[10]186</sup>。这是指他1829年的两篇文章《两部诗体中篇〈舞会〉和〈努林伯爵〉》《论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以及1830年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奥涅金〉(第7章)》。在分析《奥涅金》第7章时,纳杰日金忠实于自己在论《努林伯爵》和《波

尔塔瓦》中的观点,即普希金的创作热衷于离奇的故事和日常生活的描写;《奥涅金》新发表的这一章内容贫乏;以诗人的才能来看,他可创作的范围狭小局限。别林斯基后来驳斥说:“一位大批评家甚至公然写文章说,《奥涅金》没有完整性,只是诗的废话,东拉西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sup>[1]538</sup>指的就是纳杰日金关于《奥涅金》第7章的评论。纳杰日金的这些文章发表在《欧洲导报》上(亦即其生平活动的《欧洲导报》时期,后来1831年他创办自己的刊物《望远镜》,我们称为纳杰日金的《望远镜》时期),在对待普希金早期诗歌上的否定态度,构成了与《莫斯科电讯》的波列沃伊和《北方蜜蜂》的布尔加林的肯定性评论的争论。纳杰日金认为,我们周围的自然是理性的和谐的统一,艺术的目的就要揭示事物隐藏着的和谐,隐藏着的理性;同理,艺术本身也隐藏着自己的规律。揭示它们——这就是艺术应当走向的最高的目标。而浪漫主义过于主观的创作,无法抵达这一最高目标。就是在此基础上纳杰日金否定“浪漫主义和拜伦主义”,否定普希金南方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品,甚至《奥涅金》第7章,尽管此时《奥涅金》显然已经具有了另一种诗学特点。需要指出的是,他虽然否定“浪漫主义和拜伦主义”,但并不妨碍他肯定拜伦的意义,以及他对普希金与拜伦关系的敏锐见解,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将普希金与拜伦放在一起比较,因为普希金完全是另一种“诗歌倾向”——吸引普希金的是讽刺(或戏仿)和怪诞离奇情节<sup>[11]168,405</sup>。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表面看此时纳杰日金的手对手布尔加林也开始否定《奥涅金》(第7章),但后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有研究认为,布尔加林的否定性文章其实有明显的政治告密意味<sup>[12]457-458</sup>,甚至他开始从美学上否定普希金也是意欲彻底击溃诗人的声望,因为当时,20年代末期,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声望渐长,这可以从基里耶夫斯基1828年在《莫斯科导报》发表的《论普希金诗歌的特点》中看出。该文系最早确立了普希金创作“三阶段说”<sup>⑨</sup>及其内在发展逻辑;并认为第三阶段是其最高阶段——证明就是《奥涅金》前五章(截至他写文章时)和《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的发表。在《1829年的俄国文学观察》(1830)一文中,基里耶夫斯基又将普希金放在欧洲文学生活的语境中加以考察,高度评价他的多维度性和客观性。在文中基里耶夫斯基认为,19世纪第一个三十年的俄国文学具有与普希金创作三阶段类似的进程,并且普希金成熟时期的创作是俄国文学第三阶段最鲜明的现象。这一

阶段可以命名为“俄国诗歌的普希金时期”<sup>⑩</sup>(之前两阶段是:卡拉姆辛时期和茹科夫斯基时期<sup>[13]207</sup>)。

在基里耶夫斯基的评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对普希金某种新特点的肯定:他非常多地着笔于普希金“对现实的尊重”、对生活的所有面向均予以关注而非仅仅看重生活的高级现象的特点。实际上这比较符合我们前述普希金本人意识到的自己的艺术转向——“对现实的尊重”,意味着他对现实现象的新选择;“对生活的所有面向均予以关注”——意味着同样也关切“低级的”、非英雄人物。基里耶夫斯基的评述是俄国普希金批评的转折点,也开启了俄国19世纪30年代的普希金批评(另辟文探讨)。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当时重要的批评力量都参与到了关于普希金的评论中:格拉戈列夫、沃耶伊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别斯图热夫、雷列耶夫、波列沃伊、韦涅维季诺夫、布尔加林、杰利韦格、纳杰日金、基里耶夫斯基。另外,还有舍维廖夫,波戈金、索莫夫、米·德米特里耶夫,以及我们前述提到的普列特尼约夫等。这是真正的众声喧哗,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萌芽的现实主义甚至政治用意的争论中,普希金处于批评的漩涡中。如果从刊物角度看,参与到批评中的有《欧洲导报》《祖国之子》《北方蜜蜂》《莫斯科电讯》《文学报》《莫斯科导报》等,虽然不构成一对一的论争,但在对待普希金创作的态度上,大致前三者的否定多于肯定,后三者的肯定多于否定。在《祖国之子》(韦涅维季诺夫)与《莫斯科电讯》(波列沃伊)之间,《欧洲导报》(纳杰日金)与《莫斯科电讯》(波列沃伊)之间,《北方蜜蜂》(布尔加林)与《文学报》(杰利韦格)之间关于普希金的争论中,以及《莫斯科导报》(基里耶夫斯基)对普希金地位的确立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后来发展为特定术语的“普希金倾向”的内涵:内容与风格上,从高雅走向通俗,从严肃走向“轻浮”,从英雄走向非英雄,从崇高走向“低级”;同时,这样也不意味着抛弃前者,而是对生活的所有面向的关注与包容。这些为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通俗”“轻浮”“低级”“非英雄”,是相对于古典主义观念的,但普希金本人并不认可他是非严肃的。相反,他反对后来越来越商业化的文学创作和刊物运作。该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探讨过,这里不再赘述。

注释:

①安·加·格拉戈列夫(Андрей Гаврилович Глаголев,1793或1799—1844),俄国学者,文学博士,历史学家,俄罗斯

文学爱好者协会的活跃会员。

②基尔沙·丹尼洛夫(Кирша Данилов),推测是俄国第一部勇士歌、民歌、抒情诗集《古代俄国诗歌》的编撰者。该诗歌集1804年出版,1818年再版。

③亚·费·沃耶伊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Воейков,1778或1779—1839),俄国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出版人,新闻人,俄国科学院院士(1819)。

④此前《鲍里斯·戈都诺夫》第1、2幕发表时,波列沃伊也有评论。1831年又有札记《论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发表于《莫斯科电讯》第2期,但篇幅很短。1833年再发同名长文,不仅论述《鲍里斯·戈都诺夫》,也是整体论述普希金的创作。

⑤发表于《祖国之子》1825年第8期。

⑥发表于《莫斯科电讯》第15期:Н. А. Полевой. Толки о《Евгении Онегине》, соч. А. С. Пушкина. 见: <http://pushkin-lit.ru/pushkin/articles-pri-zhizni/067.htm>.

⑦发表于《祖国之子》1825年第19期:Д. В. Вeneвитинов. Ответ г. Полевому. 见: <http://pushkin-lit.ru/pushkin/articles-pri-zhizni/068.htm>.

⑧Ф. В. Булгарин. Примечание к статье В. Н. Олина《Крит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 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 соч. А. Пушкина. 见 <http://pushkin-lit.ru/pushkin/articles-pri-zhizni/044.htm> 这是针对В. Н. Олин.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 соч. А. Пушкина一文。后者又有В. Н. Олин. Ответ г - ну Булгарину на сделанные им замечания к статье—《Крит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 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 помещенный в 7 - м номере《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листков》минувшего 1824 года作答。

⑨Ф. В. Булгарин.《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роман в стихах. Сочинен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见: <http://pushkin-lit.ru/pushkin/articles-pri-zhizni/078.htm>.

⑩Ф. В. Булгарин.《Полтава》, поэм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8—1830. СПб., 2001. С. 126—127. 和Ф. В. Булгарин. Разбор поэмы《Полтава》, соч.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ергеевича Пушкина. //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8—1830. СПб., 2001. С. 132—142.

⑪诗人、文学家沃斯科列夫斯基(М. И.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803—1867)对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半模仿诗体小说《叶甫盖尼·韦利斯基》(《Евгений Вельский》)。

⑫指1826—1828年俄国对波斯战争,俄国取胜。这里布尔加林有指责普希金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他曾写道:“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荣光,英勇的战争和著名的和约,没有令任何一位诗人兴奋,都在哭泣和忧郁,时而为过去,时而为未来,常常为些不存在的东西……”(《北方蜜蜂》1830年第5期,1月11日)

- ⑬普希金的意大利法国时期,普希金的英国拜伦时期,普希金的俄国时期。也称为:意大利的普希金、英国的普希金,俄国的普希金。也就是到第三时期,普希金才真正具有了俄国民族性。
- ⑭基里耶夫斯基的这些论断,后来都被别林斯基沿用在俄国文学的“普希金时期”和“普希金——现实的诗人”等论断中。

#### 参考文献:

- [1]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C]. 满涛,辛未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 [2] А. ф. Воейков, Замечания на поэму “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 [С]//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0—1827. СПб: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ушкинский театральный центр, 1996.
- [3] Н. А. Полевой.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М]. роман в стихах. Сочинен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见: <http://pushkin-lit.ru/pushkin/articles-pri-zhizni/065.htm>
- [4] Н. А. Полевой. Обзор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824 году [С]//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0—1827. СПб. , 1996.
- [5] Н. А. Полевой.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Сочинен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С]//Н. А. Полевой, Кс. А. Поле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825—1842). Ленинград,1990.

- [6] Д. В. Вeneвитинов. Разбор статьи о «Евгении Онегине» [J]. помещенный в № 5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телеграфа» на 1825 год. 见: <http://pushkin-lit.ru/pushkin/articles-pri-zhizni/066.htm>.
- [7] П. А. Плетнев. 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 [С]//Повесть. Соч. А. Пушкина.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0—1827. СПб. , 1996.
- [8] Ф. В. Булгарин.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роман в стихах, Глава VII. Сочинен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С]//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8—1830 . СПб. , 2001.
- [9] А. А. Дельвиг. В 39 - м No. “Северной пчелы” помещено окончание статьи [С]//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1828—1830 . СПб. , 2001.
- [10] В. В. Прозор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М]. М. ,2002.
- [11] Н. И. Надеждин. Полтава, поэм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С]//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8—1830. СПб. ,2001.
- [12] Е. О. Ларионова.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8—1830 [М]. СПб. ,2001.
- [13] 刘宁,主编. 俄国文学批评史 [С].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The Debate about Pushkin in 1820s in Russia

——Tracing to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 between “Pushkin Tendency” and “Gogol Tendency” in *The Contemporary*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 great debate in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mid - 1850s, the dispute between “Pushkin tendency” and “Gogol tendenc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ebate of Pushkin in 1820s. At that time, important critical forces were involved in the comments about Pushkin: Glagolev, Voeikov, Viazemsky, Bestuzhev, Ryleyev, Polevoi, Venevitinov, Bulgarin, Delvig, Nadezhdin, Kireevsky, Shevyrev, Pogodin, M. Dmitryev, Pletnev and so on. It is the real numerous sounds, and Pushkin was in the vortex of criticism amid debates of classicism, romanticism, emerging realism, even political inten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ations, periodicals participating in criticism are *The Messenger of Europe*, *Son of the Fatherland*, *Northern Bee*, *Moscow Telegraph*, *The Literary Gazette*, *The Messenger of Moscow* and so forth. They don't form the one - to - one debate, but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Pushkin's creation, the first three are more negative than positive, the latter three are just the opposite. From these discussions, the connotation of “Pushkin tendency”, which later developed into a specific term, can be generally understood.

**Key words:** 1820s; Pushkin; debate; Pushkin tendency

# 斯拉夫派与土壤派的文学论争

——以阿克萨科夫兄弟为视角

陆尧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31)

**摘要:**19世纪60年代,斯拉夫派与土壤派就“文学与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拉夫派的代表伊万·阿克萨科夫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指责现有文学创作内容过于空洞、创作者态度虚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土壤派的角度,对这两点进行辩护。双方就此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文学论争。目前,学术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立场研究颇多,但对这场论争的发起者——阿克萨科夫兄弟及其思想却关注甚少。笔者从阿克萨科夫兄弟的视角出发,全面客观地看待斯拉夫主义的文学观,探寻上述两个派别在文学、思想层面的差异,以期对斯拉夫派及陀氏研究起拾遗补阙之效。

**关键词:**阿克萨科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拉夫派;土壤派;知识分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2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07-07

1861年1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时代》(Время,1861—1863)第一期出版,同年10月15日,斯拉夫派报刊《日报》(День,1861—1865)开始发行。因与斯拉夫派思想颇有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文统称陀氏)对《日报》满心期待:“莫斯科将发行新的报刊《日报》,由阿克萨科夫编辑,请让我们拭目以待!”<sup>[1]53</sup>但第一期《日报》因刊载了主编伊万·阿克萨科夫(下文统称阿氏)的《以自我认知的方式回归民族生活》一文使陀氏颇为不满。在第11期的《时代》上作家以《最近的文学现象:〈日报〉》一文痛批了阿氏,称其“对当代现实一窍不通”<sup>[2]234</sup>,以此宣泄对斯拉夫派的不满。阿氏则在给索汉斯卡娅(Соханская Н. С., 1823—1884)的信中回击了批评者:“总之,这份以一种极端绝望的斯拉夫形象出现的杂志(指《时代》——作者注)一有时间便攻击我们,说我们斯拉夫主义已经过时了,说我们想创建一个关于俄国人民性的学说,这简直毫无信仰与法则!”<sup>[3]570</sup>由此,一场肇端于陀氏,长达两年的文学论战就此开始。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聚焦于陀氏的相关论断,对于阿氏兄弟,尤其是阿氏本人则

关注不多。21世纪以来,随着斯拉夫派的一些经典著作在俄罗斯再版,阿氏的观点也逐渐得到重视。在研究后不难发现,这场论战从表面上看是两位作家、两个思想流派的差别所致,其实却是如何看待俄国文学现状,进而构建理想俄国文学的一种思想探索。

## 一、对俄国文学现状的批评与辩护

阿氏的文学批评观基本与老斯拉夫派一致。在西方思潮冲击下,斯拉夫主义者看到了精神空虚与道德沦丧引发的社会震动。因此斯拉夫派对文学界其他势力,尤其是对西欧派的文学主张十分警惕,一系列违背其创作原则、揭露黑暗现实的文学思想皆被排斥。面对席卷俄国的批评现实主义浪潮,阿氏指责该派的作品与理论是对读者的欺骗和对自己良心的蒙蔽。

在《以自我认知的方式回归民族生活》一文中,阿氏称彼得改革后的社会为充满“谎言”的社会,其表现为盲目接纳西欧的一切而忽略民族良心。阿氏认为:“谎言在多么宽广的空间里传播……社会生活的全部,都像得了麻风病一样被它腐蚀。”<sup>[4]170</sup>文学领域也毫无二致,其存在的谎言有两种形式:其一

收稿日期:2022-04-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导报》研究(1856—1906)”(20AWW004)

作者简介:陆尧(1993—),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是“谎言”的文学,这种文学是对民族生活的非真实写照,是别有用心者的工具;其二是“谎言”的理论,这种理论空洞无益、愚弄人民。

### (一)“谎言”文学的定义及其成因

阿氏认为,“谎言”的文学,是无法真实反映民族理想状态甚至恶意歪曲民族形象的文学。这类俄国文学皆是对西欧文学的借鉴模仿,是披上俄罗斯历史外衣,却让人民倍感陌生的文学:“感染外国疾病的文学,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sup>[4]170</sup>不同于谎言的文学,理想的文学是由斯拉夫派作家创作的文学。这些作家以彼得改革前的农村生活为切入点,描写了理想的乡居生活,力图反映正面、积极、理想的因素,这种创作倾向与热衷揭露社会弊病的西欧派截然相反。

从康·阿克萨科夫(Аксаков К. С., 1817—1860)对《死魂灵》的批评,可以发掘斯拉夫派的批评倾向。果戈理因《死魂灵》被西欧派推崇备至,别林斯基曾评价:“《死魂灵》使陷入麻木状态的现代俄国文学苏生了。”<sup>[5]440</sup>他肯定了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认为作者塑造的五个丑陋地主形象,是对农奴制的鞭挞和对惨淡农村生活图景的揭露。而康·阿克萨科夫则在地主身上看到了俄国宗法制的“正面因素”,看到了斯拉夫派理想中的人道主义。因此,康·阿克萨科夫认为《死魂灵》是当之无愧的史诗,是俄国的《伊利亚特》,“谈到这些‘老式地主’们,其他人只能在他们身上看到粗鄙与兽性,而果戈理看得更深更远,他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深刻的人道意义……”<sup>[6]147-148</sup>。

斯拉夫派理论认为,自然主义创作手法是一种消极、被动反映现实的创作方式,它对环境与人进行了剖析式描写。在斯拉夫派看来,如果不能对生活进行有机整合式的描述,那么作者就会执着于对现实进行片段式描绘,因过度关注黑暗而走向谎言。斯拉夫派批评家伊万措夫-普拉东诺夫(Иванцов-Платонов А. М., 1835—1894)称:“自从作家们开始关注我们的民族生活……俄国人愚昧的、黑暗的一面便被他们理解、描述成民族生活,并称之为俄罗斯生活的负面现象。”<sup>[7]1</sup>批评家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无视俄国人民的情感,常因沉浸在消极情绪中而误解与扭曲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尤里·萨马林(Самарин Ю. Ф., 1819—1876)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对现实的过分渴望伴随着对生活中灰暗、无趣的时刻关注,最终会导致对现实的诋毁,即过分夸大其黑暗面。”<sup>[8]85</sup>

阿氏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本民族有着非理性的恶意:“对我们民族的谴责,不是因为愤慨而

热烈的爱,而是因为内心的不虔诚,因为对一切神圣荣誉和责任本能的敌视。”<sup>[4]170</sup>谎言的文学便是恶意的体现。虽说如此,但这并不代表斯拉夫派拒绝谴责,只是他们认为谴责应有度。伊万措夫-普拉东诺夫承认,目前俄国存在不足之处,但不能因此就对其肆意戏谑,因为“民族文学的至高目标和任务不在于诉说民族已知之恶,他们有什么病,没有什么病,而是以诗意的方式重建应赋予他们的东西,以此实现历史的目标”<sup>[7]2-3</sup>。

那么,“谎言”文学到底是如何表现的呢?康·阿克萨科夫以皮谢姆斯基(Писемский А. Ф., 1821—1881)的喜剧《疑病患者》(Ипохондрик)为例,阐释了谎言的文学表现形式。批评家认为,皮谢姆斯基在戏剧中以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对人物的外貌及活动环境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力图还原逼真的生活图景。但随后批评家指出,《疑病患者》是对《死魂灵》的失败师法,刻鹄不成反类鹜,令读者生理不适,“喜剧中的肮脏面孔带着现实和偶然的污秽,毫无艺术感”<sup>[6]227</sup>。因此,康·阿克萨科夫得出结论:揭露“现实”的文学并不一定不是“谎言”的文学,相反,对“现实”的过度追求会走向机械的复制,失去文学性。“如果真实是一种艺术美德,那么排名第一的艺术家应该是达盖尔摄影法或速记员。”<sup>[6]229</sup>在康·阿克萨科夫看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一种对丑恶现实毫无艺术价值的复制,其所依赖的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并非师承果戈理,仅是对其外在技法的模仿,并没有触及作者的思想实质,即东正教理想。因此批判现实主义的诞生“是对艺术天才的错误理解的结果,是因为吸收了外部技术,而非伟大艺术家的想法,当然也不是天赋”<sup>[6]218</sup>。

除皮谢姆斯基外,屠格涅夫的部分作品及早期陀氏的创作,都被斯拉夫派学者称为“谎言”文学,他们在作品中过度关注黑暗因而被斯拉夫派排斥。原因在于,斯拉夫派的创作与批评始终扎根于消极浪漫主义,其文学活动的宗旨是维护与美化宗法制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塑造客观上会激起社会普遍的反抗情绪,这与斯拉夫派温和改良的主张背道而驰。为维护自身利益,斯拉夫派对该类文学的打压与排斥也就不足为奇了。

### (二)“谎言”理论的定义与危害

阿氏认为,“谎言”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疯狂的学说”,“谎言在于疯狂学说的胜利,这些学说由厚颜无耻的无知所创造”<sup>[4]170</sup>。这种理论因包含了欧洲意识形态,本身也成为谎言:“谎言在于随便地追求进步与文明中的新事物。”<sup>[4]170</sup>因此,鼓吹“文



明”“自由”的理论被阿氏视为文学领域的谎言的又一种表现。基列耶夫斯基(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1806—1856)曾批评《祖国纪事》上过度泛滥的西欧理论:“他们不是向我们传递欧洲教育的成果,而是不断地被这种教育的某些特殊表现所迷惑,但却没能真正理解它,他们认为是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早在俄罗斯就已经有了。”<sup>[9]197</sup>

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元素的脱离》一文中,阿氏痛斥了关于谎言的理论:“这是何种理论?首先,它是空洞的、赤裸的否定……其次,它是蛮横的、愚蠢的、毫无意义的力量……”<sup>[4]175</sup>阿氏否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它不仅空洞无益,还具有迷惑性:“这些半真半假的东西连同所有精神上的幻觉,会无畏地潜伏在人的内心,如海市蜃楼般欺骗他。”<sup>[10]372</sup>任由谎言的理论横行会引起社会动荡,对未经世事的热血青年毒害则更为严重。阿氏提醒青年切勿盲从西欧理论:“由于意志不发达,在成年人身上可以合理克制的东西在青年身上就不那么容易克制了;他们的所为已经越过界限,急于用活生生的、往往是丑陋的形式去解决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矛盾。”<sup>[10]373</sup>而作为成人,更应该去积极抵抗西方理论,避免社会堕落,防止青年上行下效。

阿氏看到了充斥着谎言的俄国,但他坚信,谎言的理论无法触及民族精神实质,终将如同病毒一样被复苏的民族机体所排斥:“‘公开性’‘自由主义’‘人性’‘进步’‘红色’等已经被庸俗化了的词意味着什么?……他们在我们的生活和五千万俄罗斯人民的同情心中没有根基,是无力的,尤其这些全部参照西方的习惯,通过模仿得到的东西更是如此。”<sup>[10]372</sup>

虽然斯拉夫派排斥对西方理论的挪用,称其为“谎言”的理论、“过时的理论”,但这并不代表斯拉夫派排斥理论。相反,斯拉夫派知识分子一直号召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如基列耶夫斯基的文明对立学说、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 А. С., 1804—1860)的“聚合性”、阿氏的“国家—社会—人民”有机学说等,都是立足民族现状、整合东正教因素与古俄罗斯民间传统的、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受到官方民粹派与西欧派的夹击,但影响深远——“斯拉夫派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虽然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和保守复旧的性质,但在俄国美学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sup>[11]220</sup>

###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文学现状的辩护

阿氏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陀氏的不满,他一改之前对《日报》的期待,称其为“安息了却不安分的《俄罗斯谈话》(1856—1860)”<sup>[2]231</sup>的诈尸。陀

氏认为,斯拉夫派对当代文学的否定过于消极,是为否定而否定的文学观的表现。斯拉夫派眼中的理想俄国只是部分现实与彼得改革前历史幻象混合的产物。随后,《时代》刊登的对《康·谢·阿克萨科夫文集》的书评也印证了陀氏的观点,即斯拉夫派“不是为艺术而否定,是以俄罗斯人民过去的历史生活所赋予的理想为名”<sup>[12]50</sup>对现实的否定。

陀氏认为,“斯拉夫派批评家不愿意理解现代文学”<sup>[13]84</sup>。因为只有对现状加以谴责才能鞭策其前行,为此需要自我谴责的文学——“正是这个文学,激烈否定的文学,以任何文学都未曾有过的力量,实行讽刺和主动自我谴责的文学、高尚的文学,怀着激情径直奔向勇敢和正直的文学,得到了最极端西欧派的热情支持。”<sup>[2]235</sup>陀氏充分肯定文学谴责的作用,认为自我谴责能扯掉社会的遮羞布,反观斯拉夫派对现实的粉饰才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认为,陀氏意识到了俄国文学的实质,即俄国文学内部蕴含着发展与变革的动力。随着俄国文学回归“土壤”,它开始承担反对极端西方化的任务,“但它首先必须通过无情审视‘彼得大帝改革土崩瓦解’时期俄国的生命力来清理根基”<sup>[14]107</sup>,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斯特拉霍夫(Страхов Н. Н., 1828—1896)论证了自我谴责在俄国文学产生发展的必然性:“毫无疑问,俄国对自我判断、自我谴责甚至自我羞辱的要求极为迫切,这是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sup>[15]45</sup>但批评家认为,斯拉夫派拒绝现有文学情有可原:“我们现在的精神运动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是浅薄的……他们认为,俄罗斯仍是强大的,仍然与古代因素共存,它以前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正是因为对过去的尊重,以及对赋予俄罗斯历史更大的意义和完整性的渴望,他们对新时代的现象持不信任的态度。”<sup>[15]48</sup>

可见,无论是陀氏还是斯特拉霍夫,他们对现存文学的态度都较为宽容,并肯定了自我谴责倾向的必要。自18世纪以来,俄国始终保留着谴责的传统,从诺维科夫到冯维辛再到果戈理,讽刺文学一直给社会敲响警钟。陀氏认为,现阶段的俄国社会仍需要文学的谴责与讽刺。因此,斯拉夫派对这种需求置若罔闻的态度令陀氏感到愤慨。

总之,对文学态度的差异是阿氏与陀氏观念的分野。前者立足斯拉夫派,看到了文学的不足:文学被西欧派功利化,成为攻击民族形象的工具;西欧理论同样毒害着青年人,造成社会动乱,这是持保守态度的阿氏不愿看到的。而陀氏相对温和,他肯定了谴

责文学存在的必要性,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文学的鞭策,这符合他一贯以来秉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 二、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与辩护

如阿氏所言:“民族的土壤外不存在根基;民族的土壤外亦不存在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东西。”<sup>[4]169</sup>在他看来,无论是谎言的文学还是理论,这种消极、否定文学环境的形成,都与知识分子弃绝俄国土壤、拒绝人民精神滋养的情况有关。因此,阿氏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堕落才是造成俄国文学环境崩坏的主要原因。

### (一)阿克萨科夫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知识分子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noesis——意识,最高程度的理解”<sup>[16]838</sup>。19世纪60年代,该词逐渐指专职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现代研究者指出,在俄国批评家中,正是阿克萨科夫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元素的脱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知识分子’一词。”<sup>[16]840</sup>阿氏所指的“知识分子”,是“与人民疏远、与民族土壤和民族精神脱离的‘各种类型的学者和艺术家’”<sup>[4]175</sup>,他们通常是脱离土地的西欧派,而非仰视人民的斯拉夫主义者。康·阿克萨科夫曾探究俄国知识分子困境的成因,认为他们的悲剧源于背离人民:“目前,俄罗斯处于内部混乱的状态,被一个不合情理的谎言所掩盖。政府,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层阶级,已经与人民疏远,成为他们的异类。”<sup>[17]71</sup>德米特里·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 Д. С., 1841—1919)也批评知识分子盲目否定俄国的行为:“反对俄罗斯的一切是(现在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口号,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仍弥漫着对彼得大帝的崇拜。知识分子认为,似乎只有他们知道生活在‘黑暗与阴影中的’俄罗斯人民需要什么。”<sup>[18]278</sup>可见,知识分子脱离民族土壤的现象早已成为斯拉夫派的共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亦构成斯拉夫派的理论。

阿氏将脱离民族土壤和民族精神的西欧派知识分子比作围绕在沉睡俄国旁喧嚣的侏儒,他们“不在意它,不理解也不想去了解它,了解它的生活奥秘、习俗、信仰以及法律……他们盲目地给它制定法规……以它的名义骗人和撒谎”<sup>[4]175</sup>。阿氏指出,知识分子的极度媚外迫使社会陷入模仿舶来糟粕的窘境:“无论在何处,到处都是对外国事物顺从的奴役态度,毫无意义的屈服和模仿,对人民精神的背叛,对俄罗斯人民性粗暴的外在模仿。”<sup>[4]175</sup>屈从外来文明的知识分子对俄国危害极大,他们干预了俄国的自我发展。因此真正对俄国有害的不是法国人、德国人,而是“藏在每个‘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灵魂

中的德国人”<sup>①</sup>。

知识分子的媚外恶化了社会风气,由此阿氏判断他们缺乏人民性,“斯拉夫派否认俄国知识分子身上有人民性,否认现有的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人民性和民族性”<sup>[1]53</sup>。在批评家看来,唯有斯拉夫派珍重俄国人民性,其他派别探讨的“人民性”“民族性”都是对这一概念的曲解。为此,阿氏多次就人民性问题与其他流派论战。例如,他曾质疑《时代》对人民性的阐释称:“这份杂志没有很高的道德底线,也没有更高的诚信体系。它厚颜无耻地在其扉页上写道:‘它是第一个发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俄国人民性的杂志,它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里程碑’……”<sup>[19]23</sup>

阿氏宣扬东正教外无俄国人民性。东正教是俄国人民性产生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东正教是一种精神历史元素,在它的影响下,俄罗斯的人民性形成并趋于复杂,试图将人民性与东正教分开的所有尝试都是枉然的……”<sup>[10]748</sup>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件中,阿氏攻击土壤派对人民性的曲解:“《时代》总是犯这样的错误,在宗教之外,在东正教之外把握俄罗斯人民性的实质,谈论土壤却不了解土壤的特性。”<sup>[19]15</sup>指责土壤派所谓的“人民性”缺乏宗教性,缺乏通过东正教解决问题的勇气,是对俄国人民性的误读。

从阿氏立场上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指摘似乎无可厚非。斯拉夫派视道德品质与人民性两重因素为判断世相的标准。他们从农奴身上寻得高尚的道德品质,但却认为知识分子“道德败坏”。对人民性的苛刻定义使其向其他流派展开攻击,这显然失之偏颇。阿氏将西方思想与道德堕落画上了等号的行为,体现出斯拉夫派因循守旧的弊病。但应指出,在阿氏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亦包含了对后者的惋惜与期盼,这给他的批评观染上了一抹温情色彩。

###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知识分子的辩护

阿氏冰冷的态度令陀氏不满。后者反驳道,正是斯拉夫派对西方派先存成见,才会对自然主义创作进行抨击。而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都执着己方思想打压对方的理论,双方都对俄国现实全盘否定,陷入盲目的自我崇拜。斯拉夫派固守改革前的信仰,“不相信彼得的虚无主义改革”<sup>[15]48</sup>。认为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西欧派则被欧洲的新奇理论所迷惑,试图将俄国生活硬塞进欧洲理论中。斯拉夫派对人民性的偏执,使他们只承认理想中的民众生活而无视俄国现实,“否定在文学和社会中的任何实际情况”<sup>[20]472</sup>。而西欧派曾一度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中,否定既往俄国的一切,否认人民性而追求全人类性。

相较于阿氏对西欧派知识分子的全盘否定,陀

氏更偏中庸,认为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知识分子各有优劣。他看到了斯拉夫派在维护人民性和地方区域自治的努力,也看到了西欧派为改变俄国直面现实的勇气。陀氏认为,前者钻进书斋,透过玫瑰色滤镜回望俄国古代历史,极力抗拒西方文明的一切,而后者曾一度陷入文化虚无主义,主张拥抱欧洲,摒弃俄国本身的一切,向全人类性和普遍性迈进,两者的行为本质皆是对俄国人民的离弃。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阿氏还是陀氏,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土壤派,西欧派知识分子背离人民已成双方共识。不同在于,阿氏认为知识分子主动离开人民,选择拥抱西方,而陀氏断定知识分子是被动的:“有一点是无疑的,彼得的改革使一部分人民脱离了另一部分,脱离了其主体部分……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从下而上。”<sup>[20]478</sup>因此,陀氏怜悯地看待知识分子,号召他们回归土壤。正如俄国学者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并不深怀憎恨,他只想通过回归土壤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sup>[1]53</sup>这种“回归土壤”的方式被陀氏称作俄国的第三条道路,也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 三、批评的根源——阿克萨科夫论俄国的文化环境

#### (一)阿克萨科夫论文化真空与文化自卑

彼得改革造成社会断裂,破坏俄国本土民族文化的有机发展,这种观点已得到斯拉夫派与土壤派的公认。阿氏认为,文化断裂造成了贵族对原生文化的怀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西欧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

在继承了西方浪漫主义有机体理论及东正教生命有机论的基础上,斯拉夫派提出民族生命体的“有机性”美学思想。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曾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改革前,俄国有村社和地方区域自治,民风淳朴;改革后,“一切带有民族印记的东西都被出卖,被嘲笑、被责骂、被迫害;衣服、习俗、风俗、语言——一切都被扭曲、被肢解、被残害”<sup>[6]265</sup>。种种现象似乎都昭示着改革弥留的文化真空。

霍米亚科夫曾这样描述这场文化危机:官僚体制取代宗法制,西方文化取代传统文化,“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和巩固,社会最初的、纯朴和宗法状态的痕迹便逐渐地被抹掉”<sup>[21]25</sup>。基列耶夫斯基亦抨击改革带来的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在给合理性带来的各种好处以应有评价的同时,我认为,在终有尽头的发展中它将痛楚而清楚地发现:原则(指构成西方文化核心的理性主义原则——作者注)是何等的片面、何等的具有欺骗性,多么富有诱惑力和多么阴险狡诈”<sup>[21]43</sup>。他认为,西方的理性主

义与俄国格格不入,唯有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方能在俄国长存。理性主义无益于欧洲启蒙,同样无益于俄罗斯文化。

随后,阿氏进一步论述了改革带来的文化冲击。他提出,西方文化的入侵迫使俄国文化环境形成真空,文化真空表现为两点:在文学领域,教会斯拉夫语、民间俗语以及形态各异的外来语混杂变异,形成不伦不类的产物。在思想领域,俄国传统价值尺度失效,判断标准外国化并深受追捧。阿氏形容道:“这里和那里同样是对其他世界的顺从的奴性态度,是毫无意义的奴性的模仿,是对本土精神的背叛,是对俄罗斯人民性的粗暴的外在模仿。”<sup>[4]174</sup>在批评家看来,破除真空的关键在于复兴俄国有机的文化,“要还俄罗斯民间生活自由、完整、正确、丰硕的原始有机生长”<sup>[6]266</sup>。

文化真空进一步使知识分子产生文化自卑,他们不仅嘲弄原生文化的伤痕,还无视社会弊病的根源:“我们(指知识分子——作者注)庆祝自己的觉醒,欣赏镜中的自己……却借助显微镜无情地窥视、揭露社会的创伤和悲哀,然从未发现疾病的真正根源。”<sup>[10]389</sup>在追求“全人类性”的途中,知识分子失去民族精神和道德的供养,失去了人民性。“当我们感到自己开始异化、成为无力、无根的精神孤儿时,我们才把人民性作为我们研究和调查的主题。”<sup>[10]393</sup>对本土文化的自卑和对外来文化的崇拜,使他们主动脱离人民与土地,去拥抱西方,从精神上彻底异化为外国人,逐渐丧失人民性。

阿氏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切断俄国的有机发展,公职部门取代地方区域自治,行政关系取代宗法关系。俄国最终分裂为文明俄国与道德俄国,知识分子代表文明的俄国,掌握艺术与科学知识,但却道德败坏。他们热衷创作谎言的文学,研究空洞却极具煽动力的理论,毒害青年。而广大平民代表了道德的俄国,尽管缺乏文化素养,但却能在前彼得时代创造出灿烂的民间文化。他们与土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君主之间维系着亲如父兄的宗法制关系,精神上被东正教引领,道德高尚,是所有知识分子理应膜拜的对象。从阿氏的论述来看,他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俄国的社会问题:文明俄国与道德俄国对立,宗法制与行政制对立,东正教与西欧文化对立,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对立。对这些矛盾的批评与阐释构成了阿氏学说的重要内容。

总之,阿氏在古老罗斯的生活中看到了俄国重返伊甸园的可能。为此,他警告大众小心西方文化侵略,主张以东正教精神和民族精神教育知识分子,

以恢复彼此的有机联系。为此他拒绝现有知识分子,这是他对未来的忧虑和对现实担忧的体现,足以证明他对这片土地及人民的关怀。也正是对斯拉夫民族深沉的爱,使他后期走向泛斯拉夫主义。

##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

陀氏从根本上否定了阿氏的知识分子观。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不满情绪古已有之:“在临近彼得的时候,人民已经感到生活的贫瘠,表现出抗议当时的现状,试图走到空气清新的氛围之中……至少我们这样理解历史的事实——我们的分裂。”<sup>[20]479</sup> 改革客观上加速了知识分子接受欧洲文化的进程,提高了俄国的文明程度,对俄国有利无害。彼得之错在于急功近利,以专制化的行政改革代替社会自我改革。人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主体,本能地排斥外来的文化。

而受启蒙影响的知识分子却早已迫不及待地“走到空气清新的氛围之中”,拉大与人民的鸿沟。当知识分子意识到应与人民联手改革俄国时,后者却由于知识分子的异化而选择拒绝:“正是由于人民不相信他们是真诚的。这里怪罪人民愚昧,不识好歹,以此责难人民自己,是最不公道的……应该说实话,我们不善于接近人民。”<sup>[20]481</sup> 知识分子因与人民分离,脱离根基而被人民主动拒绝,又囿于理论而无法实践。他们看似掌握社会话语权,却一直被人民所边缘化。

然而,土壤派并未太过关注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对他们来说,历史已经无法改变,解决当下才是重中之重。就知识分子道路抉择的问题,土壤派批评家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Григорьев. Ап., 1822—1864)建议,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该主动给自己划分阵营,无论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首先应牢记自己的俄国身份。他在普希金身上看到答案:这位诗人是“唯一完整的人,是我们民族天性特质的唯一全面代表……他既不是西方人,也不是斯拉夫主义者,而是一个俄罗斯人……”<sup>[22]201-203</sup> 因此,唯有时刻保持民族身份的认知,才能在作品中表达出真正的民族意义。

诚如俄国学者所说:“土壤派能够发现当代俄国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并对彼得改革后的文学历史深感同情。”<sup>[13]15</sup> 所以,陀氏选择谅解不幸的文学状况与知识分子,格里高利耶夫与斯特拉霍夫也做出相似的抉择:热爱俄国的现实。他们认为接受现状是改变俄国的首要条件,也是最好的出路。中国学者认为:“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思想彷徨和紧张的道德探索(在19世纪集中体现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纷争)之后,‘文明与人民根基

(真理)的和解’,即‘彼得大帝改革的追随者们与人民真理的和解便势在必行’,这也是每一个俄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sup>[23]111</sup>

《时代》本就对《日报》的态度不算友好,在后者发行之初,“几乎所有主流的新闻报刊都对其表达了同情,但陀氏兄弟的《时代》除外,他们认为阿氏的期刊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产物,因此报刊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倾向”<sup>[24]182</sup>。随着论战的结束,《日报》与《时代》的关系愈加不睦。1863年《时代》刊发了斯特拉霍夫的《致命问题》,该文因触及斯拉夫派利益从而引来阿氏的又一次炮轰,《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也参与了这场论战。可见,《日报》与《时代》的论战,不仅仅是两派之间简单的意见相左,更多的是面临同种危机下不同意识形态碰撞的体现。

## 三、结语

与小贵族出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阿氏兄弟出身古老的贵族世家。贵族的生活志趣,浓厚的宗教氛围以及民间传统节日,使他们往往透过一层玫瑰色滤镜来看待彼得改革前的历史。他们对改革前的历史充满美好想象,因此改革后的种种残酷现实令他们对当下采取了否定与拒绝的态度。他们否定自然主义文学,认为它是对俄国民族精神的亵渎与歪曲;他们也不承认彼得的追随者在俄国的作用,将其视为彼得改革后畸形的产物,是主动背叛人民,陷入文化自卑情绪的精神异邦人。阿氏兄弟把希望寄托在过去,认为只有恢复古老的制度,使社会、国家与人民三者之间有机协调发展,才能彻底根除俄国社会的弊病。而陀氏坚定地走俄国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只有直面俄国社会,抛弃对现有文学的否定、抛弃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见、抛弃人民与知识分子、俄国与西欧之别,选择和解与热爱,才是俄国最需要走的道路。总而言之,无论是阿氏兄弟还是陀氏,两者都立足于俄国坚实的传统文化,旨在恢复俄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不同的是,阿氏兄弟选择回望历史,试图借用传统力量抵御舶来文化的侵袭;而陀氏选择立足当下,扎根土壤,对俄国的现状充满信心。当后人回溯历史才能发现,论战的背后既是不同派别思想主张的碰撞,也是社会困境下知识分子个人求索的具体表现。

### 注释:

①引自阿克萨科夫于1865年9月25日在《日报》上发表的社论题目《不是德国的德国人置我们于危险,真凶是藏在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心中那个德国人》。

## 参考文献:

- [1] Закиев Ю. И.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Аксак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Духовно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емьи Аксаковых. Уф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ашкир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развит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01.
- [2]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 [3] Мотин С. В. Иван Аксаков и Фе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EB/OL]. [http://www.hrono.ru/text/2007/motin04\\_07.html?ysclid=I31gsffm3t](http://www.hrono.ru/text/2007/motin04_07.html?ysclid=I31gsffm3t).
- [4] Аксаков И. С. Наше знамя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M].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 [5]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 [M]. 满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6] К. С. Аксаков И. С. Аксак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M].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1.
- [7] Иванцов – Платонов А. М. 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м 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жизн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J]. 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 Кн. 1. Критика, 1859.
- [8] Самарин Ю. Ф. Сочинения Ю. Ф. Самарина [M]. Том первый. Статьи разнородн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по поль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М.: Типография А. И. Мамонтова, 1877.
- [9] 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Критика и эстетика [M].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79.
- [10] Аксаков И. С. Отчего так нелегко живется в России [M]. М.: РОССПЭН, 2002.
- [11] 刘宁. 俄国文学批评史 [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12] Сочинения К. С. Аксакова. I. М. [J]. Время. № 3, 1862.
- [13] Кунильцкий Д. 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братья Аксаковы спор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M].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рГУ, 2013.
- [14] 约瑟夫·弗兰克.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 [M]. 戴大洪,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 [15] Страхов Н. 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M].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4.
- [16] Мотин С. В. О понят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И. С. Аксаковы и П. Д. Боборыкина [J]. Известия Пензе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В. Г. Бели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27, 2012.
- [17] Аксаков К. С. Записка “О внутрен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 России” [С]//Русская социаль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1850 – 1860 – е годы: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
- [18] Хомяков Д. А.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народность [M].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1.
- [19] И. С. Аксаков – Н. Н. Страхов переписка [M]. М.: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Н, 2007.
- [20]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8卷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 [21] 索洛维约夫. 俄罗斯思想 [C]. 贾泽林,李树柏,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22] Григорьев Аполлон.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M].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80.
- [23] 季明举. “文明与人民根基的和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命题 [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9(3).
- [24] Тесля А. А. Последний из, отцов, биография Иван Аксакова [M].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 201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The Literary Debate between the Slavophiles and the Pochvennik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ksakov Brothers

LU Y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1860s there was a heated debate between the Slavophiles and the Pochvenniks on the issue of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s”. The Aksakov brother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lavophiles, accused the literature in his time of being too hollow and the authors of being hypocritical. Dostoevsky, however, defended these two aspec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ochvenniks. It was a two – year – long literary debate. Nowadays Dostoevsky and his position have been much studied in the academic world, bu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Aksakov brothers and their ideas.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view of the Slavic view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ksakov brothers,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at the literary and ideological levels,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study of the Slavophiles and Dostoevsky’s studies.

**Key words:** the Aksakov brothers; Dostoevsky; the Slavophiles; the Pochvenniks; intellectuals

# “百花园”与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

刘宏志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小小说在当代被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和百花园杂志社积极推动小小说理论建构,并促成了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密切相关。百花园杂志社利用杂志,积极给作者、读者传达关于小小说的新的理念,并影响了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具体来说:一方面,百花园杂志社坚持小小说是平民的艺术这个基本立场,同时又强调小小说的艺术性;另一方面,百花园杂志社利用《小小说选刊》等杂志,在选发小说的时候,积极拓宽传统小小说艺术的边界,从而带来了小小说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关键词:**百花园杂志社;小小说;文体特征;艺术边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14-05

2010年,小小说被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纳入鲁迅文学奖评奖范畴中。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著名作家冯骥才的小小说集《俗世奇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标志着小小说真正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中国当代文坛得到了认可。虽然众多论者在追溯小小说源头的时候,都将小小说的历史上延到了先秦——“小小说的源头,其实可以溯源于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那种‘残丛小语’‘尺寸短书’,那种‘志怪’‘传奇’?也许中国古人就是习惯和喜欢这样的小说。有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罗书华就说过:‘庄子不仅首先提出了‘小说’概念,《庄子》的许多篇章也可以视为后世小说的前源。即如……所写的任公子钓鱼的故事,几乎就是一篇微型小说。’因此说,小小说和小说中所有文体一样,都能在中国传统文体里找到自己的源头。”<sup>[1]24</sup>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小小说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被文坛公认的文体,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坛除长篇小说之外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一直到第五届,都没有针对小小说这种文体专门设置奖项,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小小说之所以能作为一种

独立的文体获得认可,显然是因为小小说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考察当代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百花园杂志社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小小说发展的过程中,百花园杂志社有意识地推动围绕小小说的理论建构,从而建构起系统的关于小小说认知、评价的理论体系,使一种规范的小小说文体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可,也使得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得到了承认。

## 一、小小说独立文体的推动与其平民性、艺术性的强调

虽然小小说历史悠久,但是之前的小小说一般都被认为是小说的一种,被认为是写得短小的短篇小说,这显然也直接导致了没有专门的小小说理论产生,影响了小小说独立文体特征的形成。在20世纪50年代,小小说曾有过短暂的风行,当时也产生了认可小小说为独立文体的说法,著名作家老舍、茅盾先后发表了鼓励小小说发展的文章。老舍在《多写小小说》中,鼓励大家应该多写小小说,“小小说

收稿日期:2022-04-25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百花园》与小小说发展”(2021-ZZJH-390)

作者简介:刘宏志(1976—),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小说理论。

是最短的短篇小说,比如说,每篇至多不超过两千字”<sup>[2]</sup>。老舍在这里初步确定了小小说的一些文体特征,比如字数,但是,他没有把小小说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而仍然视之为短篇小说之一种。茅盾则在此时认为小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说小小说是“结合了特写和短篇小说的特点而成为自有个性的新品种”<sup>[3]</sup>。茅盾在这里把小小说视为了小说队伍里的新品种,显然他已经把小小说当做独立文体来看待了。显然,无论是老舍,还是茅盾,都意识到了小小说这种文体的独特性,虽然老舍还把小小说视为短篇小说的一种,但是他又明确勾勒了小小说与传统短篇小说不同的篇幅特征。这些都说明了,此时的小小说不再是历史中只被作家无意中创作出来,而不被意识到其独特性的一种文体了。

新时期以来,小小说逐渐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围绕小小说也产生了更多的讨论,“在新时期的前十年,小小说理论探讨已经进入了小小说文体的本体,对小小说究竟是什么、小小说的本体构成(诸如结构、语言和技巧等)、美学特质,等等,都有很好的归纳和总结”<sup>[1]30</sup>。但是,关于小小说的理论探讨,“他们的理论识见主要在于,意识到小小说的存在,并主要在小说的视角里,对小小说进行理性总结、归纳和规范”<sup>[1]30-31</sup>。显然,小小说的审美特点在此时得到了更多的思考,但是,却依然没有被当做一个独立文体来进行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小小说展开的理论研究则开始明确把小小说定位为一个独立文体。在这个过程中,百花园杂志社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推动。百花园杂志社2004年出版了增刊《小小说理论》,这是新时期以来两部系统研究小小说的理论著作之一。这部著作收录了众多知名作家、评论家讨论小小说的相关文章,很多论者在文章中也提出了将小小说视为一种独立文体的看法。“《小小说理论》艺术的理论聚焦……是对小小说文体地位的探究,即从小小说的文体特征出发,澄清小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文体位置。”<sup>[1]32</sup>与此同时,百花园杂志社也积极举办各种笔会、研讨会等,力图推动“小小说是一种独立文体这种观念”成为文坛共识,并且显然也获得了明显的成效,“小小说从民间兴起,20年来蔚然成林,演绎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坛童话……笔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0年郑州的当代小小说繁荣与发展研讨会,共识着小小说是一种文体创新;2002年北京的中国小小说20年庆典暨理论研讨会,为小小说举办了成人礼……2005年冬的‘小小说理论高端论坛’,直接推动小小说挺进中国小说家族年度排行榜”<sup>[4]58-59</sup>。显

然,百花园杂志社通过编辑小小说理论书刊,举办笔会等方式,成功推动了小小说是一种独立文体这种共识的形成。不过,在小小说成为独立文体的过程中,百花园杂志社起到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则是对小小说兼顾通俗性与艺术性这种特征的认知和强调,这就对小小说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小小说不是短篇小说的一部分,而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点的情况下,小小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审美特点,就成为理论界思考的对象,这其实关系到小小说最终能否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事实上,小小说历史悠久,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文体,根本原因也在于:关于小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一直没有一个系统规范的评价体系。在这个围绕小小说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中,百花园杂志社围绕小小说从写作立场到艺术特征,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并借助《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两本杂志,对小小说作家进行系统的引导,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小小说艺术特征的形成。杨晓敏、冯辉、寇云峰等先后几任百花园杂志社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过关于小小说艺术特征的理论文章,如冯辉的《小小说与“有意味的形式”》《原创断想》,寇云峰的《漫谈小小说的开头》,杨晓敏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等,都对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小小说的艺术特征做出了自己的规范。其中,尤以百花园杂志社总编辑杨晓敏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对小小说从文体到艺术倾向都做了较为全面的规范,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文首先对小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规范,“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固定(1500字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sup>[4]7</sup>。然后,规定了小小说的基本创作立场,应该是平民的艺术,“小小说……使小说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平民艺术。无论如何,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是必定要摒弃言之无物的。它容不得要花招,所有的艺术手段,只能用来为内容服务”<sup>[4]3</sup>。显然,在这里杨晓敏强调,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小小说,其发展方向不应该是单纯追求艺术的突破,而是应该充分尊重其贴近生活的一面,强调小小说的书写内容应该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通过这样的表述,首先在创作立场上,小小说就和其他小说种类划清了界限——它的基本立足点不是艺术的突破,而是大众性。这个基本立场显然对小小说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观点立即得到了小小说界的普遍欢迎和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小小说作家撰写大多数的创作随笔、评论文章都关涉到这样



的话题”<sup>[1]33</sup>。

强调小小说的大众性的同时,百花园杂志社并不否定小小说的艺术性,而是进一步强调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艺术上还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性,“之所以称之为‘平民艺术’,当然不容忽略它在艺术造诣上的高度和质量。如果完整表述一下,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同时具备这三种艺术功能的文学品种并不多见”<sup>[4]6</sup>。“我提出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除了上述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着重强调两层意思:一是指小小说读者应该是一种具有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二是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sup>[4]7</sup>显然,在大众性的基础之上,小小说还应该具有提升读者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的功能,这是当时的百花园杂志社对小小说基本文体特征的认知。他们也积极利用百花园杂志社旗下的刊物《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来对小小说作家们进行有意的规约和引导。事实上,百花园杂志社一直注重利用杂志对小小说作家进行引导,对小小说这种文体进行规范。“作为一种示范性和倡导性的编辑工作,《小小说选刊》所连载的小小说,对小小说文体的规范和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杨晓敏给刊物的定位是: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发现、培养、扶持、组织和造就小小说作家,寻找和培育小小说读者群,改变小小说的生存境遇;在创作上,让小小说作家和读者有‘理’可讲,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使他们的创作和阅读沿着正确的思路来进行。”<sup>[1]123</sup>《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在中国小小说界的独特地位,也使得百花园杂志社的理论倡导得以有效进行。从当代小小说作品来看,可以发现,当代小小说明显是兼顾了艺术性与大众性,那些被业界广泛推崇的优秀小小说作品,如许行的《立正》、孙方友的《女匪》、王奎山的《红绣鞋》、刘国芳的《风铃》等小说,都是在晓畅明白的同时,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有论者也指出了小小说在艺术上的整体进步,以及百花园杂志社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几年在《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的推动下,小小说创作在不断地进步。现在小小说作品的水平的确非常高”<sup>[5]</sup>。

## 二、艺术边界的扩展与多元风格的鼓励

从小小说的表现形态来看,当下的小小说和新时期伊始的小小说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别。新时期伊

始,小小说尚没有被确定为一个独立的文体,也没有丰富的关于小小说形态的理论探讨,当时关于小小说的认知也是非常狭隘。就当时的小小说作品来看,很多作家基本都把小小说当做了用来针砭时弊的一种短平快的文体,这就限制了小小说本身的丰富性。多位小小说作者和研究者,都意识到了小小说在当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说在兴起之初,中国小小说的构架模式还深受欧·亨利的作品影响的话,时下的小小说构架模式已经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出人意料的结尾’曾影响过很多作家,甚至给许多读者也形成这种印象。但实际上小小说文体发展至今,已经在构架模式上进行过全方位的探索。旧有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显然已经让小小说作者和读者感到厌倦。”<sup>[6]</sup>“20多年前的小小说,由于多数作者对转型期的现实生活有强烈的感受和体验,作品立意常常像获奖作品《关于申请添购一把茶壶的报告》那样,主要追求一种贴近现实的政治内涵……也可以这样说:小小说最初的主流创作,就是一种针砭时弊的官场小说……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过去零星出现的小小说立意中的文化内涵以及以文化内涵为依托的人性内涵,开始有了更多数量和更大面积的探索,有了更为丰富和更加深刻的艺术表达。”<sup>[7]</sup>显然,相比较新时期初期,无论是从小小说的艺术结构方式,还是从小小说的表达主旨,当下小小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艺术方式这个角度来说,小小说从固定呆板的欧·亨利式结尾这种模式中解放了出来,而是呈现百花齐放的艺术模式。从表达主旨角度来说,小小说也不再是把针砭时弊当做唯一的主题,而是进入人性、文化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如果小小说就是把艺术形式限定在欧·亨利式结尾,把表达内容限定在针砭时弊,那么,小小说艺术显然就过于单薄了,也无法形成一种独立文体。小小说艺术边界的扩张,使得这种文体变得丰富起来,也使得其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成为可能。从小小说艺术边界的扩张过程来看,百花园杂志社起到了重要作用。

百花园杂志社以推动小小说发展为己任,他们一直强调利用旗下的刊物对小小说这种文体进行有意识的引导。“百花园杂志社主要是对小小说作家的创作进行有目的有制约的调控:一是文体创新,即丰富小小说的表现力,使小小说处在文体的不稳定状态,始终保持着小小说文体的鲜活度。二是温和的价值取向。小小说不在先锋性、探索性和实验性上下更多的工夫,也不承载着博大深远和形而上的

内蕴,它以晓畅明白、单纯通脱的形式和内容,即以适当的理性深度,适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百花园杂志社这种战略性的引导、调节和规范,对小小说的发展产生着长期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sup>[1]18</sup>所以,小小说从新时期之初到当下发生的种种变化,可以说是百花园杂志社密切推动的结果。具体来说,百花园杂志社主要是利用杂志的选稿,有意识地拓宽着小小说的边界,引导着小小说作家们对小小说认知的变化。针对之前对小小说艺术和表达的双重认知的狭隘,百花园杂志社利用《小小说选刊》,有意识地传达他们关于小小说的新的理解。他们在选载优秀小小说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把目光单纯聚焦在发表时(修改后)被命名为小小说的那些作品上。相反,从散文作品中,从通俗故事类作品中,他们都能发现独特的小小说元素,并将之选择出来,以小小说形式发表或者转载,从而打破了传统小小说的僵化形象。从《小小说选刊》选载的作品看,可以看到,很多原本被当做散文发表的作品(修改后),因为具有小小说的特质,而被《小小说选刊》选载。通过这种选载方式,小小说无论在内容表达上,还是在艺术形态上,都做出了有效的突破。比如著名作家贾大山的作品《邵思农先生》,原本是作家追怀故人的一篇散文,篇幅不长,约1200字。文章内容并不复杂,只是讲述了一个名叫邵思农的中医的几件事情。邵思农先生给少年时期的“我”治病,一开始并不收钱,只是等“我”病好了,才开始收费,而且还明确告诉“我”父亲,那几服药本来不需要这么多钱,只是因为一个靠拉煤谋生的鳏夫常年吃他的药,却又拿不起药钱,他才多收其他人一点药费,以资助这个鳏夫的。而且,在收了药费之后,还对父亲说“您积德了”。然后,该文讲述了邵思农先生的苦难——“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当地的掏粪工,之所以遭受如此厄运,居然是因为别人看不惯他爱干净。他死于“文化大革命”中,之后一直也没有得到平反,他的家人也并没有追究,因为邵思农先生不是计较荣辱的人。该文冲淡平和,就是对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的往事回忆。以传统小小说眼光来看,这样的文章显然缺少对故事的精巧构思,似乎不太具有小说的特质。不过,文章选材将其做人的淡泊自守与其命运的坎坷构成了对比,其家人的做派更是升华了邵思农先生的形象,这就自然形成了故事性。于是,被百花园杂志社主编的《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收录,成为一篇著名的小小说作品。对于选载作品,百花园杂志社的资深编辑王彦艳谈过他们的做法:“不仅在严肃纯正的文学期刊中,遴选那些简

约通脱的小小说,而且还在通俗故事类的期刊中发现有小小小说体裁特质的作品,选摘出来,并与作者联系,鼓励培养,导引着他们走向小小小说创作的路子。”<sup>[8]</sup>王彦艳在这里侧重谈的是对小小说作者的培养,不过从中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杂志社对小小说边界的突破,即小小说不会囿于过去的雅俗之别,将通俗故事弃之如敝履,也不会囿于文体之见,将散文、故事和小小说截然分明地区别开来,而是积极地从散文、通俗故事等其他文体中寻找带有小小小说特质的优秀作品。百花园杂志社的上述做法,也形成了《小小说选刊》独特的艺术品格,业界公认在发表或者选载小小小说的杂志中,《小小说选刊》是最具有文体创新意识的杂志。当然,百花园杂志社的上述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来了小小说与散文、故事边界的模糊,的确有效拓宽了小小说的边界。

对于百花园杂志社对当代小小说文体创新上的贡献,也有论者做过集中的表述:“1993年前后,《小小说选刊》对小小说文体外延进行了扩展:一、强化了美文体小小说。‘美文’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提出来的,特指侧重于抒情叙事的白话散文,主要特点是以优美的抒情和叙事笔调表现出作家自己的情感与个性,也是‘林语堂体’。好的文章没有故事也能让读者读下去,这是小小说的上上境界,如沈从文的《边城》、朱自清的《父亲》。二、强化了笔记体小小说,这种类似于随笔的小小说,秉承了中国古典笔记小小说的传统,以‘确凿可据’的叙事态度,设置了小小说的叙事格局,来营造出小小说的真实可靠的阅读效果。这些笔记体的故事,增加小小说的可读性。汪曾祺、魏继新写的,好多人看是随笔,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但却是小小说,如贾平凹的《太白人家》。三、强化了传奇小小说。此类小小说,多以古典语言韵味的简约的文笔,附会于历史人物、传奇故事。……这些都给小小说的体式的予以新的设定,都是为了拓展小小说文体,增加文化含量,给作家和读者提供新的小小说样式样本……小小小说的路子一下子打开了,从此有了汪洋恣肆的局面,都很好读。对刚刚习惯于小小说阅读的民间‘需要’来说,这种变化一下子变得新鲜和奇特,有些‘美不胜收’的意味。”<sup>[1]127-128</sup>显然,无论是强化美文体小说,还是强化笔记体小说,其实都是在有意拓展小小说的边界,带动小小说不断进行文体创新。这种对小小说文体的拓展,经由《小小说选刊》《百花园》等杂志,也会作用于作家身上,从而引导作家积极进行文体创新,这也促成了当代小小说作家风格的多样化的特点的形成,“从个体性的角度看,谢

志强的‘魔幻’、蔡楠的‘结构’、孙方友的‘传奇’、侯德云的‘唯美’、陈毓的‘美艳’等等,当然也都基本上自成体系了”<sup>[9]</sup>。显然,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晓敏才可以自信地做出这样的断言:“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小小说由粗糙单薄走向精致丰厚并逐渐成熟,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文学样式。”<sup>[10]</sup>

### 三、结语

百花园杂志社以发展小小说为己任,在推动小小说作为独立文体被文坛接受的同时,利用《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两本杂志,积极进行文体创新,打破既有的关于小小说的认知的窠臼,推动小小说在艺术上的发展和变革。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其艺术形式从新时期之初的单薄、程式化而变得丰厚、多元,其表达内容也更加丰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也为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为当代文坛所接受打下了基础。考察小小说这种文体在当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在强调时代给予了小小说发展空间的同时,显然不能忽略以百花园杂志社为代表的小小说从业人士对这种文体的发展、形成所付出的努力。

### 参考文献:

- [1] 王晓峰. 当下小小说[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 [2] 老舍. 多写小小说[J]. 新港,1959(2):16-17.
- [3] 茅盾. 一鸣惊人的小小说[J]. 人民文学,1959(2):76-78.
- [4] 杨晓敏.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
- [5] 胡平. 笔会:小小说与文学创造的要求[C]//杨晓敏,秦俑. 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第五卷.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73-83.
- [6] 宗利华. 一种新文体的全方位崛起[C]//杨晓敏. 小小说纵横谈.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10-35.
- [7] 刘海涛. 政治的、哲理的、人性的:第四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漫评[C]//杨晓敏,秦俑. 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第五卷.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176-179.
- [8] 王彦艳. 小小说与橄榄形文化结构[C]//杨晓敏. 小小说纵横谈.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55-59.
- [9] 李利君. “现代白话文运动”与“当代小小说运动”[C]//杨晓敏,秦俑. 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第五卷.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225-232.
- [10] 王晓君. 小小说,新兴文体的现状与前景[N]. 中国图书商报,2007-06-19(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Baihuayuan Magazine and the Formation of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Mini Novels*

LIU Hongz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fact that mini novel is recognized as an independent style in contemporary tim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Baihuayuan Magazine's* active promo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ini novel and the formation of its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Baihuayuan Magazine* actively conveys new ideas about mini novels to the author and readers, and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mini novels. Specifically speaking, on the one hand, *Baihuayuan Magazine* insists on the basic position that mini novel is the art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emphasizes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the mini novel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ther hand, *Baihuayuan Magazine* actively broaden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traditional art of mini novels by using magazines such as *Selected Mini Novels*, thus enriching and making mini novels more unique.

**Key words:** *Baihuayuan Magazine*; mini novels;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art boundary

#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 耦合协调及时空演化

——基于河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韩占兵

(黄淮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经济发展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测算了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指数和协调指数,同时分析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与动态变迁趋势。研究表明:(1)2008—2018年,河南省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内部结构表现出“阶梯化”差异的空间格局,不同区域之间的极化差异现象逐渐减弱。(2)虽然出现短暂震荡,但河南省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动态演变趋势较为一致,大致呈现缓慢上升状态,而且三系统之间高度耦合,相互影响程度较深,正向互动作用较强。但三系统之间耦合状态并不稳定,特别是下游区域耦合指数的震荡状态尤为明显,而且低值耦合指数区域分布较多。(3)河南上、中、下游区域及全省的协调指数均呈现显著上升态势,整体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从地理空间来看,上游、中游区域协调状态较好,全部处于中级协调以上,协调指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极化差异现象逐渐减弱,但协调指数“北高南低”的态势逐渐显现。

**关键词:**乡村科技人才;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4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19-08

## 一、文献综述

人才兴,则农业兴,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路径中,人才振兴占据重要地位,而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在于科技人才的振兴。2018年,中央以“一号文件”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发挥乡村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政策措施。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快培养乡村科技人才的重点任务。乡村科技人才集聚是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三者之间

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具有比较显著的耦合协调关系(见图1)。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初步探索。首先,在乡村科技人才集聚方面,多数学者从职业教育或培训视角出发来研究乡村科技人才的开发利用(王水清、贾兵强、向安强,2004;杜占元,2007;汤国辉、刘晓光,2016;周华强,等,2019;张华泉,2020)<sup>[1-5]</sup>,仅有个别学者对乡村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塑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刘玉来、余彬盛,2014;刘芬、熊春林,2017;程华东、惠志丹,2020)<sup>[6-8]</sup>。国外对乡村科技人才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科技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就业以及收入的影响等

**收稿日期:**2022-06-05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常态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多维动因、耦合机制与破解模式研究”(16CJY046);2020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人口空心化视阈下河南省乡村科技人才集聚的现实障碍与保障体系构建研究”(202400410079);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2021-CX-053);2019年度黄淮学院天中学者奖励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韩占兵(1982—),男,河南上蔡人,博士,黄淮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方面(Schultz T. W.,1961;Willard Wesley Cochrane,1979;Lipton M.,1980;Scott Rozelle,1999;Sonia Laszlo,2008)<sup>[9-13]</sup>。其次,在乡村科技人才集聚与农业科技创新的关系方面,部分学者研究认为,科技人才与科技创新之间相互协同演变(李良成、陈欣、郑石明,2019)<sup>[14]</sup>,乡村科技人力资源是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叶春燕、宋林佳,2021)<sup>[15]</sup>。而且,农村科技人才是支撑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储节旺、曹振祥,2020)<sup>[16]</sup>,需要挖掘农业科技人才价值,促进农村科技人才市场发育,以此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简小鹰,2005;刘洪银,2021)<sup>[17-18]</sup>。最后,在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宋之帅、杨善林、龙丹(2013)通过构建“双向互动关系”模型,实证研究得出了科技创新与经济相互促进关系<sup>[19]</sup>。邓翔、王仕忠(2020)通过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得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已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要素<sup>[20]</sup>。高强、曾恒源(2020)研究提出,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sup>[21]</sup>。

综上所述,学术界针对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成果积淀,奠定了进一步探索的基础。然而,现有成果大多分散在单一领域,部分成果虽然研究关注了两两间的相互作用,但逻辑性整合不足,而且缺乏基于样本区域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经济发展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省18个省辖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考察样本区域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以期为实现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提供现实思考和政策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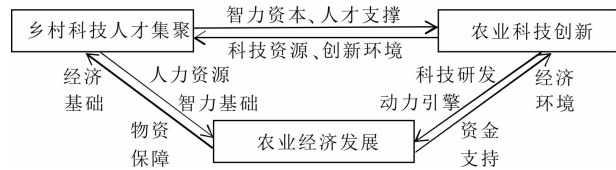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

## 二、模型、指标与数据

### (一) 计量模型

#### 1. 聚类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的空间差异,需要对研

究样本区域进行分类。本文采用层次聚类,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进行分类分析。其中,个体距离采用平方欧式距离,类间距离采用平均组间链锁距离。

### 2.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 (1) 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综合发展指数可全面测度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的综合发展程度,其基本计算公式如(1)~(3)所示。

$$RT = \sum_{i=1}^5 w_i x_i \quad (1)$$

$$SI = \sum_{i=1}^3 w_i y_i \quad (2)$$

$$AD = \sum_{i=1}^3 w_i z_i \quad (3)$$

其中, $RT$ 、 $SI$ 和 $AD$ 分别表示乡村科技人才集聚指数、农业科技创新指数与农业经济发展指数; $w_i$ 表示各系统中各观测变量的权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整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T$ ,其计算公式如(4)所示。

$$T = \alpha RT + \beta SI + \gamma AD \quad (4)$$

其中, $\alpha$ 、 $\beta$ 和 $\gamma$ 分别表示三个系统的权重,本文假设上述三大系统同样重要,则可得 $\alpha = \beta = \gamma = 1/3$ 。

#### (2) 系统耦合指数

利用物理学及相关研究成果中的耦合协调模型,可测度三大系统间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指数 $C$ 的计算公式如(5)所示。

$$C = \frac{\sqrt[3]{RT \times SI \times AD}}{(RT + SI + AD)/3} \quad (5)$$

$C$ 值越大,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越强,反之越弱。特别是, $C = 0$ ,表示系统内各要素间是无关系的; $C = 1$ ,表示各系统间离差最小,系统处于最佳耦合状态。其经验解释为: $0 < C \leq 0.3$ ,表示低度耦合; $0.3 < C \leq 0.5$ ,说明两系统处于互相抗衡阶段; $0.5 < C \leq 0.8$ ,表示两系统处于磨合阶段; $0.8 < C \leq 1$ ,表示两系统高度耦合。

#### (3) 系统协调指数

耦合协调度指数 $D$ 可以测度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其计算公式如(6)所示。

$$D = \sqrt{T \times C} \quad (6)$$

$D$ 表示协调指数, $0 \leq D \leq 1$ , $D$ 越大,说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为进一步深入考察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状态,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方传棣、成金华、赵鹏大,2019)<sup>[22]</sup>,根据协调指数的高低,进行等级划分(见表1)。

表1 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指数	协调等级	所处阶段	协调指数	协调等级	所处阶段
0.900 - 1.000	优质协调	高水平阶段	0.800 - 0.899	良好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0.700 - 0.799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0.600 - 0.699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0.500 - 0.599	勉强协调	磨合阶段	0.400 - 0.499	濒临失调	颀颀阶段
0.300 - 0.399	轻度失调	颀颀阶段	0.200 - 0.299	中度失调	低水平阶段
0.100 - 0.199	严重失调	低水平阶段	0.000 - 0.099	极度失调	低水平阶段

### 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是一种非参检验方法,它是直方图的自然拓展。核密度能较为完整地利用数据本身信息,从而避免人为主观带入的先验知识,对样本数据进行最大程度的近似,更为清晰真实的反映随机变量的动态演化趋势。本文选择高斯核函数,高斯核的方差  $h$ ,也称为带宽,其取值大小对拟合结果的影响较大。借鉴孙才志等人(2017)<sup>[23]</sup>的研究结果,本文选择  $h=0.95$ 。

#### (二) 指标体系构建

表2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子系统 $RT$	$RT_1$ 乡村科技人力资源	$RT_{11}$ 农副产品加工业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RT_{12}$ 省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推广人员数量	人
	$RT_2$ 乡村科技人才培养	$RT_{13}$ 人均农业科技人员配置率	%
		$RT_{21}$ 农民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RT_{22}$ 高等院校涉农专业的科研与技术推广人员数量	人
农业科技创新子系统 $SI$	$SI_1$ 农业科技资源投入	$SI_{11}$ 农副产品加工业 R&D 经费支出	万元
		$SI_{12}$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SI_{13}$ 农用化肥使用量	万吨
	$SI_2$ 农业科技产出	$SI_{21}$ 农副食品加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SI_{22}$ 农副食品加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
		$SI_{23}$ 农业劳动生产率	%
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 $AD$	$AD_1$ 农业经济发展规模	$AD_{11}$ 农业总产值	亿元
		$AD_{12}$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AD_{13}$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AD_2$ 农业经济发展质量	$AD_{21}$ 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增加值	万元/亩
		$AD_{22}$ 劳均粮食产量	公斤/人

#### (三) 数据来源

为了更为微观地考察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的协调耦合程度,本文选取河南省 18 个省辖市作为研究样本,相关实证研究数据来自 2008—2018 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农业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河南省农业科技人才统计报告》及各省辖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四)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1. 聚类分析数据处理

在对河南省 18 个省辖市进行聚类分析时,本文选择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生产总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3 个变量作为分类依据。考虑到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其他两项指标之间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此处对数

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科学性与有效代表性等原则,构建了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共由 3 个目标层、6 个准则层、16 个指标层构成。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子系统( $RT$ )通过乡村科技人力资源和乡村科技人才培养来体现,农业科技创新子系统( $SI$ )通过农业科技资源投入和农业科技产出体现,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 $AD$ )通过农业经济发展规模和农业经济发展质量来体现。

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便利用各指标均值进行聚类。

##### 2. 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处理

由于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计量单位互有差异,不具有可比性,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此处选择归一化方法。鉴于上述指标都是正向指标,归一化处理公式如(7)所示。

$$N_{ij} = [x_{ij} - \min(x_j)] / [\max(x_j) - \min(x_j)] \quad (7)$$

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中需要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避免主观赋权法导致的随意性问题,可较为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熵值法的具体计算步骤为:

第一步,确定指标的数值权重  $p_{ij}$

$$p_{ij} = \frac{x_{ijk}}{\sum_i x_{ijk}} \quad (8)$$

其中,  $i$  表示地市序号,  $j$  表示指标序号,  $k$  表示系统序号,  $m$  表示地市个数。

第二步, 确定熵值  $E_j$

$$E_j = - \frac{\sum_i^n p_{ij} \ln p_{ij}}{\ln n} \quad (9)$$

其中,  $n$  为系统中包含的指标个数。

第三步, 计算各指标的效用值  $d_j$

$$d_j = 1 - E_j \quad (10)$$

第四步,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omega_j$

$$\omega_j = \frac{d_j}{\sum_j^n d_j} \quad (11)$$

表3 2008—2018年河南省辖市综合发展指数、耦合指数和协调指数的均值状况

区域	地市	综合发展指数 $T$	耦合指数 $C$	协调指数 $D$	协调等级	所处阶段	协调指数排序
上游区域	郑州	0.5971	0.9902	0.7266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3
	济源	0.5937	0.8967	0.7227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5
中游区域	洛阳	0.5907	0.9868	0.7239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4
	鹤壁	0.6227	0.9548	0.7558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1
	焦作	0.5842	0.9686	0.7435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2
	许昌	0.5244	0.9139	0.6833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11
	新乡	0.5697	0.9188	0.7073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7
下游区域	安阳	0.5670	0.9682	0.7211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6
	平顶山	0.4479	0.9366	0.6267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16
	三门峡	0.4851	0.9643	0.6696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14
	开封	0.4875	0.9827	0.6767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12
	濮阳	0.5165	0.9781	0.6944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10
	漯河	0.5388	0.9715	0.6969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9
	南阳	0.3837	0.8851	0.5625	勉强协调	磨合阶段	18
	商丘	0.4805	0.9258	0.6655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15
	信阳	0.4949	0.9733	0.6723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13
	周口	0.5566	0.8847	0.6978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8
	驻马店	0.4206	0.9586	0.6198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17

从综合发展指数来看, 排名前五位的省辖市依次是鹤壁、郑州、济源、洛阳、焦作, 大部分位于上游和中游区域。这些区域乡村科技人才建设投入较多, 农业科技创新研发及成果转化状况较好,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平顶山、驻马店、南阳, 这些区域受政策、资源、地理等因素制约, 乡村科技人才建设比较滞后, 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较低,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在协调指数方面, 上游和中游区域省辖市的协调指数较高, 属于中级协调等级, 处于较高水平阶段,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乡村科技人才促进农业科技创新, 进而带动农业经济发展, 同时, 农业经济又为农业科技创新和乡村科技人才集聚提供物质保障和良好环境, 三大系统形成了良性发展循环。下游区域的11个省辖市中, 除安阳外, 其他区域协调指数均较低, 属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 处于磨合

### 三、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实证结果分析

#### (一) 聚类分析

本文首先以人均生产总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个变量指标为依据, 采用层次聚类分析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进行分类。分类结果显示, 郑州和济源属于上游类区域, 洛阳、鹤壁、焦作、许昌和新乡属于中游类区域, 其余11个省辖市属于下游类区域。

#### (二) 样本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均值分析

依据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可测算得出不同区域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指数和协调指数。相关实证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阶段。这些区域亟须采取相关政策举措提升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 (三) 样本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分析

如图2所示, 河南省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指数的动态演变呈现较大差异。上游和中游区域的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高, 下游区域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过程。从发展速度看, 上、中、下游区域及全体样本区域各自实现了221.05%、358.19%、306.27%、295.17%的增长率。从内部结构看, 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表现出“阶梯化”的空间格局。在前期, 上游高于中游区域, 但在2017年后, 中游超越上游区域。而且, 上、中游区域均高于下游区域。

如图3所示, 河南省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动态演变趋势较为一致, 大致呈现缓慢上升状态。然而, 比较特殊的是, 下游区域的域耦合指数在2016—



2017 年间出现短暂下降,而后又恢复到上升状态。受之影响,全省指数也出现短暂的震荡。从增长速度看,2008—2018 年间,上、中、下游区域及全省的耦合指数分别增长了 19.25%、20.38%、16.51%、18.71%。从耦合指数水平来看,上、中、下游区域耦合指数值均超过 0.8,表示系统之间高度耦合。这说明,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相互影响程度较深,正向的互动作用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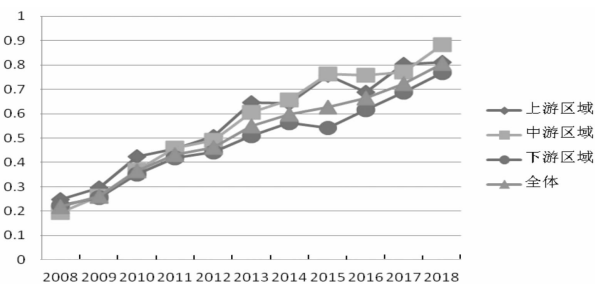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指数的动态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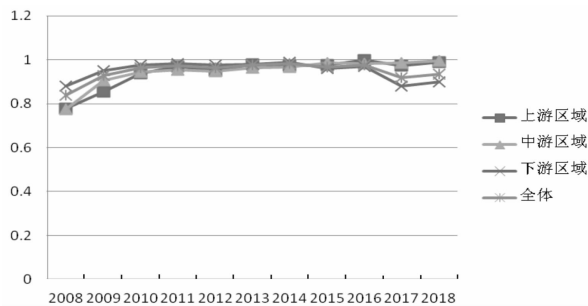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动态演变

如图 4 所示,河南省不同区域协调指数的动态演变趋势均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2008—2018 年间,河南上、中、下游区域及全省的协调指数均呈现显著上升态势。上游和下游区域由濒临失调的颀颀阶段演进到良好协调的较高水平阶段,中游区域则由轻度失调的颀颀阶段发展到良好协调的较高水平阶段。从协调水平来看,2014 年以前,上游区域协调指数高于中游和下游区域,但是 2014 年之后,中游区域超越上游区域,居于最高位置。同时,下游区域协调指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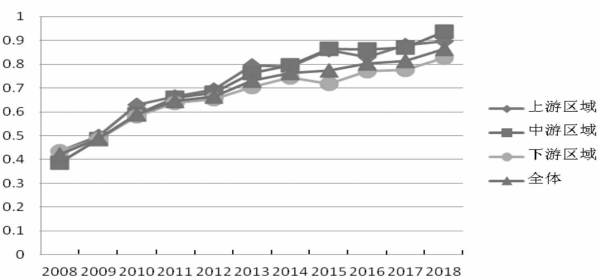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区域协调指数的动态演变

#### 四、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与动态变迁分析

##### (一) 耦合指数的时空演化分析

如上所述,本研究依据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可测算得出不同区域的耦合指数和协调指数,其时空演化情况如图 5、6 所示。

在图 5 中,2009 年,郑州、洛阳、新乡、焦作、安阳、濮阳、开封、商丘、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等 12 个省辖市耦合指数处于 0.90500—0.99930 区间,除济源外,其他省辖市耦合指数处于 0.81070—0.90500 区间。2015 年,开封、漯河降低到 0.87017—0.93504 区间,南阳降低到 0.80530—0.87517 区间,济源、三门峡、鹤壁、周口提高到 0.93504—0.99990 区间。2018 年,南阳、驻马店、周口又降低到 0.74870—0.83247 区间。

就整体空间格局而言,高值耦合指数区域由 2009 年的 11 个省辖市扩大到 2015 年的 15 个,达到最多的峰值状态,随后在 2018 年又减少到 11 个。与之相对应,低值耦合指数区域经历了扩大到缩小再到扩大的过程,由 2009 年的 1 个省辖市扩大到 2012 年的 4 个,再缩减到 2015 年的 1 个,又扩大到 2018 年的 3 个。上述情况说明,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的耦合状态并不稳定,特别是聚类分析中的下游类区域,耦合指数的震荡状态尤为明显,而且低值耦合指数区域分布较多。

##### (二) 协调指数的时空演化分析

在图 5 中,2009 年,河南省各区域协调状态不佳,除商丘和漯河属于初级协调外,其他区域均处于 0.600 以下的勉强协调或濒临失调,甚至轻度失调状态。2012 年,处于 0.600 以上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的区域显著扩大,增加至 16 个;0.600 以下低值协调指数区域缩减至 2 个,分别是平顶山和南阳。2015 年,郑州、济源、鹤壁、濮阳、许昌、焦作、三门峡 7 个省辖市稳步提升至 0.800 以上的良好协调状态,整体协调状况持续向好发展。2018 年,除商丘外,河南其他区域均达到 0.700 以上的中级协调或良好协调状态,全面消除 0.600 以下低值协调指数区域,整体协调状况实现很大程度优化。

从整体空间格局观之,河南省各省辖市中处于协调状态的区域数量逐步增加,0.700 以上的高值协调指数区域由 2009 年的 0 个扩大到 2015 年的 7 个,随后在 2018 年又增加到 17 个,达到最多的峰值

状态。至 2018 年,处于 0.600 以上协调状态的区域占比达到 100%,属于 0.700 以上中级、良好及优质协调状态的区域占比达到 94.44%。而且,上游、中

游区域协调状态较好,全部处于中级协调以上。从地理空间来看,协调指数“北高南低”的态势逐渐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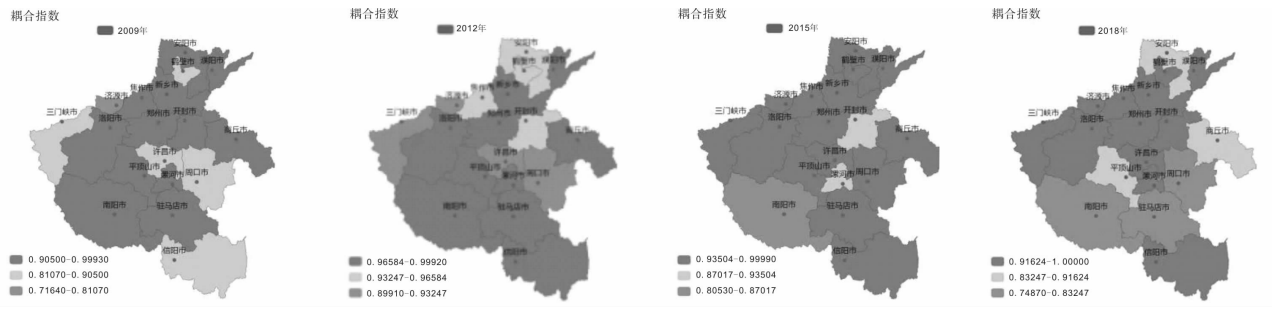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时空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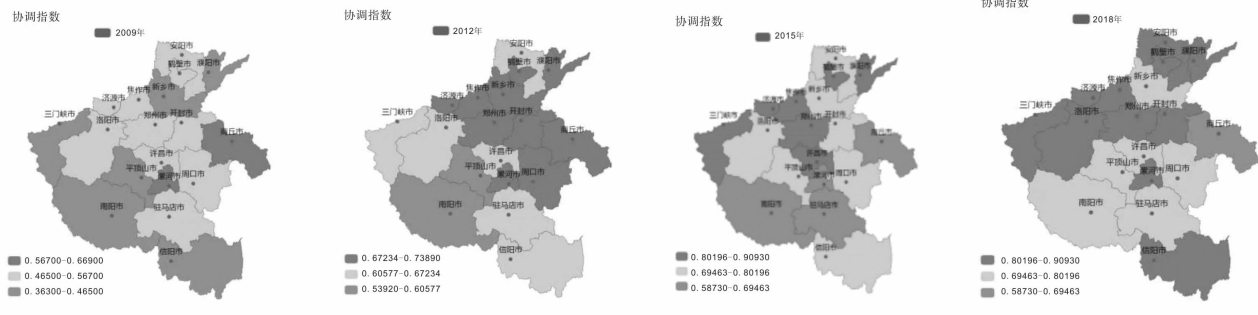


图 6 不同区域协调指数的时空演化

(三) 各区域系统动态变迁分析

本研究利用核密度估计对河南省 18 个省辖市 2009—2018 年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系统动态演化进行了实证分析,核密度曲线如图 7 所示。由图 7(a)可以看出,2012—2015 年综合发展指数向右轻微调整后,2015—2018 年明显向左侧移动,波峰垂直高度增加,曲线水平宽度呈轻微缩短状。整体上看,综合发展指数样本时间段内左右拖尾均稍微变短,这说明

河南省辖市综合发展指数差距在缩短。波峰的变化情况同样显示,综合发展指数的区域差异在逐渐减弱。但 2015—2018 年波峰垂直高度增加则说明个别高值指数区域在进一步变大。图 7(b)协调指数的核密度曲线呈现了与综合指数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因此,总体上看,无论是综合发展指数还是协调指数,除个别基础较好的优势区域外,大部分省辖市的区域差异都呈减弱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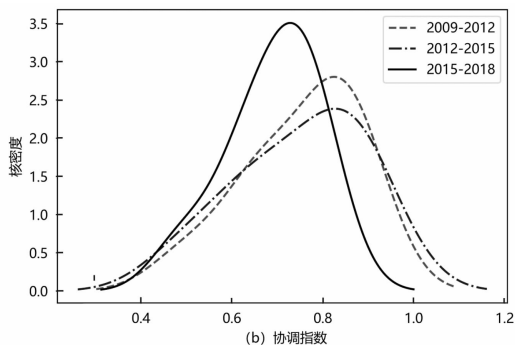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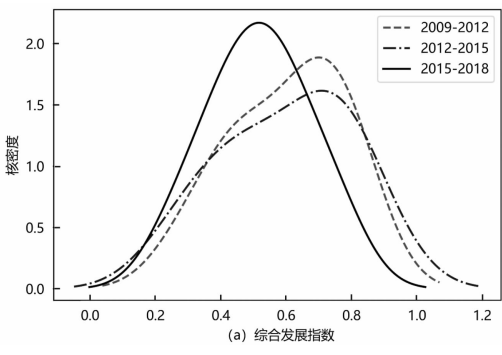


图 7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三系统的动态变迁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测算了河南省 18 个省辖市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指数和协调指数,同时分

析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与动态变迁趋势,为实现人才、科技与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研究表明:

1. 2008—2018 年,河南省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内部结构表现出“阶梯

化”差异的空间格局。在2017年之前,上游高于中游区域,但2017年之后,中游超越上游区域。而且,上、中游区域均高于下游区域。同时,从系统动态变迁来看,综合发展指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极化差异现象逐渐减弱。

2. 虽然出现短暂震荡,但是河南省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动态演变趋势较为一致,大致呈现缓慢上升状态。从耦合指数水平来看,上、中、下游区域耦合指数值均超过0.8,由此说明,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系统之间高度耦合,相互影响程度较深,正向互动作用较强。但三系统之间耦合状态并不稳定,特别是下游区域耦合指数的震荡状态尤为明显,而且低值耦合指数区域分布较多。

3. 2008—2018年,河南上、中、下游区域及全省的协调指数均呈现显著上升态势,整体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0.700以上的高值协调指数区域由2009年的0个扩大到2015年的7个,随后在2018年又增加到17个,达到最多的峰值状态。从地理空间来看,上游、中游区域协调状态较好,全部处于中级协调以上,协调指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极化差异现象逐渐减弱,但协调指数“北高南低”的态势逐渐显现。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为了促进科技人才、科技创新和农业经济相互耦合协调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应强化乡村科技人才的主体地位,将其作为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量。从工作机制创新、培养开发模式创新、科技资源配置创新、人才生态链创新等角度探索乡村科技人才集聚的新路径,从提升科技人才整体素质、加强培养开发力度、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加大科技经费投入等方面有效破解乡村科技人才“选、用、育、留”的阻滞因素和现实障碍。其次,应靶向提升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对于河南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下游区域,应重视乡村科技人才力量的建设,提高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质量,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农业科技创新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最后,应发挥河南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游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技术扩散优势,加强跨区域交流与合作,系统整合农村科技创新资源,建立乡村科技人才合作培养机制,积极促进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的优质协调发展。

#### 参考文献:

- [1] 王水清,贾兵强,向安强. 农民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51-156.
- [2] 杜占元.“十一五”我国农村科技发展战略[J]. 中国科技论坛,2007(3):9-11,15.
- [3] 汤国辉,刘晓光. 农村科技服务多元主体协作模式探索:以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市为例[J]. 中国科技论坛,2016(8):137-142.
- [4] 周华强,李镜,杨柳,等. 贫困地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分布特征:以四川省为例[J]. 中国科技论坛,2019(3):148-159.
- [5] 张华泉. 我国71年农村科技扶贫变迁历程及演化进路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5):18-27.
- [6] 刘玉来,余彬盛. 新农村建设中科技支撑主体的培育[J]. 农村经济,2014(4):22-26.
- [7] 刘芬,熊春林.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农村科技服务研究综述[J]. 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4):113-118.
- [8] 程华东,惠志丹. 农业高校助力解决乡村人力资本“短板”的新进路[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12-119,166.
- [9]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1):1-21.
- [10] Willard Wesley Cochrane.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A Historical Analys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198.
- [11] Lipton M.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of Poor Counties: the Impact on Rural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 World Development, 1980(8):1-24.
- [12] Scott Rozelle, Taylor J Edward, Alan Debrauw.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2):287-291.
- [13] Sonia Laszlo. Education, Labor Supply and Market Development in Rural Peru[J]. World Development, 2008(11):2421-2439.
- [14] 李良成,陈欣,郑石明. 科技人才与科技创新协同度测度模型及应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10):130-137.
- [15] 叶春燕,宋林佳. 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开发模式调整与优化[J]. 农业经济,2021(1):118-119.
- [16] 储节旺,曹振祥. 乡村振兴战略科技支撑路径的理论模型构建[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4):133-143.
- [17] 简小鹰. 农村科技人才市场化与农业技术进步[J]. 科学管理研究,2005(5):74-76,101.
- [18] 刘洪银. 构建人才返乡下乡的有效机制论析[J]. 中州学刊,2021(4):34-40.

- [19] 宋之帅, 杨善林, 龙丹. 科技创新人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3(8): 68-72.
- [20] 邓翔, 王仕忠.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 东岳论丛, 2020, 41(12): 109-120, 192.
- [21] 高强, 曾恒源. “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与政策取向[J]. 中州学刊, 2020(12): 1-8.
- [22] 方传棣, 成金华, 赵鹏大. 大保护战略下长江经济带矿

- 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6): 65-73.
- [23] 孙才志, 童艳丽, 刘文新. 中国绿色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化规律[J]. 经济地理, 2017, 37(2): 15-2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Gathering of Rural Technology Talents,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Henan Province

HAN Zhanb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rural technology talents aggregati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and using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calculat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coupling index and coordination index of 18 citi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Henan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d dynamic change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08 to 2018,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Henan Province shows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bu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shows a spatial pattern of “ladder” differences, and the polariz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gradually weaken; 2) Although there is a short-term shock, the dynamic evolution trend of coupling index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Henan Province is relatively consistent, roughly showing a slow rising state, and the three systems are highly coupled, have a deep degree of interaction, and have a strong positive interaction. However, the coupling state among the three systems is not stable, especially in the downstream region where the coupling index fluctuates obviously, and there are many low-value coupling index regions; 3) The coordination index of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enan Province and the whole province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was in the direction of benign coord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space, the coordination status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is good, and all of them are above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level. The polarization difference of coordination index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s gradually weakening, but the situation of coordination index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is gradually emerging.

**Key words:** rural technology tal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 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

——基于产业结构中介效应的视角

夏宏<sup>a</sup>, 朱涛<sup>b</sup>

(河南大学 a. 财务处; b. 经济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利用2008—2017年的相关数据,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对高等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起中介效应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高度化;经济增长;中介效应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5

**中图分类号:**F264;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27-08

## 一、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有很多,将这些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王路路(2018)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尤其是职业教育,于是随着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其对于人力资本的促进形成在不断地增强,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地增强。苏丽锋、史薇(2018)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指出作为侧重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发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优势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所以高等职业教育要重视技能积累,做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李兴洲(2012)则表明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高投入的高等教育,它的良性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还处在相对较低的发展层次和水平上。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王伟、孙芳城(2017)研究了31个省区市12年间的面板数据,最后得到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均

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质量的影响作用更大,且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西部其次,“中部塌陷”现象存在。张佳(2014)对2001—2012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为0.36%,大于普通本科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0.23%,东部、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西部地区。钟无涯(2015)则对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发现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而言,存在正向激励,并因产业性质与行业属性差异,这一激励机制的显著性具有差异性。除此之外,王磊(2011)以1998—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得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在长期上不仅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正相关,职业教育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至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占比连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稳步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朱云辉,2019)。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确实为社会提供了许多优秀的

收稿日期:2022-04-18

作者简介:夏宏(1985—),女,河南商丘人,硕士,河南大学财务处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产业经济。

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了企业劳动结构改善和劳动素质提升,但是当前整个国家职业教育爆发式发展,其实也是一种教育泡沫发展,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社会产业结构脱轨严重(邹海鸥,2016)。此外,我国高职教育技术型人才培养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发展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技术型人才供需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规模结构不匹配,以及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培养体系内部结构不合理且与产业发展需求相脱节(吕航、陈蕾、谈镇,等,2017)。高职专业布局实际上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学校办学理念和资源、学生和家长的的需求、政策调控、区域开放性程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杨振军,2015)。因此,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必须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围绕建立产学研多元主体共同愿景、校企微观主体共同利益基础和协同创新框架系统序参量,构建校企多元主体协同、价值整合、利益整合、资源整合以及协同实施的长效机制(唐智彬、石伟平,2015)。也有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规模均对第二产业产值有显著正向效应,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能有效促进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但对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省份而言,高等职业教育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冯健芳,2019)。而且,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在小型和中型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城市更为显著(周启良,2020)。

三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产业构造也是随之不断变迁(于拥军,2019)。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推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完善和调整产业结构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良性增长,也会突破原本的经济发展的平衡形式,引发国家经济的波动性变化。并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存在着空间自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结构性减速”,西部地区正处于“结构性加速”阶段,而中部地区为“加速”与“减速”并存,整体呈现出“结构性加速”,但全国经济总体上依然维持在“结构性加速”阶段(吕健,2012)。除此之外,不少学者实证分析后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双门槛效应,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中西部低城市化地区则表现为抑制作用(陈兆明,李敏,2019)。而且,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城

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不过从经济波动的特征来看,各城市的经济波动与全国整体的经济波动非常相似,经济波动不断趋于平缓(姚婷婷、黄馥琳、郭亚辉,2019)。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产业转型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干春晖,等,2011)。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这三大方向,研究角度和研究数据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这些文献研究都没有考虑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路径作用机理。本文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中介变量,从空间维度上对这一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弥补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的不足。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假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经济功能的凸显是现代教育非常重要的特征。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它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素养为目的,为社会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劳动力更加具备实践能力和工作能力,更加符合社会实践方面的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第一,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既接受了高等教育又掌握了专业职业技能的人才,为不同层次的人群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途径和就业前景,让更多无法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找到工作,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就业率会明显提高,失业率会降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拉动起来。第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劳动力提升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劳动者能够使自身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率得到提高,在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劳动率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效率更高,可以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劳动效益,而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会相应地提高。第三,高等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厂家和公司需要高技术、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而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会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向学生们传授最新技术,使其能够快速适应工作中的技术更新。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能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假设 H1:高等职业教育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假设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的状态中。就增长速度来说,第一产业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增长最快,在就业方面已经发挥了主要作用,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储备人力资本最主要的环节,在促进就业创业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产业的内部各个要素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高等职业教育正好可以满足其中劳动要素的改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影响。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实践,其主要目的是针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行业的实用型技术人才,这也决定了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从事“生产型”或者“生产服务型”工作,而且由于学生们拥有高水平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使得他们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的工作要求。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对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注重学中做、做中学,提高学生们的专业技能和劳动效率。对于厂商和公司来说,劳动效率高的劳动力不仅可以减少生产成本,还可以提高产出效率,从而为厂商和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所以,高等职业教育是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

假设 H2:高等职业教育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积极作用。

## (三)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假设

经济新发展需要新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调整,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主要是从事“生产型”或者

“生产服务型”工作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在促进就业和提高产出效率的同时,还可以创造新产品,促进新的需求,形成新的工业部门,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出贡献。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推进我国济全面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的转变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产业结构必须得到优化调整,高等职业教育的存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会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也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起作用。

假设 H3:高等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促进经济增长。

## 三、实证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为研究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本文考虑变量的实际可取性和意义,并综合各方面因素通过 EPS 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查询,最终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为解释变量,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中介变量,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进出口总额、投资总额、制度系数为控制变量。由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较晚,以及部分省区市在某些年份相关数据缺失,本文只选取了 2008—2017 年这十年间的数据用计量软件 Stata 16 进行实证研究。

### (二)定义变量

#### 1. 被解释变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 ),即人均 GDP,该数据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经济增长的状况,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该数据原始单位为元,数据来源:EPS—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分省)。

#### 2. 解释变量

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 $hvg$ ),考虑与高等职业教育有关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这一指标来反映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毕业生人数的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第二、三产业的产值,进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该数据原始单位为人,数据来源:EPS—中国区域教育数据库(分省)。

#### 3.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指标( $tm$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指



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在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中合理化和高级化。本文选取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值的比值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主要原因是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更多地会参与第一、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该数据原始单位为万元,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 4. 控制变量

(1)劳动力数量( $l$ ),指标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该数据原始单位为千人,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2)资本存量( $k$ ),指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该数据原始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3)外商投资总额( $fci$ ),指标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该数据原始单位为百万美元,数据来源: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 四、实证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一)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否通过产业结构起作用时,主要借助于中介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是一种间接效应,它是指当研究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产生影响的时候,如果存在一个变量  $M$ ,使得自变量  $X$  通过影响变量  $M$  来影响到  $Y$ ,这时就产生了所谓的中介效应,其中,变量  $M$  被称为中介变量。中介效应的具体传导机制可以用下列方程来解释。

$$Y = cX + e_1 \quad (1)$$

$$M = aX + e_2 \quad (2)$$

$$Y = c'X + bM + e_3 \quad (3)$$

如果  $Y$  与  $X$  相关显著,意味着方程①的回归系数  $c$  显著,通常在这个前提下考虑中介变量  $M$ ,进而通过一系列的检验程序来验证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比较复杂,一般分为三种:第一,依次检验回归系数  $a$  和  $b$ ,这是三种做法中最简单的检验方法,检验出来的第一类错误率很小,但是当中介效应较弱时,存在检验力不高的问题。第二,检验  $ab = 0$ ,其关键在于求出  $\hat{a}\hat{b}$  的标准误,该检验方法的检验力度中等。第三,检验  $c - c' = 0$ ,同样的,其关键在于如何计算  $\hat{c} - \hat{c}'$  的标准误,但是当  $a = 0$  且  $b \neq 0$  时,按公式检验出来的第一类错误率很高。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为了降低中介效应的检验错误率,可以使用如下程序进行检验:

(1)依次检验回归系数  $a$  和  $b$ ,如果回归系数  $a$  和  $b$  都显著,则表明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  $M$  实现的,然后继续第(2)步检验程序。反之,由于该种检验方法的检验力度不高,如果回归系数  $a$  和  $b$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不能确定到底自变量  $X$  与因变量  $Y$  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应该转到步骤(3)继续检验。

(2)检验回归系数  $c'$  的显著程度,如果发现回归系数  $c'$  不显著,则说明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是完全中介过程(即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完全是通过中介变量  $M$  实现)。反之,如果回归系数  $c'$  显著,则说明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是部分中介过程(即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  $M$  实现)。至此,整个检验过程结束。

(3)进行 Sobel 一阶近似检验,如果结果显著,则说明中介变量  $M$  的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说明中介变量  $M$  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该检验过程中需要检验的统计量为  $z = \hat{a}\hat{b}/S_{ab}$ (其中  $S_{ab} = \sqrt{\hat{a}^2 S_b^2 + \hat{b}^2 S_a^2}$ ,且  $S_a$  和  $S_b$  分别为  $\hat{a}$  和  $\hat{b}$  的标准误)。

#### (二)模型的建立

对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一般分为三种研究方法:混合回归模型法、固定效应估计法和随机效应模型法。而混合回归模型法是将面板数据看作截面数据,使用一个模型来进行回归,并没有考虑个体间存在差异性和时间差异,所以对 31 个省区市用一个模型来刻画整体特征效果不好。究竟是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法,还需要进行豪斯曼检验,如果通过豪斯曼检验,就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

鉴于本文是为了验证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所以将模型设为:

$$\ln pgdp_{it} = \alpha_{it} + \beta_1 \ln hvg_{it} + \beta_2 \ln l_{it} + \beta_3 \ln k_{it} + \beta_4 \ln fci_{it} + u_{it} \quad (4)$$

$$\ln tm_{it} = \alpha_{2i} + \gamma_1 \ln hvg_{it} + \gamma_2 \ln l_{it} + \gamma_3 \ln k_{it} + \gamma_4 \ln fci_{it} + u_{it} \quad (5)$$

$$\ln pgdp_{it} = \alpha_{3i} + \lambda_1 \ln hvg_{it} + \lambda_2 \ln tm_{it} + \lambda_3 \ln l_{it} + \lambda_4 \ln k_{it} + \lambda_5 \ln fci_{it} + u_{it} \quad (6)$$

检验过程如下:首先,使用 Stata 16 对第一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回归系数  $\beta_1$  为正且显著,则进行下一步分析,否则将停止中介效应分析。其次,对第二个方程和第三个方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回归系数  $\gamma_1$  和  $\lambda_2$  都显著,再查看  $\lambda_1$  是否显著,

若  $\lambda_1$  也显著,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如果回归系数  $\gamma_1$  和  $\lambda_2$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需要进行 Sobel 检验计算  $z$  值(其中  $z$  大于 0.97 则显著,小于 0.97 则不显著),检验通过则中介效应显著,检验不通过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以下是豪斯曼检验结果(见表 1)。

表 1 Hausman 检验结果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Hausman 检验	537.53 (0.0000)	168.38 (0.0000)	369.85 (0.0000)

检验结果显示,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均通过了 Hausman 检验,拒绝原假设,所以本文将对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均采取固定效应估计法。

### (三)描述性统计

将 31 个省区市 2008—2017 年的所有数据整理分析得到以下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ln pgdp$	310	10.55713	0.520197	9.085231	11.76752
$\ln hvg$	310	10.69390	1.111144	6.495266	12.40112
$\ln tm$	310	1.687925	0.829328	-0.0457395	4.433516
$\ln k$	310	9.280437	1.135149	5.736298	13.37116
$\ln l$	310	8.229868	0.896427	5.313206	9.890048
$\ln fci$	310	6.113363	1.520577	1.674926	9.776919

### (四)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在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因此本文将我国 31 个省区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我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其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划分为东部地区,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为中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陕西省、西藏自治区为西部地区)。实证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中数据可知,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中的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步骤三中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也为正,且显著,即中介效应模型中  $c$ 、 $a$ 、 $b$ 、 $c'$  均显著,说明在东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中介效应。同时

由于步骤一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为 0.291,因此产业结构能在 29.1% 的程度上解释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表 3 中介效应(东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ln hvg$	0.291 *** (3.52)	-0.197 *** (-2.51)	0.381 *** (4.94)
$\ln k$	0.326 *** (6.73)	0.128 *** (2.78)	0.268 *** (5.88)
$\ln l$	0.415 *** (5.68)	0.0766 (1.10)	0.380 *** (5.71)
$\ln fci$	0.0889 ** (2.50)	0.0302 (0.90)	0.0751 ** (2.32)
$\ln tm$			0.456 *** (4.87)
$_{-}cons$	0.305 (0.36)	2.204 *** (2.73)	-0.700 (-0.88)
$N$	120	120	120
$r^2$	0.890	0.308	0.910
$r^2_a$	0.874	0.208	0.896
$F$	209.7	11.57	209.2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检验值,标记\*、\*\*、\*\*\* 分别表示在 10%、5%、1% 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 4 中介效应(中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ln hvg$	0.353 *** (5.31)	0.0993 (0.83)	0.351 *** (5.22)
$\ln k$	0.222 *** (5.74)	-0.176 ** (-2.52)	0.226 *** (5.58)
$\ln l$	0.577 *** (4.63)	1.085 *** (4.82)	0.552 *** (3.86)
$\ln fci$	0.261 *** (5.27)	-0.0283 (-0.32)	0.262 *** (5.25)
$\ln tm$			0.0228 (0.36)
$_{-}cons$	-2.041 ** (-2.18)	-6.906 *** (-4.08)	-1.884* (-1.81)
$N$	90	90	90
$r^2$	0.915	0.293	0.915
$r^2_a$	0.901	0.282	0.900
$F$	206.4	7.961	163.3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检验值,标记\*、\*\*、\*\*\* 分别表示在 10%、5%、1% 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根据表 4 中的数据可知,中部地区步骤一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beta_1$  为正且显著,意味着在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然而步骤二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gamma_1$  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步骤三中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lambda_2$  为正且显著。对应到中介效应模型中, $c$  与  $b$  显著,而  $a$  不显著,于是进行 Sobel 检验,经计算得  $z$  约为 0.329,小于边界值 0.97,所以没有通过 Sobel 检验,即在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5 中介效应(西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ln hvg$	0.152*** (3.06)	-0.0145 (-0.17)	0.154*** (3.14)
$\ln k$	0.382*** (11.95)	-0.0804 (-1.43)	0.391*** (12.29)
$\ln l$	0.487*** (4.90)	0.561*** (3.21)	0.421*** (4.07)
$\ln fci$	0.0588*** (2.36)	0.0395 (0.90)	0.0542** (2.20)
$\ln tm$			0.117* (1.93)
$-cons$	1.536*** (2.71)	-2.265** (-2.27)	1.801*** (3.13)
$N$	100	100	100
$r^2$	0.972	0.250	0.974
$r^2_a$	0.968	0.137	0.969
$F$	756.6	7.179	625.3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检验值,标记\*、\*\*、\*\*\* 分别表示在 10%、5%、1% 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根据表 5 中的数据可知,西部地区步骤一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beta_1$  为正且显著,意味着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步骤二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gamma_1$  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步骤三中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lambda_2$  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将其对应到中介效应模型中, $c$  与  $b$  显著,而  $a$  不显著,于是进行 Sobel 检验,经计算得  $z$  为负值,小于边界值 0.97,所以没有通过 Sobel 检验,即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

之所以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同。相比较于东部地区来说,中、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发展缓慢,而且地区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就导致了东部地区在教育保障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无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增长或促进效果不明显。

#### (五) 稳健性检验

鉴于在该中介效应传导机制中还有许多重要因素会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可以在该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地区进出口总额( $open$ )检验结果是否稳健。该指标采用商品进出口总额,原始数据单位为万美元,且数据来源为 EPS—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回归结果见表 6 至表 8,加入控制变量地区进出口总额( $open$ )之后东部地区步骤一、步骤二和步

骤三对应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即  $a$ 、 $b$ 、 $c$  符号相同,大小变化不大,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中部地区步骤一和步骤三中对应的变量回归系数  $c$  和  $b$  都为正且显著,步骤二中对应的变量回归系数符号未变且不显著;西部地区步骤一和步骤三中变量的回归系数  $c$  和  $b$  也均为正且显著,步骤二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为负且不显著。同时,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变化都在合理范围内,因此可以断定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与前面实证结果保持一致。

表6 中介效应(东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ln hvg$	0.205*** (2.84)	-0.251*** (-3.33)	0.281*** (3.88)
$\ln k$	0.190*** (4.04)	0.0428 (0.87)	0.177*** (3.94)
$\ln l$	0.277*** (4.17)	-0.00963 (-0.14)	0.280*** (4.42)
$\ln fci$	0.176*** (5.24)	0.0846*** (2.42)	0.150*** (4.57)
$\ln open$	0.309*** (6.19)	0.194*** (3.72)	0.250*** (4.94)
$\ln tm$			0.303*** (3.37)
$-cons$	-1.975** (-2.42)	0.775 (0.91)	-2.210*** (-2.83)
$N$	120	120	120
$r^2$	0.920	0.390	0.928
$r^2_a$	0.907	0.295	0.916
$F$	253.7	13.16	218.0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检验值,标记\*、\*\*、\*\*\* 分别表示在 10%、5%、1% 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7 中介效应(中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ln hvg$	0.340*** (5.04)	0.0505 (0.43)	0.340*** (5.00)
$\ln k$	0.213*** (5.42)	-0.208*** (-3.01)	0.214*** (5.11)
$\ln l$	0.469*** (2.98)	0.683** (2.47)	0.466*** (2.83)
$\ln fci$	0.257*** (5.19)	-0.0431 (-0.49)	0.258*** (5.15)
$\ln open$	0.0604 (1.12)	0.225*** (2.37)	0.0593 (1.06)
$\ln tm$			0.00450 (0.07)
$-cons$	-1.763* (-1.82)	-5.871*** (-3.45)	-1.736 (-1.66)
$N$	90	90	90
$r^2$	0.916	0.341	0.916
$r^2_a$	0.902	0.229	0.900
$F$	165.9	7.880	136.5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检验值,标记\*、\*\*、\*\*\* 分别表示在 10%、5%、1% 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8 中介效应(西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ln hvg$	0.123** (2.63)	-0.0334 (-0.38)	0.125*** (2.71)
$\ln k$	0.402*** (13.38)	-0.0671 (-1.18)	0.408*** (13.57)
$\ln l$	0.295*** (2.82)	0.437** (2.22)	0.257** (2.41)
$\ln fci$	0.0574** (2.49)	0.0386 (0.89)	0.0541** (2.36)
$\ln open$	0.0689*** (3.90)	0.0445 (1.33)	0.0650*** (3.67)
$\ln tm$			0.0867 (1.52)
$_{-}cons$	2.169*** (3.94)	-1.856* (-1.79)	2.330*** (4.19)
$N$	100	100	100
$r^2$	0.977	0.266	0.977
$r^2_a$	0.973	0.145	0.973
$F$	708.4	6.151	599.9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检验值,标记\*、\*\*、\*\*\* 分别表示在 10%、5%、1% 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 五、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经过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2008—2017 年十年间的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东部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通过增加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来调整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2.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很难通过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增加来调整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无法明显达到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在不同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存在异质性。

### (二) 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在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技能人才大规模产生的重要部门,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引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本文在对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结论: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并且这种中介效应存

在地区差异。针对这个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调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使其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培养方案都应该与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发展速度较快,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偏向技术创新类专业和课程,而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来说,高等职业教育则要偏向培养实际操作能力的专业和课程。同时,与各地区产业发展协同的、急需的专业,可以适当扩大招生规模,相反,落后于产业发展、就业难的专业应进行相应缩减。专业设置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满足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技能累积以及自主创新过程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2. 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学融合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实际操作型高级技术人才,其毕业生主要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吸收。所以在高等职业学校制定培养方案的时候,应考虑加强学校与各地区企业的合作,定时安排学生到企业参加社会实践和实习,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让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迅速融入工作岗位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此过程中发现学生的优势和不足,为后期及时调整学生的培养方案和弥补教学过程之中的不足奠定基础,从而实现企业、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共赢。

3. 政府应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优化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充分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要根据各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高等职业学校发展和管理策略,合理优化高等职业学校的资源配置,包括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办学质量,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平衡、快速发展。

### 参考文献:

- [1]王路路.河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8.
- [2]苏丽锋,史薇.“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对策[J].教育与经济,2018(5):3-7,39.
- [3]李兴洲.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探析[J].教育研究,2012,33(2):49-52.
- [4]王伟,孙芳城.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哪个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J].教育与经济,2017(6):68-75.
- [5]张佳.高等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4,35(10):45-50.
- [6]钟无涯.高职教育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 2004—2013[J]. 教育与经济,2015(4):38-45.
- [7] 王磊. 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1998—2007年数据的验证[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1,32(2):77-82.
- [8] 朱云辉.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9,40(5):117-119.
- [9] 邹海鸥.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吻合度研究[J]. 教育现代化,2016,3(37):108-109.
- [10] 吕航,陈蕾,谈锁,等. 高职教育技术型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J]. 职教论坛,2017(22):62-66.
- [11] 杨振军. 关于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布局的理性思考[J]. 江苏高教,2015(2):143-146.
- [12] 唐智彬,石伟平. 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逻辑与机制[J]. 教育与经济,2015(4):3-7,29.
- [13] 冯健芳. 高职教育对第二产业产值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9,18(4):48-53.
- [14] 周启良. 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 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20,31(2):57-67,78.
- [15] 于拥军.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商场现代化,2019(23):100-101.
- [16] 吕健. 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性减速与经济增长分化[J]. 中国工业经济,2012(9):31-43.
- [17] 陈兆明,李敏.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特征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9,35(22):139-142.
- [18] 姚婷婷,黄贻琳,郭亚辉. “产业结构软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9(6):143-155.
- [19] 千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46(5):4-16,3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XIA Hong<sup>a</sup>, ZHU Tao<sup>b</sup>

(a. Finance Office; b.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2008 to 2017, this paper tak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construct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nd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through the fixed effect model in econometr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t is, it has heterogeneity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economic growth; intermediary effect

#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

——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空间外溢

杨春雨<sup>1</sup>, 杨瑞琪<sup>2</sup>

(1. 安徽三联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2. 上海大学 悉尼工商学院, 上海 201800)

**摘要:**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关系到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和农民收入结构优化, 对于我国“双循环”经济战略的实现意义重大。理论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绝对水平和收入结构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6—2021年31个省份的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 会推动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比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 对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存在显著的反向作用效应; 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的作用力度最强, 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占比, 而对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的作用力度较小。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收入水平; 收入结构; 空间外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6

**中图分类号:**F832; 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35-07

## 一、引言

2020年4月10日,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明确强调了内外双循环对塑造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性。随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调整农民收入结构、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有助于培育和提升农民消费能力, 是实现内外双循环经济战略的重要手段。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新型金融模式, 高效、便捷、成本低、普惠性强是其主要优势, 是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重要方式, 能够更广泛、更深层次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中小微企业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互联网及智能终端设备在农村地区的普及, 互联网金融对于以中小微企业和家庭生产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的作用日渐凸显。尤其是2015年7月18日, 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将互联网金融正式纳入金

融监管框架, 我国互联网金融逐渐进入规范发展期, 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深入发展, 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也越发突出。所以, 从互联网金融角度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升、调整农民收入结构成为当前政府部门推动经济发展“双循环”战略实现的重要抓手,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 学界关于互联网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理论研究逐渐增多, 比如王晓军(2018)<sup>[1]</sup>、李丽霞(2019)<sup>[2]</sup>、李京蓉(2021)<sup>[3]</sup>等学者研究了互联网金融的减贫效应, 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贫困水平的影响机制, 论证了互联网金融有助于降低农村贫困程度。一些学者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效应, 认为互联网金融有助于提升我国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比如刘心怡(2020)<sup>[4]</sup>、杨少雄(2021)<sup>[5]</sup>、刘自强(2021)<sup>[6]</sup>等。少数学者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 认为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民的收入差距,

收稿日期: 2022-05-08

基金项目: 安徽三联学院星级教师工作坊项目“新营销研习社”(XJJS201901)

作者简介: 杨春雨(1987—), 男, 安徽安庆人, 硕士, 安徽三联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实践。

比如孔杏(2018)<sup>[7]</sup>、李牧辰(2020)<sup>[8]</sup>等。现有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对农民绝对收入水平的作用效应上,深入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作用效应的很少。此外,绝大部分研究仅局限在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直接作用效应上,对作用效应的间接作用效应(空间外溢性)关注得极少。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不但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绝对收入水平的作用效应,还进一步分析了其对农民收入结构的作用效应,同时还考虑了作用效应的空间外溢性,弥补了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对于政府部门优化农民收入提升策略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 二、假设提出

### (一)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效应

#### 1.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指出,金融系统中存在金融服务共享缺乏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缺乏接触金融服务的渠道及接受金融服务时存在障碍<sup>[9]</sup>。互联网金融可以很好地弱化传统金融系统中的金融排斥现象,它克服了传统金融必须依托实体网点开展业务的不足,依托互联网及智能终端,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更加便利、快捷地向农民推送相关金融服务,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性,极大地拓宽了农民接触金融服务的渠道,为农民依托金融服务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进而提升收入水平提供了可能。比如,互联网金融为农民接触各类社会救济、补贴信息提供了便利,更为申请各类转移收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助于农民转移性收入获取效率和数量的提升。以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为农民获取社会救助提供了有效渠道,当农民面临家庭变故且急需用钱时,通过众筹平台寻求社会帮助是目前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再比如,传统金融环境下,银行的各种金融理财产品的门槛较高,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投资理财知识,这将相当比例的农民排斥在了服务范围之外。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各类门槛较低、购买便捷的小额投资理财产品为农民的投资理财提供了途径。甚至一些几乎没有任何金融理财知识的农民只需要将资金转入余额宝、理财通等货币性理财产品便可获取一定收益,有助于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提升。

#### 2. 长尾理论

根据长尾理论,当商品储备充足、销售渠道畅通时,其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会急剧下降,以往市场需求很低的商品的市场份额会快速提升<sup>[10]</sup>。在传统

金融中,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会受到自然条件、信贷系统以及农民金融知识等因素的限制,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成本较高,传统金融对农村各类经济活动的支持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服务的便利程度大大提升,销售渠道拓宽。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建立农民的信用模型,并制定风险控制标准,这能够有效降低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推动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普及,给予农民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合适的金融服务,推动农民收入水平提升。比如,互联网金融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小额信贷渠道,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更多的农民信用信息,可以更好地进行风险控制,有效降低向农民提供信贷服务的成本,推动互联网金融机构更广泛地向农民提供金融支持,有助于农民经营性收入水平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1: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

### (二)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的作用效应

农民收入包含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类型,在互联网金融的作用下,虽然农民的各种收入的绝对水平均会呈现上涨趋势,但不同类型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收入结构)会在互联网金融的作用下而呈现差异化变动。

首先,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而农民收入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发生变化。互联网金融加快了农村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比重的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逐渐降低<sup>[11]</sup>,促使农民职业分化,更多农民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农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因此增加,挤占了经营性收入比重。此外,互联网金融有助于农村地区非农经济活动的增加,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原本紧紧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农民可以利用农闲时间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而外出务工农民也会因为对户籍制度、子女教育等问题的考虑而选择回乡就业,既能够充分将时间分配在农业生产活动和非农业生产活动上,又能够兼顾父母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有助于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的提升。

其次,互联网金融为农村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为农民闲置资产的投资提供了渠道。随着农村产业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提



出和实施,农村地区各种产业合作社形式的中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农民可以货币资金、土地等资产入股,获取企业分红。或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相关企业,获取土地租金、补偿金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第一产业虽然也在互联网金融的支持下有所发展,产业的绝对产值有所增加,但其在农村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却会被第二、三产业挤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占比也因此被挤占。此外,以往农民可选择的投资机会很少,信托、房地产等投资渠道的门槛较高,证券投资的风险较高,所以,以往绝大多数农民会将闲置资金存放银行。虽然银行存款的风险较低,但利率也比较低,不利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这些投资渠道对资金量限制较低,且存取灵活。农民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利用闲置资金灵活地购买相关投资理财理财产品,这些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不但投资利率普遍高于银行的相关理财产品,且只需要通过智能终端(智能手机、电脑等)线上操作即可,便捷程度更高。

最后,转移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2016年以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较多,“输血式”扶贫成为当时的主要扶贫方式,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社会个人等的转移收入比重较高。2015年,“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以及2016年《关于“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的出台,依托农村产业推动农村人口脱贫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主基调,“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化,农民的转移性收入逐渐被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替代,农民的转移收入比重降低。而在农村相关产业发展过程中,互联网金融又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可以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农民转移性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作用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2:互联网金融会显著作用于农民收入结构,推动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提升,推动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下降。

(三)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作用效应的空间外溢

互联网具有很强的空间关联性,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活动会因为互联网的加入而呈现网络化关联。互联网金融的基础是互联网技术,空间关联性也是其特性之一。互联网金融在作用于农民收入过程中,会因为空间关联的存在而产生一定的空间外

溢,不但会直接作用于当地农民收入,还会对周边地区的农民收入产生一定的间接作用力。比如某一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在刺激当地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及占比提升的同时,也会因为空间关联性的存在带动周边地区互联网金融水平的提升,促使周边地区中小微企业更好发展,相应周边地区农民便会有更多就业机会,进而间接对周边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产生作用效应。

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3: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具有空间外溢性。

### 三、实证检验

#### (一)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考虑到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存在空间特征,本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前文假设进行检验。

$$\begin{cases} Y_{it} = \tau Y_{it-1} + \rho w' Y_{it} + \varphi'_{it} X_{it} + d'_i x_i \delta + \mu_{it} + \gamma_t + \psi_{it} \\ \psi_{it} = \lambda m' \psi_{it} + \nu_{it} \end{cases} \quad (1)$$

其中, $Y$ 为被解释变量, $X$ 为解释变量, $d'_i x_i \delta$ 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d'_i$ 为相应空间权重矩阵 $w$ 的第 $i$ 行; $\gamma_t$ 为时间效应; $m'$ 为扰动项精简权重矩阵 $m$ 的第 $i$ 行; $\mu_{it}$ 为随机扰动项; $\nu_{it}$ 为白噪声项。当 $\lambda = 0$ 时为空间杜宾模型,当 $\lambda = 0$ 且 $\delta = 0$ 时为空间自回归模型。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各变量的空间属性和时间属性。

(1)被解释变量。选择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民收入结构两类被解释变量。其中农民收入水平用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农民收入结构用农民人均经营收入、人均工资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表示。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在很多领域重叠,比如网络借贷、财富管理、互联网保险、金融服务等,本文选择零壹智库创建的金融技术指数( $GFI$ )替代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能够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的因素很多,为了控制相关因素给本文研究结论带来干扰,借鉴苏静(2017)<sup>[12]</sup>、曾智(2018)<sup>[13]</sup>、吴国松(2020)<sup>[14]</sup>等学者的研究,选择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财政支持力度3个控制变量。具体各类变量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信息汇总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代表符号	解释说明
被解释变量	农民收入水平	<i>Income</i>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经营性收入占比	<i>O_income</i>	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 100%
	工资性收入占比	<i>W_income</i>	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 100%
	财产性收入占比	<i>P_income</i>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 100%
	转移性收入占比	<i>T_income</i>	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 100%
解释变量	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	<i>GFI</i>	金融技术指数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i>GDP</i>	人均 GDP
	通货膨胀率	<i>CPI</i>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财政支持力度	<i>Finance</i>	财政支持力度 = 财政支出/GDP * 100%

2015 年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标志着我国互联网金融正式进入规范发展阶段,所以本文选择 2016—2021 年间内地 31 个省份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所有数据收集自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局官网,个别省份 2020 年之前的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用外推法弥补,同时,大部分省份 2021 年的年度数据没有公布,尚没有公布 2021 年数据的用前三季度数据进行折算替代。为了避免不同变量度量单位差异给数学模型估计结果带来的异方差问题,在具体计算过程中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所有计算过程由 Matlab 完成。

## (二) 模型校验

### 1.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计算各被解释变量各年度的莫兰指数 (Moran' I),以检验所构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自相关性(表 2)。可以看出,2016—2021 年间,各省份的农民可支配收入的 Moran' I 均为正值,且至少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各农民收入结构变量的 Moran' I 也均为正值,至少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所以本文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存在显著的空间

自相关性。

表2 被解释变量的 Moran' I 指数表

年份	<i>Income</i>	<i>O_income</i>	<i>W_income</i>	<i>P_income</i>	<i>T_income</i>
2016	0.301 **	0.402 **	0.388 **	0.311 ***	0.275 **
2017	0.286 ***	0.437 **	0.349 **	0.327 ***	0.218 **
2018	0.297 ***	0.355 **	0.316 ***	0.382 **	0.294
2019	0.324 **	0.381 *	0.346 ***	0.364 **	0.266 *
2020	0.317 **	0.407 *	0.355 ***	0.348 **	0.307 **
2021	0.344 ***	0.376 **	0.383 ***	0.371 **	0.322 *

注: \*、\*\*、\*\*\* 分别表示 t 检验通过了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下同)。

### 2. 空间效应检验

从表 3 中的空间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 10% 水平下,各被解释变量下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均通过检验,即各模型均存在空间效应。各被解释变量下的 LM - Error 与 LM - Lag 虽然均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具体显著性水平却存在差异,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Robust LM - Error 在 5% 水平下均通过检验,各被解释变量下的模型适合空间自回归模型。而 Robust LM - Lag 至少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所以各被解释变量下的模型也适合空间杜宾模型。本文选择显著性水平更高的空间自回归模型。

表3 空间效应检验表

检验方法	<i>Income</i>	<i>O_income</i>	<i>W_income</i>	<i>P_income</i>	<i>T_income</i>
LM - Error	21.524 ***	17.362 **	14.662 *	12.193 *	18.618 **
LM - Lag	19.376 **	12.057 **	10.391 *	11.052 *	15.041 *
Robust LM - Error	2.281 ***	1.825 **	3.618 **	4.618 **	1.852 **
Robust LM - Lag	3.924 **	2.105 *	3.828 **	5.106 *	3.009 **

### 3. 模型形式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在具体参数估计过程中有随机效应(RE)、混合效应(ME)和固定效应(FE)三种形式,利用 F 检验可以判断模型更适合随机效应(RE)形式还是固定效应(FE)形式,Hausman 检验可以判断模型更适合混合效应(ME)形式还是固定效应(FE)形式。表 4 中的 F 检验显示,各被解释变量下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至少在 10% 水平下认为固定

效应形式更适合,而 Hausman 检验则至少在 5% 水平下也认为固定效应形式更适合。

## (三) 模型估计与效应分解

### 1. 模型估计与分析

根据前文校验结论,基于模型(1),对各被解释变量下的固定效应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表 5)。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各模型的可决系数均在 0.4 以上,最高达到了 0.518,模型的整体显著性

水平均为 0.000,各被解释变量下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参数估计优度较高。

表 4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表

被解释变量	F 检验		Hausman 检验	
	统计值及显著性	评判结论	统计值及显著性	评判结论
<i>Income</i>	215.054 **	FE	135.261 ***	FE
<i>O_income</i>	179.665 ***	FE	173.008 **	FE
<i>W_income</i>	183.161 *	FE	124.719 ***	FE
<i>P_income</i>	108.609 **	FE	155.284 **	FE
<i>T_income</i>	169.765 *	FE	172.205 **	FE

表 5 空间自回归模型参数估计表

变量	<i>Income</i>	<i>O_income</i>	<i>W_income</i>	<i>P_income</i>	<i>T_income</i>
<i>GFI</i>	0.251 **	-0.071 ***	0.106 ***	0.218 ***	-0.063 **
<i>GDP</i>	0.083 *	-0.039	0.088 **	0.007 *	-0.047
<i>CPI</i>	0.221 ***	-0.107 **	0.207 *	0.076	-0.054 *
<i>Finance</i>	0.166 **	-0.055 **	0.053 *	0.192 *	-0.013
<i>R<sup>2</sup></i>	0.518	0.493	0.581	0.438	0.427
<i>Sig.</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5 中,*GFI* 对 *Income* 的参数估计值为 0.251,且在 0.05 水平下显著,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民收入绝对水平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农民收入水平便会提升 0.251 个单位,前文假设 1 为真命题。

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各模型的 *GFI* 参数估计值存在较大差异,*W\_income* 和 *P\_income* 下的参数估计值为正数,且均在 1% 水平下显著,*O\_income* 和 *T\_income* 下的参数估计值为负数,至少在 5% 水平下显著,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不同类型收入占比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会推动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互联网金融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具有正向作用效应,可以推动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提升,对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存在反向作用效应,使得二者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所以前文假设 2 为真命题。

进一步从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来看,*P\_income* 下的参数估计值绝对值最大,互联网金融

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效应最强,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发展加快了农村产业发展,为农民合资创业、“两权”流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农民利息、红利、土地征用补偿等收入的快速增加。*W\_income* 下的参数估计值为 0.106,互联网金融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效应也比较强,但弱于财产性收入,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互联网金融有力推动了农村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为农民充分利用农闲时间获取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条件,但相比于以往在城镇地区务工,农村中小微企业提供的单位时间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工资性收入占比的提升速度有限。*O\_income* 和 *T\_income* 下的参数估计值绝对值相近,且比较小,互联网金融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反向作用效应比较小。

各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在符号上与解释变量一致,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及财政支持力度对农民收入及收入结构的作用效应与互联网金融相似,但在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及绝对值上却存在较大差异。

## 2. 空间效应分解

空间自回归模型从整体上展现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同时也包含了空间效应,而空间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空间效应(D-E)和间接空间效应(I-E)(表 6),分别表现了互联网金融对某一地区和周边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的作用效应。从表 6 可以看出,除了 *W\_income*,解释变量对其他被解释变量的直接空间效应普遍大于间接空间效应,且至少在 10% 水平下显著,但对比效应绝对值会发现,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差距并不大。虽然 *W\_income* 下的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低,但在数值上二者相差甚微。所以,某一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能够作用于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的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调整。所以前文假设 3 也为真命题。

表 6 空间效应分解表

变量	<i>Income</i>		<i>O_income</i>		<i>W_income</i>		<i>P_income</i>		<i>T_income</i>	
	D-E	I-E	D-E	I-E	D-E	I-E	D-E	I-E	D-E	I-E
<i>GFI</i>	0.139 **	0.112 **	-0.040 **	-0.031 **	0.052 **	0.054 **	0.127 **	0.091 **	-0.034 *	-0.029 *
<i>GDP</i>	0.049 *	0.034 *	-0.023	-0.016	0.045 *	0.043 *	0.005	0.002	-0.022	-0.025
<i>CPI</i>	0.106 **	0.115 **	-0.072 *	-0.035 *	0.097 **	0.110 **	0.033	0.043	-0.033 *	-0.021 *
<i>Finance</i>	0.093	0.073	-0.031 **	-0.024 **	0.032 *	0.021 *	0.106	0.086	-0.008	-0.005

### 3. 稳健性检验

从前文的空间效应检验可知,本文各被解释变量下的模型也适合空间杜宾模型,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前文实证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各被解释变量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参数估计的可决系数 $R^2$ 均在0.5以上,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各模型估计效果较好。解释变量GFI的各参数估计值符号与前文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完全一致,在显著性水平上也至少通过了5%的临界值,与前文也极为相似,各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在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上也与前文高度一致。所以本文构建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及实证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7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Income	O_income	W_income	P_income	T_income
GFI	0.316**	-0.156**	0.154***	0.266**	-0.140***
GDP	0.281**	-0.103*	0.092*	0.048	-0.096*
CPI	0.203***	-0.087***	0.286**	0.174*	-0.109*
Finance	0.063**	-0.073	0.119*	0.188	-0.077
$R^2$	0.607	0.583	0.631	0.542	0.519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四、结论与建议

### (一) 基本结论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以其突出优势支持着实体经济发展,探讨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对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和农民收入结构优化策略的制定意义明显,有助于充分发挥农村消费在“双循环”经济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本文从农民收入绝对水平、收入结构两个方向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基于2016—2021年内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并分析了作用效应的空间外溢性。全文研究结论主要有:

1.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民收入水平提升。

2.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存在显著的作用效应,会推动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其中,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存在正向作用效应,对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存在反向作用效应。

3.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的作用力最强,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占比,而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的作用力较小。

4.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能够显著带动周边地区农民收入水平

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调整。

### (二) 政策建议

#### 1. 拓展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服务广度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是通过农村各产业、信贷系统、投资理财平台等多种渠道实现的,互联网金融在对农民收入发挥作用效应之前会对农村的社会经济各种因素产生作用效应,所以,拓展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服务广度是充分发挥其在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结构优化上作用的根本方式。首先,拓展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覆盖面,除了满足农村地区中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支付需求外,还应该与农民个人及家庭的信贷需求、理财需求、线上支付需求等密切结合,将互联网金融服务拓展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次,强化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针对性,既要有符合中小微企业需求特征的中长期信贷产品,又要有符合农民家庭生产的小额、低息的短期信贷产品,同时还要有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农民金融需求特征的产品。最后,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质量,中老年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及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都很有有限,可以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引导这类农民准确、客观地认识互联网金融,激发他们的互联网金融需求,提升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普及程度。

#### 2. 以产业服务为主体,兼顾农民个人需求

农村产业发展是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主要渠道,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受到互联网金融的正向作用显著,所以,为农村地区中小微企业及家庭生产提供服务应该成为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发展方向,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时兼顾农民个人需求,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金融机构应该针对农村不同类型企业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比如针对种植类、养殖类企业主要提供符合这类企业生产周期、种植和养殖风险特点的互联网信贷产品、互联网保险产品,并提供生产技术指导、财务管理等增值服务;针对农产品加工类企业主要提供企业原材料购买和储存、产品运输等方面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 3. 强化区域间互联网金融的协同发展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作用效应的空间外溢体现了信息时代社会经济活动的高度关联性,同时也体现了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我国地域广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要充分发挥这种空间外溢性对我国农民收入的正向作用。不同区域之间可以构建互联网金融协作平台,尤其是对农村产

业发展的协同支持平台的建设,一方面可以让不同区域之间共享各自的互联网金融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区域间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调剂,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相对发达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帮扶作用,这不仅仅限于省域之间,在各地级市之间、各县区之间也应该发挥相互帮扶作用,以实现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作用效应空间外溢的最大化。

#### 参考文献:

- [1] 王晓军,刘加林,朱强. 互联网金融精准扶贫认知及其行为影响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8,34(24):108-112.
- [2] 李丽霞,李宁,张旭锐.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J]. 科学决策,2019(11):66-82.
- [3] 李京蓉,申云,杨晶,等. 互联网金融使用对农户多维减贫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36(5):104-118.
- [4] 刘心怡,金山,张伟. 金融科技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 财贸研究,2020,31(8):65-76.
- [5] 杨少雄,孔荣.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改善农户收入了吗[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80-190,200.
- [6] 刘自强,张天.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 当代经济研究,2021(12):93-102.
- [7] 孔杏. 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动态关

- 系研究[J]. 经济与管理,2018,32(2):58-62,92.
- [8] 李牧辰,封思贤,谢星.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3):132-145.
- [9] 孙武军,林惠敏. 金融排斥、社会互动和家庭资产配置[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3):21-38.
- [10] 霍兵,张延良.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和策略:基于长尾理论视角[J]. 宏观经济研究,2015(2):86-93,108.
- [11] 周婕. 探讨河北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体制优化策略[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1):162-167.
- [12] 苏静. 空间关联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陵山区66个县域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38(6):125-130.
- [13] 曾智,何蒲明. 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7):23-26.
- [14] 吴国松,姚升. 要素市场扭曲下中国农民收入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4):12-18,44.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The Effect of Internet 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Income Level, Income Structure and Spatial Spillover

YANG Chunyu<sup>1</sup>, YANG Ruiqi<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Sydney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0,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Internet 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is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level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strategy.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Internet finance on the absolute level and incom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 constructs a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2016 to 2021,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rnet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level, which will promote the change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portion of farmers' wage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roportion of operating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It has the strongest effect on the proportion of farmers' property income, followed by the proportion of wage income, while the effect on the proportion of operating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is less.

**Key words:** Internet finance; farmers' income level;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space spillover

# 应急财政政策:历史演进、治理逻辑与调试趋向

王彦平,陶慧芳

(兰州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事后恢复重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系统回顾和梳理我国应急财政政策演进历程,剖析不同时期财政在重大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统筹推进现代应急管理制度设计,对全方位构建应急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应急财政;历史演进;治理逻辑;调试趋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7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42-05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在防范和化解突发事件风险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sup>[1]27-37</sup>。科学规范的应急财政政策在重大公共危机治理方面至关重要,无论是灾前的应急准备、发生时的应急反应,还是灾后的恢复重建,财政政策贯穿危机治理的全过程。

人类进入风险时代,叠加的新旧危机让全世界同频共振。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社会已从经济逻辑主导的生产型社会转变为风险逻辑主导的风险社会<sup>[2]10-23</sup>。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短板日益凸显,使得应急管理能力有效性降低。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财政政策如何相机抉择,减缓突发性事件的冲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尤为为重要。因此,梳理我国应急财政政策历史演进过程,厘清公共危机财政治理的逻辑,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判我国应急财政政策的未来趋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一、历史回顾:应急财政政策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我国应急管理经历的阶段迭代,与之适配的应急财政政策也分为了三个阶段:

段:以单灾种应对为主的政策孕育阶段(1949—2002年),综合性为主的财政政策探索阶段(2003—2018年)以及新时代整体性财政政策成熟阶段(2018年以来)。不同时期应急财政政策由于历史背景、目标任务以及政策要求不尽相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应急财政政策伴随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不断发展。

### (一)单灾种应急为主的财政政策孕育阶段

1949年至2002年期间,我国应急管理政策实施的主要目标是应对以洪涝、病虫等为主自然灾害的单灾种,此时虽然没有出台具体的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相关财政政策,但财政应急的思想贯穿应急管理始终。在这期间,政府颁布了诸多条例来组织和应对灾害的发生,以期减少损失。1981年政府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的通知》作为实施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抗震防灾工作报告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重大火灾事故的紧急通知》等政策文件为有序组织和应对灾难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在此期间颁布的应急政策中明

收稿日期:2022-06-15

基金项目:2019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研究”(19YB008);2020年度甘肃省软科学专项项目“绿色技术助推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机理与公共政策研究”(20CX9ZA056)

作者简介:王彦平(1978—),男,甘肃武都人,博士,兰州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公共政策、政府应急管理。

确提出“以地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原则,规定了央地政府关于抗灾资金的支出安排。此外,要求用于救灾的捐赠物资需要专款专用、统筹安排,同时也允许对国企的捐赠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中进行抵扣,发挥了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

### (二)综合性为主的财政政策探索阶段

2003年“非典”后,我国开始探索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根据应急管理“一案三制”——“全灾种、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体制的要求<sup>[3]20-23</sup>,2004年财政部颁布了《突发事件财政应急保障预案》来规定应急资金拨付以及央地财权事权划分原则,使其成为财政部门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基本法”。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规定县级政府应积极参与危机救援与处置,可根据相应的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同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采取财政措施来保障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相继出台了应急指导意见以及应急基层治理文件。我国应急管理水平在这期间不断提高,应急管理制度体系整体框架基本建成。我国应急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的进程也加速了应急财政政策体系的配套改革,使应急管理财政政策有法可依。

### (三)新时代整体性财政政策成熟阶段

2018年应急管理部组建,开启了综合减灾的应急管理新阶段。一场系统性的转型与重塑,使得国家整体应急管理格局为之变化,相关的财政政策也进入了成熟阶段。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下,应急财政政策逐渐呈现数量多、效力级别高的特点。2014年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来具体引导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推动应急产业不断得到发展。2016年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强调应急主体责任,明确央地责权事权划分的同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以及疫情防控期间针对企业和个人等规定诸多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政策在助力企业纾困、稳定经济增长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不断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有力“助推器”。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中央出台的与应急财政相关的政策达60多项。地方政府会在中央颁布的应急财政政策的指引下,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细化,因地制宜制定地方应急财政政策<sup>[4]86-90</sup>。

## 二、机理溯源:应急财政治理的逻辑理路

财政治理需要聚焦政策管理。70多年的应急

管理实践表明,财政政策会随着国际环境、国内改革与发展目标的转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厘清财政危机治理演进的逻辑理路,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等构成的框架来阐释,可以更为全面和清晰地掌握内部关系变化,彰显财政在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效能。治理目标是指实施应急财政政策所要达到的标准。我国应急管理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不断的调整,但保障人民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总目标没有变。治理主体指的是谁是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参与者。我国在应急管理过程中,中央发挥指挥作用,地方政府是主要的执行者,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是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治理客体是指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主要影响因素。我国应急管理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政策环境是不同的,政策环境复杂程度也是制定政策目标的主要依据。治理工具是达到政策目标需要使用的资源和手段,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应急管理政策保障工具,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可以有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 (一)治理目标:从重灾害处置到全过程管理

政策目标决定政策方向。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是我国应急管理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sup>[5]30-48</sup>。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期,社会封闭和物质资源的缺乏,政府和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薄弱。当时的公共危机事件呈现“单一”特征,应急财政政策主要针对重大自然和农业灾害的防治,资金主要靠中央财政安排补助。应急财政政策体系尚未建成,政策偏应对少预防。2003年中国综合性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标志着应急管理从单灾种向多灾种应对的转型。财政部门也积极调整转型,中央放权力于地方的同时,应急资金不再完全依靠中央,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以及群众参与资金的筹集和全过程危机治理。《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将灾害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目标,应急管理规范化与程序化程度加强。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又将其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价值指引与实践目标,昭示着我国开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来统筹国内外公共危机事件。应急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深化改革的需要。2018年颁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思想。应急管理部的设立使得职能部门职责不断细



化、应急机制更加常态化、应急主体更加协调高效,应急财政政策在这一过程不断发展与完善。应急管理主体方面,坚持党集中统一指挥,各地积极组建应急管理部门,强化属地管理为主,中央与地方合作紧密连接,形成协同共治、协商共事的良好发展格局。

保障人民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和未来财政政策追求的一个核心目标,“花钱买平安”是传统社会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应急财政政策要和相应的政府事权、财权相匹配,打通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让财政政策贯穿危机治理全过程,形成长效的协同治理网络体系才是应急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此外,多项有关危机安全的法规政策和财经政策出台,也为应急管理目标的实现注入了内生动能。

## (二)治理主体:从独立分散到协同高效

治理主体指在应急管理活动中具体承担管理活动的人或组织。我国应急管理体的建立就是一个从一元独揽到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sup>[6]5-18</sup>。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很强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所以靠一方力量来解决危机往往是不现实的,需要形成一个强大的有机治理网络来实现应急管理目标。一方面治理主体从党一元化应急管理理念到新时期“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应急管理基本原则,应急管理治理主体的转变,在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以及构建科学合理的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发挥了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央地应急管理的财权与事权分配关系发生了转变,从“应急主要资金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中央发挥统筹指导作用”到“地方政府作为灾后恢复和重建的责任主体,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展开应急工作,中央制定补助标准”。财权与事权分配关系有效缓解中央政府压力,也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性。形成中央宏观布局,从全国层面,整体性进行统筹,地方政府因时因地微观协调,做好地域范围内局部应对。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渐赋能应急管理。数字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使全过程追踪应急物资信息情况和危机发展程度成为现实<sup>[7]138-144</sup>,在优越的制度优势下,社会组织与成员积极参与危机应对过程,贡献力量,形成全员参与共抗危机的大局面。

## (三)治理客体:从自然灾害到叠加风险

治理客体即治理对象。不同时期的治理客体,直观展现了国家救灾防灾,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重点内容。财政政策如影相随,支出结构、规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应急财政治理客体经历了从最初的单一自然灾害为主的治理对象到综合性、复杂性危机整体治理,这一过程一方面反映出危机类型

多且异变、治理对象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应急财政的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及政策工具都面临整体性的调试,政策变革势在必行。随着治理对象的不确定性增大以及风险社会加速变化,我国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系统性、叠加性、全球性危机的威胁。各种风险与危机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不断审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我国财政治理客体应该定位为重大公共危机和次生危机、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同时,在注重新生危机的同时还要加强传统危机的防范。只有准确认识治理客体,财政治理才能有的放矢,财政政策工具才能把握危机运行的不确定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好钢使在刀刃上”。面对困难以及挑战,应急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审时度势,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

## (四)治理工具:从选择单一到强化创新

财政工具是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政策主体所使用的资源或手段。财政政策在特定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动态效应。长期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主要是凭借政治动员,采用人海战术,在应急管理层面坚持的是一元化管理体制,具体到财政政策领域的法律文件数量较少。2003年非典事件的发生为重要的节点,非典的暴发暴露了我国应急管理方面的弊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颁布让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至此突发事件关注度越来越高,政策的调适不断加强,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消费的冲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效应非常强烈。新的发展阶段,国外复杂环境以及国内改革发展任务需要应急管理做到统筹发展与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国家修订了危机治理的系列文件,这也成了应急财政政策改革创新的重要依据。应急财政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在资源调度以及宏观经济调适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财政政策从过去单一的关注向重点综合领域转变,从过去单一的宏观调控面向公共危机管理转变,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 三、调试趋向:财政要适应新时期危机治理的需要

公共危机一旦来临,财政总难置身事外。财政治理的框架下,政策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及政策工具四方面构建了我国现代化财政应急治理体系。未来财政政策工具的调试趋向是应急财政政策要适应新时期化解公共危机的需要,关键要提高公共危机意识和思想准备,构建前瞻性体制机制,完善财政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程序,做好应急财力充分准备。



### (一) 坚持全过程应急管理的财政政策目标

在应急管理体系中,财政政策的短期目标是尽快化解危机和结束危机。危机事件发生后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需要财政资源统筹与财力保障,降低危机带来的风险成本。应急财政的长期目标是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全过程应急管理体制。首先,需要厘清央地在应急管理中的权责关系是前提。应急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根据危机管理事前、事中与事后三个阶段,科学详细地划分各级政府应履行的职责进行,将应急财政政策赋能于危机管理全过程和各领域,降低人民损失,保障国家安全。具体来说,鉴于地方政府具有熟悉地方发展状况与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明白在危机发生时群众最需要什么,所以在危机预防与危机发生过程中可以将事权交给地方政府,做到及时了解危机状况、及时做出反应,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危机发生后的恢复重建和危机学习阶段,往往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来恢复危机带来的损失,这时可以交给中央政府,通过充足的财政资金来助力危机涉及地区的恢复与建设能力。根据危机事件发生的等级程度细化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对症下药、因地制宜来采取不同应对措施,采用“特事特办”而不是“急事急办”原则,提高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增强应急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其次,财政政策要为应急管理注入更可持续的确定性,促进应急产业的发展,提高供给水平。充分发挥财政的结构性功能作用,提高应急供给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和深化。推动如应急产业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建设、技能培训、扩大劳动参与、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积累,等等,提高供给响应机制的灵敏性,进而实现供需匹配关系的动态优化以及应急财政能力不断完善的目标要求。

### (二) 充分发挥多方治理主体协同作用

202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明确指出,建成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管理新格局。应急管理新格局的构建,需要充分考虑各主体相关利益诉求,推动多方治理主体协同合作、功能耦合,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优势,实现危机治理效率的提高。

首先,加快应急财政政策法治化的进程。通过探索设立全过程应急财政政策法制体系,明确政府间的法律权限和责任<sup>[8]21-30</sup>。我国有关应急管理的财政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建立专业、稳健的应急财

政政策体系任重而道远。积极探索设立全过程危机管理财政政策法律法规体系,严格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的法律权限和责任,同时设定违法追责处罚程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推动应急管理全过程有章可循,提升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决策公信力<sup>[9]61-67</sup>。其次,确立地方政府在应急管理中“主力军”地位。按照属地原则,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积极引导、专业管理,将危机损失降低<sup>[10]22-34</sup>。再次,形成社会组织与群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政府引导和激励并行,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应急协同治理。最后是社会协同。新时代应急管理需要社会组织与群众的参与与治理<sup>[11]18-23</sup>。政府应积极引导以及为危机做出贡献的单位以及个人给予优惠,激发参与应急治理的积极性。在疫情发生后,政府助力经济恢复以及激发市场活力的信心,为参与疫情救治以及社会捐赠的单位及个人出台了力度较大的税收优惠,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协同治理的重要载体作用<sup>[12]28-36</sup>。

### (三) 在复杂治理环境里调试财政政策内容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面临着重要的机遇期,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控难度加大。<sup>[13]27-38</sup>新时代应急财政政策必须着眼于危机和不确定性因素的预防,通过调试政策内容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首先,财政政策要重点关注全社会主体预期的稳定,避免经济社会焦点问题异化出新的危机并进一步扩大,通过引导良性预期,使财政应急逐步进入畅通循环的轨道。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对国家的财政支出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资金的筹措,减少财政压力在应对危机时显得格外重要。目前,我国在众多领域通过设立基金的形式来为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立国家应急管理基金的方式来减轻财政压力。其次,设置预备费财政专户。根据《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提取危机专项预备费,采用留存结转的方式,不断增强预备费存储能力和应对能力<sup>[14]27-38</sup>。最后,设立国家应急管理基金。从每年的经济增量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应急基金,保障基金筹集平稳进行。鼓励多方社会资本灵活参与,如社会资本可以采用入股的方式投入资金,通过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为基金增长注入活力。同时,遵循按要素决定贡献、按贡献分享收益的原则来运行应急管理基金。财政通过在危机预防阶段创新支出手段,为提高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也为进一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应急管理工作赋能政策保障。

#### (四)不断深化应急财政治理方式变革

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任重道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应急管理财政政策作为提升我国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工具,需要不断深化政策方式变革,逐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以及规范性<sup>[15]24-27</sup>。政策的科学性指的是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符合应急管理内在逻辑规律,符合应急管理实际需求。新时代应急管理财政政策需要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需求为导向,政策的设计以及制定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同时,政府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服务技术,积极建立应急信息公开服务平台,将数字技术与应急财政政策建设相结合,创新应急财政体制机制,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水平,不断提升政策制定以及执行的科学性。政策的规范性是指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参照一定的规则与标准。我国应急财政政策方式的变革需要严格参照国家出台的相关应急管理制度和法律,发挥政策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应急管理水平。

“十四五”时期,我国应急管理建设仍然面临着严峻的难题与挑战,风险防控难度加大与应急保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为统筹发展与安全,进一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国提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为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应急财政政策方式需要以提升政策科学性以及规范性为目标,不断“赋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 参考文献:

[1]白彦锋.“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安全运行面临的风险

挑战与应对策略[J].当代财经,2021(6).

- [2]刘尚希,孙喜宁.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基于公共风险分析框架[J].财政研究,2021(1).
- [3]闪淳昌.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的应急体系建设[J].行政管理改革,2018(3).
- [4]王泽彩,王敏.创新应急财政政策的若干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20(5).
- [5]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6).
- [6]钟开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框架构建、演进历程与完善策略[J].改革,2020(6).
- [7]张铮,李政华.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体系构建:现实基础、存在问题与发展策略[J].管理世界,2022(1).
- [8]李楠楠.央地协同治理:应急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进路[J].地方财政研究,2021(9).
- [9]李一行,陈华静.突发事件属地管理为主的异化及其对策[J].行政管理改革,2021(6).
- [10]张学诞,郭展霞.构建适应中国特色应急管理需求的财政治理体系[J].财政研究,2020(4).
- [11]朱正威.中国应急管理70年:从防灾减灾到韧性治理[J].国家治理,2019(36).
- [12]孙玉栋,王强.财政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制度逻辑及其机制完善[J].改革,2020(4).
- [13]刘尚希,李成威,杨德威.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逻辑[J].财政研究,2018(1).
- [14]王蕴波,景宏军.财政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地方政府预备费管理机制的优化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思[J].当代财经,2020(10).
- [15]李国胜.现代治理体系下推进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的思路[J].领导科学,2021(1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Emergency Fiscal Policy: Historical Evolution, Governance Logic and Debugging trend

WANG Yanping, TAO Huifang

(School of Finance, Tax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foundation and important pillar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inanc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eventing and dealing with public emergencies and carrying out post-event reconstructi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and sorting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mergency fiscal polic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logic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process of major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are helpful to promote the design of modern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 emergency finan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emergency finance; historical evolution; governance logic; debugging trend

# 宁夏革命标语形成的历史维度、内容特征与有效利用

张玉梅

(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标语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和最早的宣传手段之一。宁夏革命标语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红军长征和西征时期的留存最为集中。标语宣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多样性、通俗性等特征,是极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发挥革命标语作用,是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宁夏;革命标语;历史维度;价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8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47-05

革命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阶段开展宣传活动的载体之一,因其在宣传形式及内容上的优势、在宣传对象上的针对性等特征,在舆论斗争、政策宣传、凝聚力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革命标语的应用,各时期都提出了具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标语。宁夏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留有不少珍贵的革命标语,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了宁夏各历史阶段的革命发展脉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反动罪行,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利民、民族平等政策,为团结一切力量,形成统一战线,直至宁夏革命胜利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宣传作用。但学术界对宁夏革命标语的研究成果较少,有《红色标语——介绍固原县黑城镇祁家堡子的几条革命标语》<sup>[1]</sup>《写在墙上的记忆——墨书草泥墙皮革命宣传标语》<sup>[2]</sup>对固原祁家堡子的几条草泥墙皮革命宣传标语进行了简要概述。《光荣的古城——介绍红军在预旺城的革命活动》<sup>[3]</sup>简单介绍红军在预旺城时期的标语。《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形成及其价值体现》则集中对中央红军西征期间的宁夏革命标语进行深入探讨<sup>[4]</sup>。《宁夏红色标语的整理与作用研究》<sup>[5]</sup>侧重从宁夏红色标语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

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宁夏各时期革命标语,廓清其历史源流,分析其内容特征,为深入挖掘革命标语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作用服务。

## 一、革命标语的发展历程

### (一)系统的标语管理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着自上而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运行机制。宣传的内容主题、主旨思想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决定的。革命标语作为宣传工作的载体之一,必须严格遵循宣传原则。组织有序的宣传方式,不仅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同时贯彻落实了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 (二)组织有序的标语传播方式

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阶段,都开展有序的标语传播。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标语宣传工作。标语的书写者多是红军及识字群众,为了增强标语的传播作用,宣传部门对标语的传播程序、传播细节均作了严格规定,即不仅根据历史特征统一规定传播内容,而且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真正发挥标语作为“战斗的匕首”的作用。三湾改编后,秋收起义的部队便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名义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到处张贴宣传中国共产党宗

收稿日期:2022-07-15

基金项目:2021年度宁夏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移民档案整理与研究”(21NXBZS01)

作者简介:张玉梅(1982—),女,宁夏银川人,硕士,宁夏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研究。

旨的标语。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对红军的政治宣传工作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经验,详细部署未来工作。

随着会议的顺利召开,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宣传工作有序展开。西征红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将在连队中写标语、散发宣传品作为部队宣传工作中四件经常性工作之一而深入推广。红军西征期间,组织了十六个停战抗日促进会分会。为了推动各分会的工作,成立了宁夏河东(黄河以东)停战抗日促进会总会。总会和分会通过大规模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召集停战抗日宣传大会等形式开展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工作<sup>[6]341</sup>,取得了较好效果。

### (三)统一明确的标语宣传内容

1931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印发了适用白色区域的《革命标语》和适用红色区域的《革命标语》。适用白色区域的《革命标语》印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等十四部分内容,共计143条标语。适用红色区域的《革命标语》印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军阀、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组织革命战争等十部分内容,共94条标语。在宁夏档案馆馆藏的革命历史档案《中共三边地委宣传部宣传要点及标语口号》(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除了严格规定标语的口号,还发布通知:“此标语口号望各地大量写贴,特别在交通要道及人口多的地方。将对敌战区标语等写成纸条散发和写到敌占区各地的墙壁上去,使之多设法将标语口号和一切宣传品送出去。此前不注意写标语和未写标语的地区应注意写。不可忽视此项工作!(注:此材料供各级干部在恢复工作中向群众宣传时作参考,望多讲实例。)”<sup>[7]255</sup>在《回汉支队半年政治工作总结》(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总结回汉支队宣传工作时,认为“自政治部宣传标语口号发下后,各队每到一村庄就写,写得多一点的一、三队,队部也在写着,这已养成了一种习惯。另外每次来的捷报和传单,除所到之处张贴外还交给出去的侦察人员在边界上散发。”<sup>[7]261</sup>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也制定了关于对西北回民及国民军的宣传口号,文件中刊登了对敌一般标语口号及对西北回民及马匪军的口号。

### (四)规范的标语宣传内容

中国共产党不仅规定革命标语内容,还将标语的具体张贴细则作有明确的规定。如政治部的每个宣传员必须准备刷写标语的工具,包括白(或黑)的颜料;针对字数较多的标语,要求用有色纸先写好后

张贴;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规定标语,并悬挂于街道中间。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对标语宣传也十分重视。在闽西各县有许多不正确的已失去时间性的标语,苏维埃政府就下文要求“把各处所有的标语下一番总检查,将其不正确和失去时间性的洗刷去,另贴或写适合当前的标语”。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队伍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壁上标语、画报艺术进步还是很慢”<sup>[8]132</sup>。为了规范标语的书写水平,同时提升部队整体文化水平,政治部逐步开展识字教育,革命标语的书写规范化程度逐渐提高。宁夏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中记载,1947年9月4日中共三边地委宣传部宣传要点及标语口号中对标语从使用范围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定。

## 二、宁夏革命标语的产生

宁夏革命标语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6年9月,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地区有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开始。为了提高广大爱国青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书记李临铭组织学生上街贴标语、发表演讲、画漫画、演话剧等。1927年4月,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大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在宁夏固原县蒿店领导和发动“蒿店兵变”。兵变部队秘密向北行进,沿路书写“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sup>[9]23</sup>。

宁夏目前遗存的革命标语最为集中的是在红军长征和西征时期。红军西征经过宁夏的半年时间里,积极组织发动群众,把宁夏的革命活动推向了历史高潮。西征红军非常重视发挥我军强大的政治宣传工作优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形式,在红军中掀起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热潮<sup>[9]92</sup>。西征红军在祁家堡子驻扎的二十多天间,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sup>[1]</sup>,在墙上刷写“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sup>[4]</sup>“不交租不交粮打土豪分田地牛马衣服分给农民”“红军是抗日的先锋”“联红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等革命标语。1936年西征红军解放定边、盐池等地后,宁夏吴忠市的回族青年马怀藩、金三寿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盐池参加革命。在得到毛主席邀约后前往保安(今志丹县)会面。到达保安高桥时,路边张贴着“欢迎回民领袖马怀藩”“欢迎哥老会领袖马怀藩”的大幅标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面同样也挂着一幅十分醒目的大标语“欢迎马怀藩先生”<sup>[10]101</sup>。此外,西征期间

来宁夏采访的海德姆发现当地群众认识汉字的甚少,便将“回汉人民是一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阿文标语刷在墙上。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利用自己的回族身份,亲自给同心县王家团各清真寺赠送锦幛,刷写标语。同心县马家高庄公社沟滩大队杨家堡子上房、同心县下马关合作食堂上房也有记载红军西征情况的标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才是中国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sup>[11]151</sup>。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宁夏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烽火。包括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后方抗战服务团在内的抗日团体等通过抗日游行示威、演抗日戏、演讲、写标语等形式,揭露日寇侵华暴行,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sup>[9]106</sup>。抗日救国的热潮席卷了红军经过的地区,门板、厕所、石崖、树皮和墙壁上写满了抗日救国的标语<sup>[12]</sup>。

解放战争时期,宁夏大部分地区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尚无遗存的革命标语。仅可从解放时期的宁夏老照片中窥得有“严令部队不得进入清真寺”“十九兵团发布安民布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保护清真寺”“奋勇前进,解放全中国”“向进军西北的解放军致敬”“欢迎毛主席”及银川市各界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欢迎标语等。

### 三、宁夏革命标语的内容特征

宁夏革命标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宁夏革命斗争留下的特有产物,是红色文化资源重要的历史素材,有着鲜明的内容特征。

#### (一) 政治鲜明

宁夏革命标语有为政治、革命、群众服务的强烈政治倾向。红军西征期间,正值西安事变的前夕。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革命标语等宣传媒介积极开展对俘虏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不仅体现了浓郁的革命情感,更突出标语强烈的政治属性。首先,标语直接表明了红军对俘虏的优待政策。如“优待俘虏、不论官兵!”“优待俘虏,不分回汉!”“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发路费回家!”等。红军不仅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深入宣传教育,还归还所有武器弹药,并全部予以释放。红军俘虏政策的不断落实,使部分俘虏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宣传员,同时也吸收了更多的俘虏加入统一战线行列中。其次,标语内容不只是抗日救国等内容,还提出共建抗日联盟的决议。标语的宣传对象是驻扎在陕甘宁三省的南京军及东北军

等,通过标语向他们表达组织抗日联军、共同救国的提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军的决心。当东北军的军官士兵一听红军提出“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联合东北军打回东北老家去,收复失地”“中国军不打中国军,联合打日本”等标语口号,更是不愿意打红军,愿意与红军联合打回东北去。与红军不直接作战而取谅解默契形式的部队,在东北军中实在很多<sup>[6]456</sup>。此外,红军还采取主动拜访东北军官兵等方式,表明愿意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意图。此外,1949年7月,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对西北回民及国民军的宣传口号”中就有“欢迎胡马军弟兄们械来归,参加人民解放军!”“欢迎胡马官兵们组织起义,率部来归,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欢迎胡马军中的爱国分子,接受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sup>[13]1169-1170</sup>等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革命标语,对解放宁夏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二) 民族特点

宁夏地区受马鸿逵统治期间,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将对马鸿逵统治的不满情绪通过革命标语表达出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消灭胡宗南、马鸿逵!”红军不仅面对着强大的军事压力,还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能够开创西北抗战新局面的必要条件。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1936年5月24日)中指出:“进行和回民的联欢用红军或政治机关或群众团体的名义,同宣传口号联系起来,赠送清真寺以幅联(回族自决与回人治回等),并用适合于回族的仪式且非常之隆重地尊敬地送去,使每个教堂的中央都成为我们标语口号的悬挂所,且能得到回民热情的欢迎,这是十五军团过去最好的经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sup>[6]61</sup>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题为“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关于固原社会调查之大略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报告”(1936年6月15日)中指出:“我军到后,汉人多在家,回民一部逃跑,一部进土围,现正争取出围回家。凡经过宣传,均对我甚好,商人照常营业<sup>[6]177</sup>。”“实行民族平等,回汉平等,信教自由!”“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回汉人民团结起来,继续努力,肃清共同的敌人国民反动派残余(势力)!”等标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 (三) 内容多样

宁夏革命标语主题鲜明,内容极其丰富,包含了政治动员、政权建设、群众路线、民族教育政策、经济建设等方面。如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没收反动份(分)子土地牛羊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不让

敌人抢走一个牲口、一只羊、一只鸡和一颗粮食!”“抢收抢打快藏不让敌人抢一颗粮!”“武装保卫秋收打击敌人抢劫!”等;在教育权力平等方面,中国共产党为打破教育固有思维,提出“兴办回民教育,发扬回民文化!”;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珍贵遗产,提出“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化古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红军在长征、西征经过宁夏期间,注重宁夏革命老区的全方面发展,到处张贴“保护回民工农畜牧业!”的标语,同回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帮助回民解放作出贡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以勤俭节约为美德,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通过标语“反对铺张浪费!”进行广泛宣传,为“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胜利!”做好准备。斯诺演讲摘要的标语,直到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受到昔日的热情。

#### (四)通俗易懂

标语一般使用简单、语义清晰的汉字。标语言简意赅、对仗工整、朗朗上口、易于识记、宣传快捷、便于传播,而且有极强的鼓动性、震撼力、号召力。宁夏革命标语同样也具有以上特征。“当了胡马兵,死了没人埋,伤了没人抬!”,从反面告诉人们应该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团结一致,一致对外。标语“不让敌人抢走一个牲口、一只羊、一只鸡和一颗粮食!”等标语直接明朗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党。这些标语大量使用口语化、乡土化、形象化的语言,简单明了,朴实动人,让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懂,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大众化、通俗化、接地气的特点。革命标语的针对性,比如在对白军和红军的宗旨宣传时,一般采用的是比较的语气,如“白军是土豪劣绅的走狗,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卫队”“白军是帮土豪压迫工农的,红军是帮工农打土豪的”,这些标语用简洁明确、通俗易懂的语言达到了宣传的效果。

#### 四、进一步加强宁夏革命标语的有效利用

宁夏革命标语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多样性、通俗性等特征,而以革命标语为代表的宁夏红色资源存在着管理机构薄弱、管理人员专业化不足、管理办法不健全等问题,导致革命标语保护整理工作不容乐观、资料开发利用深度不足。如何充分发挥革命标语的重要作用,需从整理、宣传、挖掘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从而提高革命标语作为宁夏红色资源的有效利用。

##### (一)加大革命标语整理力度

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宁夏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可移动革命文物

2035件/套,其中仅有革命标语9条,这与笔者摸底统计数据尚有差距<sup>[5]</sup>,也侧面反映出包括宁夏革命标语在内的宁夏可移动革命文物工作任重道远。今后开展的工作:首先,制定宁夏革命标语保护管理办法。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应充分明确革命标语的保养和修缮需要坚持不改变原状、不破坏历史风貌、最小干预的要求,特别是不得损毁、改变革命标语字体原貌及所依存的建筑物主体结构。其次,会同当地党史等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革命标语普查工作专业队伍,深入各乡镇摸清革命标语数量、类型和内容。为方便各地开展革命标语普查,建立宁夏革命标语数据统计平台,要求各地及时录入普查数据。图书馆界、档案馆界要充分发挥搜集、整理文献优势,编纂《宁夏革命标语馆藏目录》,对革命标语在内的红色资源采取定级、修复、数字化等整理手段,进行系统普查。

##### (二)加强革命标语的宣传力度

革命标语是红色资源的重要载体之一,宁夏现存的标语实物和照片能够直观展现宁夏各历史阶段革命历程。在对宁夏革命标语的宣传推广中,需要充分发挥媒体宣传优势。一是可利用宁夏博物馆、盐池革命纪念馆等展馆,系统展览宁夏革命标语;或可以革命标语为宣传主体,通过对宁夏革命史的展示,体现标语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凸显革命标语作为红色资源的作用。宁夏在弘扬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将革命标语作为专题进行开发。可构建宁夏革命标语数据库,充分将数字人文理念融入革命标语的管理工作中,采用图文对照的数字版式,使革命标语原貌得到完美展示。三是设立实景式体验环节,让体验者感受革命历史的真实场景。各馆红色展区可特设革命标语刷写环节,以体验式教育强化情感培养,使革命标语所蕴含的厚重红色文化得以更进一步的传承。

##### (三)挖掘革命标语价值,讲好红色故事

革命标语整理不论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建设,都亟待继续扩充标语的揭示广度和深度。以革命标语为元素之一的红色资源收藏部门、科研院所等对革命标语不仅要跨系统整合,更要依托学术力量对革命标语进行系统阐释和研究。通过挖掘革命标语形成的历史源流、分析革命标语所蕴含的内容特征,从而增强革命标语的叙事张力。可以通过编印革命标语相关刊物、影印出版革命标语集、召开革命标语专题研讨会、撰写相关学术论文等多种方式开发利用各时期革命标语,充分展现革命标语的内在

价值。

## 五、结语

标语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载体,在革命的各阶段一直是激励民众热情、指导工作、凝聚民心、阐述方针政策不可或缺的宣传方式。宁夏革命标语形成于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红军长征和西征时期的革命标语最为集中。标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多样性、通俗性等特征,为宁夏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加强革命标语的整理、宣传、挖掘工作,作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宁夏”的有效途径。

## 参考文献:

- [1]张心智.革命标语:介绍固原县黑城镇祁家堡子的几条革命标语[J].宁夏文艺,1978(5):77-78.
- [2]王银彩.写在墙上的记忆:墨书草泥墙皮革命宣传标语[J].宁夏画报,2020(6):84-85.
- [3]李牧可.光荣的古城:介绍红军在预旺城的革命活动[J].宁夏文艺,1978,(6).
- [4]张玉梅.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形成及其价值体现[J].

中州大学学报,2021(5):54-57,62.

- [5]张玉梅.宁夏红色标语的整理与作用研究[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21(2):157-164.
- [6]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红军长征在宁夏:档案史料汇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
- [7]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中共宁夏档案文献选编(1927—1949)[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8.
- [8]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 [9]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宁夏党史故事[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
- [10]中共吴忠市委党史研究室,吴忠市地方志办公室.红军西征在吴忠[M].内部资料,2016.
- [11]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宁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 [12]牛兴华,麻明正.西征及其历史作用[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Z1):56-65.
- [13]盐池县档案局(馆).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盐池档案史料汇编(下)[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Content Features and Effective Use of Revolutionary Slogans in Ningxia

ZHANG Yumei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Abstract:** Slogans are the main and earliest means of propaganda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ingxia's revolutionary slogans were formed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with the most concentrated retention during the Long March and the West March of the Red Army. The revolutionary slogans were very rich in content, distinctive in theme, and externalized the strong politics, nationality, diversity and popularity, they were extremely precious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revolutionary slogans and impart red stories of Ningxia by good communications.

**Key words:** Ningxia; revolutionary slogan; historical dimension; cultural heritage



# 从《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招幌设计

杨远,李迪

(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招幌成为宋代商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东京梦华录》记载来看,宋代招幌设计主要分为实物幌、模型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其发展受到宋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而其对整个城市环境的营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东京梦华录》;招幌设计;分类研究;城市环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09

**中图分类号:**J52;TS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52-05

招幌的形成过程,是以社会性物资交易和消费需求为前提条件的,并且它是一种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广泛认同下约定俗成的产物<sup>[1]13</sup>。北宋时期作为商业经济空前发达的时期,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的繁荣,使得这一时期的店铺数量骤增,各类招幌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展现在大众面前。因此,这一时期的招幌便成了宋代商业繁荣的侧面写照,而作为营销手段之一的招幌设计也达到了一个成熟繁荣的阶段。

本文将依据《东京梦华录》的文献记载,结合宋代画卷、相关文献,拟对宋代招幌的类型、兴盛原因及其对城市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丰富宋代招幌的相关研究,为当代设计提供参考。

## 一、北宋招幌的类型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唐朝相比,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事商业买卖的商家逐渐增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营销手段之一的招幌在形式上也开始呈现多样化。从《东京梦华录》中,可大致将招幌分为以实物为幌、以模型为幌、以特定标志为幌和以文字为幌这四个类型。

### (一)以实物为幌

《东京梦华录·食店》载:“又有瓠羹店,门前以枋板花样杳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sup>[2]29</sup>这种形式不仅可以在视觉上给消费者带来

最直观的感受,使其快速地对商品进行了解,节省挑选商品的时间,而且直接悬挂商品这种生动的方式无形之中也对店铺或者摊位进行了装饰,因此以实物为幌深受店家和消费者的喜爱。商家在自己经营售卖的商品中挑选出品相较好的商品直接摆放在摊位上,或者悬挂在门前,供消费者直接鉴别,从而达到一个传递信息、招揽客人的目的。这种商业招幌形式的最大优势就是成本低。除此外它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简单易行,取材也十分方便。因此,从古至今依旧被人们广泛采用。

除此之外,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也有部分商家考虑到消费者“求美”的心理,也会对实物进行一系列的修饰,使商品看起来精致美观,减少实物的原始性。《东京梦华录·七夕》中记载有七夕节的习俗:“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面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sup>[2]54</sup>即对相关瓜果商品做了修饰。

虽然实物招幌有诸多优点,但它自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商品只有具有独立且完整的外形或是包装才可以直接悬挂陈列,才能便于识别和宣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实物招幌的形式呈现。那些液体、易腐烂或是体积较小的商品,商家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方法来宣传自家的产品。因此模型招幌也就应运而生。

收稿日期:2022-06-25

作者简介:杨远(1975—),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研究。



## (二)以模型为幌

模型招幌是以特定的模型作为招幌,是一种将商品实物加以放大、夸张或变形处理后替代实物的招徕标识。它是由实物招幌演变而来。亦如“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袞叠成楼阁之状”<sup>[2]43</sup>,在街道上将自己售卖的商品通过一种夸大的手法做成“楼阁之状”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又如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载:“兽医之家,门首地位上以大木刻作壶瓶状,长可一丈,以代赭石红之。通作十二柱,上搭芦以御马。灌药之所,门之前画大马为记。”<sup>[3]209</sup>在这段话中,作者为大家讲述了兽医用红色的壶瓶作为招幌,挂在门前,并且说明有些专门为家中牲口灌药的兽医还会在招幌上画一匹马来对自己的职业进行特殊标识。这模型招幌可以通过放大夸张或变形等方式来增强招幌的艺术效果,从而达到更好的广告效应。

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落后以及物质资料的匮乏,模型幌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模型招幌的基础上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招幌——以特定标志为幌。

## (三)以特定标志为幌

以特定标志为幌又称为象征性招幌。作为模型招幌的衍生物,将商品的特征以一种更加形象化、具体化或者隐喻的手法表现出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借代性象征招幌

借代性象征招幌,即将经营的部分产品或者产品局部作为象征标识。有的是以盛装商品的容器为象征物,有的是以商品的包装为象征,还有的招幌是以所售卖的众商品中的一种为象征。<sup>[4]4</sup>例如卖酒的经常使用酒葫芦、酒坛子或者具有借代意义的酒旗作为招幌,又或者简陋的小饭店会在门前放一杆草帚作招幌招揽客人。除此之外,在饮食或者日常用品的店铺中都可以看到借代性象征招幌的踪影。

《东京梦华录·中秋》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sup>[2]56</sup>这句话中的“锦旆”就是古代酒店悬挂在路边用来招揽生意的锦旗,即酒旗。运用这种具有装饰意味且富有动感的招揽方式,更能烘托节日的氛围。

### 2. 隐喻性象征招幌

隐喻性象征招幌是一种以暗示性象征物构成的招幌。《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sup>[2]55</sup>商家在售卖冥器之时,以纸糊的模型来代表其所卖之物,给消费者一个明确识别信号的同时,又考虑到所卖之物的特殊性,巧妙地缓解了消费者的芥蒂之心。因此模型招幌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突破实物招幌的局限性。再如旧日的典当业悬挂的钞桶,是由钱串模型演变过来的。它主要是来隐喻这一行业的经营活动是用物品抵押来兑换钱财为主,并以此实现金融流通。

## 3. 以摹绘形象为主的招幌

以摹绘形象为主的招幌从字面意义上便可得知,这种类型的招幌是以图画为主。它的主要方式是将代表商品属性的特定形象或者是象征其经营范围的特定符号绘制在幌子上。这类招幌一般绘制在布面、木牌上,或者直接画在店铺的墙面上。《东京梦华录·寺东门街巷》载:“出界身北巷,巷口宋家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sup>[2]21</sup>这种在墙体上作画的方式一开始只是起到装饰店面的作用,但随着店铺名声的壮大再加上其独特性,久而久之就成了该店的招牌,形成了独特的图画招幌。

## (四)以文字为幌

也有一些店铺会以家族的姓氏为商铺命名。这对于商家整个家族来说是一笔精神财富,将诸多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也是后来百年老字号的由来。这种代表商家诚实守信、商品质量过关、顾客反馈良好的商铺往往是顾客购物的首选。这类型的店铺多采用文字幌。一般情况下是书写自家店铺所售卖的商品,或是书写自家店铺的名号。如“酒”“茶”“药”等。在《东京梦华录·宣德楼前省府宫羽》中描述道:“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房,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sup>[2]13</sup>这些直接书写自家名号或商品的文字招幌都体现出单一文字招幌在当时的广泛运用。还有将自家店铺的功能直接写在招牌上,在《东京梦华录》中提到过的“脚店”,就是指供人短暂休息歇脚的小客店。无独有偶,《清明上河图》中也出现过“十千脚店”,这与《东京梦华录》中“脚店”的说法相一致。

## 二、北宋招幌繁荣的原因

###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 1. 朝廷政策的扶持

尽管封建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商品经济在北宋时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一些大城市里,商业店铺逐渐增多,打破了唐朝以来店铺只能设在“市”里的限制,到了北宋时期,店铺已经可以随处而开,且营业时间也与唐朝时期有很大不同。

例如唐朝时期,朝廷对于民间“夜市”的时间有所限制。然而等到了宋代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sup>[5]7941</sup>,朝廷宣布延长京城夜市时长。在北宋中期之时,这种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夜市

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宵不绝”<sup>[2]22</sup>的现象。由此便可以看出在宋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于商贾经商的管制在逐渐放宽。

## 2. 东京漕运的发展

北宋时期将都城定为东京,这样一来也就改变了全国政治长期以来以陕、洛为中心的局面。宋代在对前代原有水道进行改造、疏浚的过程中,形成了以首都开封为中心,且向四周呈放射状的水运系统。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漕运四渠”。《东京梦华录·河道》载:“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中曰汴河……东北曰五丈河……西北曰金水河……入大内灌后苑池浦矣。”<sup>[2]28</sup>可知流经京都的漕运四渠分别为蔡河(惠民河)、汴河、五丈河以及金水河。

和古代依靠脚力和马力的陆路交通相比,河运的快速高效占有很大优势。因此东京凭借遍布都城各处的水渠网络的这种极大优势,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维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 3. 商业场所的变更

宋朝之前的都城,其职能都是以政治和军事功能为主,并不考虑其经济职能,经济性区域大多存在于以农耕活动为主的乡村,并且乡村经济也是国家经济的唯一主体。此时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处于一种相对矛盾的处境:城市在政治上是处于统治乡村的地位,但在经济上却相对依赖乡村。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街市的兴起开始凸显城市的经济职能。街巷以及城坊结构开始表现出其强烈的经济性。建筑的属性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出现了前店后寝、下店上寝的组合模式,因此临街的许多民宅被改造成了临街店铺<sup>[6]81</sup>。一时间线形、带状形式的商业街,开始作为主流的商业模式出现在北宋的城市中。“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北街、晨晖门、宝篆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耍闹”<sup>[2]14-15</sup>(《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从这句话中看出上文所提到的这种线性的城乡集市贸易的形成在北宋时期已经较为完善。

## (二)印刷术的发展

《梦溪笔谈》中有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sup>[7]102</sup>,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得书籍的印刷速度大大提升。除此之外,宋代的治国政策为重文轻武,所以宋代学院及书院制度较为完备。这也是宋代全国上下读书人众多的原因之一。因此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书籍成本降低,书价也相对低廉。这直接促进了图书销量的增多,同时印刷术也

在图书销量增多的基础上发展的更加完善。在此期间,各商家为了抢夺市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便开始印制注明自家店铺信息的宣传页来为自己进行宣传。

此外,还有另一种宣传方式——纸灯。宋朝时期,纸灯除了可以照明之外,还可以作为名帖,因此它本身也是一种广告。《东京梦华录·十六日》载:“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sup>[2]41</sup>以及“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梵,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至达旦。”<sup>[2]40</sup>可以看出,宋代大多数店家都会在门前悬挂灯笼,并在灯笼上以文字形式记录自家店铺的信息,正是宋代发达的造纸业为纸灯招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三)刺激消费需求

### 1. 人口的迅速增长

朝廷的扶持、经济的发展以及利益的驱使使得大量农民从乡村来到城市从商。据相关学者的统计:“开封府,崇宁间,全城人口110万至130万之间,加上常驻禁军14万,北宋末达40万,故城市实际人口当在150万至170万,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sup>[8]53</sup>汴京的人口迅速膨胀,为城市带来了众多商机。为了迎合庞大的消费需求,并赚取更多的利润,各商家开始大力宣传自家产品,从而推动了宋代招幌的发展。

### 2. 社会风气的带动

宋代有着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官吏以及军队,由上文可知仅仅开封府市常驻禁军就有十四万人。此外,宋代官吏的俸禄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官员的俸禄也日以优厚。<sup>[9]231</sup>这是一支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群,这群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中一个庞大的消费体,因其处于社会中上层,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十分惊人。《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中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sup>[2]15</sup>

面对官吏如此强悍的消费力,再加上众多新兴的商业类型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中不断涌现,使得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开始追求奢侈的都市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宋代的装潢业发展迅猛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也可以在宋都看到:“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莹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大货行通

笺纸店、白矾楼、后改为丰东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sup>[2]16</sup>

### 3. 流动人口的推进

宋代官吏的流动程度较大，因为宋朝的制度规定官员不能在本地任职，并且在同一职位的任期也为“三年一易”<sup>[5]4519</sup>。所以在每一年流动人口的统计当中，宋代的官吏流动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可观的。这类人群处于社会中上层，他们所消费的场所往往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商铺，他们的消费实力也决定了商家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因此商家定会在广告宣传上不遗余力。

除了官员的流动，还有一部分百姓的流动，虽然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及官吏商贾，但他们的出现也为小商小贩带来了利薄却量大的生意。因此为了争夺市场，他们也会在广告宣传上尽心尽力。

## 三、招幌对城市商业的影响

北宋时期的招幌对城市环境的营造、城市经济发展、手工业的繁荣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一) 促进经济发展

#### 1. 传递贸易信息，推动商业发展

招幌作为广告业中的一种模式，它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广而告之。北宋时期，虽然街道的兴起打破了过去市和坊的界限，商品贸易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但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之间的消费者还存在着心理上和地理上的不适应。因此，招幌便成为消费者对于商铺的初次印象。

通过各式各样的招幌传递出的商家信息，消费者在不经意间便可了解街道上的各个商铺，使消费者在心理上生出一定的安全感，便于商品及时且便捷地进行交易，从而使经济加速发展。

#### 2. 改变以往经营模式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随着同行之间竞争压力的日益增大，以往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各商家除了在提升自身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同时，开始别出心裁地对自家商品进行大力宣传，来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商铺门口的招幌和招牌就是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的见证。因此注重商品宣传逐渐替代静待发现便是商家经营理念的一大转变。

#### 3. 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北宋时期，各个行业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紧跟市场的变化，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这个时期的社会风尚大多追求奢侈的都市生活，市民在满足

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东京梦华录·十六日》中有载：“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sup>[2]41</sup>从中可以看出，商家为了生存，他们也在不断进行艺术探索，通过各种方式为消费者的文化生活增添内容。《梦粱录·茶肆》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sup>[10]140</sup>由此看出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有时也会利用名人效应。拥有知名度的人光顾商铺，或是在商铺里挂上名人的作品，会吸引人前来光顾。

### (二) 美化城市景观

一方面，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宋人十分重视传统节日，因此传统的民俗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元宵、清明、中秋、端午这种大型节日上，各街道都会洋溢着到浓厚的节日气氛。如在端午时节，“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sup>[2]52</sup>。中秋节前则“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sup>[2]56</sup>。到了重阳节“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sup>[2]56</sup>。

另一方面，幌子的美观与否，侧面上也反映了商家店铺的经营状况。商家为了吸引顾客，会在自己的招幌上下工夫，从幌杆，幌挑到幌体，无不关注。每一个部分都是创作者在繁与简、雅与俗、拙与巧、大与小之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制作出来的成果，寄托了商家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愿望，因此传统招幌具有生动活泼的特质。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色彩、拥有特定意义的造型、丰富多彩的纹饰与各种材质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招幌生动朴实的特质与风格。各式各样的幌子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宋代的街道上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sup>[11]142-145</sup>

### (三) 推动手工工艺多样化

中国传统招幌在中国古代商业的民俗文化和民族传统视觉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原因在于传统招幌是由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并能从中产生共鸣的心理特征、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符号、可视化形象以及风俗习惯等元素组成。中国传统招幌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民间商业文化艺术形态，不仅展现了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传承性，而且从招幌的形制、色彩、图案等角度出发，大都蕴含一定的文化之美，寄托了商家的理念和追求。从这方面来看，招幌具有一定的民俗美学价值，是一种富

有多种民族风格的民间工艺艺术品。

传统招幌最直接的目的是引导消费和广告宣传。但因其具有一定的工艺规范和审美要求,在制作各类招幌时,是将其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品来对待。侯甲峰曾对民国时期的元宵幌子进行了记录,指出:“元宵幌子在昔日极为普遍,制之者为独门手艺,每年夏间即赴各饽饽铺敛财开始制作。其骨子系用竹篾扎成,外缠红绿棉纸穗,亦有用铁丝扎成外缠绸布者,取其不易为风雪所毁,且每年只需换缠新布,即不用现扎骨子矣。”<sup>[12][23]</sup>这种细致的手工艺做法,使顾客看到的不仅仅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还能看到商家严谨、细致、专注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以及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的商业竞争使得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宣传的质量,在招幌的制作过程中,运用细腻的制作手法和巧妙的设计构思,使招幌本身也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使消费者久久不忘,从而对商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正是由于这种间接性的联系,招幌业的不断发展,使得手工艺的技艺越发精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 四、结语

从《东京梦华录》记载来看,宋代招幌设计主要分为实物幌、模型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这四个类别,招幌对城市环境有重要的影响。招幌以其自身的设计特点构成了一道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古代商业文化景观,设计者巧妙而又精细的设计构思、活泼生动的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中国民俗发展史、商业发展史和手工艺发展史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通过对各类招幌进行探究,可以从总结宋代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巧妙的经营策略,从而了解到宋代招幌的功能以及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在后来对日本和东南亚地区部分城市商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能看到其子遗。

#### 参考文献:

- [1] 曲彦斌. 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传统广告艺术史略[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 [2]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卷四[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1982.
- [3] 熊梦祥. 析津志辑佚[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4] 曲彦斌. 中国招幌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 [5]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6] 钟灵毓. 《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东京市肆形态及街巷空间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17.
- [7] 沈括. 梦溪笔谈[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8] 董鉴泓. 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史[M]. 台北:明文出版社,1984.
- [9] 余天炽. 中国古代史[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 [10] 吴自牧. 梦粱录[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11] 陈旻瑾. 中国传统幌子的审美文化意蕴[J]. 艺术百家,2006(5).
- [12] 侯甲峰. 店幌(一):饽饽铺之一(元宵幌子)[J]. 三六九画报,1942(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Study on the Signboard Desig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Dongjing Menghua Lu*

YANG Yuan, LI D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ignboard desig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Dongjing Menghua Lu*, the signboard design in the Song Dynasty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physical signboard, model signboard, specific logo signboard and character signboard. Its development is also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it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city environment.

**Key words:** *Dongjing Menghua Lu*; signboard design;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city environment

# 全媒体新闻报道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与实践

冯美<sup>1,2</sup>, 庞端阳<sup>2</sup>

(1.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推动作用。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在全媒体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再统一”阶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随着现代媒体手段优化,新闻报道实践工作中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党性和人民性,亟需媒体做好把关人,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借助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促使内容转型升级。

**关键词:**党性;人民性;新闻报道;全媒体时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0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57-05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完善,并逐步演变成为指导我国新闻工作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性和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新闻工作者要特别关注党性和人民性在新闻报道工作中的体现。随着中国进入全媒体时代,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厘清两者在全媒体时代当中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推动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能够使新闻报道工作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 一、新闻思想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现实构建

### (一)党性与人民性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而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主张”的基础上,1905年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写作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主张,这一主张于马克思、恩格斯《莱茵报》《新莱茵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新闻工作中得以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人民性的思想从五四

开始传播至中国,党的几代领导人对其进行了丰富阐释。毛泽东认为报纸是党的喉舌,党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的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同时,提倡群众办报,加强了报纸的“人民性”,工农兵的生活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群众参与新闻工作的程度明显增强。邓小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新闻宣传要遵守党的决定,毫无条件宣传党的主张,“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sup>[1]</sup>。此外,进一步强调贯彻“大家办报”的路线。江泽民对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提出了三点要求:“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旗帜鲜明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针也坚定地反映了新闻工作的“人民性”。胡锦涛对新闻工作提出要求“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三贴近”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释。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

**收稿日期:**2022-05-20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性计划项目“当代文艺人民性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转换”(2022-ZZJH-566);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群’的构建与研究”;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大众文艺传播研究”

**作者简介:**冯美(1989—),女,河南漯河人,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与文化传播。

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的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新闻报道也要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之后,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的范围扩大,从传统媒体到全媒体都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关系;重提党性的基础和前提是人民性,党性对人民性起着引领的作用;强调党性是代表全党,人民性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不能以偏概全,否则将不能真正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关系。

## (二)全媒体时代“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在全媒体时代,人民群众了解新闻的渠道已经变得多种多样,出现了传播分众化和差异化的新趋势。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浏览习惯,在不同的网站和平台,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国际形势、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等现状。在我国党管媒体的大环境下,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新闻报道即是党的意志的具体体现。全媒体时代的新闻报道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因为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在新闻报道工作中更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在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主流媒体和大众媒体想要听取各方人民群众的心声,让人民群众及时、准确地看到官方权威的新闻报道。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及时关注社会发展状况,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新闻舆论的广泛性,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所需。新闻报道的表现形式上,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根据“三贴近”的原则,多到基层沾泥土、接地气,了解群众的心声,反映群众的问题,创作出“冒着热气”的新闻报道作品。新闻工作者更要做好审核把关工作,拒绝出现一些不符合现状、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闻报道。因此,从报道角度和内容来看,在新闻报道工作中加强人民性的体现,能够进一步促进党性的建设。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在全媒体时代,做好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工作,有利于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新闻报道工作的积极引导性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等。

## 二、全媒体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弊病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

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方法和途径,使传播方式和传播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全媒体新闻报道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同时,全媒体对新闻报道工作中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和发展,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人,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高达73.0%。随着自媒体的发展,UGC模式正在逐渐发生转变,PGC+UGC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社交媒体成为网民获取新闻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个社会热点的出现,首先会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在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后,主流媒体对其进行深度报道,最终形成一个新闻舆论的漩涡。

## (一)产销不严导致内容导向错误

全媒体时代,人们的发声成本越来越低,相对于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性有了质的突破。之前传统的新闻生产,会有专门的机构或组织去写稿、审核、发布以及传播,内容生产每一个步骤都有着严格的把关。但是,现在人民群众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麦克风之后,在网络平台上就能随时随地的发声。

今年上海疫情防控期间,卢某在网上发布信息称:上海环球港华润万家超市在政府强迫下仓促复工营业,导致管理混乱、遍地污物。此消息一出,便引起了社会轰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后经警方证实,该消息是卢某编造的谣言,目的是为了博人眼球,炫耀自己能出门购物。随后,卢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虽然该消息很快便被证实为谣言,但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上海本身就处于舆论中心,此谣言一出,为上海疫情防控带来负面压力。正是由于组织或个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已经变得极其简单,时间和地点对信息传播的限制性已经微乎其微,所以,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出现弱化党性、边缘倾向等问题。

尽管随着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各大软件的算法对关键词的捕捉,为获取流量而存在的“标题党”有所减少,但是,散发所谓内幕消息、谣言以及虚假信息等仍时有发生。2022年3月25日,“中国民航报”微信公众号在上午10点35分发布内容:MU5735第二个黑匣子已找到。15分钟之后,10点50分左右,新华社发布新闻通稿:“从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了解到,目前还未找到第二部黑匣子。”“中国民航报”微信公众号很快将上述消息删除,该报作为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的一份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唯一指定的机上配

发报纸,在这条新闻消息的发布上,却犯了严重错误。虽然平台及时删除了虚假信息,但由于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和迅速性,也极易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非常不利于党的政策方针和主流价值观有效的传播,更有可能误导人民群众,造成恶劣的舆论事件。这已经严重违反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挑战了新闻报道中党性与人民性的地位。

### (二)迎合用户导致内容娱乐低俗

在全媒体时代,“流量”一词,能够很好地展示出一个作品的受欢迎程度,而流量又来自用户,即广大的人民群众。受众对新闻价值的回馈很大程度体现在新闻的点击率、转发数与回复数上。所以,个别新闻工作者才会设法炮制出越来越多娱乐化、低俗化的新闻,大搞“眼球经济”,认为这是一条以最少投入换取最多回报的捷径。更有甚者,为了吸引用户的眼球,获取流量,而生产出一些娱乐、低俗、浅表的内容。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平台编造内容,使用惊悚故事,抄袭他人原创文章,打着“人民性”的幌子去做内容生产。暴力、色情、猎奇等元素,成为流量追捧的对象。

在娱乐的狂欢中,人们的注意力被这些低俗媚俗所吸引,却忽视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长期以来,人们变得情绪化、极端化,被催眠、被麻痹,丧失自主能力,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当个人享受被放大,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共识培养空间被挤压,出现“后真相”“信息茧房”“娱乐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意味着偏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追求的生活本质。

### (三)生硬搬运导致内容表现单一

随着全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导致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一的图文编辑,到视频音频相结合,再到新型互动类传播;从以往的静态接收,到现在随时随地和碎片化的接收,使得受众接收信息的习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此,处在全媒体的大环境下,媒体应当转变传播思路,不能被以往传统媒体的传播思路所束缚。

现在仍有部分媒体做着无效的传播,他们仍然坚持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观念,秉着功利的思想,害怕担责任、出问题,特别是对党的方针进行宣传时,通常是原封不动地进行搬运,无法根据当地的发展情况进行转变,这就会导致内容出现严重的同质化,人民群众出现解读困难等诸多问题。<sup>[2]</sup>在全媒体时代下,这种单一、生硬、照搬的宣传方式无法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不利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开展。

上述存在的问题,根源来自媒体:一方面没有适应现阶段全媒体传播方式的快速转变,另一方面是

没有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 三、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实践策略

### (一)营造权威性,引领正能量

客观公正的立场是新闻报道工作中必须要坚持的,做到每一篇新闻报道都是真实的、经得起考察的,这是媒体营造权威性的第一要义。在这个信息如洪流般的时代,人们每天都接收了大量的信息,其中也不乏一些虚假信息。因此,媒体应当时刻关注当下社会热点,当人民群众对某一个社会热点产生质疑时,媒体应当及时发声辟谣,安抚大众情绪等等。只有媒体带着真相及时出现,才具有权威性,才具有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的能力。

上述已提到,在上海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社交媒体上与疫情有关的谣言此起彼伏,模糊真假、混淆视听,无中生有、制造恐慌,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严重干扰。面对虚假乱象,《解放日报》开始推出一系列求证类报道,推出《求证·辟谣》版,《批发市场暂停交易?菜价成倍上涨?记者调查核实》《抵抗奥密克戎口罩还管用吗》《疫情之下,上海快递运转正常吗》等报道,及时如实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问题。后续,“求证·辟谣”版澄清了“世博展览馆等临时收治点可能有风险”“上海一老人因小区隔离跳楼自杀”“新冠肺炎患者无医保卡要自付诊疗费用”等谣言信息。《解放日报》富有权威性的报道,稳定了人心、普及了知识,增强了人民团结一致的信心和勇气。类似《解放日报》这种主流媒体主动回应、积极发声、澄清谬误的报道,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

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正面宣传时需把握好分寸,不拔高、不贪功,方可“取信于民”,形成报道的正能量。进行舆论监督,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回应时,也要在报道时段、版面编排、形式手段把握好“度”,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相统一,最终起到鼓舞士气、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等作用。

### (二)提高审核力,做好把关人

随着各种APP的出现与发展,人们发帖相对于传统媒体时代变得容易许多,但这大大地提高了对媒体审核能力的要求,需要媒体对各类稿件进行审核,从中挑选出有政治倾向错误、价值观出现偏差、思想不正确等有问题的稿件。特别是在特殊时期,如在疫情防控期间,一定要对有关疫情的稿件进行严格审核,避免出现谣言和不正当的言论,引起公众恐慌。

2022年6月,《北京日报》客户端在推送《蔡奇作党代会报告: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文章时,出现了“未来五年,北京坚持不懈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内容,引起了网友热议。随后,《北京日报》重新编辑发稿,社长赵靖云发文表示是记者误加“未来五年”,“说来可笑,因为要抢时效,他们拆解了报告重点,预先做了模板,‘未来五年’要干这个、要干那个,一段一段套进去,就把‘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也套进去了,没过脑子。结果连起来一读,就出了笑话”。为了达到首发效应,拆内容、套模板,一方面是内容生产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来媒体审核的巨大纰漏,对媒体的公信力造成了很大损害。媒体各个环节和相应部门都应充分学习提升媒体审核能力,充分发扬传统媒体审核把关能力的优点,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以此来确保发布内容的权威准确,为新闻报道筑起坚固长城。

### (三)以问题导向,到群众中去

媒体的工作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这一要求充分体现在新闻报道工作中的各个方面,具体要做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统一。面对群众的精神所需,想要高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首先要在内容选择层面做好把关,充分调研。新闻工作者应当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信息文化需求为己任,而不是刻意地去迎合市场需求,以赚取流量为目标。在进行议题设置时,应当充分理解广大人民群众当下最关心的问题。每个地方各有差异,不能做新闻的搬运工,这样做只会导致内容过度同质化。地方媒体应当做到内容有区别,大方向一致,努力做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sup>[3]</sup>的根本问题。

媒体应当是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表达者,为人民群众发声,积极地与人民群众进行互动交流。在新闻报道工作中,把党想要传达的声音,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聚焦与人民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平凡英雄事迹,用日常温情的故事传递党的政策方针,既贴近实际、深入人心,又在无形之中传递了主流价值观,不会使受众产生抵触情绪。

例如:《人民日报》公众号,常常站在人民的角色,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如:江苏南京护士曹美玲在街边救助老人;交警杨旭彬“咆哮式救援”;河南新乡95后小伙李红星割头皮救父等。一方面体现了其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有利于营造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日常的报道工作之中。

同时,还要注重与群众的交流,多渠道获取意见,在评论区、微信、微博、群众所发文章中去了解群众所想,并及时做到解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在建设友好互动交流的平台时,也应当积极鼓励人民群

众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把党的政策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自己手中的监督权,充分发扬民主精神。

### (四)迎形式之新,创内容之实

随着媒介生态格局的改变,新闻舆论工作的重点已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以往传统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全媒体时代的需求,媒体行业应充分利用好全媒体时代所带来的机遇,做好转型,搭建一个更高效便捷的友好交流平台,促进党和人民之间的沟通。传播平台的转换意味着话语模式也应有所调整。摒弃官话套话、“假长空”、陈词滥调等话语模式,做到严肃活泼,充分考虑现在网友在接受程度以及他们的喜好,在进行报道时,适当选取合宜的网络流行用语、民间话语,营造一个接地气、同群众联系密切的媒体形象,这样才能深受群众的喜爱。

2021年,川观新闻曾发布《三星堆国宝大型蹦迪现场!3000年电音乐队太上头》的融合新闻作品。该新闻作品在内容表现形式上,将原创手绘动画与现场的发掘视频相结合,背景音乐选用的是四川方言,融入了电音与赛博朋克特效,将三星堆文物“活”了起来。同时,通过大型交互式专题《再醒惊天下》,图文、直播、视频、H5等新闻媒体报道,全方位呈现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历史价值和人物故事。这一报道,有效地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人文报道严肃、高冷的刻板印象,以年轻人喜欢的手绘、电音、赛博朋克元素为桥梁,连接优秀传统文化与年轻群体,并完成了深度的互动。同时,借助全媒体融合创新的传播之力,将三星堆文化向人民群众进行了全面科普,使得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被大众所认知,提升了国民的文化自信。

今年两会期间,河南广电、河南日报、大河网都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创新报道形式,在全国两会上讲好“河南故事”,传好“河南声音”。河南广电用年轻人的话语方式积极向年轻人传递两会声音,微视频《青春约“会”》,聚焦年轻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创业就业、国潮文化、乡村振兴等话题,两位95后年轻记者体验式走访,以Vlog的报道形式将年轻人关心的问题带到两会代表委员面前。《河南日报》旗下的“大河财立方”推出的“朵朵的两会Vlog”,以“朵朵”作为第一视角的讲述者,用轻松愉快的口吻配以色彩鲜明的文案解说词,向大家传递两会知识,在Vlog中,还连线了正在奔赴北京参加两会的河南代表,简明扼要提出了人们较为关心的问题,通过弹幕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个Vlog给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大河网则发布了“河宝儿SHOW两会”系列视



频,“蓝胖子”河宝儿从元宇宙走出来,成功变身为“二次元美少女”,5G网络虚拟化的形式,增强了受众接收新闻的兴趣。

#### (五) 创沉浸体验,增互动之感

全媒体时代不仅加深了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还赋予了新闻报道交互性和智能化等特征。全媒体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从“一对多”传播变成相应的“一对一”传播,能高效及时地和人民群众进行沟通互动。因此,可以利用这一特性对新闻报道的宣传方式和手段进行改进,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强的参与感,充分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在对党的政策方针进行宣传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新闻直播、人工智能、个性化选择等技术手段,让人民群众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还可以通过为人民群众提供新闻定制和互动类新闻等内容,体现多样化、差异化的传播方式。

在今年两会中,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来了!极简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用户呈现了一幅精美的手绘长卷,并以SVG交互的方式,引导读者“点击看报告”,带给读者强烈的互动感和临场性。河南广电制作的创意短视频《“创”未来,“新”出彩·一起向未来》,运用VR、视频拼接、三维角色绑定动画等技术,推出沉浸式报道,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视频一经播出,立即吸引了许多90后、00后年轻网友们的关注,全网累计点击量1000万+。这种传播方式,改变了人民群众对新闻报道本身所固有的刻板印象,提高新闻的趣味性,增加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在沉浸中了解新闻时

事,更好地接受媒体本身所要传递的主流价值观。

如今的媒介生态格局已经让我国的新闻阵地,逐渐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媒体要充分利用好主流媒体的优势,做好转型,适应时代和人民群众新的需求。在这个众声纷扰的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更要以身作则,积极适应时代,打造出一个具有权威性,为人民服务的和谐友好的交流平台。把握好新闻报道的基调,引导社会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好党和人民群众耳目喉舌作用,更好地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群众中有效地传递。

#### 五、结语

身处全媒体时代当中,应当充分利用好其特征,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解决所出现的问题,以助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只要新闻工作者理解党性和人民性在全媒体时代下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关系,坚持并做好新闻报道中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工作,必然能解决所出现的问题,让全媒体技术成为我国新闻报道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器,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王惠珊. 谈融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J]. 佳木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61-63.
- [3] 陈力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J]. 青年记者, 2018(19):3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The Unity and Practice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Nature in All-media News Reporting

FENG Mei<sup>1,2</sup>, PANG Duanyang<sup>2</sup>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2.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all-media era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journa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spirit and the people's natur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re-unification" in the era of all-media.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With the optimization of modern media means, some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practice of news reporting.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nature, it is urgent for the media to do a good job of gatekeeper to guide the correct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promote the cont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elp of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methods.

**Key words:** Party spirit; People's nature; news report; all-media era

# 文化自觉、活化表达与记忆重构： 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创新三维

——以“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常 淳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文化复兴视域中,传统文化类节目应当在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创新中弘扬民族精神、构建文化记忆。就此而言,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成功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以独具特色的非遗、文物、地域文化为坚实基础,体现节目的文化自觉;其二,面向青年群体需求,以新兴媒体技术赋能活化节日文化符号,实现广泛的社会化传播;其三,以晚会对传统节日进行“再仪式化”,在媒介仪式中重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

**关键词:**符号活化;技术赋能;媒介仪式;国家记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1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62-05

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河南卫视近年来连续推出的《清明奇妙游》《端午奇妙游》《中秋奇妙游》《重阳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脱颖而出,成功“破圈”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该系列节目基于河南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的天然优势,凝练文化元素,拓新节目形态,激发了节日晚会仪式化传播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精准挖掘并深刻表现了博大精深而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精神’,从而与生于中华、长于盛世且越发文化自信的观众产生了灵魂深处的‘精神共鸣’”<sup>[1]</sup>。传统文化元素经新兴媒介转译,唤醒并复刻着年轻群体的文化记忆,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个体身份认同产生共振,激发用户以转发、评论、点赞等形式进行“生产性消费”,产生更为广泛的归属感与荣誉感,从而重塑国家记忆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节目生产与消费互为因果,传播效果与社会效益互为促进。从促进优质内容生产的角度看,“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在文化自觉、活化表达与记忆重构三个维度,摒弃主观“宣传”,专注大众“认同”,为其他地方卫视举办节日晚

会找到创新方向,也为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 一、以地方特色为坚实基底的文化自觉

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掘本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有重要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自觉呈现民族文化中有普适意义的蕴含内容,并让其在新的场域中不断衍进、扩散、共享”<sup>[2]</sup>。而传统文化本身的丰厚广博决定着其内部具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文化自觉就是对自己生长于其中的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优长利弊、现实状态、未来发展等具有清醒正确的自我认识。<sup>[3]</sup>河南卫视自20世纪90年代起,即开始了传承与弘扬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的不懈探索,《梨园春》《华豫之门》《武林风》等节目已然贯彻着这一理念,而“中国节日”系列则以更新角度、更大范围体现着这种文化自觉。

### (一) 非遗文化的艺术创造

河南作为传统文化大省,有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文化具有极强的文化性,是承载

收稿日期:2022-06-08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面向乡村振兴的河南‘三农’短视频文化生产研究”(222400410176)

作者简介:常淳(1997—),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传播,视听新媒体。

着一个民族情感、智慧与历史记忆的文化形态,是具有极强辨识度文化符号。<sup>[4]</sup>非遗文化附带小众化属性,多在趣缘群体内传播,在近年来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亟待转化小众思维,结合大众媒介进行艺术再创造,以审美共识实现去圈层化。文艺活动实际上就是审美主客体双向逆反互动的同构关系的具体存在方式。<sup>[5]</sup>非遗文化在“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呈现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转化,在新媒体平台进行交流互动,循环式输入与输出审美观念,建构以迎合大众审美为基点、满足观众审美期待为目标的优质节目内容,通过色彩、光线、音乐和音效等视听语言的精巧运用提升观赏性,实现非遗文化节目小众化到大众化的飞跃。《清明奇妙游》中节目《精忠报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形式制作的岳飞形象为开场,色彩浑厚庄重,线条精密流畅,非遗文化的精巧程度让观众叹为观止;同时该节目中唢呐艺术的融入使民乐大气磅礴的风格彰显得淋漓尽致,传统民乐唢呐与现代电子音乐的碰撞交融凸显非遗文化的可塑性与创新性。非遗文化艺术再造后以现代面貌惊艳大众、收获大批粉丝,召唤观众文化觉醒、坚定大众文化自信。

## (二) 文物文化的自信表达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见证了太多历史风云,也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物。随着《国家宝藏》《假如国宝会说话》《上新了·故宫》等文博类节目的兴起,历史文物不再只存于博物馆中等待被解读,而是以具象化、趣味化的形式主动展演表达。文物的自信表达可通过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双层意义来阐释,分别是浅层表达的能指和深层内容的所指,连接两者的意指过程升华文物内涵。节目《唐宫夜宴》中所出现的《捣练图》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该符号的能指含义为展现唐代妇女捣练、理线、熨烫劳作情景的风俗画,此为文物符号的概念表意;而延伸下的所指是通过大唐仕女勤劳专注的美丽景象展现唐代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的呈现是文物的深层意象。基于能指“任意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文物符号与唐宫 IP 相呼应,跨越时空进行梦幻联动,展现美好、自信、富足的社会景象。意指过程实现扁平至纵深的文物文化表达,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小切口、大视角徐徐展开。在“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文物元素与节目内容相互交织实现文化串联,进行多维度展演,文物的自信表达为“讲好中国故事”添砖加瓦。

## (三) 地域文化的魅力彰显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打破晚会节目中的常态化舞台呈现,大量使用实景拍摄。晚会中惯常使用的舞台布景虽具有灯光、舞美和道具等带来的绚丽感,但人工痕迹过重,易产生距离感,不利于观众的沉浸式观看。实景拍摄通过自然景观与艺术手法的融合活化节目场景,与观众产生情感联结。节目实景中出现的地域元素皆为河南的标志性景点,具有观赏和文化双重价值。地域元素加持下节目建构了三重叙事空间:一是物质空间,“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分别出现开封金明池、洛阳龙门石窟和商丘古城等地域元素,从室内到室外的空间转变拓宽观众视野、丰富文化内涵;二是历史空间,节目通过歌曲、舞蹈和服装等元素再现历史时空,具象化呈现史实,电视化改造过程中历史架构被赋予形象外衣,抽象的历史文化记忆得以丰富与重塑;三是心理空间,节目中所出现的儒家书院、释迦庙宇和道教仙山等地暗含儒释道三教交融的文化理念,地域空间蕴含的文化彩蛋激发观众产生文化共鸣与价值共识,强化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地域文化的加入丰富了节目形式与内容,给观众带来沉浸式观赏体验的同时深入展示文化实力、催生文化自觉。

## 二、以青年群体为目标受众的活化表达

互联网发展加速社会的媒介化,现实中传统节日的日渐失落,需要在媒介的虚拟空间中被再次激活。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调动传统节日符号,对符号进行二次活化创新。鉴于青年群体已经成为媒介应用的绝对主体,晚会通过现代科技赋能传统文化,贴合时代脉搏,优化文化表达,从而吸引其成为节目宣发过程中的“产消者”,借助文化寻根心理与文化资本意识,激发其社会化传播行为。

### (一) 中国传统节日符号活化

人们习惯将日常生活用符号分解,以此来指导实践活动。元宵、清明、端午、七夕和中秋等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这些时间节点被建构为节日符号,“中国的节日是贴合着中国的农耕、农业的生产节奏、人和大自然基本关系来设节的,它的节点往往是同时是社会生产实践的关键点、转折点”<sup>[6]</sup>,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殊意义。任何节日的符号与仪式,都存在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为它们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的内涵因素;二为体现这些精神文化内涵的符号与仪式的外在形式与物化的载体。<sup>[6]</sup>社会飞速发展,“全民娱乐”“消费主义”“享受主义”风气盛行,泛娱乐

化的态势日益消减节日符号内部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传统节日仅凭娱乐外衣与消费导向很难长远发展,文化传播与传承才是传统节日立足的根本,实现节日符号内涵与形式共生。晚会成为联动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媒介,并赋予节日符号更多形式与意义,节日符号被充分调动、活化并创新。

长期以来,节日晚会中唯有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与元宵节晚会受到较高关注,其他传统节日晚会发展乏力。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将传统节日与晚会绑定并推出“奇妙游”系列,促活节日符号,填补节日晚会所存在的文化空缺。比如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该节日习俗有赛龙舟、祭龙、采草药、浸龙舟水、食粽、放纸鸢等,晚会调动相关节日元素置入四十分钟的节目中,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压缩提炼,同时将线下节日民俗和元素转移至线上通过媒介传播,这一转换过程对节日符号的活化与创新具有积极作用。晚会赋予传统节日崭新活力,传统节日符号活化改善了节日民俗在大众记忆中逐渐消亡的被动处境,节日符号的意义不断拓展,生动直观的形式融合晚会内容触达观众,深刻影响大众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

## (二) 技术赋能文化表达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播出后频上热搜:#河南卫视文化霸总、#河南卫视传统文化DNA又动了、#河南卫视杀疯了等词条点击量居高不下,晚会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内核,以现代技术为触手触达观众,成功实现技术赋能文化表达。赋能,简单来说就是赋予能力,通过增强个人或组织的意识、技能、知识与经验,使得个人或组织得以发展壮大,着重解决个人或组织能力的贫乏问题。<sup>[7]</sup>河南卫视坚持文化立台,《梨园春》《武林风》《华豫之门》等王牌节目以戏曲、武术等传统文化内容的输出为主,体现“文化卫视,寓道于乐”的传播宗旨。在人类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技术如影随形,从电子技术到智能技术,技术演变不断为文化表达与传播提供与时俱进的物质支撑。技术越发达,它赋予媒体的能量和动力就越大。<sup>[8]</sup>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使用3D、5G、VR、AR等前沿技术制造出视觉奇观,线上与线下交融实现双向联动,吸引了青年群体的关注。技术赋能是晚会形式创新的最大亮点,观众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对于节目的视听呈现有着更高的需求,晚会中《唐宫夜宴》和《月光》等节目多次采用虚

实结合的手法将现实舞台与虚拟景象相融合,打破单一舞台空间带来的视觉疲劳,在美感呈现上另辟蹊径;《龙门金刚》这一节目使用三维建模、染色等数字化技术手段,用电脑着色来复原龙门石窟的色彩,刚柔并济的舞姿与充斥着科技感的氛围碰撞出的视觉效果完美诠释中原文化的厚重与灿烂,成为又一刷爆朋友圈的爆款节目。精妙的视听设计与智能科技手段契合青年观众的观赏取向,改变晚会先前的固化形态,带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震撼感受,多方位践行艺术创新。传统的演绎方式与传播模式无法适配现代观众的需求时,高新技术赋能为传统文化类节目续航。

## (三) 青年群体助力社会化传播

社会化传播是基于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与连通性的社会化媒体,是一种弥散式、辐射式、强调用户是传播网络中的“单个节点”概念的传播方式。<sup>[9]</sup>在互联网出现后,大众传播方式从中心化的树状思维嬗变为自由链接化的块茎思维。当代受众具有多元需求以及互联网思维,在传播过程中能够发挥能动性,成为重要的传播节点,促进信息的有效接收与送达。当下青年群体作为网络主力军,在社会化传播下早已转变角色,不满足将自身仅置入单纯的接受者、观看者与消费者身份,受众由被动变主动以产消者角色参与内容生产、传播与消费。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通过河南卫视、大象客户端等平台进行播放,网友积极参与晚会节目的再创作、转发与评论,在微博、B站等平台作为重要的传播节点进行社会化传播,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契合当下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习惯。

青年群体在极速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具有天然的情感联系,消费主义下依然致力于文化寻根。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主打传统文化相关的优质内容,青年群体的热情被激发、点燃。节日晚会以全新形式包装传统文化,适应青年群体的接受习惯,契合受众对文化回顾和文化寻根的怀旧心理,成功同化青年群体成为晚会内容的产消者。青年群体自觉地成为产消者,其动因还在于社交过程中文化资本、社交资本的积累。经济学家思罗斯比对文化资本进行划分,“有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即投入文化生产和发展的资本,或言‘文化投入’”<sup>[10]</sup>。河南卫视将文化遗产和文化意识形态融入晚会内容中,文化资本使青年群体在社交过程中获得广泛关注 and 认可,成为强交互型传播

方式下的开放资源,实现“从文化中来,到文化中去”。

### 三、以晚会为媒介仪式重构国家记忆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赋予节日晚会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将流传千年植根于集体记忆的民间节日,压缩进全新的时间与空间,以媒介为渠道建构仪式。不同地域、年龄、性别的受众通过媒介仪式增强情感链接和文化认同,仪式的力量将大众带入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定义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完成对国家记忆的重构。

#### (一)从“仪式”到“媒介仪式”

中国人自古以来十分注重“仪式感”,节日仪式“是人们休憩、顿思、狂欢的时间节点,充满与日常生活相异的特殊行为和情感需求”<sup>[11]</sup>。但现代社会飞速发展,高度自由的现代化环境冲淡了现代人的仪式感,丧文化、宅文化等亚文化在年轻群体中蔓延成风,人在此环境下愈发迷茫和缺失认同感,呈现弥散、游离的边缘状态,仪式权威性逐渐消解。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媒介发力将节日重心逐步由线下转为线上。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采用直播形式聚合观众,同时将符号化元素、时间与空间共同压缩进晚会中,线上观看不失在场感与仪式感,完成一场盛大的媒介仪式。英国传播学者尼克·库尔德里提出“媒介仪式”的概念,是指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到某些共同事件或活动中,呈现出一种具有象征性符号的过程和行为。<sup>[12]</sup>

媒介仪式辐射力大、包容力强,能够整合社会、创造观念认同与共识。传统节日晚会是个体融入集体的通道,个体独立的思想与行为在仪式中达成共识,从混乱走向清晰,趋向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意识形态。截至2021年底,微博话题中#河南卫视杀疯了#阅读量高达10.9亿,#如何评价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阅读量高达4.2亿,数据证明节日晚会作为媒介仪式所传达的国家信仰和民族情感得到高度认同。节日仪式改变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与表现方式,媒介仪式再塑造以情感共鸣的方式减少文化折扣,实现优秀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现代化社会中晚会作为媒介仪式不断加深、强调大众的群体意识,将离散的社会个体整合为民族共同体,将历史与当下整合为国家记忆,国家记忆成为媒介仪式的结晶。

#### (二)从“国家记忆”到“身份认同”

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共享过去的过程和结果”<sup>[13]</sup>。“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国

家记忆也基本具备了社会化和情感两种维度,即通过情感的作用把分散的个体联结或黏结起来,使个体及个体记忆都被社会化,使集体因此获得统一和聚合”<sup>[14]</sup>。换一个角度看来,观众个体作为社会化的人,出于情感需要,也须基于国家记忆、集体记忆而强化身份认同感,在媒介仪式中找寻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热播,即通过“节日”这一国家记忆载体,完成观众个体的身份认同。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诞生的IP形象、歌曲、舞蹈和造型等都是抽象国家记忆的具象载体。《端午奇妙游》晚会中的节目《祈》通过演员妆造、华丽衣饰、优雅舞姿等元素再现了观众心目中的“洛神”形象;《唐宫夜宴》中十四位唐宫小妹体态丰腴、俏皮靓丽、载歌载舞,也契合了观众对唐代美女的审美想象,因而一经播出即引来观众的交口称赞,究其原因,即在于国家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叠印共振。国家记忆可以是历史记忆被反复提及及不断强调,也可以是当下的记忆被凝练加工,记忆的时间跨度横跨过去、当下与未来,是贯穿古今同频共振的综合性记忆。一直以来,春晚、主旋律影视作品、文化类节目等内容都在致力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与社会认同,通过寻找共识将“小我”赋予“大我”的身份,完成个体在群体中的身份认同。随着社会变迁,自下而上式的身份探索与认同更加奏效,大众在国家文化中不断形成崭新认识,自发达成共同目标、强化集体认同。个体与民族、国家紧密相关,国家记忆的建构使寻求身份归属感的个体在集体主义中激发对家乡、民族和祖国的自豪与热爱,催生自我身份认同与群体认同,“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坚定炎黄子孙、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凝聚民族血脉,让大众进入“想象的共同体”中,续写国家记忆。

### 四、结语

河南卫视打造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通过再现传统文化的厚重与灿烂,使文化资源在文艺作品中迸发出无限的活力与生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魅力无穷,脱离曲高和寡的刻板印象,更具现代用途和当代价值。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出圈并非偶然,而是呈现着文化复兴态势下的民心所向,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向往促成文脉相传,文化复兴与节目发展或可互为因果。就此而言,“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已经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可以预见,随着更多节目沿着“文化自觉—活化表达—记忆重

构”的路径开拓精进,传统节日将在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中反复进行记忆刻写,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精神筑基中亦将更具发展活力。

#### 参考文献:

- [1] 张国涛, 欧阳沛妮. 在中国美学层面寻得共鸣: 解析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J]. 中国电视, 2021(7): 23 - 29.
- [2] 林克勤. 自我觉醒与形象重构: 中国文化域外分层传播的向度解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 39(7): 10 - 15.
- [3] 李永胜, 张紫君.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创新与文化自强[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6): 90 - 96.
- [4] 张吕, 雷雨晴. 数字化生存语境下非遗的传播与传承[J]. 中国电视, 2021(10): 72 - 76.
- [5] 马龙潜. 文艺美学的多重复合结构: 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研究[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 78.
- [6] 李心峰. 当前专家学者关于中华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探讨[J]. 艺术百家, 2012, 28(4): 34 - 47.

- [7] 白江宏. 技术赋能, 能做的还有很多[N]. 内蒙古日报(汉文版), 2018 - 08 - 13(10).
- [8] 沈正赋. 智媒时代信息传播领域技术赋能与人文精神传承的关系建构[J]. 编辑之友, 2019(5): 20 - 26.
- [9] 兰馨, 胥泰宇. 国内主流媒体的社会化传播策略: 以《人民日报》抖音账号为例[J]. 青年记者, 2020(35): 81 - 82.
- [10] 徐望. 美育与文化资本理论的交互链接与双向新詮[J]. 当代教育论坛, 2021(6): 67 - 76.
- [11] 俞虹, 胡双. 节庆晚会的传承与创新: 从央视2012年中秋晚会说起[J]. 电视研究, 2012(11): 52 - 54.
- [12] [英] 尼克·库尔德里. 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M]. 崔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25 - 26.
- [13]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71.
- [14] 赵静蓉. 国家记忆的生成机制与经典建构[J]. 学习与实践, 2020(10): 120 - 13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Cultural Consciousness, Revitalized Expression and Memory Reconstruction: The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Programs in Three Dimensions

——Taking the “Chinese Festivals” Series as an Example

CHANG Ch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revival, traditional cultural programs should promote national spirit and build cultural memory through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content and form. In this regard, the success of Henan TV's “Chinese Festivals” serie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program'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reflected by the unique non - foreign heritage, cultural relics and regional culture as a solid base; secondly; secondly, the festival cultural symbols are revitalized by emerging media technology to meet the needs of youth groups and achieve wide social dissemination; thirdly,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is “ritualized” by the party, and individu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and even national memory are reconstructed in the media ritual.

**Key words:** symbol revitaliza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media ritual; national memory

# 浅析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对难民事件报道之风格

——以艾伦·科迪之死为例

胡博文

(墨尔本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维多利亚州, 墨尔本 3000)

**摘要:**叙利亚三岁男孩艾伦·科迪之死是2015年难民危机的代表事件之一。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呈现了不同风格, 主要是因为英德两国有着不同的新闻媒体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国内社会环境等因素。

**关键词:**英国《卫报》; 德国之声; 难民事件; 报道风格; 艾伦·科迪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2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67-05

欧洲难民问题由来已久。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 难民数量激增,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截至2018年年底, 因政治冲突、战争或迫害等原因, 全球约7080万人流离失所、259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叙利亚约1300万人; 截至2020年2月, 已有超过670万叙利亚人被迫逃离本国<sup>[1]</sup>。叙利亚难民问题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难民危机, 三岁的艾伦·科迪是上千万叙利亚难民中的一员, 在逃离故土中不幸遇难, 曾引起世界轰动, 然而在关于叙利亚难民的热点问题中却鲜有涉及艾伦·科迪的, 同时, 不同媒体对艾伦·科迪的遇难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报道差异。鉴于此, 本文以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为例, 探讨不同媒体对难民事件报道风格的差异及其原因。

## 一、缘起

2015年9月2日凌晨, 在战争的硝烟中, 艾伦·科迪(Alan Kurdi), 一个三岁的叙利亚男孩, 和家人一起被迫逃离故土, 准备前往加拿大和姑姑团聚。一家人乘坐一艘小型充气船, 从土耳其博德鲁姆的海滩出发前往希腊, 在海上遇到了风浪, 艾伦和他的哥哥、母亲不幸遇难。穿着红色上衣和运动鞋的艾伦尸体被冲到了岸上, 一半泡在海水里, 一半在沙滩上。艾伦仿佛睡着, 但被海浪轻拍的小脸已生

机不再。多甘通讯社的土耳其摄影师尼吕费尔·德米尔(Nilüfer Demir)拍下了这凄惨而令人痛心的一幕。人权观察的彼得·布卡尔特(Peter Bouckaert)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张照片, 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艾伦·科迪之死成为2015年难民危机的代表事件, 艾伦成了所有为到达欧洲和西方安全地带而丧生儿童的象征<sup>[2]</sup>。德国代表性媒体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和英国代表性媒体《卫报》(The Guardian)对此事件均有报道, 并且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 两家媒体的报道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有着不同的新闻媒体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 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国内社会环境。

## 二、德国之声与英国《卫报》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

### (一) 德国之声关于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

德国之声属于德国国有媒体, 成立于1953年, 1960年通过《德国之声法案》(Deutsche - Welle - Act)成为一家独立的广播公司。为更好地为公司服务, 《德国之声法案》不断调整完善, 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自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1990年统一后, 德国有关部门对公共广播系统进行了改革, 尽管改革举措不少, 但德国之声是唯一仍在联邦法律下

收稿日期: 2022-06-19

作者简介: 胡博文(1996—), 女, 河南南阳人, 墨尔本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20级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际新闻研究。



运作的广播公司,其所需经费纳入国家预算,可以不通过广播费获得资金,而是直接由税收资助,且由联邦文化和媒体专员专门管理<sup>[3]</sup>。由此可见,德国之声有着充足的运转经费保障。经过多年的运作、发展,德国之声逐渐成为蜚声国际的新闻媒体。作为一家国际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在其官方网站提供了除德语以外的三十种语言,其中包括英语、法语、中文等语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英国《卫报》只有英语报道,为便于比较,笔者同样选择德国之声的英语语言版块,搜索“Alan Kurdi”为关键词的新闻,从2015年12月18日的第一篇报道到最后一篇报道,关于艾伦·科迪遇难的新闻有7篇。

就内容而言,这7篇新闻关注的主要是艾伦·科迪的亲人,比如他的父亲目前定居在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叔叔在加拿大和姑姑团聚、艾伦的父亲还希望能加入以他儿子命名的救援船队伍、姑姑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德国之声记者阿利斯泰尔·沃尔什(Alistair Walsh)在《叙利亚蹒跚学步的艾伦·科迪的姑姑呼吁人们给予同情》的报道中强调,姑姑蒂玛在看她已故侄子的照片时很挣扎,但她和她的家人必须“吞下我们的痛苦”(swallow our pain),让世界了解,没有难民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希望尽可能生活在故土;她还表示在找到停止战争和解决这些难民国家危机的方案之前,难民有权寻求庇护,有权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同时蒂玛对意大利强硬的拒绝态度表示非常伤心,她认为这是不人道的。除了对艾伦·科迪死亡事件的直接报道以外,德国之声后续还报道了艾伦的父亲想要加入和儿子同名的德国救援船,艾伦的父亲再婚并且妻子已经怀孕,他打算在儿子出生之后,加入救援船,为难民提供他没有得到过的帮助。

就形式而言,这7篇报道有文字版和采访视频,形式不同。其中对艾伦·科迪姑姑蒂玛的采访是以视频新闻的方式进行报道。在这则大约四分钟的新闻视频中,德国之声的记者询问了蒂玛,主要包括艾伦·科迪之死的照片对她的影响,以及发生艾伦·科迪死亡事件的悲剧之后,有关移民问题的相关讨论,她是否认为这件悲剧发生之后,公众应该有更多人性的思考。在这则新闻中,德国之声不仅关注艾伦之死对他家人的影响,并且将这种影响延伸至对难民问题的思考。在另外一则关于2015年难民危机图集的视频新闻中,德国之声选取了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难民形象,其中一个就是艾伦·科迪,并采访了他的父亲和姑姑,向观众展现了他们面对亲人

离世后最真实的悲痛。在其他几篇关于艾伦·科迪的新闻中,德国之声更多地关注到了难民问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其他人在解决难民们的困境时做出的努力,比如德国之声采访了一名帮助难民逃离叙利亚但却面临走私指控的丹麦企业家萨拉姆·奥尔丁(Salam Aldeen),以便唤起人们对难民问题的思考。

从这7篇稿件的内容和侧重点来看,不管是记者采访时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新闻稿件中所涉及报道内容,德国之声在尽可能展现艾伦·科迪死后家人们的悲痛之际同样突出了其家人也在努力继续生活。不仅如此,德国之声在其战略计划中还提到,他们将和欧盟合作,在2017年启动一项名为“移民信息”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服务,为来自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难民提供相关信息,告知逃离祖国将要面临的危险以及抵达国家的情况。

综上所述,德国之声对艾伦·科迪之死事件的报道更多的是侧重于艾伦的亲人以及难民的相关问题,报道的内容积极向上,对收容难民的问题也表现出正面的支持态度。显而易见,德国之声整体报道风格相当温和,新闻内容主要关注艾伦·科迪的亲人在遭遇这次悲惨事件之后的生活状态,关注难民问题,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 (二)英国《卫报》关于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

和国有媒体德国之声不同,《卫报》是一家私人媒体。为了确保《卫报》财务和编辑的独立性,避免受到商业或政治影响,捍卫《卫报》的新闻自由和自由主义价值观,1936年斯科特信托基金正式成立,为《卫报》提供资金支持。<sup>[4]</sup>

《卫报》是一家非常坚持自由主义理论的报社,在它官网的右上角有四个新闻板块,截至2021年6月3日,搜索“Alan Kurdi”共有565条相关新闻,因为某些技术原因只能查看其中80条新闻。梳理这80条新闻的内容,直接报道艾伦·科迪之死的并不多,而是与艾伦·科迪之死间接有关的新闻,包括以艾伦·科迪命名的救援船、艾伦·科迪的父亲以及叔叔和姑姑、伪造难民新闻的记者等。

《卫报》关于艾伦·科迪的报道和德国之声在内容上有很大区别。主要是报道与艾伦·科迪之死有关的社会问题,甚至还有一部分报道言辞犀利地指责英国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不作为,比如将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蒂姆·法伦(Tim Farron)谴责英国首相在这场悲剧中获利的演讲视频截取出来发布在《卫报》网站:“政府今天依旧在报道这个躺在沙滩上的三岁的男孩的故事,我们从戴维·卡梅伦那里



得到的是,……以最小的努力换取最大的头条新闻和一项不会直接帮助目前在欧洲的数十万难民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政策。这让我觉得可怜、尴尬、生气。……所以,当卡梅伦先生背弃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背弃了我们的邻居时,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他不是代表我说话,不是在代表我们说话。”<sup>[5]</sup>显然,《卫报》以此来表达对政府有关难民政策的不满。

此外,《卫报》还刊发了斯特拉·克雷塞(Stella Creasy)以艾伦·科迪之死为背景撰写的《英国故意无视其对儿童难民的承诺:这种耻辱必须结束》评论性文章,直指英国政府的不作为,因为内政部故意不解释拒绝儿童入境的理由,以避免其利用这些信息来行使他们的权利,最终迫使法庭介入,裁定政府“违反了普通法规定的公平义务”。身为沃尔瑟姆斯托工党和合作党议员的斯特拉认为,如果英国政府履行议会两年前作出的承诺,有安全的地方供孩子们使用,就不会出现法院追究政治家责任的事情。此外,《卫报》还报道了一些因艾伦·科迪之死引发的其他相关难民问题,例如一对溺亡在格兰德河(Rio Grande)的难民父女。由此可见,《卫报》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焦点并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要提及的是,在《卫报》有关艾伦·科迪的报道中,还有关于如何正确使用照片的讨论:是应该用艾伦·科迪被泡在水里的照片,还是应该用警察将他的尸体抱走的照片。《卫报》也选择了警察将艾伦·科迪抱走的新闻照片,并且在罗伊·格林斯莱德(Roy Greenslade)文章中明确提到了“英国拒绝接收更多的难民是正确的。”<sup>[6]</sup>

阿德南·R·汗(Adnan R Khan)在《卫报》发表《艾伦·科迪的父亲谈到他的家庭悲剧:“我应该和他们一起死”》的文章,指出有人指控艾伦的父亲阿卜杜拉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利用自己的难民身份谋取私利。虽然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但这样针对艾伦父亲的猜疑还在不断产生,有其他出版物使用艾伦的形象,互联网上也在不断重新编排艾伦的照片,有批评政府不作为的,也有谴责阿卜杜拉将孩子置于危险境地的。<sup>[7]</sup>

上述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和揣测语气且互相冲突的观点,《卫报》全都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了他们的新闻网页上,供读者自己去判断和甄别。

总结《卫报》有关艾伦·科迪之死的相关报道,不难发现其对叙利亚难民事件的关注重点和态度。作为一家坚持自由主义理论并且中左翼的报刊,

《卫报》刊发的内容显得更激进和严厉,角度也更加多元,不仅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展示他者的观点。就其侧重点而言,并不完全把焦点放在艾伦·科迪家人的后续生活,而是更多地关注政府和社会对艾伦之死的态度与观点,以及由此引发的难民死亡事件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

### 三、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难民事件报道风格差异的原因分析

综合上文分析可知,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以艾伦·科迪为代表的难民事件之报道有很大差异。概而言之,德国之声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是社会责任理论,因此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更加兼顾社会责任,故而,在报道难民事件上,和《卫报》犀利的言辞不同,德国之声的报道更加偏向于对艾伦·科迪一家的动向,包括他父亲和姑姑的现状,主要是针对这个事件的后续新闻报道;新闻内容的言语表达总体上比较温和,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向性,再加上德国一直在积极地接收和安置难民,所以德国之声对难民的报道也都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卫报》坚持自由主义理论,在针对艾伦·科迪之死这个悲剧事件的报道所关注的方面更加广阔,并且和德国之声不同,其报道的言辞较为激烈,富有批判性,态度和观点上也更加多样。其中包括强烈谴责英国政府对待难民问题不作为和认为政府做得对这样观点截然相反的言论。纵观两家媒体关于难民事件的报道,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卫报》所发布的新闻,掺杂着许多政要的发言和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事件,如加拿大新自由党政府实行更加人性化的政策,新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在机场亲自迎接第一批进入加拿大的难民,而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呼吁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sup>[8]</sup>这样和政治密切挂钩的相关报道,在德国之声所能搜集到的内容中,却并没有带有明显政治因素的内容。

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难民事件报道的风格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的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的不同,以及政治倾向和国内环境的不同。

#### (一) 新闻媒体的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不同

就德国而言,其传媒历史比较复杂和独特。从普鲁士王国到德意志帝国再到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国近600年的发展过程中,德国的历史进程极大地影响着新闻传播业。报刊发展初期,德国各邦国属于政教一体,教皇和君主联系密切,然而君主在审查新闻时只起到辅助作用,教会才是主要审查

机构。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后,由于印刷品的普及,新教思想广泛传播,带来了宗教改革,皇帝在中央和地方设置审查机构,以消除新思想传播所带来的威胁。16世纪欧洲大陆的战争,使得人们对情报和信息也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德国早期的新闻媒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式出现了。<sup>[9]</sup>德国境内最为发达的报刊和印刷行业地区也是商业和政治中心城市,比如斯特拉斯堡,因为位于德法两国交界,信息经常在这里交换,纽伦堡会接受来自布拉格等东欧各地的讯息,而身为议会和展会所在的城市,政治新闻和法国、荷兰的消息会优先传递到法兰克福。19世纪德国统一后,媒介审查高度集中,其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此阶段,民众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立宪呼声不断,德意志邦联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开始尝试以立法的形式管理媒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为了保证媒体权利正式制定了宪法,结束了德意志境内长达300年的媒介审查制度,媒介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希特勒上台后,在经济、法律、行政和内容层面,纳粹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而细致的媒介审查制度,将媒体的集权化发展到了极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彻底改变了德国的局面,特别是战败以后,德国被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占领,分别建立了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媒介体系,西德实行公共和私营并存的双重广播电视体制,东德的广播电视隶属国家和统一社会党。

时至今日,德国已经统一超过30年,统一之后,一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广播电视仍实行双轨制。1986年11月4日,宪法法院对下萨克森州媒体法作出裁决,根据基本法,公共和私人广播的双轨制是可以实施的。1987年4月,双轨制被写入法律,经过广泛讨论和严格立法,德国建立了双轨制,法律认为这是一个平衡的体系,公共广播电视提供“基本供给”,私人广播电视提供“减少基本供给”<sup>[10]</sup>。

德国新闻媒体管制从审查到双轨制出现,再到双轨制被写进法律,德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权利得到了保障。正是这种双轨制的发展历史和制度,造就了德国之声能够对艾伦·科迪之死多方面报道,既体现其言论自由,又能够彰显社会责任。就英国而言,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发源地和历史悠久的传媒大国,英国既有依旧坚持自由主义理论的《卫报》,也有受到OFCOM监管的符合社会责任理论广播电视媒体。经过多年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媒体消费国,《泰晤士报》《卫报》《金融时报》在世界报坛家喻户晓,BBC更是被称为英国四大品

牌之一。英国政府对报业和广播产业各有规划,采取不同的政策。英国报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依照传统,报纸是民众获取信息、意见的重要渠道,是言论自由的载体,更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化身以及权力的监督者。英国历届政府在报业管理上淡化较为直接的行政干预,保证报纸的独立性、公正性,避免压制新闻自由。譬如,英国对报纸出版实行登记制,创办报纸和成立一般行业机构在手续上没有什么差别。英国报业的规范管理更多依靠自律体制来实现,报刊投诉委员会承担了这部分责任。报刊投诉委员会简称PPC(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是由报刊行业在1991成立的行业自律机构,专门负责受理公众对报纸报道内容的投诉,以《业务准则》为依据,协调解决投诉者和报纸之间的争端,保护新闻自由,规范新闻行业行为和道德水准、维护公众利益。除了战争等非常时期,英国政府认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自由主义新闻体制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因此政府不愿意对新闻界采取规范性的控制,仅通过法律手段,淡化行政干预。<sup>[11]</sup>

## (二) 政治倾向和国内环境的不同

从政治倾向看,英国报纸行业拥有极大的自由度,并且有着各自支持的政治党派,比如《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支持保守党的政策或主张,而《卫报》则支持工党。显而易见的政治偏向,自然就导致《卫报》会选择刊发政客如贾斯汀·特鲁多、唐纳德·特朗普关于难民的言论。同时,作为一家中左翼报社,《卫报》发表的新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旗帜鲜明地抨击英国政府的难民政策。就国内环境看,虽然英国政府对难民持积极态度,但英国民众对难民援助态度相对消极,因此,在英国国内有关难民的问题,看法迥异、态度万千,这也就导致了《卫报》在报道以艾伦·科迪之死为代表的难民事件时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甚至截然相反的声音。和《卫报》不同,德国之声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故而很少刊登表达其政治属性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负责人在公开场合表达媒体自身的政治观点。由于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德国之声发布的新闻稿件在内容上基本没有鲜明的政治言论,故而其关于难民的报道多陈述事件的本身及其密切相关的问题,多陈述事实,一般不确切表明政治态度和观点。就德国的国内环境而言,接纳难民是政府和大多数民众的共识,故而在欧洲国家中,德国属于接收难民数量较多的国家之一。正因为德国政府积极地为难民提供帮助,使得德国民众和媒体对难民相对更加包容,因

此从新闻内容上看,德国之声在艾伦·科迪之死的后续报道中一直都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向受众传达对难民问题的关切,积极承担难民问题的社会责任,表现出身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艾伦·科迪之死报道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分析这些差异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二者所处国家媒介制度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国情的不同、媒体政策的不同、政治倾向的不同等原因,导致《卫报》和德国之声所遵循的媒体理论也不一致,这也必然造成两家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时会产生风格迥异的内容,但不论如何,二者都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的新闻视角,挖掘了更多的新闻内容和价值。

#### 参考文献:

- [1] 田小惠. 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土耳其与德国的政策分野及博弈[J]. 西亚非洲,2021(2):142.
- [2] Walsh B. Alan Kurdi's Story: Behind the most heartbreaking photo of 2015 [EB/OL]. <https://time.com/4162306/alan-kurdi-syria-drowned-boy-refugee-crisis/>, 2015-12-29.
- [3] Deutsche Welle. Who finances DW? [EB/OL]. <https://www.dw.com/en/who-finances-dw/a-36767785>, 2021-08-31.
- [4] The Guardian. The Scott Trust: Values and history [EB/OL]. <https://www.theguardian.com/the-scott-trust/2015/jul/26/the-scott-trust>, 2015-07-26.

- [5] Farron T. [The Liberal Democrats]. Farron accuses Cameron of getting 'maximum headlines' from Alan Kurdi tragedy [EB/OL].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video/2015/sep/23/tim-farron-david-cameron-alan-kurdi-video>, 2015-09-23.
- [6] Greenslade R. Will the image of a lifeless boy on a beach change the refugee debate? [EB/OL].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greenslade/2015/sep/03/will-the-image-of-a-lifeless-boy-on-a-beach-change-the-refugee-debate>, 2015-09-03.
- [7] Khan A R. Alan Kurdi's father on his family tragedy: 'I should have died with them' [EB/O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dec/22/abdullah-kurdi-father-boy-on-beach-alan-refugee-tragedy>, 2015-12-22.
- [8] Kingsley P, Timur S. Stories of 2015: How Alan Kurdi's death changed the world [EB/O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dec/31/alan-kurdi-death-canada-refugee-policy-syria-boy-beach-turkey-photo>, 2015-12-13.
- [9] 吴璟薇. 德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2-3.
- [10] 李焜. 德国双轨广播电视制度研究[J]. 今传媒, 2012(2):77-78.
- [11] 唐亚明, 王凌洁. 英国传媒体制[M].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1-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An Analysis of the Style of *The Guardian* and Deutsche Welle's Coverage of Refugee Events

—Take the Death of Alan Cody as an Example

HU Bowen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Australia)

**Abstract:** The death of Alan Kurdi, a three-year-old Syrian boy,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events of the refugee crisis in 2015. The British newspaper *The Guardian* and Deutsche Welle presented different styles of reporting on Alan Kurdi's death, mainly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different histories of news media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s, different political tendencies and domestic social environments in the UK and Germany.

**Key words:** *The Guardian*; Deutsche Welle; reporting style; Alan Kurdi

# 经济新业态的法律规制

——以饭圈失范现象为例

田依蒂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摘要:**饭圈失范是粉丝经济乱象的表象,具体表现为“控评”“撕黑”、滥用举报、诱导消费、过度消费、数据造假与账目造假等,实质是资本追逐经济利益的失控。“唯流量论”的市场价值判断标准造成娱乐文化产业的异变与畸形,也逐渐渗透到政治与社会事件等公共领域,更是裹挟着互联网用户参与到非理性的群体性行动之中。饭圈失范反映了新业态法律规制有效性的严重不足,对于互联网新业态中的违法违规行爲,政府应以监管者身份积极实施微观规制,依法依规对数字经济新业态进行适度限制。规范粉丝经济的交易秩序,需要引导与监管“双管齐下”,多方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提升用户自律、引导行业自律、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提高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

**关键词:**经济新业态;饭圈失范;市场失灵;法律规制;监管责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3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72-07

## 一、饭圈失范的外在表现

“饭圈”一词起源于日本、韩国的偶像应援文化,是粉丝群体的概括性称谓。饭圈文化进入中国以来,被认为是狂热追星、非理性行为的代名词,重金打榜、刷流量、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既不利于娱乐产业的长效发展,也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中央网信办于2021年6月15日开启“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饭圈”诱导消费、攀比炫富、谩骂造谣、刷量控评、干扰舆论等行为。

### (一)反黑机制与滥用举报

饭圈粉丝广泛使用的网络平台包括微博、豆瓣、知乎、微信等社交平台和抖音、快手与哔哩哔哩为代表的视频创作平台,以及“超级星饭团”“爱豆”“桃叭”等粉丝追星应援软件。饭圈失范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越发严重,一方面互联网空间提供了开放、互动、平等的表达空间,另一方面其匿名性和虚拟性也造成未成年人话语责任缺失,青少年涉嫌演艺公众人物名誉侵权案件屡见不鲜。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

的《“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损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超半数发生在微博、豆瓣、微信等社交平台,这些平台是粉丝社群的主要聚集地,超大型社交网络平台的用户数量庞大、发言活跃度高,舆论事件易受关注,容易引发群体性侵权事件。饭圈的“唯偶像正义论”导致不能接受任何批评、质疑的声音,在以偶像为中心的信息茧房中,对异议的接受度很低。粉丝通过控评、举报、侮辱、诽谤等攻击方式维护偶像相关话题热度,“保护”己方明星,不惜逾越法律底线。

2018年初,某说唱歌手的粉丝举报“紫光阁”用地沟油,甚至不惜以买热搜的方式让更多用户关注到“紫光阁”大酒店使用地沟油事件。而这起荒谬的举报事件的起因是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社官方微博连发三条微博点名批评该歌手,指责其发布的歌曲教唆青少年吸毒与公开侮辱妇女,由此引发其粉丝通过微博举报方式发起舆论攻击。2020年初,某流量明星的粉丝举报AO3平台引发热议,举报原因是AO3平台上的一篇同人

收稿日期:2022-04-17

作者简介:田依蒂(1993—),女,陕西西安人,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文(以该明星为原型)涉及未成年人性行为和嫖娼等敏感话题且在微博平台传播较广。2020年底,某脱口秀演员的一场演出内容被举报,举报者指责其“多次辱骂全体男性宣扬仇恨,煽动群众内部矛盾,制造性别对立”。被举报事件因为真实性、违法性的显著差异,影响力截然不同,但是近年来越来越泛滥的网络平台举报值得关注与反思。互联网平台设立的举报机制使得用户举报成本大大降低,饭圈粉丝逐渐学会了借助网信办、扫黄打非机构等公权力监管渠道实现目标打击。<sup>[1]</sup> 举报机制被滥用,削减了用户共同维护网络秩序的公共价值,削弱了网络内容治理的效果。

## (二) 诱导消费与过度消费

在“流量为王”的娱乐产业中,新浪微博通过设置热搜榜、排名榜、明星势力榜、超话排行榜等方式变相鼓励粉丝刷数据、刷流量。品牌方根据流量评估明星的商业价值,影视剧制作人有意选择流量明星提升收视率和票房,“流量至上”的评价标准加剧了饭圈的疯狂。特别是在选秀类节目中,节目制作方在多个商业平台上设置排名榜、扑通榜、发电榜等榜单,鼓动消费,联合赞助企业设置花样繁多的选票形式,变相买卖投票权,让选秀变质为精准营销“割韭菜”的商业合谋。饭圈常以消费金额比拼对偶像的忠诚度,向广告商、投资人等所谓“金主”证明偶像的带货能力、流量变现能力,提高偶像的商业价值,美其名曰“为爱发电”。“虐粉”是扩大“粉圈”规模的常用手段,通过塑造“受难一殉道”的叙事,触动共鸣,让粉丝产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积极参与应援。未成年人在没有建立基本的金钱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时,饭圈的话语模式鼓动着低龄粉丝参与打投、插旗、做数据等各式各样的资金与精力投入。

在一档由爱奇艺运营的选秀节目中,粉丝为获得包装瓶上的投票码来追星,成箱的牛奶被倒掉,产品的消费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是取得决定节目中练习生成员出道成为偶像团队成员的投票权。这种起源于日本 AKB48 的商业模式带来整个偶像工业发展模式的变化,向粉丝贩售影响偶像的权利也成为饭圈行动逻辑的核心。在资本的引导和粉丝的自我满足的想象中,消费是互动的一种方式。粉丝经济中的商品不再是一般的使用价值决定价值,而是符号消费(虚拟性满足)的载体。粉丝购买偶像周边的产品,是一种情感消费,为了符号价值自愿支付远超过产品本身价值的对价。

## (三) 数据造假与账目作假

2019年6月,“星援 App”被查封,花钱打榜刷

数据的行为被严厉打击。这款饭圈内被广泛使用的 App 主要用于短时间内提高评论量、转发量、点赞量,也被称为“轮博”,粉丝在软件客户端充值开通会员从而绑定大量微博小号,实现转发量翻倍,最终形成流量造假的生产链。虽然公安部的“净网 2019”专项行动让多个轮博 App 下架,但是流量造假、操纵账号等违法活动仍然在饭圈盛行。流量等同于用户和消费者,代表着巨额的经济价值,因此“刷流量”的行为屡禁不止。网络服务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制造虚假信息,刷流量造假是以不正当竞争方式扰乱经济秩序,情节严重者构成违法犯罪。

在 2021 年一档名为《青春有你 3》的选秀节目中,某热门选手的后援会因为数据没有达到目标而宣布“惩罚”粉丝,原本基于民事主体间自愿集结的类似社团的后援会却试图对成员实施处罚的权力。同期的《创造营 2021》节目中某未出道选手的粉丝声称要起诉官方后援会,认为集资款项与后援会出示的使用明细不一致,存在作假的可能。由此可见,饭圈集资打投现象已经失控。为此,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严禁节目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实际上在 2020 年 2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发布了《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禁止节目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但是 2021 年的选秀节目仅仅是用“助力”“撑腰”等说法替换了“投票”,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无疑说明监管只有形式上的机械约束效果,未能对后续违规商业行为及时干预、处置。

## 二、饭圈乱象的结构性原因

以偶像为招牌的商业模式原本是粉丝与各类商业平台之间作为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自愿交易,由于存在追星低龄化、心智尚不成熟的诱因,而且娱乐公司与赞助企业利用粉丝对偶像的一腔热忱和消费冲动,扭曲了演艺行业应有的价值。企业故意引导粉丝做数据、打投、过度消费,公共人物的社会价值被扭曲,变成一场消费主义的狂欢。饭圈失范的结构性原因在于饭圈的本质是资本逻辑,在情感价值的包装下是围绕数据、流量的利益之争。在“流量 = 收益”的商业逻辑之下,注意力经济和平台经济合力建构“流量至上”的理念与规则,从而进一步加剧饭圈失范。饭圈失范的外在表象是粉丝的非理性行为,内在原因却是资本利用饭圈粉丝组织结构特殊性,与互联网平台合谋共同造成粉丝经济、偶像市场的失控。

### (一) 粉丝经济的不竭动力:流量即价值

传统垄断性娱乐体系中,粉丝是商业和媒介选

辑下的被动消费者,但是在网络时代,粉丝有能力主动参与到塑造明星的过程中。饭圈高效的组织能力让集聚效应成为可能,倒逼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加速孵化一个明星的诞生与成名。粉丝的购买力、消费能力、影响力成为衡量明星或偶像商业价值的标准,“唯流量论”的商业模式成为娱乐产业快速攫取收益的共同取向。饭圈乱象集中于偶像产业,偶像经济由经纪公司、广告商/品牌商、渠道平台商以及相关运营服务提供者、内容制作者作为偶像产品的供应者,粉丝作为偶像产品的消费者,通过建立与加强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纽带,以流量为考量标准的艺人影响力得以扩大,偶像的商业价值得以提升,为品牌和渠道带来经济效益。

商业利益是“饭圈”兴起的主要动因,“流量变现”是注意力经济和平台经济合谋的动力。受日本造星文化和韩国应援文化的双重影响,内地娱乐产业链逐渐异化,明星不再仰赖实力与作品证明商业价值,而是依靠粉丝数量和营销影响力进行资本角逐。能力与作品决定商业价值的市场标准被饭圈文化消解,转而由粉丝的消费潜力决定偶像的商业价值,电视、电影等作品制片方选择演员时也受“粉丝=收视率”“粉丝=票房号召力”的影响,青睐粉丝数量多、话题度高的偶像明星。粉丝社群成为联结偶像、粉丝、经纪公司、营销号、消费者、品牌企业等主体的商业平台,新兴的社群经济将粉丝的消费力、传播力及生产力都纳入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造星的目的就是不断挖掘作为消费者的粉丝的购买力,持续以新的供给方式并满足需求,从而获利。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产品具有零边际特征,数量上可以无限供应,“刷榜式”消费与攀比消费也成为粉丝消费的独特现象。特别是在“养成偶像”这一造星理念之下,让粉丝与偶像产生亲密的情感联结的同时,越多的情感投入和精力付出更加容易导致过度的消费,也助长了粉丝们的偷窥欲。由此引发了饭圈中一类极端形式——私生饭,他们违法获取明星个人信息及行踪信息,在机场违法违规追星、跟踪明星,甚至闯入明星的酒店和住宅,多数行为已经构成违法犯罪。

## (二)饭圈粉丝的双重角色:消费者与生产者

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消费中的“浪费”成分逐渐被社会接纳而获得了合法性,超越生活必需的与兴趣爱好、闲暇生活有关的消费成为一种新兴趋势。娱乐产业通过赋予偶像符号化的意义吸引粉丝,粉丝作为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性需求转向符号的价值差异需求,通过关系消费获得情感满足和身份认同。

以养成系偶像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式,改变了原有的消费模式,粉丝购买产品并主动生产偶像相关的衍生品,消费的目标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个理想化偶像的发展前景。偶像满足粉丝的亲密想象比唱歌跳舞表演等才能更为重要,是偶像工业真正售卖的商品。偶像产业的投资者除了直接销售歌曲专辑、演唱会、音乐节门票等直接方式获取经济利益,还通过商品代言、排名榜单、投票竞拍等间接方式兜售偶像的影响力,转化成为偶像的商业价值。娱乐产业性质发生了变化,粉丝经济成为造就偶像的关键要素,粉丝成为造星的第三权力。粉丝运营产业链的最初是粉丝自发、松散的组织,主动为喜爱的偶像、IP<sup>①</sup>等提供流量,而后演变成经纪公司、品牌方、广告商、渠道运营商等商业主体合流,共同参与到制造流量的过程中,实现用户付费的转化。随着选秀节目增多,投资商利用选秀粉丝忠诚度的消费方式也越发多样,“打榜”“投票”“插旗”等各式个人集资活动高达数千万元,关注度高的节目的集资总金额甚至达到上亿元。后援会是饭圈粉丝中一类典型的组织形式,作为粉丝自发形成的非营利性组织,通过集资掌握了巨额资金。集资金额与投票数不一致、卷款跑路的情况时常发生,但是网络组织的不透明、不公开让始作俑者的真实身份隐匿于网线之后,粉丝不易举证,难以追责。集资本质上是赠与,所附条件是用于投票或者购买应援物品等,但是这类特殊的吸纳资金活动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款约束,也没有审核监管的渠道,交易模式极不稳定且缺乏制约。

粉丝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网络时代的粉丝参与到文化工业体系的偶像制造过程,同时承担着偶像经营推广者的任务。这种双重角色复合下的生活关系,辨别其中的法律关系显得尤为艰难。体验式消费时代已经到来,新一代消费客体是参与感。饭圈粉丝饭偶像的关键是互动,消费的是与偶像同在的参与感和沉浸感,同时偶像的语言表达与行为举止也对粉丝特别是未成年人产生示范效应。粉丝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制造流量和扩大消费规模,为偶像获取发展资源。粉丝既是产品的消费者,也是同一产品的生产者,粉丝经济收益的占有者以“免费的爱一文不值”“爱他就要为他花钱”“你一票,我一票,某某明天就出道”等营销话术将消费与生产等同。粉丝从纯粹的商品消费者转型为商品价值的再生产者,实际上成为明星投资公司的免费雇工,承担了本应由偶像明星所属公司花费的营销成本。

## (三)市场调节失灵:资本合谋与平台失责

古往今来,对偶像的崇拜一直存在,但是以社交



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让粉丝能够迅速聚集成一个群体,甚至占据“制造明星”的主动地位。与个人自发的追星行动相比,“饭圈”的组织结构严密,具有相当体量的粉丝团体就能演变出网宣组、数据组、反黑组、控评组、文案组等职能分工小组。饭圈是“偶像—粉丝”关系在数字时代特有的表现形式,从分散式的个人追星演变成为社群式的集体追星,粉丝群体形成了明确的劳动分工、科层式的管理结构、统一的行为守则等特征。粉丝对偶像的喜爱,一方面是实现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是在同好粉丝中寻找群体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让粉丝团体更加亲密,组织具有高度黏性。日复一日签到、打榜、投票、接机等集体行动强化了服从意志,参与者失去自我意志和判断能力,极易被群体情绪激发参与到骂战,特别是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鼓动。新媒体时代的粉丝通过操控流量数据等方式完成意见表达,形成与明星相互依赖的拟态亲密关系。<sup>[2]</sup>饭圈目标一致,成员黏性高,在线上线下一体化、扁平化的组织模式下,具备快速有力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饭圈建立了集体的规则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时拥有一定的资金运作能力。这种合作性、聚集性很强的群体行为,一方面是粉丝经济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因部分不理智粉丝实施群体性攻击行为而极具争议性。

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微博建构起以数据生产和流量为核心的规则体系,成为主宰饭圈形成与发展的互联网平台。粉丝主动参与数据生产活动,微博利用明星势力榜、超话排名、热搜榜等功能不断刺激粉丝进行持续性劳动,而流量带来的巨额收益却被经纪公司、品牌方、营销公司和平台公司等利益集团所掌握。微博被主管部门多次整顿后,仍然想方设法利用流量规则和收费项目维持“流量至上”的资本逻辑。互联网平台是企业创造盈利的技术工具,原型仅具备纯粹的商业属性,借由平台形成多种商业交易模式获得利润。但是平台掌握着数字时代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源——数据,由此承载了海量用户的平台不仅成为公共意见交换的场所,也自动生成具有经济价值的“财富密码”——流量。平台不仅控制着流量生产与流通的场所,更是掌握着流量定价的标准。平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比起维护互联网文明生态环境,更加热衷于最大程度地激发更多的用户成为流量生产者。因此反黑、控评、拉踩等能够快速拉动流量增长的饭圈行动反而得到了平台的默许与放任,平台甚至有意扶持营销号跟风炒作、鼓动饭圈“战争”,从而带来可观流量。

自2010年起,数字赋能让偶像泛化的趋势越发明显,科技、游戏、体育等领域被粉丝文化席卷,“饭圈逻辑”逐渐渗透入社会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流量思维已经逸出娱乐行业领域,互联网用户潜移默化受到“流量即正义”思维的影响,对政治活动和社会事件同样采用控评、骂战、上热搜等方式参与其中,极易造成网暴式煽动和群体对立。流量操控社会治理的方式隐蔽而影响深远,而立法与监管却未能跟上。以逐利为市场的市场主体缺乏自我规制的自觉性,缺乏自我约束和外在管制的市场野蛮生长,导致社会失范。

#### (四) 监管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

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与微观规制集中于经济法领域,法律制度在此领域将保护消费者、劳动者的主要责任施加于生产者、经营者,调整具有利益关系的行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促成双方信息对称、力量均衡。粉丝经济改变了经济学上对消费者“一般理性人”的假设,粉丝消费非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此建构的经济法无所适从,给法律规制带来巨大挑战。“一般理性人”假设的错配引发严重的市场失灵,粉丝劳动的剩余价值被掠夺。为避免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以往政府调节粉丝经济的措施集中于事后监管环节。饭圈乱象“久治不愈”的现状表明现有法律规制的力度不足、公共部门对粉丝经济干预的滞后,事后监管型法律规制未能起到恢复市场正常秩序的作用。

数字时代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交易主体和交易标的认知,所以粉丝经济消费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欺诈问题呈现出新的样态。粉丝购买门票和有形产品等营利模式受传统规制约束,但是主动为偶像做数据、赠送礼物、打赏、集资等行为难以认定交易主体与受益人。情感因素给粉丝经济带来超额利润,但是粉丝经济运营的标——“人设”是无形的,这种兼具“人格商品化”与“商品人格化”特征的产品脱离了传统法律规制框架。<sup>[3]</sup>“人设”是粉丝消费的主要动因,相关欺诈、不诚信的行为违背了交易目的,却无法受到法律约束。在粉丝经济发展初期,法律法规很难渗透到粉丝产业链条中,因为这种新兴交易关系很难在现行法律中找到合适的定位。随着粉丝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以饭圈偶像相关的高溢价产品为典型代表的粉丝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平台垄断、交易不透明等问题导致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消费者权益受损,长此以往造成粉丝经济消费市场秩序的混乱。

网络内容的法律规制以管控负面信息为传统方



式,但是这一消极处理方式不仅无法制止饭圈粉丝无限制的“反黑”“撕黑”“控评”的行为,甚至被饭圈粉丝“俘虏”后成为举报对家(与自家偶像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偶像)粉丝、路人(没有偶像偏好的一般用户)账号的手段。此外,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技术上的短板,政府难以运用数据技术进行及时干预、降低影响。目前关于粉丝经济与偶像市场的法律政策开始逐步调整原有的规制范围,将平台的内部规则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将平台治理作为法律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者介入平台企业的规则制定与适用过程,要求相关主体从事前预防到事后处理积极作为,系统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粉丝经济交易秩序与公共网络秩序。

### 三、饭圈失范的法律规制

饭圈乱象的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传统政府监管的单向治理模式难以应对突发的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迅速扩散的不良网络内容、隐蔽的数据造假等问题。为了应对网络内容生产社会化、平台化的倾向,纠偏饭圈粉丝的非理性行为,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公共部门需要共同参与到饭圈乱象的治理过程。

#### (一)政府规制以包容审慎为原则

粉丝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具有自身特殊性,是互联网新业态的一类新现象。粉丝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其生产者身份不断增强,由粉丝构成的社群本身也成为粉丝经济中的产品之一,由此粉丝社群作为商业平台的功能不断扩大。消费一般被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定的消费者概念是以生活消费需要为前提,而以欣赏、享受、情感满足、身份认同为需要的符号消费,是对商品和服务概念外延的延伸。对偶像产业和粉丝经济的法律规制不仅出于经济性动因,还有非经济性动机。饭圈的组织能力、动员效果与技术手段展现了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可能性,为解决应急管理、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具体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要看到偶像在公益引导方面发挥着作用,偶像作为极具号召力的公众人物,其正向引导作用不可小觑。对于符合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新事物,需要给予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是对于明显违背公序良俗、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行为,则必须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

对于新兴产业不宜设置严格的监管条款,但是示范引导的规则不应缺位。非理性消费、数据至上的娱乐产业的误导性理念需要被纠正,隐藏在饭圈粉丝背后的具有诱导消费的主观恶意的组织、平台

需要由法律规范予以约束。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严厉打击数据造假、虚构流量、恶意炒作、无脑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正当的营销和传播方式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而且造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评价标准的失衡,需要出台专项法律法规规范流量市场秩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加强本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网络群组、论坛社区版块建立者和管理者履行管理责任,初步形成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的规则体系。但是对于饭圈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效果有限,下一步可以提出形成规范“饭圈”管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强化明星经纪公司、粉丝团体的规范管理。2021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体现了公共部门与网络平台合作治理的方式,各地网信办指导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把内容导向、规范信息呈现、加强账号管理、强化舆情监测处置,以采用联合惩戒措施、追究连带责任等方式降低平台违规操作的可能性。自“清朗”行动开展以来,平台直接处理违规的个人账号,关闭、解散饭圈粉丝活跃的讨论组与话题,减少文娱类微博热搜,清除负面有害信息,取消比拼类榜单,要求综艺节目排查违规情况,涉及粉丝集资的程序应用下架整改,在减少八卦消息和网络谣言传播、遏制粉丝消费集资等方面成效显著。

#### (二)引导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的合法性基础是成员之间的契约、行业惯例或者共同利益趋向,关注的是行业道德、行业信任与行业信誉。行业协会具备充分了解行业内部信息、协调协会成员利益关系、制定共同行为准则的能力,通过行业协会形成行业自律机制是延长政府监管“射程”的有效方式。如果行业协会能够发挥治理作用,实现自我纠正,那么就不必动用政府监管工具,可以降低公共规制成本。特别是新业态之下,互联网产业扩张迅速而政府监管资源有限,以行政审批和专项整顿为主的规制手段难以形成对互联网经济的长效治理,走向公私合作治理势在必行。例如以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为代表的行业协会在参与网络生态环境治理和营造健康的文娱行业生态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于2001年,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协会关于抵制非法网络公关行

为的自律公约》等数十部自律公约和倡议书,审查通过了《面向网络内容的未成年人不适宜提醒测评指南》《网络游戏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数据安全治理能力评估方法》等团体标准,通过制定自律公约和团体标准规范行业行为。虽然协会成立多年,并设立了“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接受公众投诉举报,但是对会员单位缺乏违规惩处方面的规定。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相比,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年在自律惩戒方面出台的规定更具强制性和威慑力,协会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法规规定,发起了《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制定了《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2021 年 11 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开了一份警示名单,将郭某蓓等 88 名违法违规主播及违法失德艺人列入警示名单,要求各网络音视频平台及经纪机构会员企业在警示期限内不得为其提供各类网络直播服务。中国互联网协会的自律机制因缺乏外在制裁手段而规制效果有限,但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告对违规失德艺人及主播实施长期行业禁入的禁令也引发了争议。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行业协会的性质、法律地位、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的规范,行业协会类社会团体由主管单位负责管理业务,行业协会自律惩戒措施由协会章程和行业自律性文件规定。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行业自律是在法律之上对公众人物附加更高的道德要求,批评教育、行业联合抵制等自律措施同时具有声誉惩戒目的。在信息时代,声誉机制不仅对企业有显著的约束效果,也对公众人物回归社会生活具有直接影响,因此自律惩戒需要建立标准细化的自律公约、独立有效的决策规则和监督申诉机制。

### (三) 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

饭圈粉丝的特殊性在于由官方后援会、数据组等职业粉丝构成了等级明确的类集权体制,对忠诚、服从和战斗性的强调形成了更具凝聚力和参与感的共同体模式,由此塑造了粉丝社群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在一场又一场以偶像为名的数据战争和集资战争中,饭圈粉丝已经不单是零散的同好社团,而是具有低成本与高效率的最优特征的社会共同体。饭圈的组织与参与高度依赖网络平台,特别是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微博的榜单机制在流量经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腾讯、爱奇艺、优酷等选秀类节目将饭圈经济发挥到极致,这些主要的网络平台公司在规范饭圈行为、引导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是平台举报的门槛较低,

导致大量不合理的被举报对象被下架、删除;另一方面是平台纵容粉丝群体间的“撕黑”、骂战。饭圈粉丝不受限制地参与“撕黑”与“反撕黑”,导致网络公共空间充斥着言辞激烈的侮辱性发言和诽谤谣言。营销号和职业黑粉更是无事生非、煽风点火,专门匿名编造谣言,挑起争端,为了流量和点击率不择手段。平台既是规则制定者,也是不良秩序的纵容者,默许网络暴力乃至违法违规行,甚至充当“保护伞”。<sup>[4]</sup>网络平台利用公共资源获益,承担着维护公共秩序的义务,对于不当言论的扩散、恶意营销、水军刷流量等行为有责任采取有效的管控手段。互联网公司履行监管职责意味着企业享有网络服务管理的权限,同时也承担着直接管理网络公共事务的义务,但是政府保留了对企业的监管权,这种“政企发包”模式是行政机关基于资源技术和产权安排因素的理性选择。<sup>[5]</sup>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虽然传统的行政法规制措施尚不能应对网络技术迭代发展下的平台治理需要,但是应当要求互联网平台主动承担起审查义务,采取技术手段预防法律风险。

首先,微博、豆瓣等大型互联网环境作为网络生态的守门人,应当加强监管责任,完善网络用户信息审核和内容发布机制审查,加大对营销号、网络水军等数据造假可疑主体的监测与审查。网站平台应当进一步完善社区规则和用户公约,引导用户共建文明追星环境。其次,网络平台对于控评、骂战以及鼓动消费等群体性粉丝行为,可以运用删除、屏蔽、暂停账号使用等技术手段,及时干预,遏制不良风气的扩大,预防易受鼓动的未成年人被裹进侵犯他人隐私或名誉的网络狂热之中。平台为吸引流量,放任人身攻击、造谣诽谤等现象,甚至主动创造词条加剧恶意话题的热度,应当由主管部门设置惩戒机制,纠正“流量至上”的价值取向。互联网平台作为公众意见发表的平台,有责任引导正确的价值导向,不因封闭的消声处理使得举报功能被有意滥用。最后,在粉丝集资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对集资发起人的资质审查,对于匿名个人发起集资活动严加审核与过程监督。特别是后援会通过桃叭、摩点和 Owhat 等平台集资,粉丝集资已经成为常态。饭圈集资所涉资金规模较大,依赖发起人自律不足以防范资金风险。平台应当尽到监管职责,完善集资过程的透明性、真实性保障机制,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和后续的保障义务。对于集资中巨额资金去向不明的问题,应当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防范高额集资行为的隐性风险。粉丝集资目前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但是集资发起人

违反捐赠条件时,应当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诈骗罪或者侵占罪等刑事犯罪。

#### 四、结语

饭圈失范的表象是话语权垄断、过度消费与数据造假等非理性粉丝行为,其深层原因却在于商业与娱乐资本掌控数据权力、操纵市场规则,利用消费主义理念和身份认同心理将人作为数据生产的工具,已然超出了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与限制。饭圈失范的法律规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事前准入阶段,由平台设立准入门槛,由行业协会出台行为准则,约束偶像、经纪公司及相关利益主体的过度营销、改变对粉丝劳动的剥削行为、提高偶像的正面宣传作用;在事中过程监管阶段,平台通过账号管理和大数据实时监测筛查营销信息和造谣信息,降低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的影响;在事后违规处罚阶段,平台应及时处置违规账号和行为并对违规情况予以反馈说明,国家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强制力约束,必要时追究其民事、行政、刑事责任。饭圈失范现象的扩大与失控说明国家治理能力应对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不足与缺位,需要加强对享有规则制定权的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引导互

联网新业态规范、有序发展。

#### 注释:

①IP即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的缩写,包括游戏IP、网络小说IP、电影IP、动漫IP、综艺IP等。

#### 参考文献:

- [1]张世超,胡岑岑.粉丝、平台、资本与国家:多元互动视角下的饭圈反黑及其治理[J].学习与实践,2021(7):132-140.
- [2]李昱雯.明星流量造假:粉丝主导的不良互动模式与转型路径[J].新媒体研究,2019(8):78-82.
- [3]王首杰.粉丝经济的法律规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3):93-105.
- [4]半月谈评论员.撕与黑:起底“饭圈”职业黑粉产业[J].半月谈,2020(1):5-6.
- [5]于洋,马婷婷.政企发包:双重约束下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基于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8(3):117-128,15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Legal Regulation of New Economic Forms

——Take the Fandom Anomie as an Example

TIAN Yifei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Law,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Shaanxi 710122, China)

**Abstract:** The fandom anomie is the appearance of chaos of fans economy, which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controlling comments, striking back anti-fans, abusing reporting, inducing consumption, excessive consumption and fake data and accounts. In essence, it is the uncontrolled pursuit of economic interests by capital. The commercial value judgment standard of “excessive focus on clout” has caused changes and deformities of the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e industry, and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public fields such as political and social events. It also coerces Internet users to participate in irrational group actions. The anomie of the fandom reflects the serious lack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form. For the illegal acts in the new business form of the Internet, the law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micro regulation as a regulator. To standardize the trading order of fan economy, we need to resort to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simultaneously as a two-pronged approach, with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improve user self-discipline, guide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strengthen the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y of network platform, and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network governance ability.

**Key words:** new economic form; fandom anomie; market failure; legal regulation;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y

# 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

## ——基于数据产权立法的策略

邱国侠, 范美云

(合肥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当前社会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新型生产要素,同时也成为以其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平台企业相互竞争的重要资源。一些大型平台企业在数据竞争市场中逐渐呈现出垄断的特征,以算法共谋为典型特征的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以及滥用市场地位的现象层出不穷,既是对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也是对消费者福利的消解。平台企业的垄断肇因在于数据产权立法的缺失,对数据产权的界定不清导致数据成为平台企业的私有财产,由此引发垄断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对当前平台企业的垄断现状的认知以及数据产权的界定的基础上,从数据产权立法策略出发,厘清数据产权归属,寻求构建完善、规范明晰、科学高效、公平正义的数据产权法律体系,以期对当前平台反垄断有所裨益。

**关键词:**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数据产权;反垄断规制;立法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4

**中图分类号:**D91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79-07

###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成为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个体的数据信息已经不仅仅是含有人格意义的身份信息,来源于用户的简单、零散的海量数据经过大数据算法的收集、分析一跃成为极具有经济价值的生产要素。平台企业便是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并依托于平台进行资源配置的新型经济组织,其通过利用大数据算法技术将其拥有的用户数据用于经营从而迅速实现其盈利目标。平台经济的出现为经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了资源配置方式,在深受疫情影响的当下,平台企业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然而,对数据的商业性适用也产生了垄断的负外部性,拥有海量数据实际控制权的平台企业凭借其自身巨大的数据优势,通过算法共谋的方式签订垄断协议、通过合并、收购等方式进行数据集中、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数据垄断的现象屡见不鲜。垄断导致的数据壁垒已经成为当前严重妨碍数据要素市场健康运行的消极因素。

平台企业垄断性特征的出现,一方面与资本固有的无序竞争的本质相关,另一方面在于对数据要素资源欠缺系统有效的规制。当前,数据的财产性价值属性及其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得到国家政策层面上的确认。但当前我国对数据资源的配置及数据产权的界定尚不明确,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数据产权法律规范体系。作为一种新型财产权利,未能明确数据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归属,因此本文认为数据产权在法律规范上的缺憾是导致当前平台企业垄断消减用户福利乱象的根本动因。为此,从数据产权立法的策略出发有助于探讨出一条规制平台企业垄断的有益进路。

### 二、平台经济与垄断现状

我国迎来数字经济的发展热潮,各类互联网平台得到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的统计,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718.7亿元,同比增长16%,增幅领跑全球数据市场。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8.6%,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增

收稿日期:2022-06-03

作者简介:邱国侠(1971—),女,安徽淮南人,博士,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

速为9.7%。庞大的经济体量已成为领跑我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依托数字技术及数据生产要素的平台企业所显露出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超越传统企业,我国平台企业中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

### (一) 平台经济及其特征

大数据平台企业是一种通过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来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型企业组织。伴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其日益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无序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由此带来了市场垄断。平台企业作为一种新兴经济组织形式,其本身具有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独有特征。

其一,平台经济具有规模性特征。平台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具有无限大的规模,作为一个人口十四亿多的国家,我国平台经济具有无限大的发展潜力,平台型企业的运作模式是采用轻资产运作,这个特点一方面使得平台经济的进入门槛较低,另一方面使得平台型企业容易进行业务扩张。经营模式的作用机理不受外在经营条件的限制,其通过不断扩大规模以消解边际成本使其无限趋近于0,从而在规模上得到不断扩张。此外,开放包容的平台属性,能够容纳无限多的用户群体,通过用户得到用户的经营模式,使其不断做大市场规模,最大限度摆脱成本约束,获得大量收益。

其二,平台经济具有交叉网络效应。平台经济市场中的直接参与者为平台企业、商户、消费者三方,其中,商户及消费者均为平台的用户,平台企业的一端连接商户,另一端连接消费者。随着商户的入驻数量的增加,平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更具有价格竞争力,因此,一部分消费者也会被吸引过来,同样通过商户及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交易,平台企业商户入驻量又会随之增长,在平台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吸引中,平台企业得以发展。

其三,平台企业生产资料的非实体性。平台企业是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新经济形态,不同于传统企业所需的生产设备、场地等实体性生产资料,平台企业的前期投入相对较小,从运行模式来看,平台企业并不直接涉及交易,而是充当商户与消费者之间交易的桥梁。

### (二) 平台经济的垄断——数据垄断的逻辑解释

平台企业是一种具有网络效应的经济组织体,其通过用户量的增加以实现价值的增长目的,拥有大量用户的平台企业的边际成本被无限压缩,大量的数据资源聚集在少数平台企业手中,导致了平台

经济市场中的“马太效应”和“赢者通吃”的局面,从而在平台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垄断形式,即数据垄断。数据垄断主要体现在: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个方面。

#### 1. 算法共谋下的平台垄断协议

数字经济时代,算法共谋成为互联网平台的新垄断协议适用场景,“经营者更倾向于借助算法黑箱的内部代码和沟通过程的隐蔽性达成垄断协议”<sup>[1]</sup>。数据驱动的算法可以做到实时监测市场中竞争对手的价格变动,并据此调整自身的商品定价,导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由阿里尔·扎拉奇提出的算法共谋理论将算法共谋主要划分为四种:信使类共谋、轴辐类共谋、预测类共谋及自主类共谋。信使类算法共谋被认为是平台经营者通过算法达成横向垄断协议从而实现限制竞争市场的目的,经营者往往具有强烈、特定的共谋意图,算法实质上是经营者之间达成垄断协议充当“信使”的功能性角色,通过算法执行,经营者可以消解明示场景下带来的风险。轴辐类算法共谋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場情景下,“多个经营者之间利用算法形成共识,达成纵向合谋,然后根据平行式算法的反馈和决策自动化机制,对协议价格作出市场反应自动决策多个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定价策略,从而达成横向共谋”<sup>[2]</sup>。轴辐类的算法合谋中,由轴心经营者(hub)与轮缘经营者(spoke)组成,通过辐条的连接而形成一个封闭的车轮状,通过横向、纵向垄断协议达到封闭市场排除竞争的目的。预测类算法共谋是由算法取代传统的企业管理者,经营者之间的算法可以实现自动预测市场变化,监督市场价格并发出信号以实现不同经营者达成共识。算法的应用使得经营者之间实现远程的价格协商,垄断协议的达成更具有隐蔽性。自主类算法共谋是由算法进行自我学习,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从而形成自主意识,实现自我决策和自主定价。在自主类算法共谋中,几乎不需要经营者的参与,一切共谋的产生均来源于算法自身的决策网络,其运行的整个过程构成了一个为人们所不易察觉的“黑箱”,具有很强的人为不可控性,因此,一旦发生自主类算法共谋对于市场的破坏将会是极其巨大的。

#### 2. 平台经营者数据集中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和流量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估计的,由于平台企业的网络外部性特征,现行进入市场的平台通过用户量的积累成为超级平台,其将不可避免地在市场经营中采取兼并、收购的手段打压、排挤中小型的初创企业以占据更大的市

场份额。与传统企业有所区别,平台企业的扩张主要通过横向并购同类企业。当前我国的大型平台企业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进行企业并购事件屡见不鲜。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2021年,阿里巴巴的投资并购数量共43起;百度的投资及并购事件共59起;腾讯的投资并购事件共293起。

经营者集中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数据的集中,经营者之间以合并、控股等方式进行集中以获得更加完整的数据资源,其规模的扩大,催生出平台经济领域的范围经济,其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形成绝对的数据权力奠定了规模基础。由经营者集中带来的数据集中,导致同类竞争企业获取相关数据的难度加大,从而阻碍市场竞争。此外,经营者集中带来的数据集中,也为优势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埋下了祸根。

### 3. 数据寡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sup>[3]</sup>。因此,数据成为众多平台企业争夺的关键生产要素,在实践中,一些大型的平台企业掌握了绝大部分有价值的用户数据,它们拥有绝对的数据集中优势,在大数据市场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凭借着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制造数据壁垒,形成了数据垄断。在当今的大数据市场中,数据垄断已成为常态化现象,数据寡头则往往滥用市场中其数据垄断威权下的支配地位。

由中国人民大学孟小峰教授团队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隐私风险指数分析报告》在对3000万真实用户数据和约30万App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2019年度总体隐私较2018年增长26.66%,数据垄断态势高居不下,10%的权限数据收集者可获取99%的权限数据。数据垄断伴随的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在实践中也得到体现。在“德国facebook”案中,德国反垄断机构认定facebook在未经用户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应用程序收集用户数据的行为构成了剥夺性滥用,最终在反垄断调查中被处以10万欧元的罚款。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阿里巴巴“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数据寡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也是当今出现的“大数据杀熟”“二选一”、平台自我优待、平台封禁现象的肇因。

### 三、数据产权的相关界定

数据产权可以理解为附着在数据上的一系列排他性权利的集合,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数据使用的利益关系的制度。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运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产权制度体系的构建被提到了战略性高度,充分肯定了数据作为一项要素资源所应具备的产权体系。在实践中,也提出了一项全新的课题,即如何构建科学的数据产权体系。数据产权作为权利体系中的一项新生事物,其产生的正当性基础、权利特征、类型均需进一步明确。

#### (一) 数据产权的正当性——基于法律范式的解释

一项权利的正当性在于其权利构造基础是否具有合理性,数据产权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财产权无论什么性质,怎么设置,无论赋予谁,都会对个体和社会的利益产生影响,对物关系和对人关系构成了财产关系的两面。法律范式构成财产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范式,其背后的价值与精神实质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分。

表1 不同发展阶段的法律范式

法律范式	自由主义	福利国家	多元主义	阶级斗争
发生阶段	资本主义初始阶段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完善阶段	社会主义初期
代表人物	格劳秀斯、洛克等	马歇尔、罗尔斯等	贝克、芒泽等	维辛斯基
正当性基础	自由、平等	社会正义	修正主义	集体主义
权利形态	个体绝对财产权	社会财产权	既有财产权的新解释	公有财产权
核心要素	个体要素	社会要素	个体要素+社会要素	社会要素

我国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首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2007年《物权法》将“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作为其主旨,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我国以立法的形式给予了个人财产权有力的保护,但并不能认为当前我国属于

权利本位,因为“阶级斗争的法律范式的残余还没有消除干净”<sup>[4]</sup>,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法律范式是以权利本位为主导夹杂着阶级斗争残余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下,个体要素与社会要素之间是平衡的,民法典创设了各项私人财产权的同时也产生了政府许可财产权、养老金财产权等公有财产权。一项财产权的内容不仅包含个体要素,同时包含社会

要素,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当然不同类型的财产权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个体要素与社会要素之间存在主次关系,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有所区分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根据个体要素与社会要素的强弱的不同,可以将财产权做如下类型化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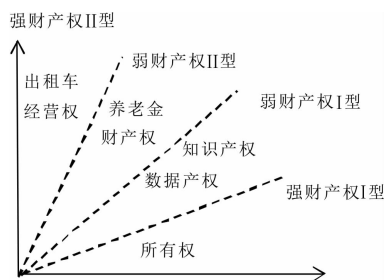


图1 数据产权的权利定位

在多元主义的法律范式下,应遵循以权利的创设目的及关联因素进行整体评价与定位。在数据财产的整体评价中,应当充分考量其数据资源的属性。

### 1. 数据的财产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堪比“石油”的重要生产资料,已脱离了数据作为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信息的范畴,数据产权的财产性成为其核心价值。数据的价值产生于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中,在平台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到市场交易中,产生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无论数据是原始的主体所拥有,还是作为数据的收集者、加工者的企业所拥有,抑或是政府所拥有,其财产性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 2. 数据的人格价值

数据来源于个体,零散、简单的信息即使经过处理,其人格性、身份性的意义仍然无法磨灭,被用于经济活动的数据所携带的人格信息,常常在数据交易中受到侵犯。数据的人格价值所涉及的人格尊严是其核心,数字经济时代,人格的价值不应被经济价值所替代,唯有如此才能在大数据时代共享美好生活。

### 3. 数据的公共价值

被政府所利用的数据自然就产生了公共价值,对公共数据的总体把握符合国家数据安全利益。此外,政府利用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在数据社会下,政府运用数据分析技术,掌握社会发展和运行的总体态势,预测风险,增强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政府通过数据的共享及分析技术,能够实现数据的高效利用,提高服务效率与决策能力,对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从以上三个价值,可以将数据产权定位为一种弱财产权 I 型,其根本特征就是以个体要素为

主导,在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和实现财产价值,增加物质总量。另外,需要关注其社会要素,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更高的价值目标,实现“自由”与“善”的平衡,这正是数据产权的正当性基础。

## (二) 数据产权的权利体系

数据产权是数字经济的产物,作为一项新兴事物,其权利主体的多样性、权利客体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权利形态也较传统权利性质不相同。数据产权虽然为一项财产权,但其财产属性并不能得到完全阐释。对此,需要对数据产权进行类型化分析来全面认识其权利体系。

按照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数据产权划分为个人数据产权、企业数据产权和政府数据产权;根据权利内容的完备性可分为完全数据产权、定限数据产权。

一项完备的财产权应当拥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基本权能。当前,在理论界对于个人数据产权的权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即承认个人作为数据的天然所有人的法律地位,但是对于企业数据产权与政府数据产权则持不同意见,对于二者的权利归属尚无统一看法。本文在此对现有观点进行梳理,并在后文立法策略中具体论述。

表2 数据产权权利体系

数据类型	个人数据产权	企业数据产权	政府数据产权
权利客体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衍生数据	公共数据
权利主体	个人	企业	政府
权能	完全数据产权	完全/定限	完全/定限
权利价值	人格利益/财产利益	财产利益	安全利益

## 四、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策略——数据产权立法

平台经济的垄断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数据市场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出现生产要素的集中,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自然孕生出垄断。当前,对平台经济的垄断治理已成为我国的重要任务。

2021年2月7日《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正式发布,这是我国在执法层面上对平台经济反垄断做出的回应,体现出我国对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已步入正式轨道。作为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在执法层面的探索和努力,始终要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依归。在反垄断领域,我国在2008年出台的《反垄断法》的部分条款已经脱节于当下新出现的经济模式,仅仅对垄断行为作出的一般性规定已无法解释新经济现象出现的问题,因此,进一步修订《反垄断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开展的时代任务。然而,作为一个新的经济产物,平台经济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仅仅从《反垄断



法》这一基本法律来进行规制尚有所不足,为了更加全面且具有针对性地对平台垄断进行制约,尚需对其垄断根源做进一步的探究,唯此才能构建出科学有效的治理路径。

如前所述,平台经济是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组织,数据成为平台企业竞争的焦点,当前出现的各种垄断行为的根源在于数据产权不明而导致的资本无序竞争。数据产权的权属包括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由于当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对其作出规定,当前平台企业将其作为私人财产,成为平台数据的绝对拥有者,在某种程度上,数据产权不明赋予了数据市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私有制为资本积累和生产资料的集中提供了基础,其本身就是垄断滋生的温床,因此,以数据产权的权属界定为基础,构建出权利清晰、科学高效、公平正义的数据产权法律体系以真正适应时代之需。

### (一)数据产权立法的原则导向

#### 1. 开放包容原则

数据产权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出现的新特征、新变化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思维,其客体的虚拟性、复杂性特征突出,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将产生更多新的问题,这就要求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打破封闭的财产权体系,以动态发展的视角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实际。

#### 2. 利益平衡原则

数据并非符合物权法的物权客体特定原则,数据权利不仅囊括所有权及使用权,其中财产权与人格权利益并存,数据产权的问题涉及众多主体,个人、企业及政府,在立法中,应当在以个人要素和社会要素结合并突出个人要素的法律范式下进行,在个人自由、财产保护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平衡。

#### 3. 明确性原则

在确认数据产权的法律地位的基础上,明确其权利边界。为数据产权设置红线,只有在权利红线范围内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护而不受侵犯。对此,应当明确权利边界的设置规则,实现科学划分,避免因立法的过于宽松而导致企业过度侵蚀社会公有数据,危害国家数据安全,同时,应当发挥立法的创造作用,将数据的要素价值充分发挥,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科学配置,促进社会发展。

### (二)总体思路:三方框架下的产权界定

有利益必有归属,有权利必有保护。一项权利的归属,能够起到法律上的公示作用,从而产生对抗效力,如果一种稀缺性资源的产权是模糊的,人们就

必将争相攫取,数据权属的明确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防止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 1. 数据所有权

数据所有权是数据产权最为重要的一项权能,作为定分止争的天然权利边界在划分权利红线的功能上具有关键价值。数据产权的所有权构造,依据数据的来源不同有所差别。

##### (1)个人原始数据的所有权

原始数据,即那些最初来源于用户个体的简单、零散的信息,这些最初的数据形态往往带有很强的隐秘性,与个人隐私密切相关,因此,该类数据涉及极强的人格性利益,但同时不可否定其对于个人的财产性利益。在天赋人权自然法视角下来看,源自于自然个体的信息当然属于个人所有,其不仅对该数据的人格权,还应当包含基于对数据的绝对控制而享有的财产权利。在人格权意义上的数据所有权强调的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赋予个人数据所有权能够有效防范企业过度收集问题,有效化解当前数据“公地悲剧”,将数据权重新赋予个人,筑牢数据滥用的防线,有效防范企业因无序竞争与垄断导致侵害个人权益的现象。在财产权意义上的数据所有权强调个人对其数据权益的专属控制,这即赋予了个人决定其数据之后的使用及收益的可能性,进而产生数据的经济价值。

##### (2)国家数据所有权

平台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垄断正是在于数据产权的界定不清从而导致的“破窗效应”,数据产权的模糊性以及不合理的企业私有化是造成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的根本肇因。数据,当其为最初始形态的个人信息时,其应当属于个人信息或隐私的范畴,其权属理应归于个人。但是,当其经过收集、整理、加工等程序,过滤掉无价值的信息而将具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存留下来,更多地凸显出经济属性时,即形成了衍生数据。衍生数据就如同土地、石油、矿产等资源,为了维护数字经济的安全及有序发展,探索实现数据产权的国有化,构建数据产权全民所有制的产权体系是具有创造性和可行性之举。在法律结构中,所有权具有最为完备的法律权能,其突出的法律功能确立了唯一且排他的法律主体地位,明确数据产权的公共属性,就可以有效防止一些大型平台企业将自身收集到的数据作为其私有财产进而导致的垄断问题,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市场竞争力,提高公民福利。

#### 2. 数据使用权

数据使用权是在数据所有权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一项权能,数据所有人出于自愿的意思表示,通过签署协议让渡其权利,以实现其功用。

### (1) 个人数据使用权

个人的数据使用权是基于其对个人原始数据的所有权产生的,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保障个人知情同意权。个人数据本是由个人天然的占有、使用,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的数据被用作一种生产要素流通于大数据市场,因此,个人应当在其自由意志下,决定其数据是否被收集以及收集的方式与规则,这首先是对个人的人格尊重,其次则是对其数据权利的保障。数据的使用权可以参考《欧盟数据通用条例》的规定,赋予个人数据知情权、同意权、数据修改权、被遗忘权等。个人在被明确告知并同意的前提下,有权要求数据收集者对其不准确的信息进行及时修改,这能够有效保护个人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更好地保护个人的人格利益。此外,通过行使数据被遗忘权要求数据收集者删除其数据信息以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

### (2) 平台企业数据使用权

平台企业的数据使用权是基于数据的所有权人转让其部分使用权而继受取得的权利。平台企业往往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并不由其自己生产创造,而是来自用户的许可及让渡。

平台企业行使数据使用权时,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是合法原则,平台企业在收集、分析用户数据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充分尊重用户的知情同意权,在获得其授权的基础上对其数据进行使用,避免出现隐形强迫用户授权的情形,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数据应当在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下进行,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使用权;其次是必要原则,平台企业在收集个人数据时应当在最小伤害的行为限度内,收集必要的信息,以防对用户的数据权利造成损害;再次是利益保护原则,平台企业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应当对原始数据的所有人做到利益保护措施,对其隐私、个人财产权进行安全承诺,在必要时,可以采取有偿措施对其进行利益补偿,以实现利益平衡;最后是透明原则,平台企业对用户数据的收集方式应当是透明的,收集目的、范围、规则等均应大概事先告知,在清晰透明的计算规则下进行,避免“算法黑箱”。

### (3) 政府数据使用权

政府对于数据的使用主要体现在数据管理的层面。政府作为衍生数据的所有权人,行使数据的使用权,具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政府代表全民统一

行使数据使用权,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建立科学分类、安全运营、有效监管的数据共享规范,切实地保障我国的数据主权、安全及利益;其次,政府拥有数据的使用权,可以决定一部分数据是否由企业收集,能够更好地对数据进行管理,更好地进行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防止企业过度收集数据,维护数据市场的秩序,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最后,政府通过利用数据提升其公共治理能力,在行政过程中,实现政府部门的高效协同,打造“互联网+政务”的电子政务平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 3. 数据收益权

数据收益权,是数据所有人、使用人获得数据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增值价值的权利,数据收益权对于调节、平衡数据多方主体的利益,提升数据流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划清收益归属,实现多方利益共享,是数据收益权界定的首要价值。为此,收益权的主体应当包含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

### (1) 个人数据收益权

在数据产业链中,作为数据要素源泉的个人,应当确保其收益权。个人本就是原始数据的所有权人,即使数据在流转中经过价值的增值过程实现了由普通数据到生产要素的伟大飞跃,但是其提供原始数据的贡献应当予以承认。当前平台企业对于用户数据的使用大多出于无偿使用,这不仅损害了用户的数据收益权,反而使获利巨大的平台企业通过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侵犯用户隐私及消费权益。因此,给予用户一定的数据红利是具有价值的举措。尽管在当前的大数据市场环境下,直接给众多分散的用户分配一定货币利益的举措具有难以量化的可操作性,但是采取一些间接的利益减免则具有可行性,以减少其利益付出的行为,如减免平台进入金额门槛,优惠补贴、折扣使用等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则在保护用户收益权的基础上实现了共享数据红利的目的。

### (2) 企业数据收益权

在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是最主要的市场参与者,其基于对数据的使用,促进了新型的生产方式,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基于企业数据的收益权是正当的。在数据市场中,平台企业获得了收益的绝大部分,这是由于平台企业是将数据进行价值添附的最关键主体,其依据成熟的数据算法技术,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企业基于数据使用权获得的收益具有正当性毋庸置疑,但是,应当特别关注其过度的利益获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垄断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拥有经济实力的平台企业往往容易走向垄断,其

对于经济市场产生的危害自不待言,这就需要对企业收益进行规范,通过制定科学的利益获取方式,以制约其收益权的过度扩张。

### (3) 政府数据收益权

平台经济发展中,企业的收益权得到大幅度的扩张,由此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垄断行为、无序竞争及消费者福利的消解,严重威胁着我国共同富裕的政策取向,因此,对企业收益权的科学限制,促进合理分配,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的所有权视角来看,政府应当拥有对数据的收益权。当前政府参与数据权益分配最主要的就是通过税费的形式进行,此举既保障了政府的收益权,又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利益平衡。为此,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科学的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体系,对平台企业根据其规模进行分级课税,将规模以上的平台企业的税收归属于财政分配权划归中央,以此调节大中小型平台企业之间的收益悬殊,实现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

### 五、结语

平台经济是当前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尤其是在深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当下社会,其新的生产方式为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然而其快速发展的背后催生出垄断的问题,一些寡头平台企业不合理

地获取了数据垄断权,排挤、打压其他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给数据市场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的同时也侵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为此,理论界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学者们尝试不同的方法力求解决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本文尝试开辟一条全新的理论进路,从数据产权的立法的策略出发,指出数据产权的立法缺失与数据产权的权属不明是当前平台经济垄断的肇因,通过构建数据产权的权利体系,界定数据产权的所有权、使用权及收益权边界,试图为平台经济反垄断提供有益思路。

### 参考文献:

- [1] 尚正茂. 算法共谋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J]. 学习与实践, 2022(3): 63-71.
- [2] 刘佳. 人工智能算法共谋的反垄断法规制[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8.
- [3] 赵容艳, 侯为民. 平台经济的数据垄断行为剖析及其防范[J]. 改革与战略, 2021, 37(7): 43-52.
- [4] 张文显, 于宁. 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J]. 中国法学, 2001(1): 63-7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Anti - monopoly Regulation of Platform Economy

— Strategies Based on Data Property Rights Legislations

QIU Guoxia, FAN Mei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09,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data has become a new production factor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Some large platform enterprises graduall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opoly in the data competition market. Monopoly agreements, concentration of operators and abuse of market position, typically characterized by algorithmic conspiracy, is not only a threat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but also a dissipation of consumer welfare. The monopoly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is caused by the lack of legislation on data property rights.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leads to the data becoming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which leads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monopoly.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gnition of the current monopoly statu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the defini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starting from the legislative strategy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clarify the ownership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seek to build a perfect, standardized, scientific, efficient, fair and just data property rights legal system,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current anti - monopoly platform.

**Key words:** platform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data property rights; anti - monopoly regulation; legislation strategy

# 地方应用型本科新工科建设策略研究

赵冰<sup>1</sup>, 郭改文<sup>2</sup>, 黄继海<sup>1</sup>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教育部主持达成了“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 新工科建设的研究成为热点, 但大都站在战略高度或综合性大学的视角, 对于地方型应用本科如何开展新工科建设的研究较少。然而, 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需要大批新工科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 对地方高等教育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文章分析地方型应用本科在新工科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 并结合地方应用型本科的特征, 提出地方应用型本科新工科建设的策略。

**关键词:**地方型本科; 新工科; 建设策略; 问题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5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86-06

世界经济全球化、多元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驱动着新经济的形式与发展, 对高等教育的变革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都需要大批新工科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工程改变世界, 行动创造未来, 改变呼唤创新, 我们必须重视和关注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 对传统工科教育做出相应的调整和研究, 使其保持和新的经济模式紧密联系, 并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内在发展规律, 进而从战略的高度创新高等工程教育的理念, 开展相关政策的研究。基于这一现实需求, 在教育部和社会各界重视下, “新工科”诞生了。

## 一、新工科建设势在必行

新的科技和经济要发展, 需要与其接轨的新经济人才, 而信息技术、智能终端、生物医疗、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新兴行业已经出现了人才短缺问题,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因此, 探讨和建设新工科, 为国家培养多样化、创新性卓越工程人才, 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高等教育新阶段的当务之急

和长远之策。

### (一) 新工科的概念

依据我国高校的工学办学实践有理科和工科之分, 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教育改革的需要, 政府提出新工科的概念。2017年2月18日, 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 达成了“‘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 两天后, 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 启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4月8日, 教育部新工科建设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召开, 形成“新工科”建设的愿景与行动路线, 即“天大行动”(夏建国、赵军, 2017)。随后, 关于新工科建设的研究火热起来。

“新工科”到底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定义, 大家只是对其基本范畴达成共识。从专业的角度可以理解为针对新兴产业的专业, 以及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 简单概括为: 人工智能、智慧制造、云计算、新材料、新能源等。然而从战略的层面考虑, 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某个领域或专业, “新工科”建设是一种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模式, 要引

**收稿日期:**2022-02-16

**基金项目:**2017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等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研究与实践”(ZGJG2017030B); 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计算机专业类大数据方向人才培养实践”(201802357003); 2020年度河南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工科背景下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简介:**赵冰(1972—), 男, 河南邓州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计算机应用、教育信息技术。

入全新的教育理念,为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和提供新的机遇。

## (二)文献综述

2017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张大良《新工科建设的六个问题导向》文章,提出了什么是“新工科”,为什么要发展“新工科”,如何发展“新工科”,发展什么样的“新工科”,怎样培养“新工科”人才,指导性地阐述了新工科建设要问产业需求建专业,问技术发展改内容,问学校主体推改革,问学生志趣变方法,问内外资源创条件,问国际前沿立标准(肖应林,2017)。

马陆亭界定了与传统工业相关的“老工科”,以及新经济发展的“新工科”,提出了新工科更加凸显学科交叉与综合的特点,对高等工程教育的变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余东升则认为,“新工科”要有新观点,新时期要全面创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以适应引领新经济发展的战略(吴爱华等,2017)。陈慧、陈敏依据综合性大学基础学科和多学科交叉特点,对综合性大学培养新工科人才进行思考与探索,提出了发挥独特优势进行新工科建设思路。张维光(2022)等研究了新工科背景下传统专业升级改造途径,郑庆华(2020)等阐述新型工程教育的外延和内涵,通过研究提升传统专业,创办人工智能等新专业,探索理工结合、医工结合、文理渗透、管工贯通等实践,探讨综合性高校开展新工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

## (三)新工科的建设内涵

一谈起工程师,好多人脑子里第一印象就是戴着安全帽拿着尺子、图纸的“搬砖”形象,或者就是机油、柴油弄得一身黑,拿着个仪器一天到晚对着机器的形象。因为工科不同于理科,它更侧重于技术和实干,于是大家对工程人员的印象总是一副“邋遢”的场景,就像程序员是一群“宅男”一样。老旧的思想和印象使工科“望而生畏”,但实际情况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工程师是更加朴实的科学家,新工科不仅仅是新经济中的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医疗等等,也包含具有动手能力的工程师,美国这样一个科技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在闻名世界的波音飞机制造工厂里,波音747在最后的组合,没有机器咬合,依靠的就是工程师。

新工科具有一系列新特点,即新理念、新特征、新知识、新模式、新机会、新人才。从高等教育改革来看,多元化、实践性与国际化将是新工科的教育方式和特色,而其专业特色是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交叉化、创新性。我们要面向战略新兴产业与引领性行业需求来培养人才,针对新技术、新产业与社会新

形态的变化,需加强多学科交叉与行业融合。要按照新工科的规律与特点进行教育改革,推进可持续竞争力的新型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新工科的建设。

那么“新工科”到底要建设什么?新工科的内涵还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把握好学与教、实践与创新创业、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任务,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达到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的目的。21世纪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传统的理科和工科已不足以应对时代变革,要以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导向,把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作为战略重点之一,为新技术与新产业发展培养各种类型的新人才;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低端产业向现代高端产业转型,实现资源主导向技术创新主导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 二、地方本科院校在新工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工科教育的基础上,研究新工科建设的问题和策略,并立足地方经济发展,探索地方应用型大学发展新兴工科教育的新模式,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是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考虑(陈慧等,2017)。目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在工科教育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不重视基础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化结构布局,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深说:“基础学科是所有学科的基石。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的基础能力是关键,而基础学科所构建的就是这样一种‘底层能力’”。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工科基础教育,它是培养未来工程师最基础的渠道也是最重要的渠道(袁晓明,2017)。基础学科是支撑工科大厦的骨架,在研究上突破性进展,可能引起广泛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开创生产大发展的前景。作为综合性大学来说,基础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相对重视,把提高教学与科研的水平放在战略地位(张翼星,2008)。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应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各类学科得到了迅速、蓬勃的发展,而地方高校的基础学科建设未真正得到足够的重视。地方大学由于地域的局限,有重工轻理的倾向,由于工科侧重于生产实际问题的研究,造成“理向工靠”的培养方案,但“工”离不开“理”,基础学科孕育大量新技术,并催生新产

业,在高等教育中奠定了一所大学的基本地位,增强应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学科的后劲,促进人才的培养并保证质量。因此,基础研究是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赵婀娜等,2022)。

## (二) 培育模式单一

地方应用本科在教育教学模式上,沿用高职高专教学方法、方式,教学内容以传授课本知识为主,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体,而教学过程就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课程体系设计基本趋同,实践环节以验证性实验教学为主,考核方式单一,忽视能力培养,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视不够,难以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在实验课程设计上没有创新思路,实验内容绝大多数是按确定的方法、步骤,缺少探索型、研究型、开放式的实验,扼杀了工科学生创新的源泉,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只是培养了学生利用课堂对某种原理或现象进行验证能力。毕业设计是本科生实践教育的重要环节,由于选题不够合理、过程疏于控制、考核答辩流于形式,学生不能在实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阻断了工科学生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途径,导致毕业生素质达不到社会的需求(陆必应等,2013)。

## (三) 专业设置不科学

地方高校大多由几所学校组合升本而来,专业设置重叠严重且范围广,在有限的规模上尽可能多地设置专业,不仅降低了学校的招生水平,也浪费了教师和教育资源。高校的专业设置既反映了社会对于人才的整体需求,历来是高等学校办学十分重要的环节,涉及高校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国家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结构、学生就业、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质量、学校办学特色等。然而,地方高校属于地方财政事业单位,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延续,增加容易淘汰难,学科与专业设置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只能把招不到学生的专业改头换面揉成新的专业,表现在求新、求多、求全、求热门,缺乏应用和实践的指导,以及充分的调研、论证和民主决策。具体表现在一是专业设置缺乏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缺乏创新性、前瞻性,严重浪费了教育教学资源。二是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对接度不高,新兴产业相关专业设置较少,不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专业结构不合理、不专业,没有专业群建设,没有形成集聚优势,重点专业的带动和辐射效应不明显。

## (四) 教育模式僵化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时代看苏联,“以苏为师”很快就从教育领域扩展到科技领域搞特色

专业,搞重工业。然而,随着服务行业的不断推进,导致工科开始看向西方,高校经过不断的合并向综合性大学看齐,建名校建世界一流大学等,导致工科教育变得不伦不类,不精不深。教育与科学技术本是一脉相承,应该注意到,新经济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经济的发展总是在推陈出新,不同时期的经济都有“新”的部分,但新只是相对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会逐渐变成“旧”(徐磊,2002)。因此,新工科建设不仅要结合自己的国情研究我国新工科专业建设,也要着眼于互联网革命的时代特征,紧跟新技术发展、制造业升级等动态发展,地方应用型高校更要因地制宜,办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新工科专业。

## (五) 校企合作落不到实处

地方高校的校企合作流于形式,说起校企合作来大家头头是道,拿西方的“德国二元制”“美国合作教育”“现代学徒制”等例子来说,都是校企合作的典范,然而中国高校历来重视讲,能够做得具体些的依旧只有那么几个重点学校、重点专业。校企合作在中国历来是炒作的多,实干的少。企业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高校关心的是数量和企业名头。然而,从内部发展要素上,校企合作关键是科教融合进入深层次的实践教育,由于工程教育中的通识和人文内涵不足,企业的视野狭窄,创新思维和意识不足,不重视校企合作的科研投入和工程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未达到人才培养深层次的目标要求。因此,地方高校的毕业生人才知识体系不完善、不能快速地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 (六) 教师信息化素养不到标

地方应用本科教师直接从高职院校升级上来,师信息化意识不足,对于信息化素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重要性认识不足,一部分教师对智慧教育的认识还是停留在PPT方式,大多数教师采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是简单的多媒体与网络环境或工具。从原来高职基础升级的地方本科,科研的要求没有科学的标准,教师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教学层面,没有科研的压力,不愿意花费时间学习新的知识内容,再加上对教师的考核形式局限,导致教师对信息化教学的开展兴趣不高,能力不足(周子平等,2021)。地方高校教师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没有及时从信息化1.0向信息化2.0行动调整,难以接受现代化的教育管理和教学模式,缺少颠覆性研究气魄和创新担当,应用信息技术改革和创新教学主动性不够,再加上地方本科的缺少对教育信息化实践创新的激励机制,使地方高校教师在信息化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实践动力不足。由于教师的整体信息化素养不

足,在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教师就缺少数字思维,认识不到“互联网+教育”“智慧+教育”“元宇宙”教育等信息技术新特点,认识不到新的工科技术的发展和学习的都是以数字技术为手段。

### 三、地方应用本科新工科建设路径思考

地方应用本科如何前瞻地进行新经济工科人才预测,精准对接重点领域人才需求,如何吸引有工程教育背景的教师、增加产业界对工程教育介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成立时明确指出,应用型大学不是一所传统的大学,而是一所“致力于提升工业科学及艺术的院校,且研究亦以应用为本”(付八军,2016)。地方应用本科院校在新工科建设中,要加强政策层面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做好顶层设计规划,深化专业设置、产学研合作教学、改革工程实训、促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培育人文和工程内涵,加快传统教学深化改革,主动、快速地适应未来工科教育发展变化。

#### (一)以立德树人引领新工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作为地方高校的新工科建设,必须以立德树人作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钟登华,2017)。新工科教育融合新文理教育、多学科和跨学科工程教育,是个性化专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模式,是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最前沿和新方向(顾佩华,2020)。新工科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也是国家重大战略和需求的重要起点,需要以立德树人统领人才培养全过程,立足我国战略发展需求,加强工程教育改革创新,做好课程体系顶层设计,重塑人才培养质量观,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学生终生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核心素养及能力,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时代新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只有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能激发学生的科学报国信心和勇气,才能努力学习,把科学文化学到手。这要求我们科学引导学生,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才能打造综合性、创造性、实践性、跨学科、国际化等全新工科课程体系。

#### (二)加强基础学科建设

据最新的自然科学分类,六大基础学科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生命科学。基础学科的研究是构建工科大厦的基石,培养学生的工程知识基础、多学科思维和创

新能力,获取被研究主体全面的知识,构建更系统、综合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做好地方应用本科新工科建设,从基础课程改革开始。地方的高校的基础课程要求较低,设置较少,特别是基础自然科学的课程弱于综合性大学。不管在“新工科”还是“老工科”背景下,高等数学、物理学科的基础地位不会动摇,化学和生物等科目将更加交叉融合,强调的是应用性和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技术科目的重要性将大大加强。虽然改革传统的工科教育,基础性的知识教育要加强,但人文社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不可缺少,从技术、伦理甚至美学艺术等角度综合思考,引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改变,将“大工程观”植入课程体系整体设计和变革,重视科技与环境自然融合,才能帮助堆砌起创新大厦的基石。

#### (三)结合地方工业发展实际建设

由于受管理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制约,目前的工业企业大多不愿意大量或长期接受学生系统实习,与工业企业深入开展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建设等,而实习又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因此,建立必要的校外实习基地对新工科人才培养还是必需的。地方高校建设新工科要避免与工业实际脱节,而是要真正走进工业企业,围绕地方支柱产业进行,结合本地工业发展实际情况,准确定位办学方向和专业建设,确定办学特色,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能够给高校带来新的课题研究,通过与地方的调研与合作,加强实践合作,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寻求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要对接区域战略产业,与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接轨,做好校企深度合作;地方应用本科通过与地方政府科技合作,优化高校的教学质量,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为高校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我们要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加强地方与高校与地方经济建设相互合作,以实现双方的资源互补;要建立双方合作管理制度,达到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使高校与地方合作互动持久深入;要构建高效的与地方合作交流平台,满足工程教育培养中人才、技术和信息产业、经济沟通交流。学校要与工业企业建立有效地校企合作关系,就要加强校内对实习企业的支持和服务能力,或建立服务团队,以若干团队的长期服务来强化合作关系。

#### (四)加强工程伦理教育

教育理念和发展模式对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有支撑作用。地方应用本科新工科建设必须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导。新工科的创新发展,



不仅需要人文精神积淀,也需要科学的、先进的价值观指导,并遵循人文道德和工程伦理规范。新工科给我们带来的舒适的生活,是工程伦理(Engineering ethics)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的应用伦理科技的发展。绿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国际工程教育的发展必须融入绿色理念。要树立综合化工程教育理念,强化跨学科综合教育,在具备人文情怀和管理素养的同时,深化工科领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学生工程技术创新能力,为新兴工科孕育产业奠定基础,创新全面新型工程教育观。

#### (五)深化工科教育改革

地方应用本科新工科教育要深化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落实“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革”的工程教育理念。一是翻转课堂,在教学方法上将传授知识改为传授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推动学生向主动探索性学习转变。尽量利用科技手段,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如辩论式、演讲式(讲课)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研究兴趣。二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性教学,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老师的指导下组成团队,协同科研创新。三是重视毕业设计环节,改变选题模式和考核形式,尝试由学生自主的选择毕业设计的技术路线,以及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实验方案等,把毕业设计作为地方本科生教育的最重要环节。四是毕业答辩重点考核手段,要评价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表现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仅要审查论文的质量,更要考查学生的研究过程、研究思路,关注实验方案和研究成果。

#### (六)加强教师“双师素质”建设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地方应用本科建设新工科最基本条件,教师本身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培养的人才的素质,要建设地方应用新工科,必须提升教师素质和实践能力,改革教师评价机制。当前的评价机制是科研以文章、项目数量作为主要标准,教学技能侧重于程式化的基本能力和水平,不利于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探索体现创新性和实践性人才强校战略,建立科学评价标准与支持机制。把科研转化、校企协同创新、企业工程实践经历等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把外部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经理的评价作为主要依据,制定聘任和职称晋升制度,促进工科教师专业发展和工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加强教师联盟平台建设,积极开展科研开放与内外协同,提倡研究向跨学科、跨学院的模式转变,学校鼓励学科之间的竞争、协同、交叉与融合,组建若干跨学科的知识

创新基地,促进具有学校特色的工科协同、艺工交融和文理渗透。

#### (七)加强新工科专业建设

随着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将“智慧化”创建理念主动引入基于大数据的专业建设,从适应市场需要的角度出发,不断调整和完善专业设置,突出学生技能培养,强化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挖掘学生就业实习途径和岗位,形成“实习即就业”的安置模式,本着“服务于社会,有利于学生,有益于企业”的原则设置专业;密切关注国际产业转移、新技术的引进、产业集群发展、现代服务业增长、环保节能、新能源的发掘利用,以及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等因素对新工业发展的影响,加强相关学科与工科的融合共长。针对专业的特点提出“宽基础、重技能、活模块”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围绕培养“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智能型”毕业生的目标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学校依据地方经济发展创新人才需求,以及毕业生跟踪毕业生就业的反馈信息,分析地方应用型本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准确预测新工科专业的发展趋势,提出科学合理建议,制定中长期规划,使地方应用本科新工科专业建设走向康庄大道。

#### (八)新工科建设要抓住智能时代的特征

工业革命的每个时期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得以大规模的使用,我们进入了工业4.0的智能时代。由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工业上大量应用,将全方位的改变社会生产和商业模式,而智能时代人才培养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学有专攻,多专多能”(汤丽萍,2018),因此,结合地方应用本科校新工科建设要求,积极进行新工科专业课教育改革和实践,探索智能时代新工科的教育新模式。首先探索基于5G、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工业应用,确立新工科专业群和专业模式建设。其次要以教育信息化2.0的基本目标为指导,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开创教育服务新模式、教育治理新模式,具体就是加快面向5G网络的高校智能学习体系建设,以AR、VR和MR以及区块链为主要技术,探索“元宇宙”下的智慧校园的建设和智慧教育模式,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做好智慧教育创新示范。最后,在提高师生新工科专业的信息化素养下,依托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新工科+数字校园”平台,拓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材料和新基建的新工科建设。在智能时代特征指引下的教育改革探索和实践,将有力促进教育

信息化2.0 行动计划的实施,并推动工程教育多学科交叉创新,实现跨界融合和学科集群发展。

#### 四、结语

新工科建设不仅是一般工科专业的建设,而是一种新的工科教育理念的转变,因此,发展新工科也要因时而动。伴随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教育的发展将遭遇新的挑战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是促进高校分类发展,提升高水平大学国际竞争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特别要支持有特色的高水平地方高校发展,加强信息、医药、新能源、智能服务等行业高校建设,突出地方高校学科专业特色和行业特色,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推动与大学、企业、地方的合作共建协同创新,把办学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加快推进我国从工程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工科教育新体系,培养一大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工科人才。

#### 参考文献:

[1] 夏建国,赵军.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刍议[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3):15-19.  
[2] 肖应林. 以新工科建设助力产业转型升级[N]. 长沙晚报,2017-06-15.  
[3] 吴爱华,侯永峰,杨秋波,等. 加快发展和建设新工科,主动适应和引领新经济[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1):1-9.

[4] 陈慧,陈敏. 关于综合性大学培养新工科人才的思考与探索[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2):19-23.  
[5] 张维光,吴慎将,潘永强,等. 新工科背景下传统专业升级改造途径研究:以光电信息与科学专业为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1):17-22.  
[6] 郑庆华. 新工科建设内涵解析及实践探索[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2):25-30.  
[7] 张翼星. 必须加强基础学科和基本理论的建设:我国综合大学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J]. 现代大学教育,2008(6):9-13.  
[8] 赵婀娜,吴月. 强基础研究 育拔尖人才[N]. 人民日报,2022-03-18.  
[9] 陆必应,张汉华. 工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中国电力教育,2013(13):19-20.  
[10] 徐磊. 技术创新的演变与工科教育发展[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2(1):74-18.  
[11] 周子平,陈磊,杜月云. 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素养培育体系构建研究[J]. 海峡科技与产业,2021,34(10):82-84,88.  
[12] 付八军. 学以致用:应用型大学的灵魂[J]. 教育发展研究,2016,19(36):24-29.  
[13] 钟登华.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3):1-6.  
[14] 顾佩华. 新工科与新范式:实践探索和思考[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4):1-19.  
[15] 汤丽萍. 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J]. 决策探索(下),2018(10):56-57.

(责任编辑 许峻)

## Research on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ZHAO Bing<sup>1</sup>, GUO Gaiwen<sup>2</sup>, HUANG Jihai<sup>1</sup>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Henan Finance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was held in Fudan University and the Fudan consensus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as achieved under the hos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But most of them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height or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and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how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in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promoted by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top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new engineering, which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Key words:** local undergraduat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trategy; problems

# 河南省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为例

石 丽

(黄河交通学院 公共体育部,河南 焦作 454950)

**摘要:**由于“用工荒”“就业难”,加上“新冠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办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面对毕业生的职业认知不能满足体育企业节约用工成本及发展需要的短板日益凸显的现状,民办高校必须利用自身体制与机制的优势,在营造双创文化氛围、软硬件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双创导师选拔培训等的基础上,建设与发展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助力大学生就业前最后一公里的冲刺。

**关键词:**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专业实训;人才培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6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92-06

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实现大学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sup>[1]</sup>新形势和新机遇下,我省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纷纷通过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构建与完善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和支持体系,在人才培养的职业性、实践性,以及科技优势转化等方面初见成效。但就体育产业专业来讲,目前省内只有极少数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我省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人才极度缺乏。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我省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人才在培养模式和教学目标实施方面,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和师资的影响,依然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现象,尤其是体育专业实训实践平台基本上形同虚设,人才培养不能胜任职业岗位要求,社会人才供需错位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由此可见,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with 落实,既能够促进

高校积极整合各级各类资源,发挥高校科技与人才优势,拓展高校人才培养的途径,又能够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基地的示范效应,为学生搭建专业实践平台,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大学生实践与职业胜任能力。

民办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办学实力和社会认可度方面处于劣势,但在办学模式和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方面却有自身的竞争优势,完全可以充分整合与利用企业行业优势和自有教育教学资源,建立产教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育人、共谋创新发展新的合作机制下的校内创新创业基地,以此实现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无缝对接,寻求与践行具有较强竞争力与可持续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 一、我省体育企业“用工荒”与“就业难”问题剖析

尽管目前我省职业体育联赛、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但是武术产业、体育培训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彩票市场发展趋于成熟。体育市场体系的逐步成熟,促进了体育产业质量、效益和增加值稳步提高,体育产业呈现占比提

收稿日期:2022-06-30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河南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与发展研究——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为例”(21B890010)

作者简介:石丽(1959—),女,河南焦作人,博士,黄河交通学院公共体育部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与管理研究。

高、增速加快、效益提升的发展态势。

然而,我省体育产业与国内发达城市相比起步较晚,体育产业经营人才的缺乏,使得体育产业及体育相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从目前体育产业人才现状来看,主要存在着体育产业管理者缺乏专业管理知识;体育经营人才单一,没有形成体育及体育相关产业联营体系;体育产品的研发和体育市场的开发人才匮乏等问题。根据调查得知,体育企业的HR认为:岗位与人才不匹配,体育专业毕业生工作阅历不丰富、个人承担业务的能力较弱,难以达到岗位要求等;同样拥有高学历的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也主要是由于个人业务承担能力和工作经历,而成为应聘时被刷掉和淘汰的主要原因;大多数民办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社会与职业认知水平有限,“高不成低不就”与较弱的抗挫和抗压力,因不公平待遇而频繁“跳槽”和辞职也成为其就业的羁绊。

研究团队对体育企业26位相关专家、学者的访问交流与问卷调查,普遍认为,民办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多方面实质性的创新与改革:提出需要加强实操性教学环节建议的占76%;提出对加强大学生职业素质教育、提升职业认知度方面问题的占65%;认为应当加强企业与高校合作协同育人方面的占39%;认为必须不断更新专业教学体系并基本保持与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占37%。由此不难看出,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使学生达到真正学以致用,既是实现民办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及体育企业最迫切的核心需求,也是加强大学生职业素质教育,提升其职业认知与职业化水平,实现创就业的根本保证。

### (一)当前体育专业人才供需矛盾与影响因素分析

1. 体育行业的快速发展变化与体育专业人才不足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素质与之不相匹配状况凸显,国民素质,尤其是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成为当时亟待解决问题。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体育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及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所发挥了显著作用。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工作,促进国民整体素质提高,成为适应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

1995年6月20日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建立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和法制化全民健身管理体制的需要,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国家[1995]14号)。《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作为一项关系

到我国体育事业协调发展和全民素质提高的重要举措,以及在宏观战略性意义上的群众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奋斗目标。”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也被同时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教育部在1998年对体育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表演、经营与开发管理等方面专业人才的社会体育专业设置。在这个时期,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体育改革与发展战略计划,直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体育热潮迭起,社会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的同时,高校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迅速升温,扩招院校和扩招人数也在呈倍数增长。现实中,扩招的升温在短期内缓解了体育行业专业人才供需矛盾,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和体育行业的快速发展变化与体育专业人才不足之间的矛盾的不断凸显。

课题组对我省五所院校招收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100名大二、大三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走访中发现,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生源,62%是文化课分数不高,但是为了考上大学,转到体育专业来的。由于不是自己高考的原目标,或者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因此对体育专业的热爱程度相当有限,加之社会体育指导员没有体制内计划和相应的岗位,基本属于公益性质的。所以,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选择到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学生占31%,选择自主创业的(体育和其他行业)占11%,选择教育部门的22%,占36%的毕业生就业意向迷茫。对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职业去向的调查发现,从事与体育对口职业的占29%,而71%的学生从事与所学体育专业无关的职业。从前述毕业生就业意向、择业标准和就业去向的数据即可看出,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意向和就业最终选择与培养目标存在很大的差距。

2. 体育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与传统的课程设置与单一的专业教学的矛盾。根据对体育行业专家访谈得知,当下,体育行业最需要的是既懂体育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例如社会体育专业学生毕业时首选的是去健身俱乐部,而到健身俱乐部入职后,无论是巡场还是私教岗位,或者是行政人员,必须兼顾营销。这些学生因营销能力不能满足健身俱乐部要求,或者完不成营销任务,大多数在短时间内主动或被动离职。课题组在调查中还得知,毕业生跨专业的知识储备不足,尤其是与体育行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互联网、金融、营销、法律课程没有机会接

触,因此这些知识和能力比较欠缺,相关专业技能短板很快就显露出来。

民办高校培养社会体育专业教育教学相对比较传统单一,课程设置、课程调整和多元化提升滞后于体育行业的市场需求,缺乏紧跟市场变化的、宏观的、动态的课程体系管理。校内缺乏专业实践场所,重理论轻实践,加上师资队伍普遍对体育市场发展变化的预测、把控及其应变能力薄弱且不敏感。因此,既不可能让学生接触到紧密结合市场需求的新课程,更不可能在教学中很好地通过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深刻地熟悉了解与掌握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践的融合点。尽管个别学校以“校企合作”方式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但是种种原因制约,学生课上课下能够到实训基地进行实践的机会非常少。一方面是学生在校学习的专业理论知识非常抽象地叠加累积,另一方面是学生学到的专业技能无法在具体实践中得到检验,理论与实践脱节,实践应用机会无从谈起。现实中学生永远是被动学习的角色,职业认知仅存于表面。

3. 体育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压力与毕业生职业能力不强之间的矛盾。人力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所具有的包括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劳动能力的总和。人力资源成本则是体育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实现既定的组织目标,人力资源取得、开发、使用、保险和离职等所支出的各项费用的总和。体育企业为了提升自我竞争力,也会注重通过人力资源有效的管理和有目标的开发,实现人力资源价值的增值。

随着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数量的逐年上升,就业竞争和压力不断加大,但毕业生质量却不容乐观,集中表现在职业认知和职业能力不强。究其主要原因是高校普遍存在着在知识上做足了准备,而对学生适应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相对不足。毕业生到体育企业还需要进行技能、人际交往、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等诸多方面二次开发,或者说是二次培训。虽然说这种对人力资源二次开发对体育企业来讲,能够使其升值和产生利润,为体育企业实现战略目标铺垫基础。但是从体育企业控制人力成本的角度来看,智能化、科技手段在体育企业的广泛应用,人员优化与配置的精简已经成常态,尤其是疫情后体育企业对人力成本的控制尤其凸显,甚至一些体育企业已经开启断尾式生存方式,体育企业生存压力与毕业生就业的矛盾日趋严峻。体育企业很难对毕业生到岗后进行专业技能应用和职业能力培训,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在岗时间非常短,主动和被

动离职成为常态。人员的频繁流动不仅增大了体育企业人力成本耗损与企业难以维持稳定发展的矛盾,对毕业生来讲,频繁地变更就业单位,也极易造成漫无目标的就业选择和失去就业信心。

## (二) 体育行业人才供需矛盾解决的策略

1. 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体育大众化发展供给侧需要,强化教育质量意识。高等体育院校应改革传统的以理论为主的课程体系,关注社会体育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以夯实学生体育专业理论与体育专业实践基础,引导学生的体育职业兴趣和职业向往,促进学生体育专业基础能力的提高。

2. 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体育大众化发展供给侧需要,强化社会需求本位意识。高等体育院校应积极进行实践教学改革,及时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培育自有“双师型”教师,或者通过合作企业聘请校外专家担任专业实践教学课程等双管齐下策略,通过大量体育实景案例,增加体育专业实训课程和实践的情境体验性,促进学生体育实践能力的提高。<sup>[2]</sup>

3. 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体育大众化发展供给侧需要,强化优质资源配置和平台建设帮扶意识。学生的职业认知和职业素养的打造和提升是一个可持续的系统工程,因此要特别注重学生多元化的实践需要,为学生选配既具有较强的专业教学能力,又具有懂市场、知晓市场、善于凝聚团队的智慧,指导学生的人际交往,帮助学生完善职业结构,提升学生职业素养与个性品质,促进学生职业成长的全能型导师,

## 二、挖掘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资源优势

所谓体育产业创新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人格并获得在体育领域逐步积累的创业人才素质,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持续向体育产业领域纵深发展,具有善于和敢于创新性地使用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的特质,并取得创新成果,为社会体育发展做出创新贡献的人。目前,我省体育产业已经基本构建起具有鲜明特色、主导产业明确、发展结构合理的体育产业体系,努力将体育产业打造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出贡献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夙愿。但是体育产业未来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大批具有跨界融合能力的体育专业领军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必须从传统的教育教学和培养模式跳出来,围绕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形成校内校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打造专业实训和创业活动实践平台,为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研究组在对郑州升达经贸管

理学院等五所民办高校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可行性的调查中得知,我省民办高校在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方面具有可挖掘、可拓展、可应用的三大资源优势。

### (一) 人力资源优势

人力资源,通俗来说指的是人员配置与资源利用。我省民办高校师资队伍状况在近几年陆续接受教育部评估后有了极大的改善,在师生比方面满足了办学与人才培养需要,由于引进了大量优质师资资源,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例如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在近30多年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既符合高等教育规律,同时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模式。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素质及能力培养、教育教学质量等逐年稳步提升,获得了学生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以评促建”激发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热潮,学校上下形成一股“凝心聚力谋发展、担当使命抓落实、不负韶华启新程”的良好风气。体育学院借评估之际广纳贤才,专任教师队伍中就有五位在原执教院校卓有成效的知名专家教授,而且人脉资源特别丰富,涉及不同行业领域。体育学院近年在体育领域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也是享有盛名,尤其可喜的是在校大学生都能够正视自己的“民办学生身份”,比公办院校大学生很明显地普遍拥有端正的学习态度、不甘落后的精神状态和极高的社会实践热情,期望通过创新创业基地实践获得真才实学,旨在为将来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才打下坚实基础。为此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又为创新创业基地的运营树立良好的品牌口碑,由此积累下来的大量管理经验,夯实了创新创业基地教育培训业务对外拓展战略和建设发展基础。

### (二)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资源优势

开拓性和原创性是创新的核心内涵,而创业则是通过个体的实际行动进而获取利益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在创新创业这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中,创新是创业的基础与动力,而作为载体的创业,创业者只有通过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对资源进行整合与再创造实践,并不断寻求新模式与新思路,最终将创新理念推陈出新获得创业成功。

调查显示,我省开设体育专业的民办高校在努力创造条件为提高体育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积极主动性投入整合学校和社会各方资源,寻找途径、搭建平台。例如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自2015—2020年五年间,在学校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及各方共同努力下,为了满足大学生对社会体育产业及其实践的了解和认识,不断提

高其职业认知与职业素养。学校设立了“双创学院”,专门负责“产学研”指导与管理工作,同时在各学院专门设立“产学研专员”一职,实现了人员落实到位、岗位职责明确、目标任务清晰的规范化管理模式。体育学院由资深教授担纲“产学研专员”,并在院内独立设置了“升达心动体育双创工作室”,选拔、组建和重点培养了不同专业的学生学科带头人和团队,期间成功立了一项国家级大创项目,学生各专业团队也分别组织参与了不同类型的赛事和专业实践,学生专业能力得到历练的同时,组织、协同与管理能力,人际交往与合作能力,专业及其相关知识体系进一步完善,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认可与好评。体育学院由“升达心动体育双创工作室”牵头,与十一家体育企业签署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协议,建立了以“郑州博飞大健康俱乐部”为代表的“示范性双创人才培养基地”,学校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人力支持,用以改善硬件条件和双创人才培养环境。

### (三) 建设目标与市场接轨优势

新时代,随着全球新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建立,体育产业发展方式和体育企业存在形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极具专业化、小而强的体育企业不断涌现。如智能化自助式健身房的出现,就对毕业生的专业技术创新应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果毕业生不知道或者不了解这些体育企业智能化下的发展变化,至少失去了在智能化健身行业就业和生存的机会。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具有创新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体育市场需求的大学生。例如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提出的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初始就给予准确的目标定位,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首要标准就是以“学校内涵式发展”为契机,瞄准体育市场发展规律,探索实践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落实学校发展规划提出的“育人质量提升工程”,保证大学生的学习和专业实践变成持续的强化过程,为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搭建集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创业成果研发和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实践平台。

在民办高校校内建设创新创业基地拥有诸多优势。体育由于既是教育的有效手段,又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体育专业有着与其他专业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其创新创业实践也具有专业独特性与实操性要求。所以在校内建设创新创业基地优势体现在:第一,目标设计能够很好地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市场化目标相融合,满足学生随时随地了解体育



市场发展变化特点而有针对性进行专业实践和教学的需要,使学生能将自身掌握的体育技能和专业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及时得到检验;第二,组织学生在校内外专业导师引领下参与体育经营管理工作全过程,通过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和校企合作单位的专业实训实践,进行双岗交替、双向培养等手段,达到既锻炼学生自主经营能力,为其毕业后自主创业和就业积累专业实践经验,又能够有效地减少大学生未来的创业成本和创业风险,提高项目落地转化率;第三,可以有效地利用民办高校师资与研究条件和研发资源,及时调整和把控基地建设发展方向始终与市场化方向相一致,实现与体育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高契合度;第四,通过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中的导师团队建设,以此形成相互间互为基础的互动良性循环发展,以此带动教学和基地创新创业实践水平的不断提升;第五,极大便利地引进具备相应体育专业知识背景的企业家、创业校友作为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专业导师,充分发挥其在相关体育领域丰富的从业经验与职业发展审视优势,达到不断充实完善专业理论知识,又及时掌握行业领域前沿科技信息及精湛的专业技能,促进校内外师资资源共享和共赢发展,是实现高校服务社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延伸与具体体现的最优选路径。<sup>[3]</sup>

### 三、民办高校校内双创基地建设的实现

突发而来的新冠疫情使全国上下、各行各业进入了暂时停摆。疫情带来的全民禁足,一方面使体育产业及市场主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又为其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观察与思考的机会。此次疫情中,最优异的贡献是体育产业资源协同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新作用,最大的人物亮点就是钟南山先生以及他的体育健身经历,最从众的事件就是线上赛事和健身指导活动的快速普及。可以说,疫情暴发和持续的这段时间为“互联网+体育”背景下探索新的体育服务模式营造了空间,由此必然促动体育市场主体多维度的运营创新。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智慧体育在体育产业方方面面的应用迎来新机遇,畅通线上线下项目资源和内容的交融管道、疏通体育产业细分门类的兼容渠道、融通体育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发展的步法节奏等,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体育产业发展的航向标。暂停的“会面”,热闹的“云端”,不得不说此次疫情更像是一次外力倒逼,对全社会进行了一次数字经济的全方位的启蒙和行为习惯的促成。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必然会摆放在重要的地位,体育产业未来

线上线下的全产业链融合亦是唯一的选择。

#### (一)适应数字经济催生的社会新需求

新形势下的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成功与否,既与学校的高层设计相关,又与决裂传统的办学和教学理念的信心与胆识相关,更与学校一代人的职业信念与职业责任相关。以创新为动力的新兴经济发展方式革新的今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建造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和新引擎,创新创业是永恒的主题。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不仅为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载体,更能为民办高校与产业融合,为政府、社会和企业提供人才与服务贡献力量。后疫情下,面对数字经济催生的体育全产业链的诞生与发展需求,民办高校只有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现实要求,高度重视智慧校园建设,满足社会经济改革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深化教学改革,拓宽教育资源,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不断提高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创新创业素质和专业实践等综合能力。进而提升民办高校社会知名度与生存竞争力,才能够顺利应对严峻的社会“筛选”和“人才”挑战,获得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 (二)统筹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顶层设计

“创新创业基地作为民办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教学实践场所,既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切入点与突破口,也是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sup>[4]</sup>沿与革、传统与创新、适应与超越多元矛盾纠缠在一起,在形势逼迫必须进行抉择时,民办高校只有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及自身办学基础与特点,解决好创新创业基地建设过程中顶层设计服从和服务于学校实际、应用型的办学定位以及人才培养目标。顶层设计原本是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具体到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即是指从基地建设全局的角度:一是建设任务的全方位,包括政策制定与机制搭建,加大经费投入,完善硬件建设;二是不同层次以及各要素进行统筹规划并赋予相应的职责权限,包括教务、学管、科研、双创学院等相关机构;三是凝聚整合校内外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建设目标。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建设,还可以先行校办企业,并依托校办企业的辐射功能与助推力,将校内的优质资源先行挖掘出来进行有效的尝试和利用,明确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践性要求,结合体育企业的职业经验与能力,对市场变化发展规律的把控,尤其是运营推广专业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资源,形成多元参与的协同育人培养模式。



### (三) 突出创新特色,完善实践课程设置

实践课程设置关系到学生的专业实践成长与职业素养及职业能力的提升,因此,在实践课程设置方面,要以创新推进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关注实践课程内在的整体性与关联性,扭转传统的课程设置形式化和实践碎片化现状,避免实践课程内容衔接之间的断层。重视实践课程中主题单元与教育意蕴的凝练,着眼于社会发展与学生创就业需要,结合市场与体育企业发展变化需求,丰富、整合、生成新的螺旋式网状实践课程框架,形成主题单元突出、多学科融合、集多重功能为一体的实践课程轴,满足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不断提升的职业化需求。

### (四) 拓展实践教学,实现教学资源最优化

实践教学就是以真实的工作场景为活动主题,引导学生运用专业学科知识解决特定情境问题的能力。在实践教学中,既突出了体验性,又启发了研究性,更关键的是融入了多元相应跨学科知识的应用,共同构成完整的突出问题解决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的课程体系。基于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本质特点,凡是有利于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更好地帮助学生组织知识和增加经验等最优质的教学资源,都应当成为优质教学资源融合的目标。比如资深教授多年积累下来对课程的教学元素独到的处理和对学生学习兴趣、需求的把控,年轻教师在教学方式方法使用上的创新意识等,这些优质教学资源融入实践课程中,就能够获得

实现教学资源最优化事半功倍的效果。

### (五) 加强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设

作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创新创业导师是由校外优秀专家、企业家和知名校友以及校内优秀专业教师组成的专兼职队伍。但是在选拔培养方面,对校内创新创业导师的培养,应当围绕导师队伍的专业化和专家化提升,保证导师团队能够对学生因材施教。培训与提高导师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并能够使用已有的知识解释新知的能力;培训与提高导师引导学生探究发现新知,活化现有知识,实现知识迁移和创造的能力;培训与提高导师促进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办公厅. 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N]. 人民日报, 2021-10-13.
- [2] 常胜涛,王姗. 基于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实践的若干思考与对策研究[J]. 产业创新研究, 2019(11).
- [3] 吴海英,于琦,邢芳凝. “需求层次塔”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模式研究[J]. 教育现代化, 2019(12).
- [4] 刘蕾. 创新创业背景下民办高校实践实训基地建设的实践与反思[J]. 教育观察, 2020(2): 76-78.

(责任编辑 许峻)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 o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Taking Zhengzhou Shengd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SHI Li

(Public Sports Department, Huanghe Jiaotong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950,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labor shortage”, “difficult employment”, and “COVID-19” and other factor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social sports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in private colleges has become more severe.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graduates’ career cognitive cannot meet the sports enterprises’ needs of saving labor costs and the weaknesses in development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ivate colleges must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own system and mechanism to build and develop on-campu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basis of creating a culture of dual innovation,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nstruction,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mentors, helping the graduates finish the last kilometer sprint before their employments.

**Key words:**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 professional training; cultivation of talents

# 矛盾分析法在中国十二音作品中的体现与运用

——以罗忠镕《涉江采芙蓉》为例

胡舒翔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十二音序列音乐作为现代主义音乐的一部分,对当今音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其在作曲技法上的独特性,与传统的调性音乐在音乐思维、音乐语言上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演唱上有一定的难度。从矛盾分析法出发,以中国第一首五声性十二音作品《涉江采芙蓉》为例,通过对作品形态、内容、思想、情感等分析,探讨中国十二音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使演唱者能够更好地诠释作品,真正实现诗、情、意的完美融合。

**关键词:**矛盾分析法;对立统一;涉江采芙蓉;中国十二音作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7

**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098-05

作为现代主义音乐重要的一部分,十二音序列音乐与传统的调性音乐在音乐思维、音乐语言上存在较大差别,其中蕴含了多种矛盾关系,比如音乐形态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与统一,音乐内容表达的钢琴伴奏与旋律的对立与统一,音乐思维和音乐语言的特殊性<sup>[1]</sup>,音乐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心情感等。

对于十二音作品中出现的矛盾关系运用两点论将音乐表达中的理性和感性一分为二,杜绝顾此失彼;同时坚持重点论将音乐内容和音乐表达的主次矛盾区分开,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突出重点;针对音乐思维和音乐语言的特殊性,运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论,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坚持具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用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十二音作品中的矛盾,避免思想僵化,进而使作品的表达实现对立元素的和谐统一<sup>[2]</sup>,作品内容与表现形式的诗、情、意的完美融合。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十二音作品中的矛盾关系,笔者选取第一首中国化的十二音艺术歌曲《涉江采芙蓉》为范例,从作品形态、内容、思想、情感方面探讨中国十二音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矛盾的特殊性等问题,为音乐作品更精准的表达提供借鉴和参考。

## 一、音乐形态中的对立与统一

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于1923年发布了他的第一首十二音作品《钢琴组曲》(op. 25),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标志着十二音体系的建立,也使得无调性音乐趋于规范化、理性化。由于十二音体系音乐是以序列为基础进行发展的,也被称为序列音乐。十二音音乐是基于数理逻辑与理性化的一种无调性的技术手法,通过十二平均律音的排列及其对位式的变化进行音乐创作,共由十二个不同的半音组成,这十二个半音排列构成一个序列,序列通过逆行、倒影、倒影逆行等作曲技法发展,以此形成乐曲。由于十二音体系是基于平均律发展来的,其三全音音程用C-#F或用C-bG来标记是没有区别的,同时十二个音处于同等地位,因此十二音序列音乐又具有强烈的理性化特征。十二音序列充分体现了原型序列(原序)的自由运用,要求原序不断重复及变化,与整部作品呈现自相似性。

1941年德国作曲家弗兰克尔在上海任教时,教给学生们一种新的作曲技法“十二音作曲法”,这也是“十二音体系”这种极具西方理性色彩的作曲体系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sup>[3]</sup>在弗兰克尔的指导下,桑桐先生在1947年创作了中国最早的自由无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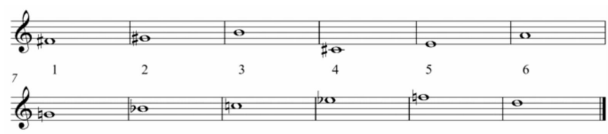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2-06-20

作者简介:胡舒翔(1999—),男,河南郑州人,西南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与心理学。

音乐作品《夜景》。《夜景》的诞生开启了中国作曲家自由无调性作曲技法的研究和探索之路。但由于一些历史因素,无调性作曲技法在中国的探索在其时并没有创造出多少优秀的音乐作品和研究成果。直到1979年罗忠镕先生创作的中国第一首十二音五声性声乐作品《涉江采芙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在十二音作曲道路上的探索和发展。

《涉江采芙蓉》作为一首标准的十二音序列音乐,也是第一首中国化的十二音艺术歌曲,严格采用了十二音作曲技法,以中国古诗词谱曲,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它实现了诗曲合一,打造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罗先生将十二个平等的半音排列起来形成序列,并将序列分成原型(P6)、逆行(R6)、倒影(I6)、逆行倒影(RI6)等形式对乐曲进行发展(见谱例1),体现了作者对序列创作的独特设计。

谱例1:《涉江采芙蓉》十二音序列



中国的古诗词创作是创立在中国文人特有的思想基础上的,古代文人在创作诗词时,通常会将自已的情感、思想和人生阅历通过诗词进行表达。《涉江采芙蓉》全诗五言八句,是一首美丽凄凉、思念深切的短诗,生动描写了游子思乡、思念亲人的离愁之情,从这首诗中仿佛可以看到这样一番景象:远在家乡的妇人不顾危险涉过江水去采摘美丽的芙蓉花,采摘完芙蓉花后意犹未尽又跑到芳草萋萋的兰泽里,去采摘兰草想要赠给在远方自己魂牵梦绕的爱人,然而远方的游子回头看自己的家乡,却是山遮水挡,长路漫漫。游子和妻子两人本应同心同德,相依在一起,但却只能分隔两地,孤身一人在忧伤中老去。又如宋朝诗人晏几道所创作的《鹧鸪天》,表达了诗人与一位风尘女子久别重逢时的开心却又复杂的感情,作者通过“犹恐相逢是梦中”一句就表达出了其忧郁的心情。可以说,中国的古诗词饱含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性特征。

矛盾的对立面相互依存,在一个统一体中互为存在的前提,矛盾的对立面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在序列音乐作品中自然融入中国音乐风格,实现无调性因素和调性因素两种看似对立的因素合理结合,需要作曲家突破常规的创作方式,以达到音乐作品的可听性和内涵度<sup>[4]</sup>。在《涉江采芙蓉》中,罗忠镕先生为了能让西方理性的无调性音

乐与中国感性的古诗词相结合,在作曲时除了运用西方的十二音技法,还将中国传统极具民间特色的五声音调融入其中,兼具“饱和的调性因素”和“鲜明的五声音调”特征<sup>[4]</sup>,使得这首作品既具有现代特征,又散发了浓郁的民族气息。同时罗先生在创作技法上并非单纯依靠纯理性的推演,而是在序列设计、旋律塑造、和声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斟酌考究,使得十二音序列具有“突出的调性因素”和“明显的五声音调”<sup>[5]</sup>。如谱例2中,在第一句中就包括了E宫的五声音阶和bB宫的七声音阶。而E宫的五声音阶和bB宫的七声音阶结合起来恰巧就组成了一个八度中没有重复的十二个音,这一特征也说明了罗忠镕先生巧妙地将五声调式与十二音作曲技法融入一起。因为作曲中的五声性因素,使得演唱家在演唱时,观众能在理性的十二音音乐中听出属于古诗词的音韵美和古典美。正因为中国传统五声调式的连接,在这首作品的音乐形态上,罗忠镕先生将理想化的十二音体系与具有感性的中国诗词相统一,使得二者相互对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

谱例2:《涉江采芙蓉》的五声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出版的《涉江采芙蓉》<sup>[6]</sup>谱例中,第一句“涉江采芙蓉”中“涉江”两个音是#F和#G如谱例3所示。但在之后的谱例中“涉江”二字的音都已经改为#G和#F。对这一现象,笔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通过与罗忠镕先生的学生进行交谈了解后,发现罗忠镕先生是四川人,在作曲时,他习惯性地 will 四川方言“涉江”二字的发音带进谱例中,发现这一问题后,又将这两个字改为普通话的发音,这说明了在创作这首作品时,罗忠镕先生注重发声音调融入这首理性的十二音作品之中,使得整首作品既存在对立的因素又相互统一。

谱例3:《涉江采芙蓉》初版谱例第一句



## 二、音乐内容中的对立与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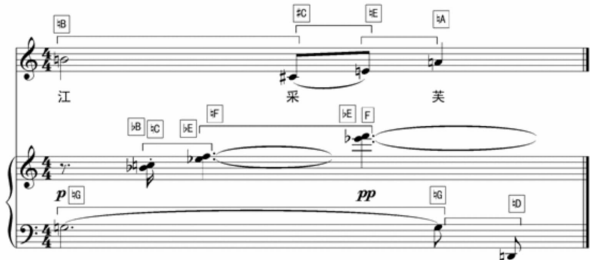
通常的调性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往往与演唱旋律交相呼应,二者相辅相成,并且在演唱与演奏

时,钢琴伴奏往往能通过相同的旋律音或和声给予演唱者一定的支持。而在十二音作品中,钢琴伴奏和旋律二者关系则相对独立。分析发现,在《涉江采芙蓉》这首作品中,钢琴伴奏中并不会出现与之纵向对应的旋律音,并且在作品旋律音出现时,与这个旋律音所纵向对立的钢琴伴奏中并不会出现该旋律音。在全曲中随机选择一个片段进行验证,如谱例4所示,当旋律音出现 $\flat B$ 时,此时与旋律音纵向对应的钢琴伴奏则是 $\flat G$ 、 $\flat B$ 、 $\flat C$ 、 $\flat E$ 、 $\flat F$ 这几个音,表明了在这首无调性音乐作品中钢琴伴奏和演唱旋律两部分相对独立,不能共存,这也使得歌唱者在演唱作品时很难通过钢琴伴奏找到演唱的旋律。

罗忠镕先生在作曲时通过钢琴伴奏,诠释了一部分歌曲所蕴含的内涵。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旋律和钢琴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纵向联系的,例如在全曲开头的引子部分如谱例5所示,此时前奏中已经将序列的原型和逆行两种形式放在伴奏之中,使听众在听到歌曲旋律后能对序列留下更深的印象,同时演唱者可以从前奏中找到在演唱时的旋律音——如前奏部分最后两个音就是歌唱旋律开头的两个音,这样就可以帮助找到演唱时的音准。同时歌曲通过前两个乐句较平稳的铺垫,在第三乐句中通过力度记号的逐渐加强( $p$ — $mf$ — $f$ )将整首作品推向高潮,钢琴伴奏也通过旋律的起伏增大以及和声的紧张性逐步增强将旋律推向高潮。在节奏上,前奏中所出现的带附点的节奏型在整首作品中多次出现,用于增强作品的统一性,说明罗忠镕先生特别注重作品整体感的塑造。

罗忠镕先生对于前奏和节奏的塑造就是典型的“矛盾转化”的表现形式。乍看此曲的钢琴伴奏与歌唱旋律似乎是各自独立,甚至在演绎的过程中相互对立。然而,实际上它们在寓意、色彩、动率、情感的内在连接上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演唱者可通过对作品节奏的缓急及音色的明暗把握、钢琴伴奏与声乐歌唱的配合,完成对作品内涵意境的诠释与表达。

谱例4:《涉江采芙蓉》旋律音与钢琴伴奏关系



谱例5:《涉江采芙蓉》引子部分



### 三、矛盾的特殊形成中国十二音作品的风格

勋伯格创造无调性十二音技法的目的是打破传统的和声体系,破坏调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西方的十二音序列作品中,旋律横向音程关系大多为一些不协和音程,如小二度、大七度等,三全音和半音在作品中也会经常在相邻音中出现。由于作品中出现大量的难、怪音程,当我们聆听作品时,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协和感觉。在研究《涉江采芙蓉》时笔者发现旋律部分的相邻音关系组成与传统的西方十二音作品存在着一些差别:在这首作品的旋律中相邻音之间关系均为大二度和小七度、小三度、纯四度、纯五度的音程,没有出现小二度、大七度、增四度、减五度等音程。例如在旋律的第一句(谱例6)所示,乐句“涉江采芙蓉”中的相邻音之间的关系分别是大二度、纯四度、小七度、小三度、纯四度、大二度的音程。同时如谱例6中,在原型序列中,序列的前五个音和后七个音分别构成了E宫的五声音阶和 $\flat B$ 宫的七声音阶,并且相邻音之间的关系为大二度、小三度、纯四度音程。这些音程都属于五声性音程,十二音序列常出现的三全音和半音并没有在相邻音中出现,这都使得它的音程的色彩也被冲淡。同时五声性民族色彩的凸显使得整首作品在听感上也显得相对和谐。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其实就是矛盾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十二音作品中,中国十二音作品源于西方十二音体系,但由于我国的作曲家在创作时融入了中国特色的五声音乐又使得中国十二音作品与西方十二音作品在一些方面存在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事物的本质,同一音乐作品中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体系,也正源自它们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这也是此作品所具备的最典型特征——融合中西方作曲技法的中国十二音音乐作品。<sup>[7]</sup>罗忠镕先生考虑到民族曲调的基本乐汇、基本旋法的五声性,并将这些旋法的“基因”——大小三度进行抽取出来,在十二音依次出现的链条中,通过不同节奏组合的切割,把数个相邻的音组构成典型的五声性曲调,从而使链条中的每一环都具有明显的民族乐汇气质,并在保证了统一的无调性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出中国色彩。这些聚集在不同节

奏时空中的中国风味的曲调片段,有效地冲淡了十二音手法的无调性风格,又在抑扬起伏的句读中表现了忧愁的语势,<sup>[8]</sup>这首作品既包含着西方无调性音乐的因素,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民族五声音乐的韵味。从矛盾分析法的层面上看,正因为在西方的十二音作品中融入了中国特有的民族五声性因素,才使得中国十二音作品具有明显的辨识度。作为当代的演唱家,只有意识到中国无调性音乐所具备的“特殊性”才能更好地去演绎具有中国风格的十二音作品。

谱例6:《涉江采芙蓉》第一乐句横向旋律音程关系

#### 四、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中国十二音作品演唱中的运用

中国十二音作品由于其在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方法和表达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走向繁荣。在此期间,中国作曲家的音乐风格与创作技法等多个方面有了新的进步与发展。有许多专业作曲家加入无调性音乐的创作中,他们把新的音乐风格,新的创作技法注入无调性音乐创作中,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进行了创新。创作出来的歌曲不管是在创作技法上,还是在音乐风格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大大增加了演唱者学习和演唱十二音作品的难度。

声音是歌唱的基础,没有声音歌唱也就无从说起。在十二音作品的演唱和学习中,由于其独特的创作技法,使得有很多学习者只是停留于对音乐作品的音准和节奏的重视,在练习时注重于如何将作品完整的呈现出来,这种学习者在演唱时可听出其声音条件非常优秀,也具有一定的技巧性,可最后呈现出的演唱效果却很难打动听众。从矛盾分析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演唱者在学习十二音作品时忽略了其中所蕴含另一特殊性:情感的表达。

一首声乐作品中,声音在声乐作品中承载着基础的作用,正如中国古代音乐专著《乐记》中所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没有声音,声乐就不可能存在,声音就如同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一切音乐作品之中。而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则如同矛盾之中的“特殊性”,《吕氏春秋·音初》中写到:“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可见情感在歌唱中的重要性,只有把握歌唱中的情感,了解其“特殊性”才能更好地将声乐作品完整呈现出来。

《涉江采芙蓉》中表达的是游子的思乡之情。因此就要求演唱者在演唱时表达出来孤独、悲伤、惆怅的情感,在演唱时音色不应该过于明亮,速度也应较慢。在第三乐句的高潮部分,应注意表达出忧伤、惆怅的情感。这样听众在聆听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韵味和美感。而如果仅仅只是按照谱面上的内容进行演唱,单纯地将歌曲的歌词和旋律以专业化的形式呈现给听众,那么听众就无法感受到歌曲中的情感和古诗词艺术独特的意境之美。

声音是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情感是声音演唱的灵魂,通过声音和情感的输出与观众产生共鸣。声情并茂是一部优秀音乐作品表达的最高境界,演唱者只有正确理解创作者的意图,融入个人情感再创作,合理有度表达情感,才能通过声音载体将作品完美地呈现给观众。因此,从矛盾分析法的层面看,声音和情感在声乐演唱中相辅相成,既要重视声音在声乐中的普遍性,也不能忽略声乐中情感的特殊性,只有用声音来传达歌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用心感悟和体会情感,从而带动声音的表达,才能更好地演绎出一首优美的十二音作品。

#### 五、结语

中国十二音作品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与意义。《涉江采芙蓉》作为中国第一首将西方十二音序列与中国传统五声音乐相结合的音乐作品,开创性地将中国的调性因素巧妙地融入了无调性序列设计中,对之后的中国十二音作品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作用。矛盾分析法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创作中,但其中所蕴含的科学分析和严谨理论却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去更全面、更透彻地解读中国十二音作品的具体形态和内容,并指导学习和演唱中国十二音序列音乐作品的学生和演奏家们将声音与情感结合,更好地去诠释作品。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十二音作品分析

相结合,利用矛盾分析法中的部分原理对《涉江采芙蓉》中音乐之间的关系进行叙述与分析。从矛盾分析法的“两点论”看,作品所展现的音乐形态中理性与感性、钢琴伴奏和演唱旋律的对立统一为作品的艺术性和可听性的提升提供了智慧启迪;从矛盾分析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看,正因为“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大创作风格都包含其特殊性,使得音乐作品具有明显的辨识度。

作为演唱者,只有充分意识到不同题材风格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意识到情感在声乐演唱中的特殊性和声音在声乐中的普遍性,才能通过声音和情感表达更好地诠释作品内涵,展现作品的艺术价值,为演唱者在作品表达方面提供正确的方法指引。

#### 参考文献:

[1]王天宏.自由无调性、十二音序列音乐视唱教学研究与分析[J].音乐创作,2015(9).

[2]李琳.论声乐表演中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和处理[J].黄河之声,2021(20).

[3]邵承帅.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及其在中国当代作品中的运用[D].长春:吉林艺术学院,2017.

[4]王艺莹.植根民族,兼收并蓄,传承中国音乐传统:谈序列音乐艺术歌曲《涉江采芙蓉》[J].北方音乐,2015(22).

[5]程楚楚.罗忠镕十二音作品《涉江采芙蓉》研究综述[J].音乐创作,2020(5).

[6]郑英烈.歌曲《涉江采芙蓉》的创作手法[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1(3).

[7]戴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爵士鼓学习与演奏中的价值初探:以矛盾分析法为视角[J].黄河之声,2020(1).

[8]赵微.浅析罗贯中《涉江采芙蓉》的创作风格[J].大众文艺,2012(21).

(责任编辑 许峻)

## The Embodi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ntradiction Analysis in Chinese Twelve Tone Works

——Taking Luo Zhongrong's *Crossing the River and Picking Hibiscus* as an Example

HU Shux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music, twelve tone sequence music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usic. It is difficult to sing due to its uniqueness in composition techniques, an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onal music and traditional tonal music in terms of musical thinking and musical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diction analysis, taking the first Chinese pentatonic twelve tone work *Crossing the River and Picking Hibiscus*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 content, thought and emotion of the 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opposites and unity maintained in the Chinese twelve tone works, so that the singer can better interpret the work and truly realize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poetry, emotion and meaning.

**Key words:** contradiction analysis; unity of opposites; *Crossing the River and Picking Hibiscus*; Chinese twelve tone works

# 《立体构成》课程线上线下 教学互补模式及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实践

禹典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遗产与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传统课堂正在逐步走向网络化教学平台,线上网络教学对于每一位习惯于传统教学的教师都是挑战。以《立体构成》课程为例,探索线上线下创新教学手段,整合两种教学方式的优势,构建两种教学方法的互补模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关键词:**立体构成;线上线下教学;互补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8

**中图分类号:**G642;J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103-04

《立体构成》是美术设计教学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素质与技能培养科目。教学目标主要是让学生对三维立体形态进行科学而又技术化地解剖、重组,创造一种全新的三维立体造型,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活的艺术创新思维能力<sup>[1]</sup>,以提高学生形象化思维能力、美术思维能力和建筑设计的创新能力,为今后的设计活动开展提供广泛思路,为学生在建筑空间设计、美术造型、装饰设计、包装设计等各个领域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立体构成》课程是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既有对平面空间的理解又有三维立体形态的创造,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立体构成》的教学可分为基础知识和技能训练两部分,两部分都需要分别设计合理的线上线下教学内容,充分发挥线上教学方式与线下教学手段各自的优势,以提高实际教学效果。

## 一、《立体构成》线上教学内容模式及教学阶段设计

线上教学内容的设计主要围绕传授学生立体构成基本概念、立体构成的基本要素,认识点、线、面、体四要素构成的组合表达方式及制作手法、材料要素、技术要素等基础知识的认识理解,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形象思维和审美观念,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从二维构成到三维构成理解能力的提高。

阶段一,课前导学阶段。老师课前必须熟练掌握线上教学软件的操作,并精心制作每一节线上课堂的内容,使其具有专业的个性化教学设计,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备课,还需要设计一个讨论环节来回答课后的问题。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已经在线上接受了其他课程的学习,对于线上学习是有体会的。针对学生分散各地不能集中的特点,老师在正式开课之前一定要召集学生线上进行签到,了解学生的准备情况,教材是否在身边,网络的通畅度,提醒学生认真对待课前预习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每次课前一天以微视频或慕课形式给学生提供有关《立体构成》课程的新知识点,根据教学重点、教学难点分成若干分节,每节控制在15分钟以内,学生可以随时利用零碎时间在任何地点使手机或电脑进行预习,如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进行重复回放。

阶段二,课中教学实施阶段。课上设计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内容模式,以作业的形式抛出问题。因为学生知道课后要完成作业,他们会更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认真听取老师的讲解。线上直播教学,对于立体构成这门课的优势是可以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图片资料,以凝炼的文字配上生动的插

收稿日期:2021-11-15

作者简介:禹典(1989—),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遗产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空间设计。



图可以降低学生在看到满屏文字课件时的不适感,保持对课程的兴趣。课堂上老师一定要把教学节奏牢牢把握,以防自己从头到尾唱独角戏,在讲解完每一个知识点时,可以做适当的停顿,给有问题的学生有互动时间。当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时,老师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本技能和灵活的教学应对能力。《立体构成》线上教学内容模式对老师的专业知识要求更高,与学生的课堂互动更加有难度,因此比线下教学内容模式增加了工作量,也给老师带来了挑战。学生学习立体构成,刚开始还是依循二维思维的习惯,理解三维空间构成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有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空间的衔接训练,使学生逐渐向三维思维过渡。比如,为了让学生理解形状与形态概念的不同,老师就要提前做功课,可以录段小视频,以魔方为例进行讲解:形状是魔方的一个面,或面上的各个小四方形的图形;而形态就是魔方转动起来每个方位的瞬间具象或扭动魔方的阶层所出现的不同姿态。随后以平面图形立体化为训练主题,在线上分小组,每一个小组完成同一项作业,自行选择平面绘画、图案、广告或标志进行立体化呈现。老师给予评价标准,师生共同确定选题是否合适、立体效果、材料的合理应用、美观程度等等。作业完成后,小组成员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进行互评,以此倾听学生对立体构成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程度,考查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最后老师进行总结点评考核。在材料认知和选择的环节,可以给出以低碳绿色环保为主题的作业,鼓励学生找寻身边可回收利用的废弃材质,以思政理念倡导勤俭节约、善待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老师教的过程,也是提升自我的过程,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不足,更新知识结构拓宽眼界,适应新时代科技的发展,关注新技术在艺术设计领域上的创新结合信息。

阶段三,课后辅导阶段。在课后还需要设计讨论区答疑,线上学习由于时间有限,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无法课堂上及时与我们老师进行交流,课后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的便利,设计讨论区答疑,这样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想法。一些不敢在课堂上提问的学生也会比较主动地参与交流讨论,提出疑难问题,老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根据学生反馈情况进行教学反思,及时拓展学习内容、修订下一节课的教学方案。

由于是线上授课,学生的学习状态我们老师无法精确把握,需要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以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在第一天开始授课之前,我们老师就要将《立体构成》这门课的总成绩考核评分规

则讲解给学生,使学生明白线上学习成绩贯穿课前阶段、课中阶段、课后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针对性的评价,包括签到考勤、作业考核、课堂测试、课终作品等,这样可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紧迫感。

## 二、《立体构成》线下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设计

《立体构成》的线下教学主要以技能训练为主导,使点、线、面、体四要素在造型创作中准确体现,以三维立体创作训练为主线,注重培养学生的三维空间立体视觉的表现和创造能力,与已经进行过的线上教学内容相结合,进一步剖析三维空间立体形态的本质,挖掘学生的思路,拓宽教学手段,探索新材料、新技术与新科技的融合,使三维立体形态鲜活起来。

### (一) 三维视觉技能训练

立体构成原理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展,线下课程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来进行。单以教科书中的立体构成图例对立体构成的形式要素进行讲解是不够的。我们老师需要利用简便易寻的材料自己制作一些立体构成作品,在课上进行辅助展示说明,帮助学生理解空间形态的抽象内容。在学习空间形态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积累空间设计中十分重要的三维视觉语言,这种语言是进行造型艺术设计的主要物质传播媒介,也是表达自我设计意图的重要元素。同时应注重结合专业方向,把《立体构成》课程从线上的理论讲述提升到实践指导的高度,注意结合计算机三维设计软件工具将构成造型转化为产品的各项练习。通过一定数量的立体构图设计和作品制作练习,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基本的立体构成设计规律,从而增强学生的空间意识和空间感知能力,使学生建立良好的思维习惯,深刻理解设计与构成的关系、视觉构成语言等设计原理,与之后的专业课程前后连贯,发挥引导性作用。

### (二) 创新设计能力的训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sup>[2]</sup>。老师在课堂上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 1. 树立学生的创新意识

回到立体构成的课堂上,通过我们老师的引导让创新概念深入学生的意识中,可以举出跨行业各种创新的优秀实例,评价创新引发的社会效应,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理解事物和分析问题,激发学生创新的欲望,从而为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奠

定基础<sup>[3]</sup>。学生在掌握了三维立体造型原理和制作技能的基础上,给学生一个讨论的空间,一个能发挥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作业,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和技能,在自己的作业中探索和拓展现代设计创新思维。

## 2. 增强学生的创新自信

线下课堂的老师应该充分肯定和鼓励那些敢于一次又一次尝试的学生,让学生不断地体验、探索和总结,从而树立起创新自信。在引导学生开展立体构成探究性学习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老师应该善于发现和挖掘学生自身的一些闪光点,充分肯定学生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活动中的独特性,增强学生在探究性学习活动中克服困难、完善自我的内驱力。

### (三) 立体构成设计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训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4月考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讲话中指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的本质关系和内在联系,指出了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方向。

#### 1. 新材料在立体构成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当代艺术家将新材料作为表达思想和观念的最直接的形式语言,不仅越来越广泛,而且越来越个性化。在立体构成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利用各种个性材料进行视觉构成和造型创作,达到最恰当、最理想的表现效果。这需要充分认识及选择材料,从而提升作品主题的表现。在教授学生充分认识各种材料的性质、性能、形状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打破传统模式下的材料形式,尝试材料形式的创新,寻找材料形式的各种可能性,探索个性化造型形态。一是借鉴当代艺术家应用新材料创作的作品以及运用传统材料而形式创新的作品,开阔学生的视野。如韩国雕塑家、装置艺术家徐道濩采用新型纤维材料还原电话亭、房间以及房间内的家具等生活中常见的物品,通过色彩丰富、通透的纤维材料对曾经家园的再创造,强调了人与物质空间的联系。二是调研材料市场,查找最新、最广泛使用的材料,了解材料研发的新趋势。三是在日常生活中多仔细观察,从新购置的物品中发现存在可以作为《立体构成》课程的材料。鼓励学生掌握材料特性,在设计实践环节,能够很好地展示出创造性。

#### 2. 新科技在立体构成教学中的运用

计算机软件与艺术创意紧密结合能够快速便捷地体现创意效果。在传统立体构成教学中,有些学生不能从各种各样的材料中创作出符合自己想象的作品,很多时间用在了材料选择中。同时造型成型

需要手工制作,并受组合空间、材料重力等因素的影响,工艺也不能过于的复杂,这些情况都会影响作品效果。使用计算机软件设计,学生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完全不用考虑工艺、材料的局限等种种因素,把精力集中在作品效果上,不拘一格地变换色彩、搭配纹理和图案,将想象变为虚拟现实,还可以轻松反复修改,从而达到自己理想的创意效果。

3D打印、激光技术与艺术设计跨学科渗透协作。在高科技发展的现代,先进的制造技术作为手段,为艺术的表现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其中3D打印(增材制造)、激光技术(激光制造)也以其独特的内核魅力为艺术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提供了广阔空间。3D打印是通过计算机软件建立的数据模型文件控制打印机将可黏合的粉末状材料(塑料、金属等)以层层叠加的方式建造型。3D打印应用在立体构成教学中,可以使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的奇异构思造型得以真实呈现。异形形态的造型由于受组合空间、材料重力的影响,难以使用传统手法制作,3D打印可以非常完美地进行呈现,抽象思维完美变成有材质、有触感、有形态的实体,其效果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立体空间想象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激光技术也同样可以助力立体构成教学。目前,激光加工技术是利用一系列的光学系统聚焦成微细光束,以极高的能量密度照射在材料表面,使材料熔化甚至气化<sup>[4]</sup>。不同的材料在激光功率、速度、加工方式等参数的控制下呈现不同的烧灼颜色,硬质材料可成凹凸肌理、软质材料展现质感图纹,材料形态可翻转、可扭曲、可折叠、可拉伸、可连接,形成独特的“激光材料”。在立体构成的创意设计造型中,可以搭配这种“激光材料”,更好地表达造型的内涵,还可以首先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将立体造型进行分解,尺寸缩放、卯榫结构精确计算,然后用激光快速加工出零件,最后组装成立体造型。当然,激光技术也因受材料厚度、材质的限制,对于异形立体造型的实现难度很大,需要3D打印技术与之互补。

### 三、线上线下教学的互补模式分析

与线下教学相比,线上教学缺乏面对面的情感交流,面对面的线下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和老师之间所具有的“互动性”“亲切感”远远强于线上,更容易保证教学质量,那些自制力欠缺的学生在线上学习达不到线下学习的效果。对于《立体构成》课程来说,光听课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适量进行技能作业练习。在线下,不懂的可以直接向老师提问,老师可以手把手示范教学,而且线下师生一起讨论交流更

为方便,这些也是线上教学无法实现的。

在实践中总结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模式的利弊,针对教学内容进行线上线下教学互补模式的探究及教学手段的改进,使线上与线下教学相互交融,可以得到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比如《立体构成》课程教学评价可以由线上和线下共同完成,统一协调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并重的评价机制:学习过程是在线上理论知识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的评价,学习结果是在线下实践训练教学后对学生设计作品的评价。老师线上讲授理论知识应与线下实践训练及相关的设计环节相结合,结合设计作品内容进行命题,在线上组成若干小组,针对命题展开讨论,以取得最佳设计作品方案,运用翻转课堂考查学生掌握立体形态造型设计与制作方法的情况,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价。线下实践训练课程,继续保留线上小组成员,老师深入每一个小组中进行作品命题的讨论,与学生共同努力,解决作品命题训练中的实际问题。师生之间、小组之间面对面交流、观摩、展示、分析,并对设计作品的结果进行评价。例如,学生以众志成城战胜新冠病毒为主题的作品,用简单的几何形体通过色系的深浅、实物与剪影做对比,表现空间;用光感强化空间,以病毒为题做钥匙链提醒人们警觉;用喇叭形状代表病毒分支,链子环环相扣,向周围人传递团结防疫精神。另外,《立体构成》课程一般安排在学生学习了 Rhino 或三维建模软件之后,学生具备了一定的立体空间视觉概念,老师提前在网络资源选择有关计算机软件设

计的作品,线上讲授时结合教材中有关资料,使学习内容更形象化,启发学生设计思维灵感、完善造型构思,在单位作业练习中,利用计算机设计软件的快捷多做练习,训练创造性思维能力和造型感觉;线下讲授实物造型制作时,学生经过大量线上作业练习,已经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软件制作出形态造型了,线下就可以主要用来讨论学生所要制作的作品实体,用新颖的材料,融合新科技的多样性技术手段,来表达自身的情感、状态,做出丰富视觉的作品。

#### 四、结束语

线上和线下教学都存在一定的优点和缺点,如果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实施科学的教学手段,融合新科学技术,注重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的结合,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相得益彰,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刘金婷,陈晨. 浅谈高职院校艺术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J]. 科学大众,2019(5).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67.
- [3] 于进海. 班主任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几点思考[J]. 科教导刊,2009(1).
- [4] 叶建斌,戴春祥. 激光切割技术[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许峻)

##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mplementary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s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Course of Three - Dimensional Composition

YU Dia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 Desig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s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The online teaching is a challenge to every teacher who is used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Taking the course of Three - Dimensional Composi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teaching methods, constructs the complementary mode of the two teaching methods, and trains th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Key words:** Three - Dimensional Composition;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complementary mode

# 活性粉末混凝土(RPC)节段预制梁制造技术

刘秀元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2600)

**摘要:**活性粉末混凝土(RPC)作为一种新型的工程材料,具有很高的抗压和抗拉强度,徐变很小,抗渗性、抗冻性、耐久性都很好。用RPC建造桥梁,可以提高桥梁跨度,减小梁体延米自重,减少了桥墩台数量。RPC与先进的节段拼装造桥法结合建造桥梁,可以实现工厂化生产桥梁,提高桥梁建设速度,节约投资。为了对RPC桥梁进行各项科学实验,专门建造了模型试验梁,研究RPC节段拼装梁的预制生产工艺,主要由RPC的配合比、拌制、运输、浇筑、养护等过程。

**关键词:**铁路桥梁;活性粉末混凝土;RPC;节段预制;剪力键;高温恒温养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19

**中图分类号:**U4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107-05

## 1 引言

活性粉末混凝土(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RPC)是现代材料科学和混凝土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高性能建筑工程材料,因为活性材料占有比例较大,称为活性粉末混凝土<sup>[1]</sup>,以下简称RPC,该材料具有很高的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还兼具有收缩徐变小,低脆性,耐久性好的优点,其抗渗性、抗冻性和耐腐蚀性指标均远远优于普通混凝土。RPC的原材料:水泥、粉煤灰、石英砂、硅灰、高效减水剂和钢纤维。RPC的工作性能原理是:使用提高组分的细度和活性使材料内部的缺陷(微裂缝与孔隙)减少到最小限度,获得了特别高强度与更高的耐久性。RPC拌和物所采用的原料平均颗粒尺寸在 $0.1\mu\text{m}$ 到 $1\text{mm}$ 之间,尽量减小了混凝土中的孔隙率,使的拌和物更加密实。RPC是一种最新研制混凝土,经过高温高压蒸汽养护处理后,RPC获得了200MPa到800MPa的超高抗压强度,还具有30~60MPa的高抗折强度,非常好地克服了一般高性能混凝土的较低强度和高脆

性<sup>[2]</sup>。

## 2 模型梁简介

按1:2缩尺,模型梁总长25.1m,支座中心距24m,9个梁节段,8道接缝。梁高度2.0m,梁顶面宽3.8m,梁底面宽2.6m,梁跨中底板、腹板和顶板均厚18cm,支座附近加厚。梁端处设1.1m厚横隔板加强。用R120级活性粉末混凝土浇筑。板厚未按1:2缩尺,是为了满足底板钢束和腹板钢束的布置。接缝面均设活性粉末混凝土剪力键。采用节段预制拼装成梁。箱梁7个中间节段长2.8m,2个两端端节段长2.75m,中间节段重量13.5t,两端节段重量22.4t。每一个梁节段在箱内顶板靠近梗肋处对称设置4个吊装孔,直径30mm,保证梁段拼装过程起吊平衡。设计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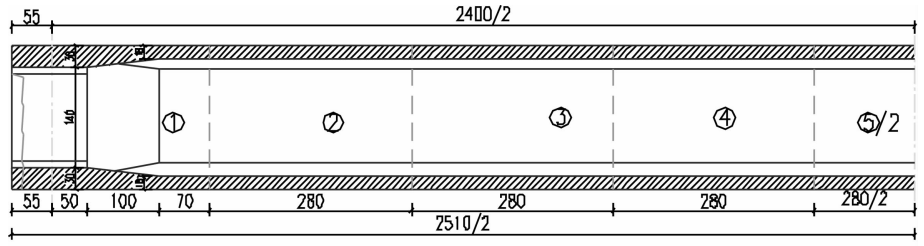
模型梁为后张拉法预应力,体内束钢绞线布置,梁腹板上设置两排 $6\times 7-7\phi 5$ 钢绞线,梁底板上设置一排 $8\times 7-7\phi 5$ 钢绞线,用直径 $\phi 60\text{mm}$ 普通波纹管预埋成孔道,腹板的锚下后张拉应力1294MPa,底板的锚下后张拉应力1259MPa。张拉完毕,尽快

**收稿日期:**2022-0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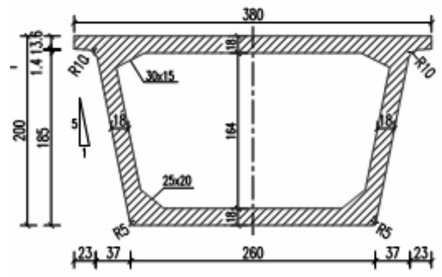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铁路总公司重点课题工务工程基础及前瞻技术研究“大跨度活性粉末混凝土铁路简支梁关键技术研究”(2014G010-D)

**作者简介:**刘秀元(1978—),男,山西繁峙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高速铁路、地铁设计施工科研工作、BIM技术研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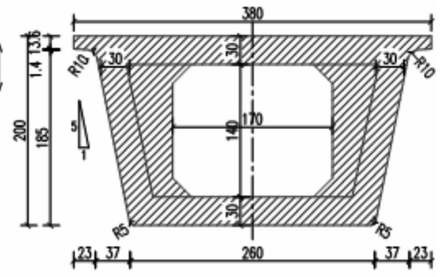
采用真空压浆法进行孔道压浆,水泥浆的强度为 M50,水泥浆里需要掺入阻锈剂。模型梁预应力设计如图 2。



(a)梁中心纵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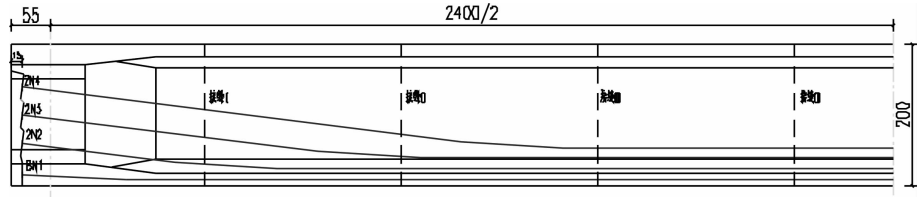


(b)跨中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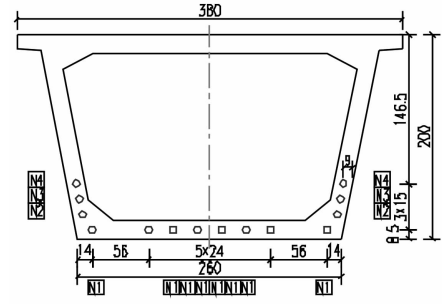


(c)梁端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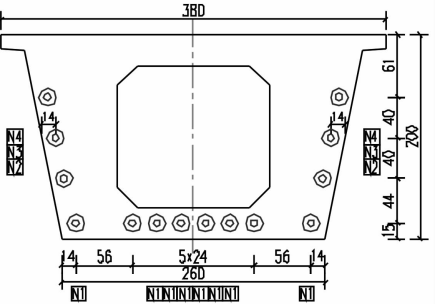
图 1 模型梁设计图



(a)中心纵断面



(b)跨中断面



(c)梁端断面

图 2 钢绞线钢束布置

箱梁腹板和顶底板均设活性粉末混凝土剪力键,采用卯榫设计,剪力键高 4cm,剪力键顶部宽

16cm,剪力键底部宽 22cm,斜面为 45° 坡度。剪力键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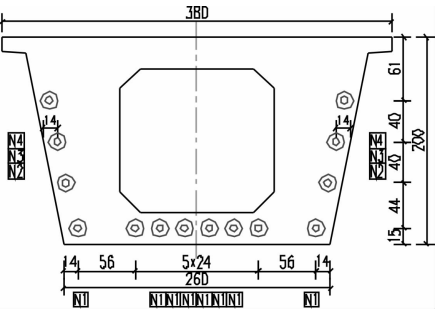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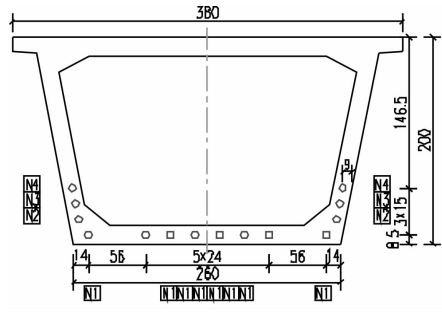


图 3 接缝 I 处剪力键布置图

模型梁用短线预制节段拼装法制作,然后拼装成整孔梁<sup>[3]</sup>。节段间梁缝用环氧树脂胶密封胶结,接缝面施工时单面涂胶,厚度不得大于 3mm。梁接缝孔道间端头粘贴聚乙烯发泡垫圈,上面有单面不干胶,保证孔道不会进胶。临时预应力采用  $\varphi 25\text{mm}$

的预应力用精轧螺纹钢筋临时拉紧拼接,单根精轧螺纹钢筋张拉力设计值为 180kN,接缝面预压应力不得小于 0.4MPa,整个截面应力必须均衡。临时张拉锚块布置如图 4。模型梁预制工艺流程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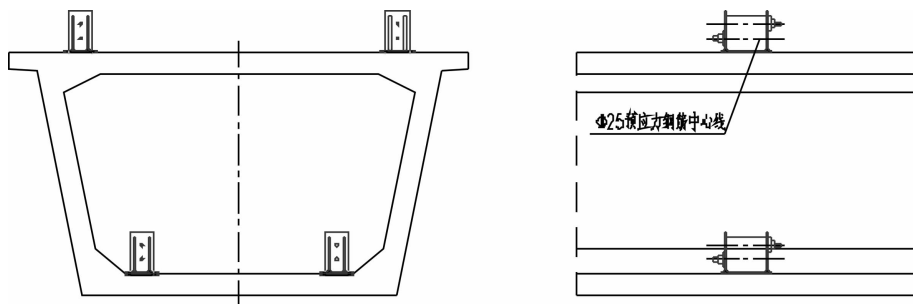


图 4 临时预应力锚块布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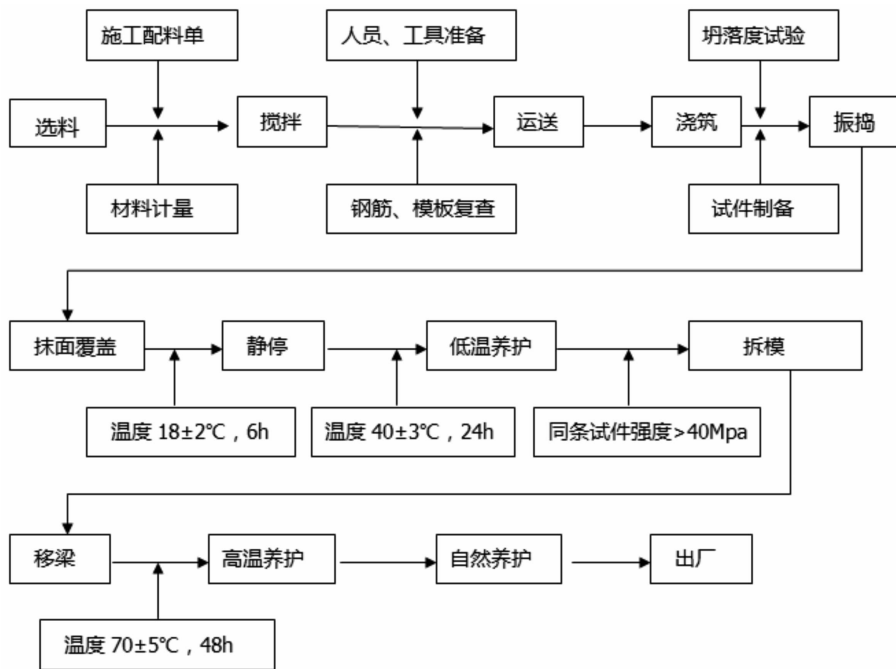


图 5 模型梁预制工艺流程图

### 3 RPC 混凝土搅拌与运输

#### 3.1 拌和机选型

RPC 拌和物流动性较差、黏度较大,须采用变频高速搅拌机或 RPC 混凝土专用搅拌机。搅拌设备应为强制式高速搅拌机<sup>[4]</sup>,叶片轴速度不低于 45 转/分。本次试验采用工厂内的 HZS750 型拌和站进行拌和 RPC。拌和站需要配置专门清洗 RPC 混凝土的设备,因 RPC 拌和物黏度较大,搅拌完毕后及时清洗搅拌机。

#### 3.2 RPC 混凝土配合比

试验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小结:曲线变化 36h 之前速率较快。可推断蒸养前期对立方体试块影响较大。36h 后曲线平缓上升。5 天强度即可达到最

终设计强度 120MPa 以上<sup>[5]</sup>。

试验轴心抗压强度试验小结:和立方体抗压强度曲线相仿,轴心抗压曲线变化自 36h 之前速率较快。36h 后曲线平缓上升。5 天强度即可达到最终设计强度 120MPa 以上。试验弹性模量强度试验小结:弹模曲线自 36h 后平稳上升,基本在第 4 天即可达到设计弹模强度 48GPa。最终配合比见表 1。

表 1 RPC 配合比 (kg/m<sup>3</sup>)

水泥	硅灰	石英砂粗	石英砂中	石英砂细	钢纤维	减水剂	水
920	170	460	340	280	120	22	174

#### 3.3 RPC 混凝土搅拌

搅拌前必须检测拌和站的计量器。RPC 材料拌和物配制时,水泥、硅灰和专用掺和料原材料,必须是干燥状态的用量,且均以质量计<sup>[6]</sup>,每次计量

时,对计量称校零,计量设备至少准确到 $\pm 1\%$ 。骨料称量须准确到 $\pm 2\%$ ;水、外加剂的用量按重量计,称量须准确到 $\pm 1\%$ 。

搅拌时的投料顺序为骨料、钢纤维、水泥、硅灰、矿物掺合料先投入,预搅拌4min;然后加水 and 外加剂后再搅拌4min以上,总搅拌时间不得少于8min。混凝土搅拌机的下料口上面应有专门装置,防止钢纤维结成团状。

RPC拌和物的水胶比一般要小于0.2,坍落度180mm~220mm。拌制好的RPC混凝土应在20min内灌注完毕,最长间隔时间不应超过半小时,RPC混凝土模型梁节段须连续灌注成型。

### 3.4 混凝土运输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应符合GB/T 26408的规定。由于RPC拌和物黏度很大,流动性很差,不能采用普通混凝土罐车运输<sup>[7]</sup>,混凝土用装载机运输,运距50m。运输后及时清洗运输设备。

## 4 RPC混凝土浇筑

### 4.1 分料斗设计

顶板分料器主要为三角形设计,使拌和物从一处分成四处流入模板内部,有利于使腹板拌和物浇筑高度对称<sup>[8]</sup>,可以避免拌和物成堆导致波纹管挤压变形,或一次浇筑厚度较厚拌和物内气泡排不出去等情况。

### 4.2 混凝土浇筑

(1)RPC拌和物浇筑施工前,应做好充分准备,配备足够的施工人员、设备机具,为了避免漏振和欠振,振捣工人分段负责,分工明确。

(2)浇筑前应进行坍落度、含气量和温度测试。如果RPC拌合物发生离析、坍落度过小达不到灌注要求现象时,须对RPC拌合物进行二次搅拌,严禁加水。浇筑RPC拌合物时,模板温度宜在 $5^{\circ}\text{C}$ ~ $35^{\circ}\text{C}$ 范围内,拌合物入模温度宜在 $5^{\circ}\text{C}$ ~ $30^{\circ}\text{C}$ 范围内。

(3)浇筑顺序:底板-腹板-顶板

(4)浇筑底板,内模统一安装完毕,在将内模下平模移出,装载机一次将底板的混凝土全部运送来,将拌合物倒至斜溜槽内,人工大致摊平,再开启底板上8个振动器,四人开始收面,从中间向两端,初收即可,将多余混凝土清理,移到外面。收面后立即安装上内模,准备浇筑腹板。

(5)浇筑腹板,对称逐层浇筑,每层高不超过250mm,使用分料器,装载机分料的均匀性,并注意浇筑速度,并用附着式振动器振动,以排气混凝土中和分层间浇筑时封闭的气体,并使混凝土逐层密实

振动时间控制在1~2min。

(6)浇筑模型梁底板和腹板,不能正对预应力波纹管布料,散落在模板上的拌合物残渣必须及时清理,避免模型梁表面形成麻面、干灰、夹渣等不良现象。

(7)浇筑模型梁腹板,要保持两侧基本同步等高,防止两侧混凝土面高差较大,造成内模偏移现象,由于腹板高度较高,浇筑时尽量使料斗高度放低,以免造成拌和物离析。

(8)浇筑模型梁顶板:拆除分料器,用装载机直接在顶板布料,摊平后,同时开启内模振动器、腹板上部振动器、端模上部振动器、内模角部振动器,对顶板拌和物振动,振捣后人工收面,将多余拌和物清理出去。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持水分不散发。

(9)搅拌完毕的RPC材料拌和物应在30min内灌注完毕。采用分层法浇筑,即浇筑采用“分段定点,循序推进、一个坡度、一次到顶”的方法,能较好地适应RPC拌和物浇筑,使两层混凝土不超过初凝时间,能很好凝结在一体,一次性连续浇筑完毕。在浇筑至顶面过程中,插入预埋的测温线至模型梁节段芯部,每个模型梁节段预埋3个测温线,横剖面中心及两侧50cm处各预埋一个<sup>[9]</sup>。

(10)RPC拌和物应连续浇筑,如有特殊情况,应尽量缩短其间歇时间,必须在上一层RPC拌和物凝固以前将后一层RPC拌合物浇筑完毕。最大间隔时间不应超过30min。

(11)在灌注活性粉末模型梁节段过程中,随机制作活性粉末材料立方体抗压强度、弹性模量、轴心抗压强度试件,同条件养护。

### 4.3 振捣收面

(1)振捣:活性粉末混凝土材料采用振动台与吸附式振捣相结合的振捣方式,振动台的振动频率不得低于2860次/min,振幅在0.3~1.0mm围内范。梁底部混凝土依靠8个振动台振捣,侧部混凝土各12个用附着式振捣器振捣。附着式振动器,钢模板与附着式振动器须连接牢固,防止振捣过程中移位。尽量避免适用插入式振捣棒振捣,以免影响纤维分布。

(2)RPC模型梁节段必须保证足够的振动时间,因为活性粉末混凝土(RPC)不同于普通混凝土,黏性较大,流动性较差,必须通过振动才能将气泡排出,从而保证成品的表面质量。控制振动时间,不能过振和振不实,不能重复振捣,振捣时间不小于1min,每处应以2min为限。在腹板下部和上部应适当延长振动时间,以2.5min为宜。不得漏振和过振。



(3)腹板浇筑时,可以用振动棒辅助振捣,每浇筑一层后,立即进行均匀振捣,保证 RPC 拌和物的密实性。采用赶浆法振捣,确保上下两层接茬部位结合良好,防止漏振,也不能过振。移动振动器的间距,应能保证振动器的有效半径平板覆盖范围,全面振动混凝土各部位。振捣上一层 RPC 拌和物时应插入下层约 50mm,使两层之间的接茬消除。

(4)混凝土浇筑过程如用振动棒时:a. 控制振动棒插入的深度,以避免损伤波纹管;b. 振动棒不能接触模板面板,以避免损伤模板漆膜,影响梁体表面光洁度;c. 棒体快插慢拔,尽量减少钢纤维组织分布不均匀而形成预制缺陷;d. 慢速拔出不产生空洞和气泡<sup>[10]</sup>。

(5)一边振捣一边用抹子压实 RPC 混凝土表面,人工快速抹平收光,防止 RPC 拌合物表面水分散发,保证模型梁外观质量良好。振捣过程中,要把钢纤维团和杂物检出,并将钢模顶面四周砼清理干净,防止模型梁出现飞边现象。

(6)在顶板振捣器停止前,梁表面用整平板整平,振捣器停止后,用抹子将泥浆压平收光。由于活性粉末混凝土胶凝材料较多,一般浇筑时间不宜超过 2h,及时养护覆盖塑料膜。避免表面失水过快而出现早期收缩裂缝。

#### 4.4 高温恒温养护(终养)

脱模后的模型梁节段进行高温恒温养护,分为升温、恒温、降温三个阶段,升温速度不应大于 10℃/h,降温速度不应大于 10℃/h。养护棚内温度应在 70 ± 5℃ 进行恒温养护,相对湿度应在 95% 以上。恒温养护时间不应小于 48h。降温完毕后,模型梁表面温度与外界环境温差不超过 15℃ 时,可撤除保温设施。养护温度曲线见图 6。

在养护池中,蒸汽不能直接喷在模型梁表面,蒸汽应向下方喷;在模型梁上方都要覆盖塑料薄膜,防止养护棚顶上的冷凝水直接滴于模型梁表面,影响制品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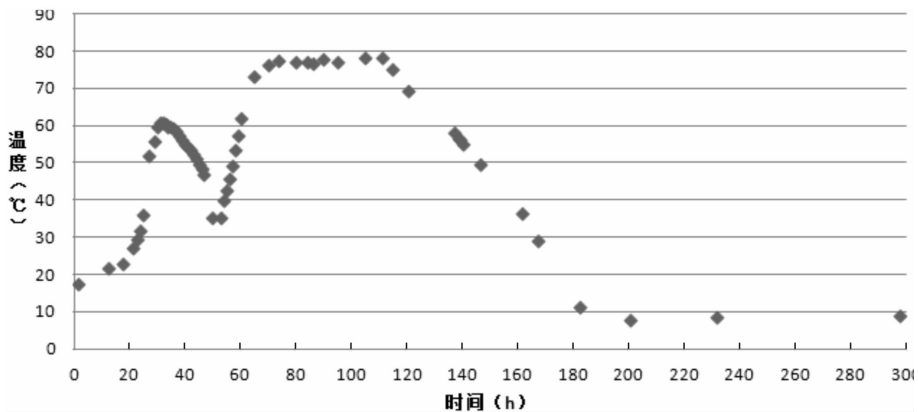


图6 养护温度曲线图

#### 4.5 自然养护

模型梁节段终养结束后,用移梁车移到车间外,在存梁区自然养护,最少养护 14 天。自然养护时,梁体用土工布包裹,上面洒水,保持土工布一直湿润。节段梁高温蒸养结束后,喷涂预制单位名称、编号、规格、生产时间等标志,25t 吊车用 10t 吊带将节段吊起用货车转移至存放地,存放场地应坚实平坦。梁体存放时单层放置,下垫 15cm \* 15cm 方木。

### 5 结束语

利用新型 RPC 材料代替普通混凝土,解决普通混凝土自重大、强度低的问题,通过开展大跨度活性粉末混凝土铁路简支梁的研究和实践,将简支梁跨度加大到 48m,采用节段拼装法施工,接缝采用胶结,以后跨度加大到 72m 乃至 80m,扩大铁路简支梁的适用范围,进而推动 RPC 新型材料在铁路工程

中的广泛应用,使中国高速铁路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 参考文献:

[1] 王苇,苏永华,班新林. 活性粉末混凝土简支箱梁模型研究[J]. 铁道建筑,2019(1):148-150.  
 [2] 孙建新. RPC130 活性粉末混凝土的配制及工程应用[J]. 铁道建筑,2017(9):148-150.  
 [3] 尚庆保. 铁路 6m 跨双线简支箱梁节段(胶接缝)拼装施工技术[J]. 铁道建筑技术,2015(2):14-17.  
 [4] 李壮. 24m 节段拼装 RPC 简支箱梁抗弯试验及剪力滞效应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9.  
 [5] 刘晋艳,刘秀元. 先张 CRTSⅢ 型轨道板模具制造技术研究[J]. 铁道建筑技术,2017(2):77-82.  
 [6] 刘秀元. 先张 CRTSⅢ 轨道板张拉技术研究[J]. 铁道建筑技术,2016(4):66-69.

(下转第 118 页)

# 类矩形盾构隧道管片施工受力性能数值模拟分析

张欢欢, 汪菁\*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宁波轨道交通三号线类矩形盾构段为工程背景,采用 PLAXIS 2D 有限元软件构建了类矩形盾构隧道管片在施工过程中的数值模型,研究类矩形盾构施工注浆率、隧道埋深和土层条件等参数对地表竖向位移的影响,并给出类矩形盾构管片的结构受力特性。结果表明:提高施工注浆率能降低类矩形盾构施工时所引起地表沉降;随着埋深增加,盾构隧道施工引起地表沉降增加,类矩形管片的弯矩增大;针对不同土层的地表沉降量分析,同一埋深时类矩形盾构在黏土中的沉降量比在砂土中小,盾构管片在黏土中的弯矩幅值大于在砂土中的弯矩幅值。

**关键词:**类矩形隧道;地表沉降;管片受力;有限元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20

**中图分类号:**TU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4-0112-07

##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大,随之带来交通拥堵等诸多城市问题;城市地下空间建设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盾构法是地下施工的重要方法。目前,我国圆形盾构技术的发展已经成熟,在双圆盾构方面的研究也已起步。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围绕盾构沉降量分析主要有现场监测分析、半经验半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方法。Peck 提出的半经验半理论分析方法是其中最简便且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方法,即地表沉降槽横向沉降曲线(Peck 公式)<sup>[1]</sup>。刘建航等<sup>[2]</sup>根据延东隧道施工实测数据得到预测纵向沉降槽曲线的公式,首次提出了“负地层损失”的概念。侯学渊等<sup>[3]</sup>对盾构推进各阶段地层变形的行为给出了机理上的解释,且提出了土压平衡盾构的地表沉降预估方法,即数值分析法。王洪德等<sup>[4]</sup>通过 FLAC 3D 研究了盾构隧道施工的建模影响因素。王冠琼等<sup>[5]</sup>采用 FLAC 3D 有限元软件对隧道开挖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分析了不同注浆

压力和不同注浆量下的地表沉降变化规律及浆液硬化作用对地表沉降和管片位移的影响,并将地表沉降的计算值和实测值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献[6-7]中采用试验预测法进行盾构沉降分析。盛佳韧等<sup>[8]</sup>通过对多个断面地表沉降测量和分层沉降监测,得到盾尾注浆是控制双圆盾构施工引起地层沉降的关键,并提出了控制沉降的措施,即注浆设备改造及工艺改造。在管片受力分析方面研究也较为丰富<sup>[9-10]</sup>,张鹏<sup>[11]</sup>通过建立考虑环、纵向接头不连续性的三维盾构隧道有限元模型,得出管片的力学性能沿隧道纵向存在较大差异,各环变形特征也不尽相同。蒋向阳<sup>[12]</sup>通过对管片的力学特性进行监测,得到较为全面准确的隧道衬砌结构荷载和管片承受内力在施工期的分布。

由于传统圆形盾构逐渐显示出其弊端,如空间使用效率低、受地下埋设物的影响大、受上覆土厚度的制约等,矩形和类矩形隧道可以弥补圆形盾构的缺点,为了解决圆形断面盾构出现的问题,矩形盾构或类矩形盾构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以类矩形

收稿日期:2021-07-28

作者简介:张欢欢(1990—),女,河南开封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建筑结构抗震、混凝土材料。

通信作者:汪菁(1964—),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建筑工程评价及模型研究。

盾构隧道为背景,对类矩形盾构进行施工模拟的研究,采用 PLAXIS 有限元计算软件建立类矩形盾构施工模拟的简化计算模型,分析了不同注浆率、不同埋深和不同土层下的地表沉降及其对盾构管片受力的影响,为工程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 2 有限元模型

### 2.1 土体模型

根据宁波地铁 3 号线工程,建立土体模型如图 1 所示: X 方向为土体宽度方向, Y 方向为土体深度方向。模型 X 方向 100m(即 -50m ~ 50m), Y 方向 50m(即 0 ~ -50m)。该模型的选取以能全面地展现盾构开挖时的研究内容为依据。此外,该截面是盾构开挖的横截面,可以清楚地研究 Peck 公式的适用性以及管片的受力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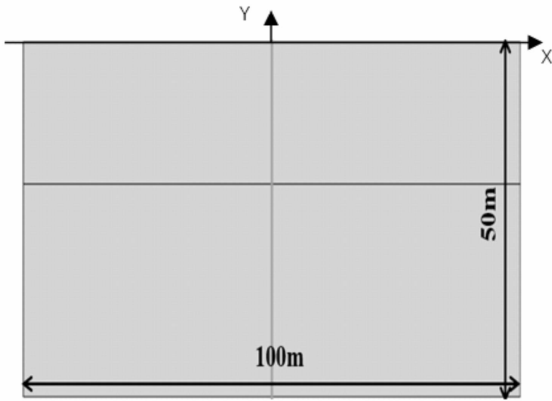


图 1 土体有限元模型

土体本构模型采用土体硬化模型 (Hardening Soil), 主要参数土体容重  $\gamma_{unsat}$ 、三轴固结排水剪切试验的参考割线模量  $E_{50}^{ref}$ 、固结试验的参考切线模量  $E_{oed}^{ref}$ 、三轴固结排水卸载-再加载试验的参考卸载再加载模量  $E_{ur}^{ref}$ 、与模量应力水平相关的幂指数  $m$ 、有效黏聚力  $c'_{ref}$ 、有效内摩擦角  $\varphi'$ 、剪胀角  $\Psi$ 、泊松比  $v$ 。土体的材料参数根据实际勘测,具体参数见表 1。

### 2.2 管片模型

类矩形盾构段实际工程中所采用的是土压平衡式盾构,其断面为 11.83m × 7.27m 的矩形。管片相比盾构机外轮廓向内缩进 15cm,即注浆层厚度为 15cm。中部设有中立柱,钢筋采用 HRB400、HRB400E 级,均为热轧钢筋,其中主筋采用 HRB400E 级。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50。外围管片的厚度为 450mm,中立柱厚度为 350mm。其断面尺寸如图 2 所示,管片材料参数见表 2。

表 1 土体参数

参数	淤泥质黏土	淤泥质砂土
材料模型	土体硬化	土体硬化
材料类型	不排水	不排水
$\gamma_{unsat}$ (N/mm <sup>3</sup> )	$0.018 \times 10^{-3}$	$0.0165 \times 10^{-3}$
$E_{50}^{ref}$ (MPa)	2.71	25
$E_{oed}^{ref}$ (MPa)	2.71	25
$E_{ur}^{ref}$ (MPa)	13.55	75
$m$	0.8	0.5
$c'_{ref}$ (kPa)	16.1	0
$\varphi'(0)$	10.3	31
$\Psi'(0)$	0	1
$v$	0.2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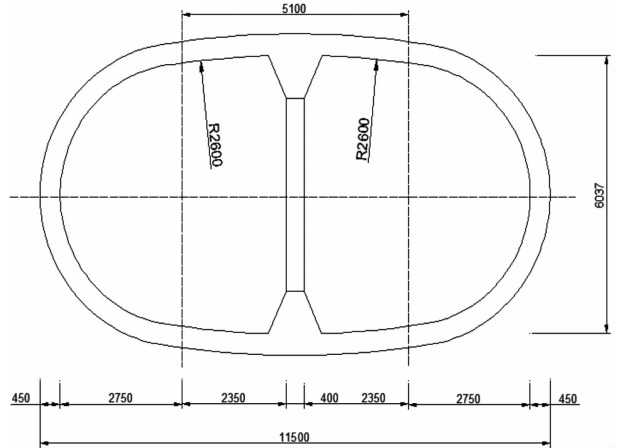


图 2 管片模型示意图

表 2 管片材料参数

参数	衬砌	中柱
材料类型	弹性,各向同性	弹性,各向同性
轴向刚度	$13.8 \times 10^6$	$13.8 \times 10^6$
抗弯刚度 (N · mm <sup>2</sup> )	$230 \times 10^9$	$184 \times 10^9$
重度 (N/mm <sup>3</sup> )	0.0084	0.0084
泊松比	0.15	0.15

### 2.3 注浆模拟

为了更加贴近工程实际,盾构壁后注浆采用等效替代法,即对应不同的注浆率(120%、150%、200%),分别计算扩展体积,然后采用浆液材料代替。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先计算出类矩形管片面积和扩充 150mm 后的管片面积,取其插值,即为 100% 注浆率情况下所需的注浆面积。依次扩大 1.2、1.5、2.0 倍,可得到 120%、150%、200% 注浆率所需填充面积,所需注浆面积与密度的乘积即为所需的注浆量。设  $S_{100\%}$  为 100% 注浆率情况下的注浆面积, $d_{100\%}$  为 100% 注浆情况下的扩展长度。则  $S_{120\%}$ 、 $S_{150\%}$ 、 $S_{200\%}$  分别代表 120%、150%、200% 注浆率情况下所需填充面积, $d_{120\%}$ 、 $d_{150\%}$ 、 $d_{200\%}$  分别代表

120%、150%、200% 注浆率情况下所需扩展长度。经计算得  $S_{100\%} = 4.626\text{m}^2$ 、 $S_{120\%} = 5.551\text{m}^2$ 、 $S_{150\%} = 6.939\text{m}^2$ 、 $S_{200\%} = 9.525\text{m}^2$ 。已知初始条件  $d_{100\%} = 150\text{mm}$ ，求解可得： $d_{120\%} = 180\text{mm}$ 、 $d_{150\%} = 223\text{mm}$ 、 $d_{200\%} = 296\text{mm}$ 。为避免多种因素产生误差，故将注浆压力设为定值，采用等效均布力的方法进行模拟实际工程中的注浆压力。主要考虑不同注浆率对地表沉降及管片造成的影响。本文所用浆液材料密度  $\rho = 1200\text{kg/m}^3$ ，压缩模量  $E = 20\text{MPa}$ ，泊松比  $\nu = 0.2$ 。

### 3 数值分析

在隧道的开挖过程中，由于天然土层受到扰动和破坏，从而导致地表沉降和衬砌管片的受力发生变化。影响地表沉降与管片受力的因素有很多，本

文选取 3 个较为重要的参数，即施工注浆率，隧道埋深和土层条件，并从地表沉降和管片受力两方面进行讨论。

#### 3.1 注浆率对地表沉降及管片受力的影响

图 3 为模拟土层为淤泥质黏土，隧道埋深 10m 的条件下生成的类矩形盾构施工过程中的土体位移云图。由图 3 可知：类矩形盾构顶部土体沉降，两侧土体呈现上浮，且隧道底部土体整体上浮，显然与实际施工结果相似。另外，隧道上方土体位移随着土体深度的增加，沉降值逐渐增大，下方土体位移随着土体深度的增加，上浮值逐渐减小。综上，该图也验证了有限元模拟的准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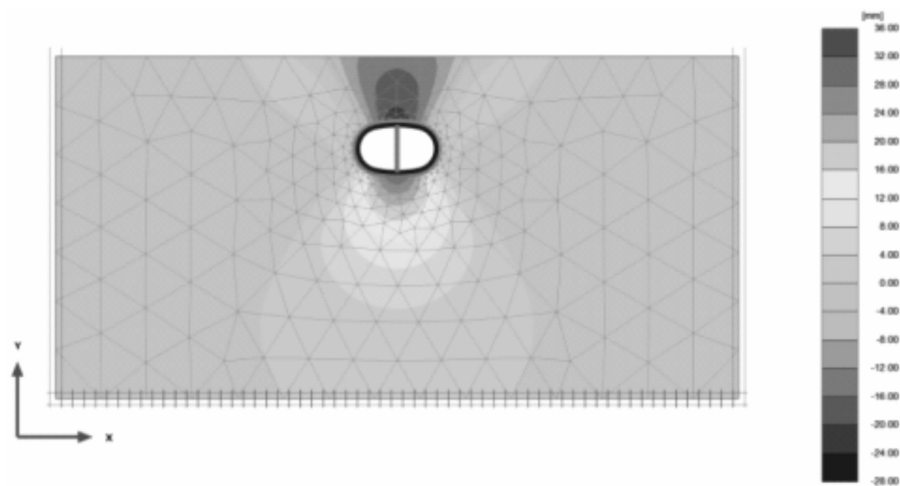


图 3 类矩形盾构周围土体位移云图

由于类矩形盾构施工时壁外注浆过程复杂，注浆率对土体和结构的稳定性存在影响，经分析得出不同注浆率下的地表沉降位移曲线如图 4 所示，其注浆率分别为 120%、150%、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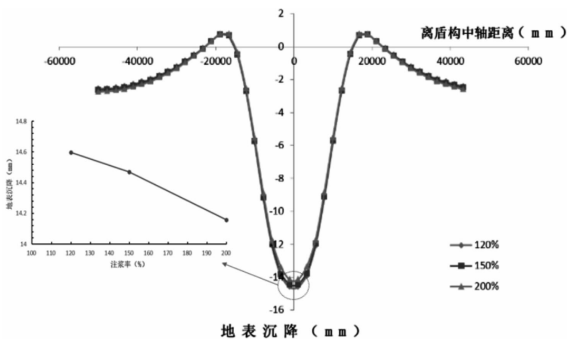


图 4 地表沉降位移曲线

由图 4 可知，地表沉降趋势与 Peck 公式所表达的特征曲线相似，进一步验证了数值计算的正确性。另外，随着注浆率的增加，地表沉降变小，如注浆率为 120% 时，盾构中轴处沉降量（位移峰值）为

14.6mm，当注浆率为 200% 时，沉降量为 14.1mm。可知提高注浆率可以降低地表沉降，但也需要考虑注浆率对施工后土体位移的影响，在工程设计阶段应引起重视。

衬砌管片的拼装是盾构施工中重要的一步，同时管片的受力特性也是盾构施工以及运营期间最受关注的一部分。图 5 为注浆率 120%，隧道埋深 10m 时的类矩形盾构管片的结构受力云图。

由图 5(a) 可知，类矩形管片受力模式和圆形隧道管片相似，上、下部分主要受正弯矩，管片左、右两端受负弯矩，但上、下部所受的弯矩值大于管片左、右两端的弯矩值。另外，管片间螺栓连接位置位于正、负弯矩交界处，今后进行精细化分析时，可考虑螺栓连接对隧道管片的影响。由图 5(b) 和 5(c) 可以看出，类矩形管片中柱轴力上部比较小，下部比较大，中立柱剪力上下相等。

图 6、图 7 分别为模拟分析得出的不同注浆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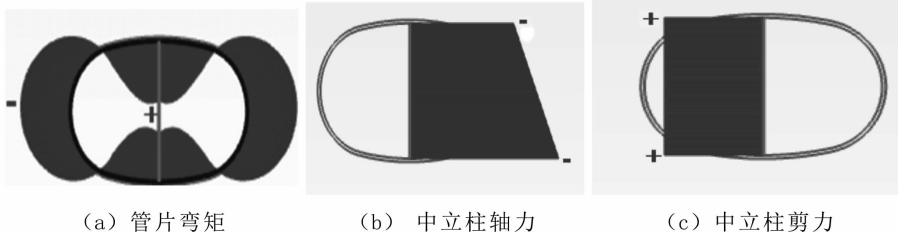


图5 类矩形管片结构受力云图

下类矩形盾构管片的负弯矩和正弯矩幅值曲线。由图可知,不同注浆率对管片正、负弯矩的影响均较小,且弯矩差值变化均在1%以内。但是随着注浆率的提高,正、负弯矩均逐渐减小。即注浆率为120%、150%、200%时,管片负弯矩分别为  $6.449 \times 10^5 \text{ N} \cdot \text{mm}$ 、 $6.447 \times 10^5 \text{ N} \cdot \text{mm}$ 、 $6.439 \times 10^5 \text{ N} \cdot \text{mm}$ ,管片正弯矩分别为  $6.076 \times 10^5 \text{ N} \cdot \text{mm}$ 、 $6.066 \times 10^5 \text{ N} \cdot \text{mm}$ 、 $6.048 \times 10^5 \text{ N} \cdot \text{mm}$ 。分析知这是由于浆液的增加,帮助管片承担了上部土体重力影响,使管片在施工过程中受力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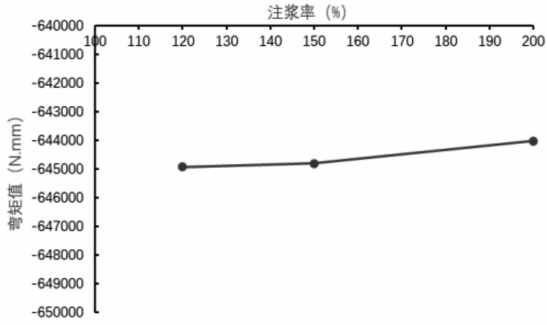


图6 不同注浆率下管片负弯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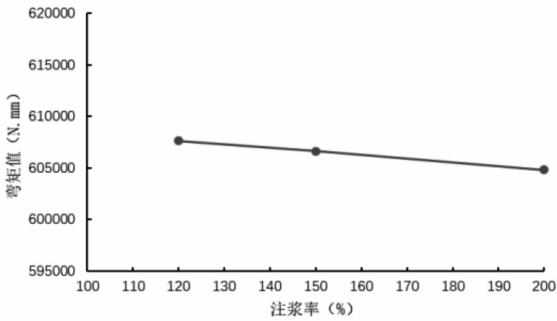


图7 不同注浆率下管片正弯矩图

图8、图9为模拟分析得出的不同注浆率下类矩形盾构中立柱的轴力和剪力幅值,由图可知,随着

注浆率增加,中立柱轴力和剪力均增加,这是由于管片结构发生横向水平位移产生扭转,从而导致管片中柱的轴力和剪力都提高。另外,由于管片产生横向水平位移,中柱轴力变化较小,幅值变化在3%之内,而剪力值变化在40%以内,变化较为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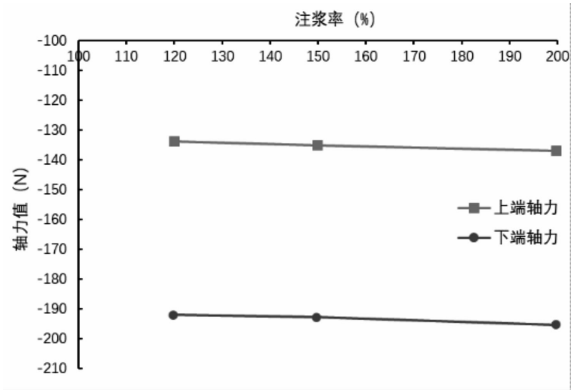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注浆率下中柱轴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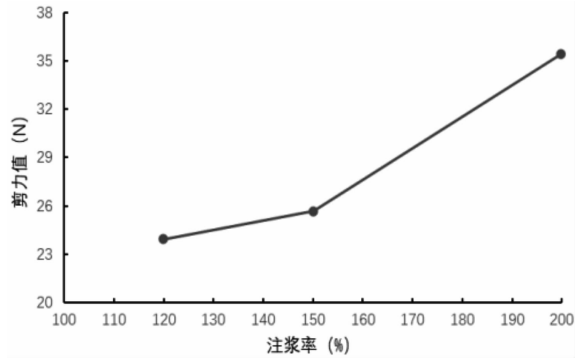


图9 不同注浆率下中柱剪力图

### 3.2 隧道埋深对地表沉降及管片受力的影响

建立不同埋深的类矩形盾构施工模型如图10所示,隧道埋深分别为10m、20m、30m,注浆率均按照120%进行注浆,其他相关参数如支护压力、注浆压力、刚度折减系数等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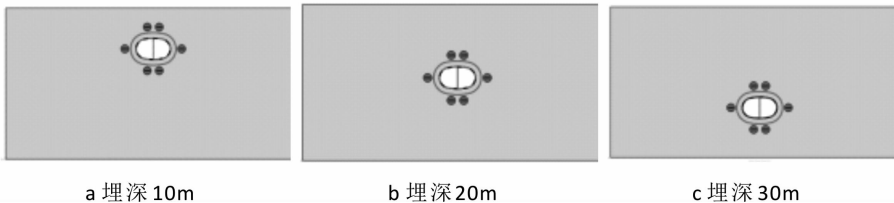


图10 不同埋深施工模型图

由图 11 不同埋深下地表位移曲线可知,在同一种土层中类矩形盾构隧道在 10m、20m、30m 三种不同埋深的情况下,不考虑土层影响,随着隧道埋深增加,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逐渐变大,埋深 10m 的时候沉降量最小,埋深 30m 的时候沉降量最大。另外,随着埋深的不同,隧道开挖中心线两侧的变形程度也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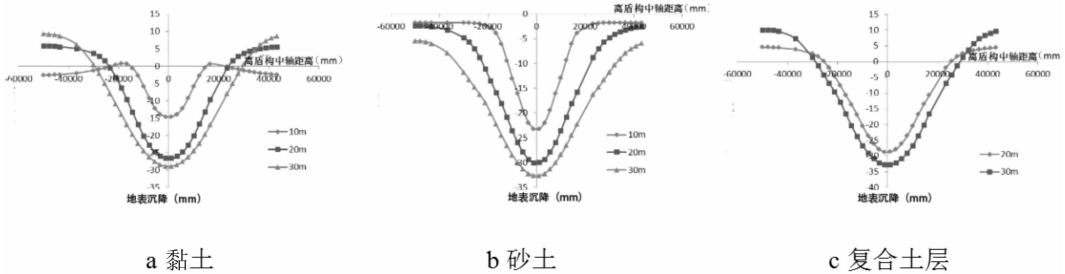


图 11 不同埋深下地表沉降位移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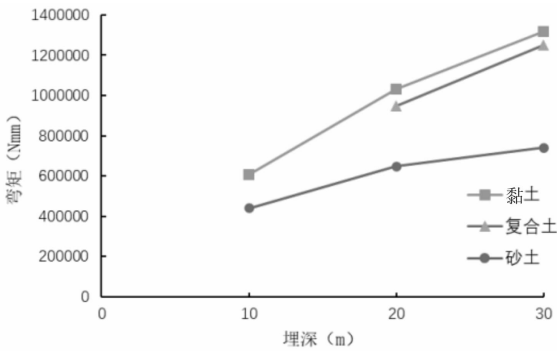


图 12 不同埋深下管片正弯矩幅值

### 3.3 土层条件对地表沉降及管片受力的影响

考虑盾构穿越不同土层对地表沉降造成的影响,建立不同土层的盾构模型如图 14 所示。第一类土层均为黏土,第二类土层均为砂土,第三类复合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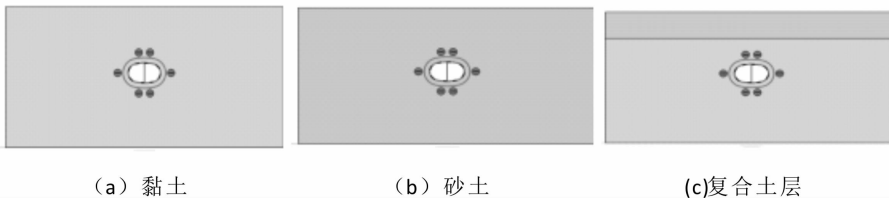


图 14 不同土层施工图模型

由图 15 不同土层下地表沉降位移曲线可知,地层条件对地表变形的影响显著,由于砂土的渗透系数较大,导致地表沉降最显著,而黏土存在较大的黏聚力,其沉降位移较小。当复合土层进行类矩形隧道施工时,地表沉降峰值位于黏土与砂土之间,这显然是由于盾构上部黏土与砂土存在比例关系引起,不同的土层有不同的性质,黏土的性质与砂土的性质进行互补造成了这种现象。另外,从图 15 中也可看出,黏土中隧道开挖中心线上方两侧隆起的高度

由图 12、图 13 不同埋深下的管片正、负弯矩幅值图可知,不考虑土层影响时,随着盾构衬砌埋深不同,管片的弯矩幅值变化显著。类矩形管片上、下的正弯矩和左、右的负弯矩均随着埋深的增加而增大,而且增加幅度的大小也比较相似;这是由于上覆土增加,导致管片受力增加。

层上覆 10m 砂土,其余土体为 40m 为黏土,复合土层不考虑隧道埋深 10m 工况。另外,注浆率均按照 120% 进行注浆,其他相关参数如支护压力、注浆压力、刚度折减系数等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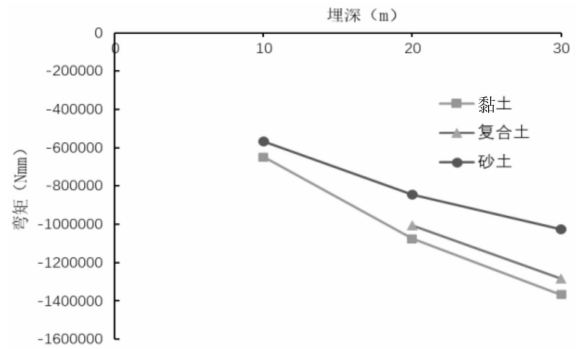


图 13 不同埋深下的管片负弯矩幅值

比砂土更显著。

由图 16、图 17 不同土层下的管片正、负弯矩幅值可知,当埋深相同时衬砌管片所受弯矩随着土层变化而变化;当埋深为 10m 穿越土层为黏土时,管片正弯矩为  $6.045 \times 10^5 \text{ N} \cdot \text{min}$ ,穿越土层为砂土时,管片正弯矩为  $4.391 \times 10^5 \text{ N} \cdot \text{min}$ ,其变化幅度为 27.4%。同理可分析知:埋深相同时衬砌管片所受正弯矩变化幅度范围在 27%—45% 之间,埋深相同时衬砌管片所受负弯矩变化幅度范围在 12%—

30%之间,均属于较大变化,可见不同类型土层对衬砌的受力情况影响显著。由图可知同一埋深时,黏土地层下弯矩值更大,砂土地层下弯矩值较小,这显

然是由于土体特性引起的,即与土体的弹性模量及泊松比等有关,然而一般来讲复合土层弯矩值处在黏土和砂土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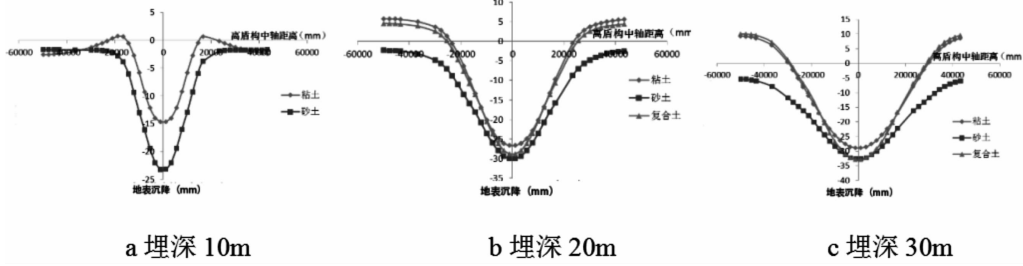


图 15 不同土层下地表沉降位移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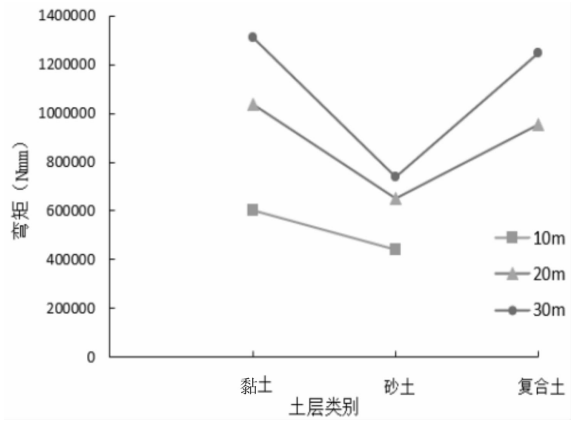


图 16 不同土层下的管片正弯矩幅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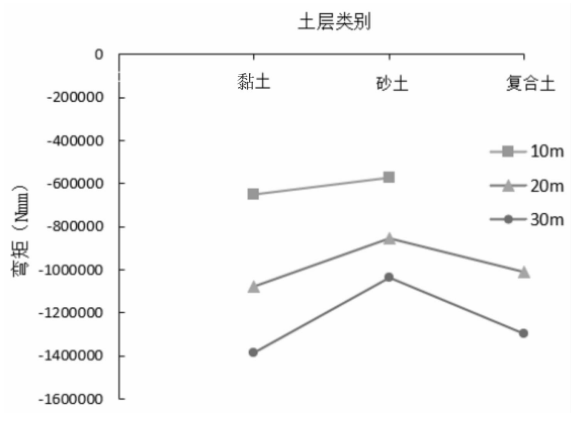


图 17 不同土层下的管片负弯矩幅值

#### 4 结论

本文采用 PLAXIS 2D 有限元软件建立类矩形盾构隧道施工有限元模型,分析了宁波地铁三号线类矩形盾构开挖过程中由不同注浆率引起的地表沉降和管片受力,并讨论了隧道埋深和地层条件影响。结论如下:

(1)类矩形盾构在施工掘进的过程中,引起的地表沉降在一定的范围内,中轴线附近的土体扰动比较大,两侧扰动越小,其沉降曲线符合 Peck 公式一般规律。

高,引起的地表沉降逐渐减小。当注浆率变化时,对类矩形隧道管片的弯矩影响较小,弯矩差值基本在 1%之内;由于管片产生横向水平位移,对管片中立柱的剪力影响显著。

(3)随着埋深增加,不同土层下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均增加,针对不同土层的地表沉降量分析,同一埋深时盾构隧道在黏土中比砂土中引起的地表沉降小,此外,盾构管片在黏土中的弯矩幅值大于在砂土中的弯矩幅值。

#### 参考文献:

- [1] Peck P B. Deep excavations and tunneling in soft ground [C]. Proc 7th Int conf on Soil Mech and Found Engrg Mexico, 1969:275 - 290.
- [2] 刘建航,侯学渊. 基坑工程手册. 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 1997.
- [3] 孙建华,侯学渊. 松散地层浅埋隧道基于地表下沉的反分析理论[J]. 隧道建设,1991(1):16 - 27.
- [4] 王洪德,崔铁军. 盾构隧道施工过程建模影响因素分析[J].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2003,9(3):628 - 632.
- [5] 王冠琼,刘干斌,邓岳保. 盾构壁后注浆对地表沉降影响模拟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2014,27(3):97 - 102.
- [6] 孙统立,张庆贺,胡向东,等. 双圆盾构施工土体沉降有限元数值模拟[J]. 同济大学学报,2008,36(4):466 - 471.
- [7] 刘建海. 盾构隧道同步注浆效果对地层沉降的影响预测分析[J]. 铁道建筑,2010(3):46 - 48.
- [8] 盛佳韧,叶冠林,桥本正,等. 双圆盾构盾尾注浆对地层沉降的影响分析[J].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2014,10(1):201 - 205.
- [9] 周文波,郑宜枫,滕丽. 双圆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管片力学性状的原位测试研究[J]. 力学季刊,2005,26(3):459 - 463.
- [10] 刘超,张子新. 超大直径双线泥水盾构施工的三维数值模拟[J]. 土木工程学报,2011(44):118 - 122.
- [11] 张鹏. 盾构隧道管片施工力学性能三维数值模拟研究



[J]. 铁道工程学报, 2012(10): 63 - 69.

[12] 蒋向阳. 大直径泥水盾构隧道管片结构力学特性研究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 北京: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2015.

##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gments during Construction of a Near - Rectangular Shield Tunnel

ZHANG Huanhuan, WANG Ji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rectangular shield section of Ningbo Rail Transit Line 3 as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PLAXIS2D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is used to construct a numerical model of a near - rectangular shield tunnel tube shee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effects of parameters such as grouting rate, tunnel depth and soil conditions on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surface are studied, and the structural for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ar - rectangular shield tube sheet are presented.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ing the grouting rate can reduce the ground surface settlement caused by near - rectangular shield construc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buried depth, the surface settlement caused by near - rectangular shield construction can be higher; Surface subsidence of different soil layers is analyzed; when the burial depth is the same, the settlement of the near - rectangular shield in clay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sand; the bending moment of shield segment in clay is bigger than that in sand.

**Key words:** near - rectangular tunnel; ground surface settlement; segment stres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上接第 111 页)

[7] 袁冰冰. 整孔预制架设 48 米活性粉末混凝土简支箱梁的设计分析[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19.

[8] 刘秀元. 先张 CRTSIII 型轨道板蒸养技术研究[J]. 铁道建筑技术, 2016(9): 88 - 90.

[9] 石磊. RPC130 活性粉末混凝土在石武客专铁路工程盖

板生产的应用研究[J]. 铁道建筑, 2011(5): 134 - 135.

[10] 蒋宗全, 杨忠, 郭晓安. 活性粉末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研究及生产工艺[J]. 铁道建筑, 2010(7): 142 - 14.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Segmental Precasting Technology of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LIU Xiuyuan

(China Railway Fifth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RPC), as a new typ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 has high compressive and tensile strength, very small creep, good permeability, frost resistance and durability. Building bridges with RPC can increase the span of them, reduce the self - weight of the girders of the bridge,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piers. The combination of RPC and advanced segmental precast erection method can realize the factory production of bridges, increase the speed of bridge construction and save investment. In order to carry out various scientific experiments on RPC bridge, a model test beam was built to study the precasting process of RPC segmental assemblies, including the processes such as matching ratio, mixing, transportation, placement, maintenance and so on.

**Key words:** railway bridge;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RPC; segmental precast erection; shear key; high temperature curing

# 基于响应曲面法优化碳酸甲乙酯精馏工艺的模拟与分析

郑丽萍, 刘 杏, 刘梦瑶, 张峻炜

(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

**摘要:** 简述碳酸甲乙酯(EMC)的合成工艺,利用 Aspen Plus 软件对 EMC 粗产品的精馏工艺进行模拟,考察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对 EMC 收率的影响。通过单因素试验分析确定试验范围,并从中选取三种水平进行响应面设计。利用 Design - Expert 8.0 软件将模拟得到的结果进行二次多元回归拟合,建立回归模型,通过响应曲面法分析出制备 EMC 收率的最佳操作条件。

**关键词:** 碳酸甲乙酯;精馏工艺模拟;Aspen Plus;响应曲面法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21

**中图分类号:** TQ4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2)04-0119-05

碳酸甲乙酯的分子式为  $C_4H_8O_3$  (简称 EMC),其结构中同时具有甲基和乙基,使其具有许多优秀的特性,在医药、农药、溶剂等领域都能得到一定的应用,尤其在锂电池领域,EMC 应用在电解质溶剂的优良表现,使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sup>[1-2]</sup>。EMC 的合成方法主要可以分为 3 种:光气法<sup>[3]</sup>、酯交换法<sup>[4-5]</sup>和氧化羰基法<sup>[6]</sup>。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制备 EMC 的方法中只有酯交换法还在被广泛使用,但是合成工艺在不断改进,例如,采用离子液体等作为特殊的反应溶剂促进反应进行<sup>[7]</sup>,利用多相催化剂完成 EMC 的选择性合成<sup>[8-9]</sup>,或者开发更节能高效的工艺<sup>[10-11]</sup>等。本文在国内原有合成 EMC 路线的基础上,利用 Aspen Plus 软件进一步模拟了 EMC 粗产品的精馏工艺,并运用 Design - Expert 8.0 软件进一步处理模拟结果,建立二次多元回归模型,做出响应面图,进而找到获得 EMC 最佳收率的操作条件,为 EMC 高纯度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 1 试验方法

采用 Design - Expert 8.0 软件对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进行考察,同时对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进行评价。通过得出的多元二次回归方程,进一步拟合影响因素与响应值之间的函数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分析,寻求最优工艺参数,减少实验周期,避免盲目进行实验。

本实验选取完全二次回归模型,在保持精馏塔的进料温度、进料量、进料压力、塔板数等不变的基础上,以进料配比(A)、回流比(B)及进料位置(C)为影响因素,EMC 收率(Y)为响应值。设计采用三因素三水平,设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因素水平

水平	A(进料配比)	B(回流比)	C(进料位置)
-1	0.75	1.2	10
0	1	1.6	15
1	1.25	2	20

## 2 结果与分析

### 2.1 EMC 合成过程中精馏工艺的模拟与数据分析

化工流程模拟软件 Aspen Plus 具有完整的单元操作模型,使用者可根据自我需求从软件的流体流动、分离、输送机械操作等单元中选择合适的单元操作,进而完成所需流程的工艺模拟。EMC 粗产品的分离在精馏塔中进行,馏出量与进料量的比值称为 EMC 的收率,在实际生产中 EMC 的收率总是偏离

收稿日期:2022-06-10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科研启动费(22046);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博士后课题启动费(210004);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011068008)

作者简介:郑丽萍(1986—),女,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型材料开发及其性能研究。

预期值,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针对 EMC 的精馏分离过程,使用 Aspen plus 软件进行模拟,精馏塔的工艺设计经过简捷设计和简捷校核两个阶段。

进行精馏塔模拟时,首先进行的是简捷设计,选择软件的 DSTWU 模块进行模拟,针对实际生产中影响 EMC 收率的因素进行了筛选。选取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 3 种影响 EMC 收率的因素,在改变单一因素固定其他变量的基础上进行模拟实验,通过模拟结果选取因素的最佳水平。

### 2.1.1 进料比对 EMC 收率的影响

对于精馏操作而言,进料配比对其带来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当提高重组分在进料组分中的占比时,精馏段必然会面临负荷加重的情况,当遇到精馏塔中的精馏段板数被固定时,塔顶馏出物中极易出现含有重组分的不合格产品,同时因为组分变重,使得塔釜排出量增大,造成精馏塔面临着温度升高,压力变小的情况。当提高轻组分在进料组分中的占比时,提馏段必然会面临负荷加重的情况,当遇到精馏塔中的提馏段板数被固定时,釜液中极易出现更多蒸不出的轻组分,同时因为进料组分变轻,使得塔顶馏出物的流量变大,造成精馏塔面临着温度降低,压力变大的情况。

为确定最合适的进料配比,固定其他操作条件,改变进料配比,通过 Aspen plus 模拟获得不同进料配比下的目的产物收率。在 Aspen plus 中输入固定的进料温度、进料压力、进料量、塔板数、进料位置、回流比等参数,输入 EMC 与 DEC 的配比分别为 0.5,0.75,1,1.25,1.5 等 5 组数据运行模拟,得到不同进料配比下的 EMC 收率,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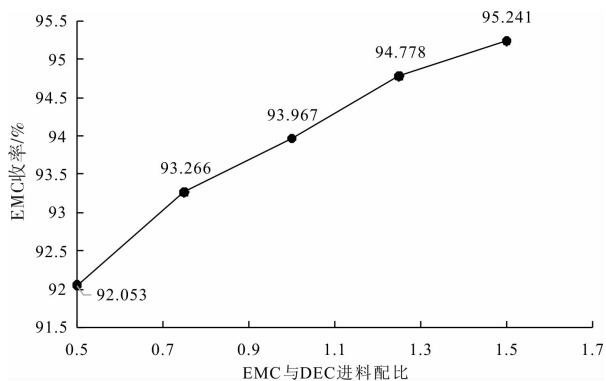


图1 EMC与DEC进料比对EMC收率的影响

不同的进料配比对应不同的 EMC 收率,根据图 1 的模拟结果可知,随着进料配比的增加,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也在逐步增加。进料配比从 0.5 变化至 0.75 时,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从 92% 增加至 93%,并且增加的程度很明显;进料配比从 0.75 变

化至 1.5 时,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仍有所增加,但增加的程度并不明显,增加的趋势逐渐平稳,稳定在 95% 左右。当目的产物的占比越高时,混合物的分离效果越好,但目的产物的占比很高时,其收率增长逐渐平稳。

### 2.1.2 回流比对 EMC 收率的影响

回流的应用使得塔顶和塔底都能获得纯度更高的产品。回流比是塔顶的回流量与馏出量之间形成的比值,是精馏操作中影响分离程度的重要因素。精馏塔所需的理论塔板数、塔径以及所需冷却水的用量都会受到回流比的影响。在进行回流比的选择时,通常将最小回流比作为最低界限。适当减少回流比可以使塔釜的温度得到提升。增大回流比可以提高塔顶中重组分的回流,进而使产品纯度更高,但是回流比过大时会造成精馏塔液泛,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回流比的选择至关重要。

在 Aspen plus 中输入固定的进料温度、进料压力、进料量、塔板数、进料位置、进料配比等参数,输入回流比 1.2,1.4,1.6,1.8,2 等 5 组数据运行模拟,得到不同回流比下的 EMC 收率。根据模拟结果可知,随着回流比的增加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也在逐步增加,回流比从 1.2 变化至 1.4 时,图中线段的斜率较大,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在逐步增加,并且增加的程度更明显;回流比从 1.4 变化至 2 时,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仍有所增加,但收率稳定在 94% 左右。当回流比逐渐增大时,混合物的分离效果会变好,但当回流比达到一定水平时 EMC 收率增加的趋势逐渐平稳,但并不能达到完全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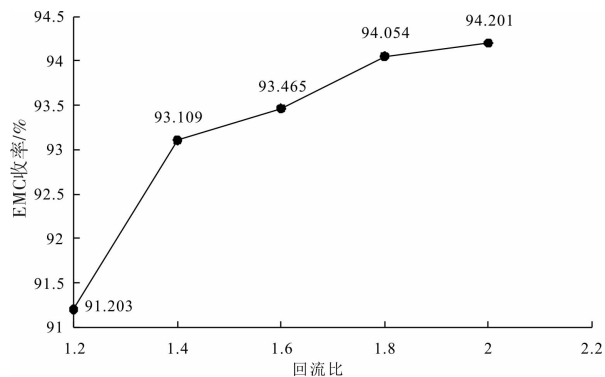


图2 回流比对EMC收率的影响

### 2.1.3 进料位置对 EMC 收率的影响

在塔的进料过程中,通常以调整进料位置这种手段来应对进料状况的改变,从而获得符合生产要求的产品。当理论塔板数和操作条件被固定时,通常参照进料板的分离能力的高低来选取进料位置,

此时的进料位置必定选择分离能力最强的进料板。当所有操作条件都相同时,此时的进料位置必定选择理论板数最低的进料板。

当进料组分中的轻组分占比增大时,必定要使提馏段的板数增多,提馏段的分离能力会随之增大,此时通常选择较高的进料位置。当进料中重组分占比增大时,必定要使精馏段的板数增多,精馏段的分离能力会随之增大,此时通常选择较低的进料位置。在 Aspen plus 中输入固定的进料温度、进料压力、进料量、塔板数、回流比、进料配比等参数,输入进料位置 5,10,15,20,25 等 5 组数据,运行模拟得到不同进料位置下的 EMC 收率。图 3 为不同的进料位置下 EMC 的收率。根据图中的模拟结果可知,随着进料位置的增加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也在逐步增加,当进料位置从 5 变化至 10 时,图中线段的斜率较大,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在迅速增加,当回流比从 10 变化至 25 时,目的产物 EMC 的收率仍有所增加,但线段斜率没明显降低,收率稳定在 94% 左右。根据上述研究,发现当进料位置逐渐增大时,混合物的分离效果会变好,但当进料位置达到一定水平时,目的产物的收率增加的趋势逐渐平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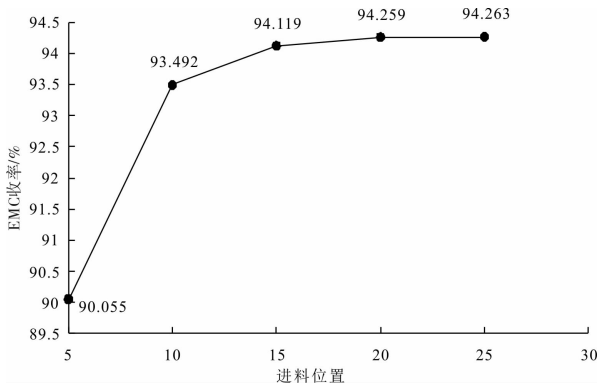


图 3 进料位置对 EMC 收率的影响

## 2.2 EMC 合成过程中精馏工艺的优化研究

对精馏塔分离工艺进行响应面优化时,以 EMC 与 DEC 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为考察因子(自变量),分别用 A,B,C 表示。Design - Expert 8.0 软件以单因素三种水平为基础。EMC 的收率是通过对不同因素的各种水平的组合进行模拟得到的数据,如表 2 所示。

将表 2 数据利用 Design - Expert 8.0 软件进行二次多元回归拟合,得到 EMC 的收率(Y)对自变量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的二次多元回归模型为:

$$Y = +98.43 + 1.50A + 1.40B + 0.55C - 0.46AB - 0.28AC - 0.037BC - 5.30A^2 - 0.56B^2 - 0.49C^2$$

表 2 响应面实验设计与结果

试验号	因素			EMC 收率/%
	A	B	C	
1	-1.00	-1.00	0.00	89.436
2	1.00	-1.00	0.00	93.185
3	-1.00	1.00	0.00	92.865
4	1.00	1.00	0.00	94.774
5	-1.00	0.00	-1.00	90.035
6	1.00	0.00	-1.00	93.758
7	-1.00	0.00	1.00	92.073
8	1.00	0.00	1.00	94.685
9	0.00	-1.00	-1.00	95.437
10	0.00	1.00	-1.00	98.588
11	0.00	-1.00	1.00	96.248
12	0.00	1.00	1.00	99.251
13	0.00	0.00	0.00	98.457
14	0.00	0.00	0.00	98.186
15	0.00	0.00	0.00	98.578
16	0.00	0.00	0.00	98.352
17	0.00	0.00	0.00	98.567

通过统计与分析 EMC 分离精馏塔的数学模型,来检验方程的有效性。获得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P < 0.01$ ,说明建立的数学模型或考察因素的影响极其显著; $P < 0.05$ ,说明建立的数学模型或考察因素存在了显著的差异; $P > 0.05$ ,说明建立的数学模型或考察因素的影响不显著。由表 3 可以看出,回归模型  $F = 208.00$ ,线性曲线显著性检验  $P < 0.0001$ ,表明该试验所采用的二次模型是极显著的,在统计学上也有一定意义。

表 3 EMC 的收率为响应值的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显著性
模型	161.39	9	17.93	208.00	<0.0001	**
A	17.98	1	17.98	208.54	<0.0001	**
B	15.60	1	15.60	180.97	<0.0001	**
C	2.46	1	2.46	28.57	0.0011	**
AB	0.85	1	0.85	9.82	0.0165	**
AC	0.31	1	0.31	3.58	0.1004	
BC	$5.5 \times 10^{-3}$	1	$5.5 \times 10^{-3}$	0.064	0.8083	
A2	118.41	1	118.41	1373.50	<0.0001	**
B2	1.32	1	1.32	15.31	0.0058	**
C2	1.00	1	1.00	11.59	0.0114	*
残差	0.60	7	0.086			
失拟项	0.50	3	0.17	6.19	0.0553	不显著
净误差	0.11	4	0.027			
总和	161.99	16				

注: \*\* 为差异极显著,  $P < 0.01$ ; \* 为差异显著,  $P < 0.05$

所用的模型和试验拟合的程度是通过失拟项表示出来的,即二者的差异程度。本试验的失拟项为 0.0553,说明失拟项不显著( $P > 0.05$ ),表明该模型具有统计意义,因此可以用上述多元二次回归模型方程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一次项中 A,B,C 的偏回归系数显著( $P < 0.01$ ),说明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对 EMC 的收率的影响极显著。通过比较

各回归系数  $F$  值的大小可知,所选取的因素水平范围内,对 EMC 收率的影响程度依次是  $A > B > C$ ,即进料配比 > 回流比 > 进料位置。交互项 AB 的偏回归系数显著 ( $P < 0.01$ ),说明进料配比和回流比的交互作用对 EMC 的收率有显著影响,交互项进料位置不显著。该模型  $R^2 = 0.9963$ ,校正决定系数  $R^2$  (Adj) = 0.9915,说明该模型只有 0.85% 的变异不能由该回归模型解释,因此,该模型的拟合性较好。预测决定系数和校正决定系数分别为 0.9499, 0.9915,二者相差仅为 0.0416,小于 0.2, CV(变异系数)为 0.31%,小于 10%,表明该模型的分辨率、

拟合精度较高,误差较小。

根据所得回归方程,进一步运用 Design - expert 8.0 软件获得响应面图,预测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对 EMC 收率的影响。图 4 和图 5 所示,进料配比和回流比、进料比和进料位置的交互作用对 EMC 收率的影响较大,表现为三维图中曲线陡峭,二维图中等高线近似椭圆。图 6 所示,回流比和进料位置的交互作用对 EMC 收率的影响较小,表现为三维图中曲线圆滑,二维图中等高线近似圆形,响应值变化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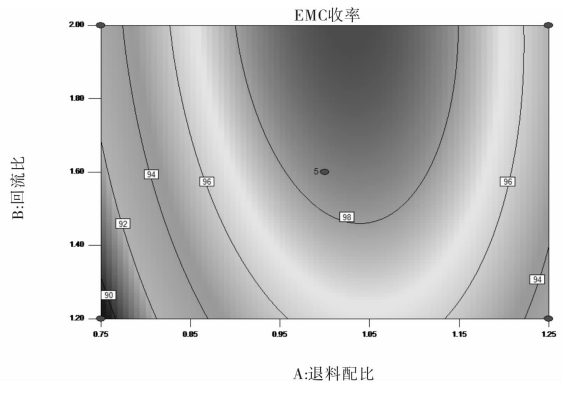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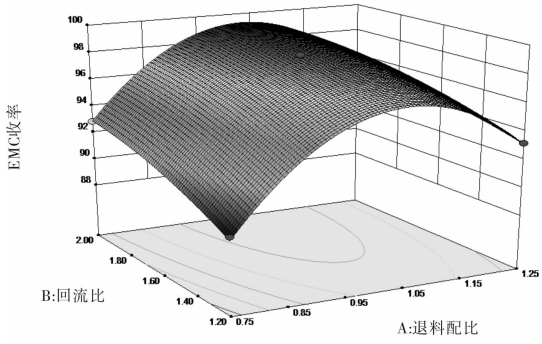


图 4 进料配比和回流比对 EMC 收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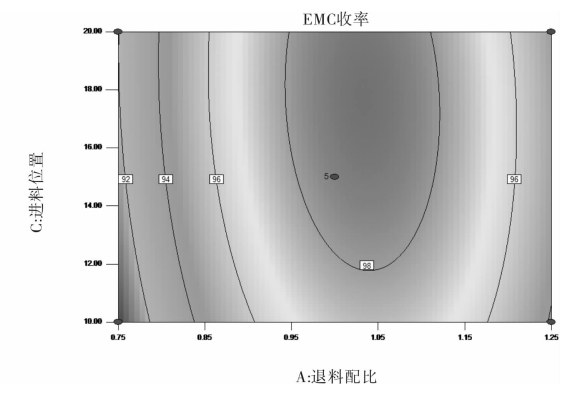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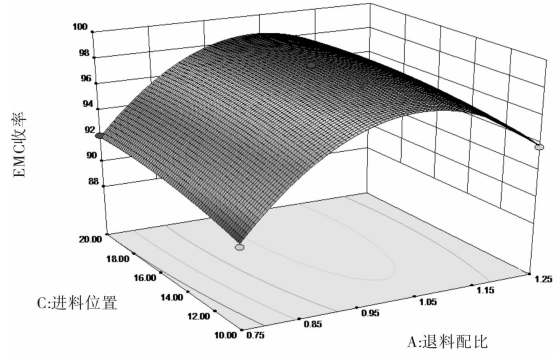


图 5 进料配比和进料位置对 EMC 收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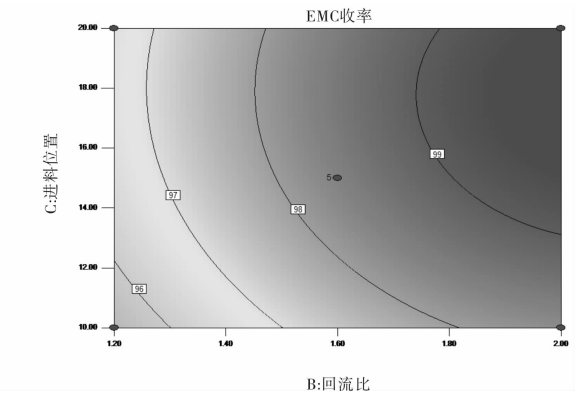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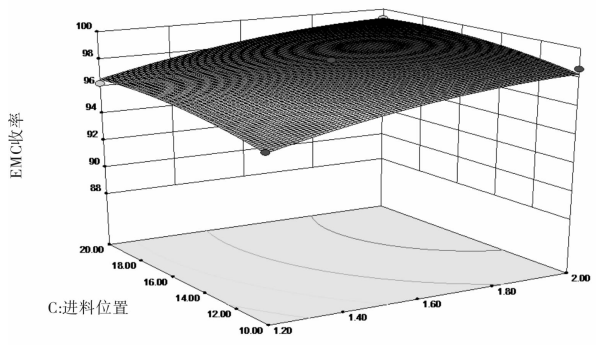


图 6 回流比和进料位置对 EMC 收率的影响

根据表 3 数据可以得出 EMC 收率的残差正态概率分布和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对应关系,残差的正

态概率分布和 EMC 收率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对应关系均靠近一条直线,说明以上得到的 EMC 收率的

二次多元回归模型方程拟合性较好,可以用该模型解释进料配比、回流比以及进料位置之间的关系。通过响应面法分析出 EMC 收率的最佳操作条件: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分别为 1,1.6,15,在此条件下进行 3 次试验,最终得到 EMC 收率的平均值为 98.536%,与响应曲面和拟合的 EMC 收率一致。

### 3 结论

本文针对 EMC 粗产品的精馏工艺进行了模拟,通过 Aspen plus 模拟结果选取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三种因素,并分别对每一因素选取不同水平进行模拟,将模拟后的结果运用 Design - Expert 8.0 进行响应面处理。分析结果表明,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对 EMC 收率的影响极显著。进料配比和回流比、进料配比和进料位置的交互作用对 EMC 收率的影响较大。经过响应面处理后分析得到最佳的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分别为 1,1.6,15。最佳操作条件下可以得到收率大于 98.536% 的高纯度 EMC,可以直接运用于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添加剂中,为 EMC 实际生产中最优精馏条件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 参考文献:

[1] 韩啸,张成锐,吴华龙,等. 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与关键材料[J]. 金属功能材料, 2021, 28(2): 37 - 58.  
[2] BEZABH H K, CHIU S F, HAGOS T M, et al. Bridging role of ethyl methyl carbonate in fluorinated electrolyte on ionic transport and phase stability for lithium - ion batteries

[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21, 494: 376 - 388.  
[3] 郝春明. 论碳酸甲乙酯酯交换法生产工艺的研究[J]. 化工管理, 2016(11): 220 - 222.  
[4] 石磊,于悦,王吉宇,等. 酯交换法合成碳酸甲乙酯研究进展[J]. 燃料化学学报,2019,47(12): 1504 - 1521.  
[5] 张洁,贾爱忠,李芳,等. 酯交换法合成碳酸甲乙酯催化剂的研究进展[J]. 化工进展, 2020, 39(11): 4435 - 4445.  
[6] 黄荣生,莫婉玲,李光兴. 氧化炭化法合成碳酸甲乙酯热力学及催化性能的研究[J]. 燃料化学学报, 2004(2): 129 - 134.  
[7] 孙伟氏. 离子液体催化酯交换合成碳酸甲乙酯[J]. 化工新型材料, 2015, 43(8): 207 - 209.  
[8] ZHOU X, ZHANG C. Effect of preparation method on the catalytic property of calcined Ca - Al hydrotalcite for the synthesis of ethyl methyl carbonate [J]. ACS Omega, 2021, 6(7): 5056 - 5060.  
[9] LYU J, CAI H, GUO Y, et al. Selective Synthesis of Ethyl Methyl Carbonate via Catalytic Reactive Distillation over Heterogeneous MgO/HZSM - 5 [J]. Chemistry - Select, 2019, 4(24): 7366 - 7370.  
[10] 王红星,李海勇,周庆,等. 隔壁反应精馏合成碳酸甲乙酯节能新工艺[J]. 化工进展,2020,39(S2): 66 - 72.  
[11] 王红卫,孔望欣,瞿新阳,等. 间歇精馏脱除酯交换法制碳酸甲乙酯反应体系中轻杂质[J]. 精细石油化工, 2018, 35(2): 51 - 54.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Distillation Process Optimization for Methyl Ethyl Carbonate Based o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ZHENG Liping, LIU Xing, LIU Mengyao, ZHANG Junwei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ynthesis process of methyl ethyl carbonate was introduced briefly, and the Aspen Plus software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distillation process of the crude product of methyl ethyl carbonat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eed position on EMC yield. The test range was determined by single factor test analysis, and three levels are selected for response surface desig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fitted by quadratic multiple regression using Design - Expert 8.0 software, and the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for obtaining the optimal yield of EMC were analyzed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Key words:** methyl ethyl carbonate; distillation process simulation; Aspen Plus;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 间歇式双污泥工艺处理农村污水的应用

宋博宇<sup>1</sup>, 卞晓峥<sup>1</sup>, 华洁平<sup>1</sup>, 黄健平<sup>1,2\*</sup>

(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2. 河南省水体污染与土壤损害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间歇式双污泥工艺将 SBR 工艺与双污泥系统相结合, 既拥有 SBR 工艺可以处理流量变化较大的污水的特点, 又拥有双污泥系统低 C/N 比、低需氧量、低污泥产量的优点。介绍了 SBR 系统、改良 SBR 系统以及几种间歇式双污泥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处理效果, 进行了处理效果和经济比较。从处理结果可以看出, 间歇式双污泥系统在处理低 C/N 比的污水时, 表现出了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 并且具有很好的抗负荷能力, 可以用来处理水质变化较大的污水。

**关键词:** SBR 工艺; 双污泥系统; 农村污水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4.022

**中图分类号:** X7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2)04-0124-05

农村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自然水体中, 已经成为影响水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是农村居民生活当中产生的洗涤用水及厕所冲水, 因此主要污染物是 COD、氮磷以及病菌<sup>[1]</sup>。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需要同时进行脱氮除磷时, 污水中的 5 日生化需氧量与总凯氏氮之比宜大于 4, 污水中的 5 日生化需氧量与总磷之比宜大于 17, 但是实际中的农村污水很难满足这些要求。SBR 工艺可以实现自动化管理和运行, 在技术人员相对较少的农村也适用。

## 1 SBR 在农村污水处理中的应用现状

### 1.1 SBR 工艺在农村污水处理的应用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工艺特点是在同一个反应器中, 按时间顺序进行进水、曝气、沉淀、排水和闲置 5 个工序, 从而对污水进行脱氮除磷。以张亚平等<sup>[2]</sup>对常熟市辛庄镇和泰村的 SBR 工艺调查为例, SBR 工艺的进水中 COD 为 100 mg/L 左右, TN 在 4~7 月份为 5 mg/L (其余时间都稳定在 20 mg/L), P 在 1 mg/L 以下, 可以算出 C/P 为 100。SBR 工艺对 COD 的去除率在 60.0%~84.0%, 平均去除率为 74.9%, 出水水质达到一级 B 标准, 处理效果稳定; 对 TP 的去除率在 15%~60%, 波动比较大, 并且去除率是从当年 8 月到来年 3 月逐步上升的, 因此温度可能是影响 TP 去除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 TN 的去除率在前期比较低, 不超过 40%, 后期逐步提升并趋于稳定, 最终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60%~80%, 这样就导致出水中 TN 浓度全年都比较稳定, 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对氨氮的去除率在 25%~80% 之间, 波动比较大。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 SBR 在实际运行中对 COD 的去除效果表现良好, 但是对 TP 和 TN 的去除率比较低, 且去除率的波动比较大, 这是由于 SBR 工艺需要足够的碳源, 与污水中的碳源不足相矛盾所导致的。

1.2 改良 SBR 工艺处理农村污水  
文艳等<sup>[3]</sup>将 SBR 工艺进行了改良, 用隔板将

收稿日期: 2022-05-27

基金项目: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161100310700)

作者简介: 宋博宇(1997—), 男, 河南商丘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通讯作者: 黄健平(1968—), 女, 河南郑州人, 博士,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及水污染控制方面的研究。



SBR 装置分成主反应区和副反应区,只有在主反应区底部进行曝气。该工艺在最佳反应条件下,COD,  $\text{NH}_4^+ - \text{N}$  和 TN 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95%, 98.2% 和 69.1%, 去除率相对比较稳定。

该工艺在主反应区发生了硝化反应,将  $\text{NH}_4^+ - \text{N}$  氧化成了硝态氮,而在副反应区发生了反硝化反应,将硝态氮转化成了氮气,同时达到了除磷的作用。该工艺不仅实现了硝化反应和反硝化反应同时进行,还可以减少部分 PHB 在好氧条件下的损耗,从而有更多 PHB 可以在缺氧环境条件下被用于聚磷作用,实现利用较少的 COD 去除更多的磷,提高

了磷的去除率。但是 DO 浓度对改良 SBR 工艺具有重要影响,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加大对主反应区的曝气量,提高两个反应区的 DO 浓度差,这样会提高污水处理的成本,不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 2 间歇式双污泥系统及其工艺比较

### 2.1 前置 $\text{A}_2\text{NSBR}$ 双污泥系统

赵伟华等<sup>[4]</sup>提出了前置  $\text{A}_2\text{NSBR}$  双污泥系统。该系统先在厌氧-缺氧 SBR 中进行反硝化除磷,然后在好氧 SBR 中进行硝化反应,以硝化出水作为最终出水,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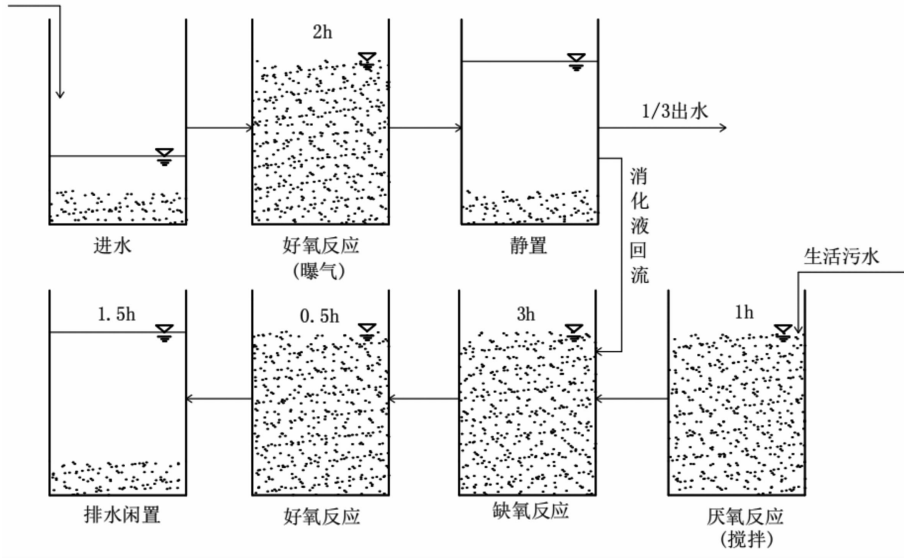


图 1 前置  $\text{A}_2\text{NSBR}$  双污泥系统工艺流程

污水首先进入好氧 SBR 中进行硝化反应,一部分作为出水排出系统,一部分回流至厌氧-缺氧 SBR 中缺氧段,即厌氧段释磷结束后注入硝化出水。待系统稳定后,对平均 COD 为 204.9 mg/L,平均氨氮为 49 mg/L,平均 TN 为 53.2 mg/L,平均 TP 为 4.3 mg/L 的污水进行处理时,出水中 COD、氨氮、TN 和 TP 平均值分别为 33.8, 0.9, 13.6 和 0.3 mg/L,相应的去除率分别为 84.3%, 98.4%, 76.8% 和 93.9%, 各项出水指标都满足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 2002) (以下简称《标准》)一级 A 标准的要求。

该工艺采用前置硝化的方法,最大程度上提高了氨氮的去除效率,降低了出水中氨氮的浓度。在稳定运行后,反硝化聚磷菌占总聚磷菌的比例大约为 61.3%, 说明磷的去除是由聚磷菌和反硝化聚磷菌相互作用产生的。

### 2.2 SBR - BCO 双污泥系统

秦玮等<sup>[5]</sup>将 SBR 工艺与 BCO 工艺相结合,提出了 SBR - BCO 双污泥系统。该工艺由反硝化聚磷污

泥系统(SBR)和接触氧化硝化系统(BCO)两部分构成,整个工艺流程由一个厌氧 SBR 阶段、一个接触氧化阶段和一个缺氧/好氧 SBR 阶段组成,如图 2 所示。

在该双污泥系统中,废水首先在厌氧 SBR 阶段完成厌氧释磷,然后通过沉淀,使富含  $\text{NH}_4^+ - \text{N}$  和磷的上清液和活性污泥分离开来,上清液直接进入接触氧化池进行氧化,在接触氧化池中  $\text{NH}_4^+ - \text{N}$  被氧化成硝态氮,而活性污泥直接进入缺氧/好氧 SBR 阶段,与接触氧化池的出水进行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了 PHB 在好氧条件下的消耗;在缺氧/好氧 SBR 阶段,反硝化聚磷菌首先在缺氧条件下,以硝态氮为电子受体,进行聚磷脱氮反应,而缺氧之后的曝气则提供了好氧条件,既可以提供氧气,除去缺氧阶段没有完全反应的磷,又可以吹脱缺氧阶段产生的  $\text{N}_2$ , 从而提高磷的去除率和沉淀阶段污泥的沉淀性能。

SBR - BCO 双污泥系统的进水为人工合成废水,其中 COD 为 150.6 ~ 198.1 mg/L, P 为 4.0 ~ 7.5 mg/L, TN 为 38.7 ~ 44.3 mg/L, 最大 C/P 为 20 ~ 26 时,在上述运行条件下, SBR - BCO 双污泥对 COD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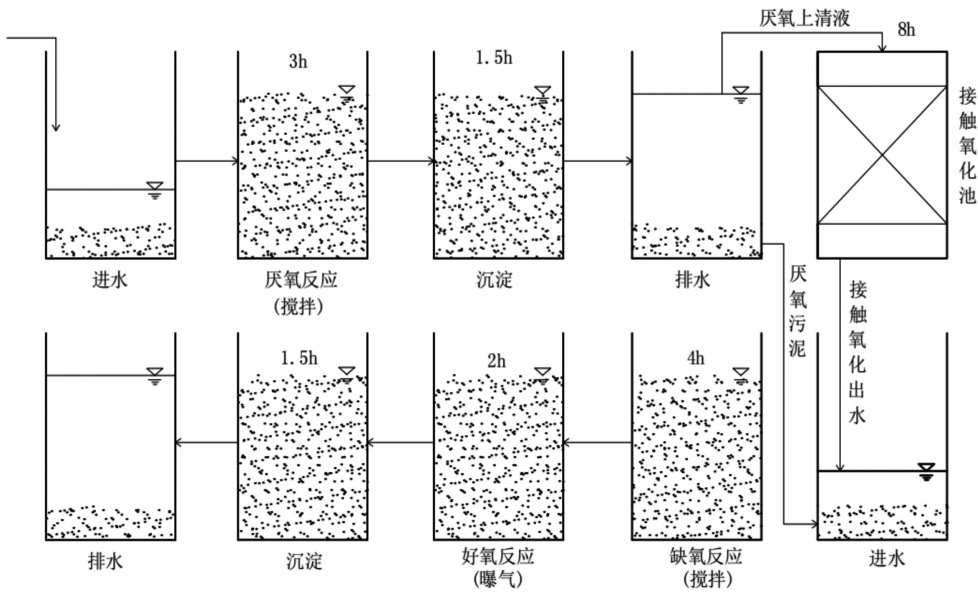


图2 SBR-BCO双污泥系统工艺流程

去除率达到91%，对氨氮的去除率高达84.2%~89.5%，对TN的去除率为66.9%~78.3%，对TP的去除率达到94.6%，出水的各项指标均满足《标准》一级A标准。

王松凯等<sup>[6]</sup>对SBR-BCO双污泥进行了运行参数优化和技术经济分析，并以农村污水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验。处理规模为20 m<sup>3</sup>/d，其中进水中COD为50~240 mg/L，TP为1.5~6 mg/L，TN为18~40 mg/L，经计算，当C/P为8.3~40时，

COD、氨氮、TN和TP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6.9%、97.6%、60.4%和83.3%，而该工艺的水动力费用为0.3元/吨，运行成本为0.3元/吨，满足农村污水处理的实际需求。

### 2.3 SBR-SBBR双污泥系统

李桥等<sup>[7]</sup>进行了SBR-SBBR双污泥短程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研究。该系统由具有以亚硝酸盐为电子受体的反硝化除磷作用的SBR<sub>1</sub>和具有短程硝化作用的SBR<sub>2</sub>组成，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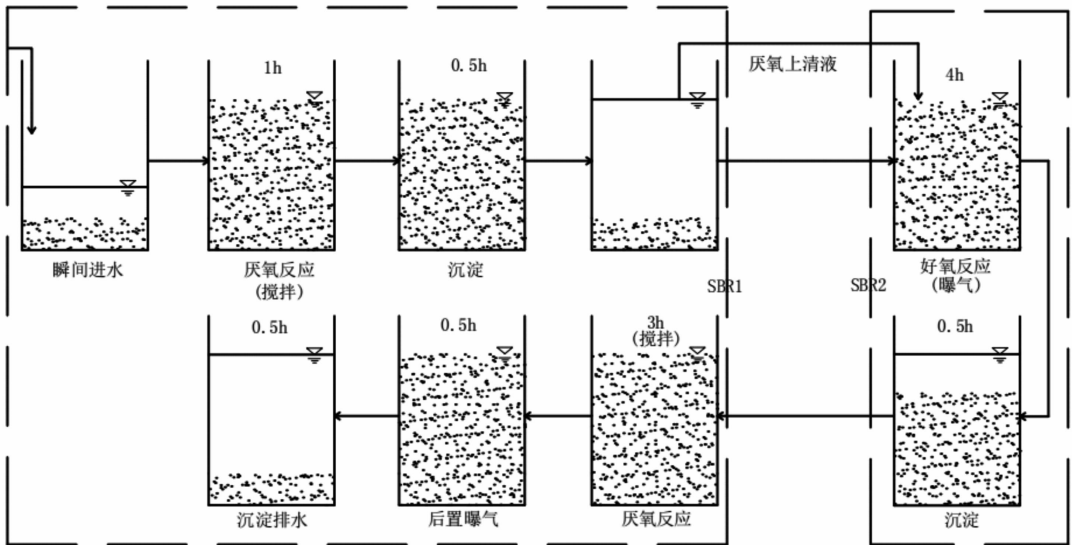


图3 SBR-SBBR双污泥系统工艺流程

在SBR<sub>1</sub>子系统中，首先进行厌氧释磷反应，经过沉淀，上清液和活性污泥分离开来，上清液（富含NH<sub>4</sub><sup>+</sup>和磷）进入SBR<sub>2</sub>子系统进行短程反硝化作用，NH<sub>4</sub><sup>+</sup>被氧化成了NO<sub>2</sub><sup>-</sup>；SBR<sub>2</sub>子系统中的上清液（富含NO<sub>2</sub><sup>-</sup>和磷）则再次进入SBR<sub>1</sub>子系统中进行反硝

化除磷。相关研究<sup>[8-9]</sup>已经证明经过驯化培养的聚磷菌可以以硝态氮和亚硝态氮为电子受体进行反硝化除磷，并且对溶解氧和碳源的需求量降低，减少了污泥的排放量。

SBR-SBBR双污泥法减少了COD在好氧条件

下的消耗外,又利用了短程反硝化作用,再次降低了对碳源的需求量和曝气量。在处理效果方面,当 C/N 为 3~6 时, COD, TN 和 TP 的去除率分别为 94.9%, 81.2% 和 89.5%, 均达到《标准》一级 A 排放标准, 此外, SBR-SBBR 双泥膜法具有很好的抗氮负荷冲击能力, 当 C/N 从 5~6 降到 3~4 时, 对 TP 的去除率基本没有影响, 保持在 88% 左右, 而 TN 平均去除率仅由 82.5% 变为 78%。SBR-SBBR 双污泥系统利用了亚硝酸盐作为电子受体, 大大降低了污水处理过程的曝气量, 并且使系统具有很好的抗氮

负荷冲击能力, 适用于处理氮浓度变化较大和 C/N 较低的农村污水。

## 2.4 A<sub>2</sub>NO-MBR 双污泥系统

A<sub>2</sub>NO-MBR 双污泥系统将 A<sub>2</sub>NSBR 与 MBR 相结合, 并增加缓冲池, 使硝化和反硝化除磷同步进行, 缩短运行周期, 而后置曝气 0.5h 可以进一步降低出水氨氮和总磷浓度。杜东梁等<sup>[10]</sup>以膜出水的方式进行后置曝气 A<sub>2</sub>NO-MBR 双污泥工艺研究, 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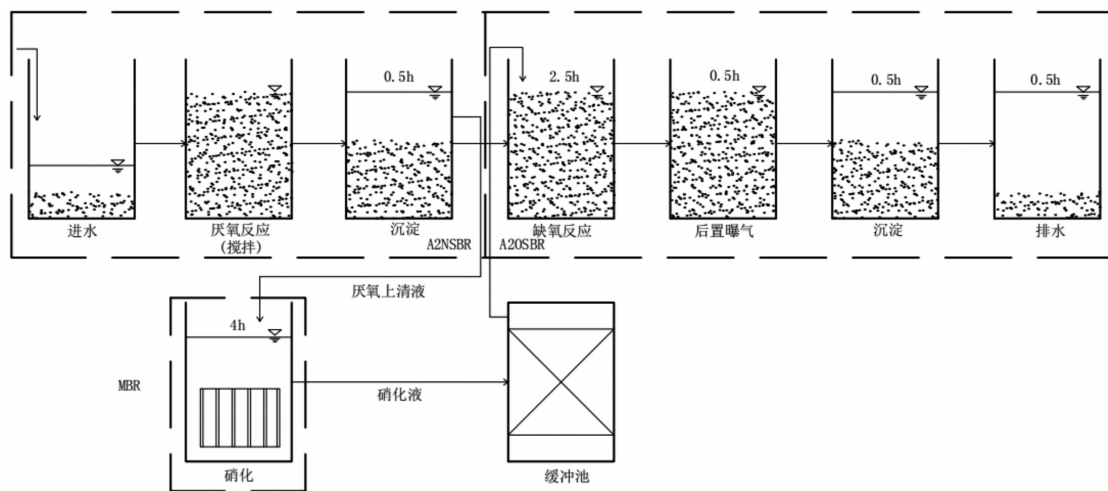


图 4 后置曝气 A<sub>2</sub>NOSBR-MBR 双污泥系统工艺流程

污水首先进入 A<sub>2</sub>NSBR 中进行厌氧释磷, 厌氧上清液(富含 NH<sub>4</sub><sup>+</sup> 和磷)进入 MBR 反应池中进行硝化反应, 活性污泥直接进入 A<sub>2</sub>OSBR 中参与缺氧反硝化除磷反应。与此同时, 缓冲池内预存的硝化液泵入 A<sub>2</sub>OSBR 池进行缺氧反硝化除磷, 经沉淀出水后, 进入短时曝气阶段, 最后沉淀出水。通过研究 C/P 分别为 60, 50 和 40 情况下 COD, TP, NH<sub>4</sub><sup>+</sup>-N 和 TN 的去除率, 发现 C/P 为 60 时处理效果最好, 去除率分别为 89.8%, 97.6%, 83.9% 和 76%, 而 C/P 为 40 时, 虽然处理效果降低, 但是仍然表现出良好的脱氮除磷能力。此外, 还有研究表明, 在不进行后置曝气的条件下, 即 SBR-MBR 工艺, 在进水 C/N 为 4.2~8.6 时, COD, TP, NH<sub>4</sub><sup>+</sup>-N 和 TN 的去除率依然可以分别达到 86.4%~90%, 61.8%~76%, 85.2%~93.6% 和 97.6%~99.3%。

A<sub>2</sub>NO-MBR 双污泥系统的硝化过程在好氧膜上完成, 减少了剩余污泥<sup>[11]</sup>, 从而降低了处理成本, 并且具有很好的抗负荷冲击能力, 当 C/N 和 C/P 的浓度变化较大时, 依然表现出良好的脱氮除磷能力, 适用于处理有机物浓度变化较大, C/N 和 C/P 较低的农村污水。

## 2.5 工艺比较

从表 1 可以看出, SBR-BCO 双污泥系统相比于传统 SBR 污泥系统, SBR-BCO 双污泥系统在处理低 C/P 的污水, 特别是 C/P 低于 17 的污水时, 依然表现出优秀的脱氮除磷效果。当 C/P 在 8.3~40 时, SBR-BCO 双污泥系统的 COD 去除率和氨氮去除率依然可以达到 90% 以上, 说明 SBR-BCO 双污泥系统具有很好的抗负荷冲击能力。

表 1 不同工艺处理效果比较

工艺	C/P	C/N	COD 去除率/%	氨氮去除率/%	TP 去除率/%
SBR	100	5~10	74.92	25~80	15~60
SBR-BCO	8.3~40	-	96.9	97.6	83.3
SBR-SBBR	-	3~6	94.9	81.2	89.5
SBR-MBR	-	4.2~8.6	86.4~90	85.2~93.6	97.6~99.3
前置 A <sub>2</sub> NSBR	3~78	3.1~5.7	84.3	98.4	93.9

SBR - SBBR 双污泥系统和前置 A<sub>2</sub>NSBR 双污泥系统在处理 C/N 低于 4 的污水时,依然保持良好的 COD、氨氮和 TP 的去除率和处理稳定性,展现了较好的脱氮除磷性能。SBR - MBR 双污泥系统在处理水质变化较大的污水方面有良好的表现。

### 3 结语

间歇式双污泥工艺既拥有 SBR 工艺可以处理流量变化较大的污水的特点,又拥有双污泥系统低 C/N、低需氧量、低污泥产量的优点,有很好的抗负荷冲击能力和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利用间歇式双污泥系统处理农村污水时,既可以适应农村污水的低 C/N 和低 C/P 的特点,又可以适应农村污水的水量和水质随时间变化较大的特点。此外,双污泥系统在降低需氧量和减少剩余污泥方面,减少了污水处理成本,比较适合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随着对双污泥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双污泥工艺的不断优化,双污泥工艺在农村污水处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应用前景,期望找到一个适合农村污水水质和农村经济条件的双污泥工艺。

### 参考文献:

- [1] 鞠昌华,张卫东,朱琳,等.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J].环境保护,2016,44(6):49-52.  
[2] 张亚平,徐茂,赵坤,等.5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运行

- 效果[J].安徽农业科学,2016,44(30):50-53.  
[3] 文艳.改良 SBR 法同步硝化反硝化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8.  
[4] 赵伟华,王梅香,吕冬梅,等.前置 A<sub>2</sub>NSBR 工艺系统的启动特性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16,36(9):2689-2695.  
[5] 秦玮. SBR - BCO 双泥系统脱氮除磷特性及生物代谢动力学模型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16.  
[6] 王松凯. SBR - BCO 双污泥反硝化除磷工艺应用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工程示范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20.  
[7] 李桥. 双泥膜法 SBR 短程硝化反硝化脱氮除磷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  
[8] 丁文川,李桥,吉芳英,等.双泥 SBR 系统的短程硝化反硝化和反硝化除磷研究[J].中国给水排水,2010,26(13):11-14.  
[9] 达方华,王焱,王超超,等.短程硝化工艺的快速启动与影响因素研究[J].水处理技术,2021,47(11):111-116.  
[10] 杜东梁. 后置曝气膜法双污泥工艺运行特性[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17.  
[11] MOHAN S M, NAGALAKSHMI S. A review on aerobic self-forming dynamic membrane bioreactor: Formation, performance, fouling and cleaning [J]. Journal of Water Process Engineering,2020,37:10154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Application of Intermittent Dual Sludge Process to Treat Rural Sewage

SONG Boyu<sup>1</sup>, BIAN Xiaozheng<sup>1</sup>, HUA Jieping<sup>1</sup>, HUANG Jianping<sup>1,2\*</sup>

(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2. Henan Water Pollution and Soil Damage Remedi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mittent double sludge process combines SBR process with the double sludge system, which not onl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SBR process for treating sewage with high flow change, but also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C/N ratio, low oxygen demand and low sludge output of the double sludge system.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treatment effect of SBR system, improved SBR system and several batch double sludge systems are introduced,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economy are compared. The treat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mittent dual sludge system has a good effect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in the treatment of wastewater with low C/N ratio. And has a very good load resistance capacity, can be used to treat the water quality change.

**Key words:** SBR process; dual sludge system; rural sewage